

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

李鸿彬/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李鸿彬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1

(学者文丛)

ISBN 7 - 80504 - 935 - 1

I. 满... II. 李... III. ①满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②中国—古代史—研究—清前期

IV. K282.1②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3800 号

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

李鸿彬/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铁道部十八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240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 - 80504 - 935 - 1

定 价: 20.00 元

序

□ 秦宝琦

著名清史专家李鸿彬教授一生研究的结晶《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终于出版了,从而实现了他生前的一个宏愿,也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

李鸿彬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就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和勤奋好学的品质。1960年从北大毕业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先后在中国历史教研室和清史研究所担任教学与研究。他在工作中总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在清史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不仅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而且亲手创办了《清史研究》并担任主编多年。他在清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正如著名清史专家李治亭教授所说:“鸿彬教书育人,可为人师表;主持编刊,甘为学人铺路;他潜心治学,自成一家之言,在我国清史尤其是清前史研究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这是对他最中肯的评价。

鸿彬一生著作颇丰,仅有关清史的学术论文就多达一百五十余篇,其中不少还是在身患重病期间完成的。综观他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在清前史方面有重大突破。

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对清王朝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清王朝的建立者——满族乃是“外族”、“异族”,而清入关建立清帝国,乃是“外族”、“异族”对中国的“入侵”,明清两个王朝的更迭,则是历史的“倒退”,视明朝的汉人政权为“正统”,而视满族建立的清王

朝为“异端”。鸿彬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撰文指出,满族既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那么,满族的崛起与明朝的衰亡,无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应该充分肯定清朝的历史地位,从而突破了传统观点的束缚,促进了清史研究的发展。

其次是在学术观点上求实创新。

鸿彬在清前史研究方面,一直坚持求实创新的原则,从不人云亦云。他对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看法,后金政权封建化的过程、明清战争,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一系列创见。例如关于努尔哈赤之死,历来的说法是,因为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时中炮重伤而亡。而鸿彬却根据新的史料,考证出所谓“炮伤说”乃是根据朝鲜人李星龄的误记流传下来的错误说法,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努尔哈赤死于病疽。再如,关于满族的祖籍问题,鸿彬也提出了新的看法,指出努尔哈赤的祖先原来居住在黑龙江北岸,从而科学地解释了努尔哈赤祖先的由来。

第三是资料翔实,言必有据。

鸿彬的学术论文皆言之有据,不讲空话,每个论点、每个结论皆有翔实的史料依据,他所使用的每条史料,也都经过严格的考证。他在研究工作中,使用了大量考古和文献方面的资料,在文献资料中,又特别重视明清档案和稀见的史籍,包括满文和藏文的史料,此外,还引用了诸多朝鲜文和日文的资料。

鸿彬生前一直希望用自己多年来在清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撰写成一部全面、系统的清代前史。不幸从 1992 年起他就患上了重病。在患病期间,他仍然念念不忘终生奋斗的清史研究工作,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从所撰写的一百五十余篇学术论文中,精选出数十篇精品,准备改写成专著。可惜,病魔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使这一宏愿最终未能实现。值此鸿彬逝世两周年之际,鸿彬夫人提出把鸿彬论文整理出版的想法,并得到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作为鸿彬生前的同学、挚友和同事,义不容辞地接受了

鸿彬夫人吕姝清教授的委托,在鸿彬生前初步整理的基础上,编辑成《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这部专著。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部著作仅仅反映了鸿彬全部研究成果的很少一部分,而且是按照论文的内容编辑而成,尽管还不是一部全面、系统的清前史,但是,却包括了清前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本书能够对我国清前史的研究有所推进,受到读者的欢迎。我非常同意李治亭教授在纪念鸿彬辞世一周年时所说的:鸿彬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思想、做人 与治学精神,是他留给清史学界的一份珍贵遗产。这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就是鸿彬教授留给我国清史学界的珍贵遗产之一。

2002 年 10 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前 言

我国自古以来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进步,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满族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关外满族崛起,关内爆发农民起义,如同两股波澜壮阔的洪流,猛烈地冲击朱明王朝的统治基石,使其摇摇欲坠,大厦将倾。

满族的杰出领袖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起兵统一了女真各部,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从狭窄的苏子河流域进入广阔的辽沈地区,满族由落后的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

皇太极即位后,其父努尔哈赤留下的并不是一桌丰盛的筵席,而是“邦家未固”的严重局势。他审时度势,提出了“讲和自固”的战略方针,争取时间,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等方面比较全面的改革,使汗权加强,满族贵族之间和满、汉之间的矛盾得到和缓,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兵力强盛,加速了后金封建化的进程。同时消除了东面朝鲜,西边蒙古的威胁和后顾之忧,并取得松锦大战的胜利。明朝在关外的精锐丧尽,从而为清军入关铺平了道路。

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清军占领北京后,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清朝、南明和农民军(大顺、大西)政权三种政治势力鼎足的局面,实际上以清朝为一方,以南明和农民军抗清为一方,双方对垒的势态,就实力而言,抗清一方占优势,清朝则处于劣势。这种优势和劣势不是固定不变的,更不能以此决定胜负,其中人的因素很重要,如果从双方决策者的素质来看,

清摄政王多尔衮无论是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都比抗清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南明诸王要高明得多;若从双方内在的凝聚力考察,清方满族内部比较团结,使内耗减少到最小程度,而且联合蒙古,团结汉官,形成了满、蒙、汉统一战线。抗清阵营内部十分涣散、矛盾重重,这时急需一位足智多谋、捐弃前嫌的英雄人物来组织和领导这支队伍,可是没有人能承担此项使命,因此互相猜忌,各自为战,如当大顺军李自成处于危难关头时,大西军张献忠却袖手旁观。而南明与农民军积怨太深,企图以割地纳款联合清军攻打农民军,农民军曾一度联明反清,南明却无诚意,貌合神离,借刀杀人。历史辩证法则是无情的,抗清阵线由优势变为劣势,清朝则由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清朝完成了清初的统一。

明末清初是风云变幻、新旧王朝更迭之际,各种政治势力都在进行较量,活跃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各自选择自己政治坐标,去拼搏奋斗。于是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出现了既肯定皇太极,又肯定袁崇焕;既肯定多尔衮,又肯定李自成;既肯定范文程,又肯定郑成功等似乎十分矛盾的评价,其实并非矛盾。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历史是由各种合力组成的,以上人物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肯定他们是科学的,符合历史真实的。

清王朝虽然是我国封建王朝的延续,但面临的历史任务却有别于前朝。当时西方殖民者开始东侵,国内仍存在敌对势力,因此巩固国家统一,抗击外国侵略,实现全国的社会稳定,恢复和发展生产,则是其历史使命。随之,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大展宏图、厉行改革、文治武功,从而完成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大业,为我国疆域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长期战乱遭到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科学文化兴盛,人才辈出,许多学科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于是出现了为世人讴歌的“康乾盛世”,成为屹立在东方的强大的中华帝国。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历了近百年的“康乾盛世”,而五十年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其原因是清朝统治者推

行闭关锁国政策,没有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未能用变革的手段,达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追赶上去的目的,却沉醉在“天朝上国”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对世界无知,造成近代中国惨痛的历史教训。

著 者

1999 年春节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满族的由来与形成	(1)
--------------	-------

第一节 满族的先世	(1)
-----------	-------

第二节 满族的祖籍	(5)
-----------	-------

第三节 明代女真(满族)铁业的发展	(10)
-------------------	--------

第四节 关于三万卫	(19)
-----------	--------

第五节 后金对朝鲜的两次战争	(32)
----------------	--------

第六节 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	(59)
-----------------	--------

第二章 清朝的开国	(87)
-----------	--------

第一节 努尔哈赤与萨尔浒之战	(87)
----------------	--------

第二节 宁远之战与努尔哈赤之死	(99)
-----------------	--------

第三节 皇太极的继位	(114)
------------	---------

第四节 清朝开国及其对明议和策略	(125)
------------------	---------

第五节 皇太极与松锦大战	(158)
--------------	---------

第三章 清帝国的建立与全国的统一	(186)
------------------	---------

第一节 多尔衮与山海关大战	(186)
---------------	---------

第二节 孝庄文皇后在清帝国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203)
-----------------------	---------

第三节 清初杰出的汉族政治家范文程	(213)
-------------------	---------

第四节 清王朝与大顺政权的战争	(221)
-----------------	---------

第五节	洪承畴在清初统一过程中的作用·····	(238)
第六节	清廷对东南各地的统一·····	(249)
第七节	康熙统一台湾·····	(286)
第八节	施琅、吴英与澎湖海战·····	(298)
第四章	康乾时期的安内与攘外·····	(323)
第一节	康熙平定布尔尼叛乱·····	(323)
第二节	乾隆时期的金川之役·····	(331)
第三节	清廷反击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	(346)
第五章	清前期几位杰出的科技人才·····	(369)
第一节	杰出的治河专家陈潢·····	(369)
第二节	火器制造家戴梓·····	(377)
第三节	农学家杨岫与《蠡风广义》·····	(381)
后 记	·····	(388)

第一章 满族的由来与形成

第一节 满族的先世

清王朝的建立者满族的先世,学术界已经发表过诸多的论著,这里不准备对此做系统的论述,仅从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看到唐张建章墓志铭,做进一步探讨。此墓志是1956年11月在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附近出土的,志石两块方形,志盖刻篆书“唐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铭”,四行十六字。志文楷书,三十二行,满行三十一字,共计九百零九个字。这块墓志的出土,对了解和研究唐朝与渤海关系的历史,颇为重要。

隋唐时期,居住在我国东北境内的少数民族靺鞨人分为七大部。其中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和辉发河流域的粟末靺鞨部,到了公元7世纪末,兼并周围各部,势力日益强大。698年(唐圣历元年),粟末首领大祚荣自立震国(或作振),称震国王。705年(唐神龙元年),唐中宗派遣侍御史张行岌前往招抚,大祚荣随即归附。713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派遣郎将崔忻前去粟末地区设置忽汗州,任命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并册拜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于是大祚荣“去靺鞨号,专称渤海”^[1]。可见史称“渤海国”之名是由唐王朝的册封而来的。

渤海是唐朝的地方政权,辖地东起日本海,西达大兴安岭,南接新罗,北抵黑龙江,管辖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渤海自大祚荣时代到为辽所灭,共经历十五世二百二十九年。这个时期,渤海和唐

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除了大量文献记载外,张建章墓志就是很好的历史物证,它是继崔忻“鸿胪二井”^[2]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其志文不仅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文献记载的谬误,从而更使我们增加了具体深入的认识,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两点:

第一,当时的渤海和唐朝保持着严格的臣属关系,渤海地方政权,为了向唐朝中央政府报告地方情况,缴纳贡赋,经常遣使朝贡,据统计“渤海十五王中朝于唐者,凡一百三十二次”^[3]。而唐王朝也不断派敕使赴渤海,宣谕朝命,检查地方工作。张建章就曾奉命出使渤海,可是关于这次出使活动,现存的唐代文献皆不见,新旧唐书也无记载,只是宋人所著《北梦琐言》、《南部新书》中,曾提到张建章赴渤海一事,内容非常简单,不能说明问题。根据《玉海》的地理类转引《唐志》的记载说:张建章所著《渤海国记》是在唐文宗大和年间。又据《宋史》王溥传的记载说:唐大和中,有幽州从事张建章著《渤海国记》。因此,近人金毓黻先生在他所著的《渤海国志长编》一书中,推论认为张建章出使应是835年,即唐文宗大和九年^[4]。由上可见,有关张建章这次出使渤海的历史材料很少,更不能很好地说明唐朝与渤海的关系。

但是,张建章墓志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次出使十分具体而又翔实的史料。根据志文记载,张建章,字会主,北平人。生于807年(唐元和二年),卒于868年(唐咸通九年),享年六十一岁。833年(唐大和七年,即癸丑年),张建章二十七岁时,因为“渤海国王大彝震遣司宾卿贺守谦来聘”,所以唐王朝也要遣使前往渤海,经过“府选报复”,决定派张建章“假瀛州司马,朱衣使行”出使渤海。这年的秋天,他从山东登州,“方舟而东,海涛万里”,渡过渤海,经旅顺,于“明年(即834年,唐大和八年)秋杪,达忽汗州”。渤海王大彝震对唐的来使,“重礼留之”,张建章对此盛情难却,只好“岁换而返”,临行时“王大会以礼,货宝器名马文犀以饯之”。835

年(唐大和九年)八月,他回唐“复命”,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出使渤海的任务。以上志文所述张建章出使经过,可以补充和更正过去文献记载的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

第二,自宋以来,有些人的著作中记载说,张建章曾著有《渤海国志》一书,如《新唐书》艺文志所记:“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又如《宋史》艺文志也记:“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等等。因为《渤海国记》是张建章出使渤海以亲身耳闻目睹撰写而成的一部专著,所以一直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可是《渤海国记》早已失传,仅留一份存目,至于此书内容,人们一无所知。然而据张建章墓志志文的记述,他出使渤海回来时,“凡所笺启赋诗,盈益帙帙,又著渤海记”。这就证实了张建章的确写了一部《渤海记》。志文又说《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由此可知,它记载了渤海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后晋刘昫撰写的《旧唐书》艺文志里,没有收录张建章的《渤海记》,而宋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艺文志中把此书收进去了。这说明刘昫很可能没有看到张建章的《渤海记》,后来的欧阳修却看见了。这从新旧唐书所写的渤海两传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旧唐书》渤海传,只是简略地述说了渤海建立、诸王相袭、唐和渤海关系的情况。可是《新唐书》渤海传,除了充实丰富了《旧唐书》所记的内容外,大量地增加了有关渤海的地方建制、行政区划、官员设置、物产分布和社会风俗等情况。如果按照志文说《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来考虑,欧阳修撰写《新唐书》渤海传时,参考了张建章的《渤海记》。因此,我们可以想见《新唐书》比《旧唐书》增补的内容,很可能就是《渤海记》里的。

现将张建章墓志录文如下:

唐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番副使摄蓟州刺史正议大夫检校
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安定张公墓志铭并序。

从兄幽州节度掌书记中散大夫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珪撰。

弟前幽州节度衙前散兵马使总章书。

公讳建章，字会主，中山北平人也。其先受氏于轩后，系祖于前凉，降及冠冕，闲闲历代沿袭，家谍详备，故编近以识□。高祖颖贞，皇特进朔方节度副大使知使事鄯国公赠司空。曾祖阍，皇特进太府少卿充河北陆运使，临泾侯赠太子少傅。祖诜，皇儒林郎守定州北平县远知县事。考幬，皇通议大夫检校太子右谕德涿州别驾。公幼聪而俊晰，美而和时，谓閭生琳琅，乡中英妙，洎青襟从师，丹青有志，年十六，云水兴高，风月吟苦。旋自试于秋赋，明敏著名，尚持疑□春□，琢磨益厉。大和四载，博陵歎，尤迫旨甘，乃咄嗟而谋曰：仲由负米，毛义捧□，孝敬之行也。予独何为，执以厥养，□亲便近游方者燕，既馆□礪石。太保李公□□磨之安次尉，逾年李公入觐，弘农杨仆射受钺，星纪再周，渤海国王大彝震，遣司宾卿贺守谦来聘。府选报复，议先会主假瀛州司马，朱衣使行。癸丑秋，方舟而东，海涛万里。明年秋杪，达忽汗州，州即挹婁故地，彝震重礼留之，岁换而返□，王大会以礼，货宝器名马文犀以饯之。九年仲秋月，复命，凡所笺照启赋诗，盈益缙帙，又著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历司徒史□知而竟□，至太尉，张公以素分擢受节度，随军，委之草檄，询之运筹，破虏荐名，授节度巡官，监察御史里行；寻迁幽州节度掌书记，转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搢琳之笔，勒班超之功。

不幸府故，嗣袭福王遥即，公入处宾寮，迁尚书

主客员外□兼□史，赐绯鱼袋，将还加水部郎中，充观察判官，无何，工部奏遣归阙，汝南周公代未□而捐馆。保相清河公弓招，表升驾部郎中，余如故。□□明之典，加兵部郎中，幽州节度判官。大中十二年敷奏，对扬大悦，圣旨面赐金紫兼御史中丞，贾生宣室之□，方朔辩对之机，百辟荣观。咸通五年四月，奏升押奚契两番副使正议大夫检校左庶子兼御史大夫储□清崇。亚相显贵。六年十月，摄蓟州刺史诸军事，期幸麦之端，□□袴夸之谣、渔阳大理。七年九月十日，大病于官舍，享年六十一，词锋没于逝川，学□□为朽壤悲人。夫人京口韦氏，先公而谢五年矣。以咸通八年二月二日，迁室于府城东南七里邓村之原，用鲁礼。有子二人，长曰奠，前莫州任丘主簿，迁衙前将，璵曰小丑。有女一人，适归义县丞石令存，皆□慕□祈，以珪通旧且宗。请志陵谷，铭曰，碣石山高兮，上捧其星。桑乾水远兮，下注沧溟。中有崇□兮，叶吉泉局，贤人官业兮，万古方馨。

第二节 满族的祖籍

关于清代满族祖籍的记载，无论是官书，还是私著，都肯定是长白山，几乎已成定论。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官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此书称：“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儿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

时长白山东南鳌莫惠(地名)鳌朵里(城名),内有三姓夷酋争长,终日互相杀伤。……三酋长……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古伦所生,姓爱新(华言金也)觉罗(姓也),名布库里英雄。……三酋长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5]

这段脍炙人口的动人传说,以后有清一代凡叙其满族祖先起源时皆缘之。这个充满神奇幻想的神话,虽然有些情节荒诞无稽,但是并非毫无根据,在一定的程度上和某些方面则是客观现实与生活斗争的反映。它清楚地告诉人们满族先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英雄,生长活动在长白山东麓布库里山下布儿湖里湖和鳌莫惠的鳌朵里城一带,鳌朵里城则是始祖布库里英雄居住的地方。

那么鳌朵里城在何处呢?同该城相联系的布库里山、布儿湖里湖、鳌莫惠又在何处呢?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说,“黑秃阿喇(辽宁新宾)距鳌朵里西千五百余里”^[6],尽管知道了鳌朵里城的大体方位,但是仍无法确切知道鳌朵里城址。所以,到了康熙时期,他为了弄清楚自己的祖籍,便于康熙十六年(1677)特命内大臣觉罗武木讷等人,前往长白山进行调查,所谓“专官访求,备历险异”,并“召村庄猎户”询问,皆“无知其处”^[7],结果就把“树峻极之雄观,萃扶舆之灵气”^[8]的长白山作为祖宗的发祥地。自此直至乾隆初年,仍然不知道鳌朵里城在哪儿,因此我们看到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重修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雍正十二年(1734)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校订本》、乾隆四年(1739)成书的《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都承袭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说法,只是在个别字句上加以修饰润色,其他内容无一变动。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乾隆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的《大清一统志》记载:

勒富善西岸有鄂多理城,周一里一百步有奇,门三,四围有濠,子城周百步有奇,南一门,本朝初定三姓之乱,国号满

洲,即肇居于此^[9]。

又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修的《盛京通志》记载:

谨稽发祥世纪,始祖居长白山东鄂谟辉之野鄂多理城,在兴京东一千五百里,宁古塔城西南三百三十里,勒富善河西岸^[10]。

这两部乾隆中期修的清代重要官书,皆说鄂多理城(鳌朵里城)在勒富善河西岸,即吉林省敦化县境内。

如果这种说法可信的话,便有以下两个难解的疑问:其一,《大清一统志》和《盛京通志》都认为鄂朵理城在牡丹江上游勒富善河西岸,那么为什么同鄂朵理城有关的鳌莫惠和布库里山,以及布儿湖里湖在其周围皆找不到呢?其二,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记载,都说鄂朵理城在长白山的东面,那么为什么《大清一统志》和《盛京通志》却把鄂朵理城移置到长白山的西边去呢?因此,我认为鄂多理城在勒富善河西岸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不可信的。

满族是女真的后裔,女真族曾长期活动在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建立过强盛的金王朝,后来虽然有大批女真人迁入关内,但是仍有许多女真人留居旧地,这部分女真人正是满族的直系先世,所以,当满族兴起后,努尔哈赤建国号大金和皇太极改姓爱新觉罗,都是表明他们继承先世金的事业。因此,他们对黑龙江流域的同族兄弟十分怀念,如皇太极说:“此地人民语与我国同……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11]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命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等人,率领“兵二千五百人,往征黑龙江地方”^[12]。第二年五月凯旋归来,在归降者中有个名叫穆库什克的人,据《旧满洲档》记载,他向人们讲述那里有关自己先祖的传说:

我父祖世居布库里山麓布勒和里湖,我处无书籍档册,有关古昔情况,悉依世代相传。昔于布勒和里湖有三天女,俄古伦、京古伦、佛古伦来浴,最末一天女将一由神鹊衔来的红色

果实含于口中，落入喉内，于是身重，随生布库里雍顺，此族即满洲国。布勒和里湖周围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三十里，生二子之后，遂离布勒和里湖，迁至萨哈连乌喇之纳尔浑地方居注。^[13]

《旧满洲档》的这段记载，不见于清代的官书私籍，若把它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对照比较，却给我们两点十分重要的启示。

第一，《旧档》和《武录》有许多相同之处，如三仙女在布勒和里湖（一称布儿湖里湖）沐浴吞果生满族始祖布库里雍顺（一称布库里英雄）。又如始祖布库里雍顺开始生活在布库里山下的布勒和里湖一带，后来由此迁往纳尔浑（一称鳌莫惠），等等。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两者有密切联系，实际上是说同一件事。

第二，《旧档》和《武录》也有明显不同之处，最重要的是满族始祖布库里雍顺生长居住的地方，《旧档》说是黑龙江（即萨哈连乌喇）流域的纳尔浑，《武录》说是长白山以东鳌莫惠的鳌朵里城。但是《旧档》所载穆库什克讲述的三仙女传说，早就在黑龙江一带“世代相传”了，显然比《武录》成书的时间要早得多。因此，《武录》的“长白山说”，很可能来源于《旧档》的“黑龙江说”。所以，应把寻觅满族祖籍的视线由长白山转移到黑龙江。

我们利用历史文献和历史地图，沿着黑龙江流域查找同满族先祖布库里雍顺生长活动有关的山川湖泊地名，结果有了新的发现。

据《盛京通志》山川黑龙江条云：

黑龙江城南七十五里有薄科里山，城东南六十里有薄和力池^[14]。

又据《水道提纲》黑龙江条云：

德儿得尼城之东北有博儿豁里鄂谟（即池或湖）……黑龙江南经德儿得尼城东，东岸数里即车赫城，亦隔水相望也，有博库里河，自西北来绕城南而东注之，又南经博库里山东麓南

汇为湖^[15]。

按照《盛京通志》和《水道提纲》两书所提供的有关黑龙江城(即瑗珲城)、德儿得尼城、薄科里山(即博库里山)、薄和力池(即博儿豁里鄂漠)的地理方位再去查考清代的历史地图,一切就更明白了。

据乾隆时绘制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标明,从精音里江(即精奇里江)和黑龙江汇合处,到博科里河与黑龙江合流处之间,在黑龙江左岸有瑗珲城,博勒和涅鄂漠,右岸有博科里山。

又据光绪时绘制的《黑龙江舆地图》标明,自精奇里江口到逊河口,在黑龙江左岸有博尔和里鄂漠,博科里城,该城是辽五国剖阿里国故城,俗称鄂尔多。

再据《清代布特哈衙门管辖图》(满文本)标明,在黑龙江左岸有瑗珲城和博勒霍若池,右岸有博科里山、博科里河。

综观上述史籍的记载和史图的标注,十分清楚说明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的布库里山,就是黑龙江右岸的薄科里山(即博库里山),满族先祖布库里英雄,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正是依据布库里山取名的。布儿湖里湖就是黑龙江左岸,同布库里山隔江相望的博儿豁里鄂漠(即薄和力池、博勒和涅鄂漠、博尔和里鄂漠、博勒霍若池),鳌莫惠就是布儿湖里湖北面的瑗珲,此处也是《旧档》中所说的纳尔浑。但是《武录》中的鳌朵里城,在《旧档》里没有提到,不过我认为鳌朵里城有可能就是瑗珲东南的博科里城,又称鄂尔多城。由上可见,满族先祖活动的地区,并非在长白山以东,而是在黑龙江省爱辉县和对岸江东六十四屯境内。所以说黑龙江是满族的故乡,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关于黑龙江流域是清代“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16]这一科学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第三节 明代女真(满族)铁业的发展

明代女真铁业的兴起,是女真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女真铁业获得较为迅速发展是有其深刻社会原因的。明代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大体分布“其地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17]的广大地区之内。明王朝为了加强对女真的统治,在女真地区于明永乐七年(1409)设置奴儿干都司,管辖三百多个卫所,作为明政府的地方行政机关,它“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18]。这就密切了明中央政府同女真地区的联系,对于女真社会的发展,促进关内外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积极作用。

明初,依据女真分布的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分成建州、海西及“野人”三大部。明朝人对这三大部女真的经济情况,做过以下描述:建州女真“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19];海西女真“俗尚耕稼……倚山作寨”^[20];“野人”女真“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21]。这清楚说明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部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而采猎经济则是“野人”女真的社会生活方式。此外,由于明王朝对女真采取“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22]的分而治之的办法,致使女真各部长期陷于分裂、混战状态。再加上此时女真正处于奴隶制早期发展阶段,奴隶主把战争视为掠夺财富和奴隶的重要手段,因此女真诸部之间及其内部,不断发生战争,据明人毕恭的《辽东志》记载,“野人”女真时常侵袭海西和建州,所谓“数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23]。而各部内部也是“攘夺货财,兄弟交嫉”^[24],相互厮杀。正是以上女真社会农业、采猎和战争的需求,皆“以铁物为贵”^[25],从而客观上为女真铁业的兴起与发展开辟了道路。

明代女真,原不知用铁,他们的生产工具和作战武器主要是以柁木及兽角骨为原料加工制造而成。如朝鲜《李朝实录》卷二记载,“野人(女真人)以唐牛角或以本土牛角自造弓”。卷五二载“往时野人屈木为镗,削鹿角为镞”。卷五十载“所谓骨镞者,以熊脚骨久沉于血,则其坚如铁,故用以为镞耳”。只是到了15世纪中期,铁器在女真地区才比较广泛地使用,这时“野人箭镞,昔皆用骨,今则皆以铁为之”^[26]。而且“近年以来,颇业耕农”,使用铁制农具进行生产^[27]。

当时女真人用的铁器主要来自明朝和朝鲜。女真诸部是通过赴明京师朝贡及边关马市贸易取得所需要的大量铁器,根据明政府规定,女真三大部的各个卫所要“以时朝贡”,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令岁以冬月从开原入朝贡,唯野人女直僻远无常期”^[28]。每次进京人数很多,少则几十人,多达两三千人。所献贡品皆是地方名贵土特产品,如马匹、貂皮、阿胶、人参、海东青等,虽然明王朝对“贡到方物,例不给价”^[29],但是明朝政府按照朝贡者官秩大小,授给抚赏与回赐,另外,他们所带货物,允许在京师指定的市场上交易,换取或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在这些抚赏、回赐和交易中女真能够获得不少铁器。与此同时,女真各部还到明朝开设的开原、抚顺、清河、绥阳、宽甸等处“马市”进行交易,铁铤、铁锄、铁锅等铁器是女真交易的主要商品,明政府对重要出口商品要抽税,据明正统年间修的《辽东志》卷三《边略·抽分货物》记载,所列货物中就有铁锅,每口铁锅,抽税银一分。明嘉靖年间编的《全辽志》卷二《马市抽分》也记载,每只铁铤抽税银五分,每口铁锅抽税银二分。我们根据辽宁省档案馆现存明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统计,仅铁铤子就有四千二百九十二件输入女真地区^[30]。

除了明朝,朝鲜也是女真铁器的重要供给地,因为女真地区盛产各种毛皮,尤其以貂皮更为著称,而这些上等名贵毛皮正是天气

寒冷的朝鲜官民所需要的防寒佳品。当时朝鲜政府公开明令西北诸镇向百姓征收貂皮,即“国家以五镇之民,困于防戍,令减杂徭,但赋土豹皮、貂皮、鼠皮而已”^[31]。此外,朝鲜国王和一些京官也向西北诸镇地方官索取貂皮,于是地方官员“皆以貂皮进上,而貂皮非近境所产,故将牛马、铁物市于深处兀狄哈而来,若无貂皮,虽有功劳,上京者当次者,不得上来者有之”^[32]。而一般官民富有人家也很喜爱穿戴貂皮,所谓“近来奢泰成习,下流贼品,莫不潜着,富家巨室,迭相矜炫,如衣裘衾席之属,亦皆以此为之。乡间小会,妇女无貂衣者,耻不肯赴焉”^[33]，“且毛裘宜于老者,而年少妇女皆服貂裘,无此则羞与为会,数十妇女之会,无一不服者”^[34]。由于需要大量貂皮,所以女真对朝鲜非铁器“则不与之易,故不得不尔”^[35]，“边将率以铁物购买貂鼠皮,至于农锄、箭镞,无所不用”^[36]。因此“貂皮价高,谋利者云集北道,市索无已,至以牛马、铁物买之……有以二锄易鼠二张者”^[37],或者“以箭镞四个,贸貂皮一领”^[38]。女真人除了以貂皮易朝鲜铁器外,而且要求朝鲜赎回被俘人员也要用铁器换取,据《李朝实录》卷二八二记载,“掳一人而去,如欲刷还被掳人,以牛三十头,马一匹,甲一、釜十、田器十部、锄十、斧十、铧铤五、铧五许我,则当以此买来”。由此可见,朝鲜铁器大批流入女真地区。

明王朝知道铁器“皆彼夷(女真)日用所需”^[39],从政治上考虑,“许买铁器,以结其心,皆羁縻之义”^[40],企图以此来笼络和控制女真。明政府又害怕女真强大起来,所以严格管制铁器,特别是不准铁制兵器运往女真地区,早在明正统四年(1439),明署都指挥金事毕恭首请禁铁,勿以资敌,他奏称:

靺鞨子、海西女直归自京师,道过边境,辄以所得彩币或弩马市耕牛及铜、铁器皿。臣以耕牛边人所恃为生,而铜、铁器外夷所资以为用,乞禁勿与市。^[41]

明正统皇帝“可其奏,谕总兵巡抚等官禁之,敢有犯者,治罪不

宥”^[42]。明廷虽禁，则禁而不止，经过三十多年，到了明成化十二年（1476），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疏言：

比年朝鲜陪臣及建州、海西、朵颜三卫夷人入贡，军民人等辄以弓材箭镞与凡铁器私相贸易，诚非中国之利，乞下所司禁约。且以行人带领，通事伴送，沿途防禁之。^[43]

于是“事下礼部，请差行人，著为例，兵部请榜谕京师并诸边军民，违者谪戍边远，会同馆及沿途伴送官吏人等，有纵之者概治共罪，若吏人挟带出关，事觉拘入官，给还原直，仍追究所鬻之人。从之”^[44]。可见明廷对女真再次宣布铁禁。

朝鲜也同明朝一样感到问题严重，认为铁器“此虽小物，积之既多，则铠甲、矢镞皆可造耳”^[45]，“铁物多人彼地，其不利于我国大矣”^[46]，一旦女真强大，势必要威胁朝鲜的安全。所以，朝鲜许多官员指出：“野人（女真）持貂，吾民不惜农牛而易之，又以铁物者……而吾民之牛、铁尽归于彼，牛以厚其农，铁以利其兵”^[47]，“若不禁之，其弊大矣”^[48]。因此，他们向朝鲜政府提出严禁用铁器与女真交换貂皮等物的建议，并要求采取一些措施：首先向女真只许输出水铁（生铁），所以“北方野人，以水铁农器，易软铁为军器颇多，本国未知其术”^[49]。其次是“杜其源，凡以貂皮为衣裳衾席，及僭著耳掩者，严立科条”^[50]，“朝官所着貂皮物，一切禁断”^[51]。再次“且减进上皮物”^[52]，“请除五镇貂皮之贡”^[53]。还次“知情故放者，以违禁下海律科罪，有能捕告者，依此律文充赏”^[54]。

由于明朝和朝鲜对女真地区实行铁器禁运政策，致使女真人“男无铧铲，女无针剪”^[55]，严重地影响女真的生产和生活，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

女真为了摆脱缺乏铁器的困境，被迫不得不发展自己本民族的铁业生产，以满足生产、生活及战争的需要。从史料记载来看，女真铁业大约是在15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据朝鲜《李朝实录》成宗朝六年（1475）二月戊申记载：

平安道观察使承谕送唐人阿家化,其言曰:‘俺年十四岁时,为建州贼松古老等所抢,随住其家。松古老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唐女二人。同里而居者六家,而有冶匠,弓入焉’。又据朝鲜《李朝实录》成宗朝十四年(1483年)十月戊寅记载:

建州卫野人赵伊时哈等八人辞,命都承旨李世佐赐酒,仍问曰:“汝卫男婚女嫁,何以为礼?”答曰:“男往女家”。又问:“有纳采执币之礼乎?”答曰:“婿家先以甲冑、弓、矢为币,而送于女家”。……又问:“汝卫甲冑以何物为之乎?”答曰:“以铁为之”。又问:“铁产于何地?”答曰:“产于火刺温地面”。又问:“有冶工乎?”答曰:“多有之”。

但是,此时女真仍“不解炼铁”,只能“得正铁改造耳”^[56],即进行铁的再加工,还不能直接从铁矿石中提炼铁,所以“正铁”原料仍然依靠从明朝和朝鲜进口。尽管明朝及朝鲜多次宣称“禁铁”,但是时严时松,并非铁器绝对不流入女真地区。如明朝虽然“禁铁”,可是“所禁铁器非农器”^[57],主要是指兵器,不包括铍、锄等农器。而朝鲜也是无法阻止铁器输入女真境内,正像朝鲜侍讲官李芑启曰:“闻北平馆野人处贸易皮物者,前则如箭镞禁物,潜匿怀中卖之,今则弓角箭镞等物公然卖之”^[58],既然兵器如此,农器更可以买卖了。这就说明明朝和朝鲜对女真实行“禁铁”,虽然给女真带来生产与生活上许多困难,但是仍有一定数量的铁器流入女真地区。勤劳智慧的女真人把“所易之锅、铍……毁碎融液”^[59],再“自造”^[60]成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以及作战武器等,以供女真社会需要。

当时女真铁业,虽然处于铁器加工制造阶段,但是具有以下的特点:

——女真铁业已成为刚刚从农业分离出来的手工业中最重要的专业生产部门,并且已有本民族的制铁匠人。如朝鲜《李朝实录》成宗朝二十五年(1494)四月丙戌记载:

训练院习读官童清礼……条具书启：“一、富宁清岩里居向化(女真)七十余人，去庚子年(1480)逃入本土，翌年虽有刷还者，其未刷还者尚多，能造兵器”。

上面我们曾引朝鲜史料，已说明女真地区出现了专业的“冶工”、“冶匠”，这里所录材料只是进一步指出他们其中许多工匠是女真人。

——女真铁业，因受明朝和朝鲜的影响，制铁技术相当高，已经掌握鼓风和淬火技术。据朝鲜《李朝实录》成宗朝二十二年(1491)七月丁亥记载：

永安北道评事李世卿率被掳达生等三人来。……上复御宣政殿引见达生等。……上曰：“贼马何如？”达生等曰：“人马皆壮健矣”。上曰：“弓箭何如？”达生等曰：“弓矢皆强劲，设风炉造箭镞，皆淬之”。

这段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设风炉”，就是说女真铁业生产已有鼓风设备，此项技术能使炉温得以升高，从而关系到铁器的产量和质量提高。其次是“皆淬之”，即把烧红的铁器迅速置入冷水中，这种淬水的热处理技术，使生产的铁制品的坚韧性和锋利程度都大大提高。

——女真铁业，带有浓厚的军工色彩，兵器制造比较发达。由于对内对外战争的需要，有时“箭镞、甲冑日夜打造”^[61]，特别是制造铠甲技术尤精，据朝鲜《李朝实录》成宗朝二十二年(1491)正月辛丑记载：

别侍卫姜孝福启曰：“彼人百余名，骑步相半，而被铁甲者居其半。其被甲者皆以铁为领袖，又裹其面，所露者两目而已”。

女真人的甲冑中有“水银甲……兜鍪则以铁片编之，上有长铁钩，以象毛悬之，又以兽饰之”^[62]。又“以石鳞，或涂于胸，或着于胃，其光如水银”^[63]闪闪发亮。

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女真族在自己杰出领袖努尔哈赤的领导下日益崛起,此时女真的铁业获得了更迅速的发展,如果说这以前女真铁业仅能熔旧铁加工制造,那么现在已进入能够开矿冶铁锻造的新时期。何以如此,其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努尔哈赤领导女真人民对外抵御明军的进犯,对内进行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由于战争的需求,因此铁制兵器就显得更加重要。例如努尔哈赤早期曾把军队编成四编,“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64],这些兵种名称都和铁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无疑反映了铁制兵器在女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努尔哈赤的军队以骑兵为主,“兵皆铁甲,马亦被甲”^[65],可是规定每个官兵的马匹、兵器皆自备,所以许多人争购和打制精良的武器甲冑,因而刺激和促进了女真铁业的大发展,推动了制铁技术的革新。

第二,女真地区有丰富的铁矿、煤和木炭等炼铁原料,而且已有掌握鼓风与淬火技术的女真人“冶匠”。据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朝鲜出使建州的何世国报告,他见到赫图阿拉城中“甲匠十六名,箭匠五十余名,弓匠三十余名,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无日不措矣”^[66]。由此可见,当时女真铁业分工又专又细,所以从冶铁原料和技术工匠皆具备自己开矿冶铁的条件和基础。

第三,随着女真各部逐渐走向统一,努尔哈赤统治的地域扩大,人口增多,生产发展,对铁制的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数量需要也不断增加。可是明朝和朝鲜政府,为了扼制女真的强盛,铁禁更严,甚至停止贸易。这就给女真铁业进一步发展提出十分严肃的问题,以往“贸大明铁自造”^[67]遇到了困难和阻碍,铁器的供求产生了矛盾,所以开矿冶铁锻造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努尔哈赤根据女真社会的需要和可能,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宣布“始炒铁,开金银矿”^[68]。《沈故》一书记载,“是时太祖(努尔哈赤)尚居赫图阿喇,此矿当在今兴京百里内”^[69]。

前些年在赫图阿拉城外发现大量的生铁锭和生铁残块^[70]，从而证明女真冶铁一事是完全可信的。

努尔哈赤对冶铁锻造十分重视，对冶铁匠非常优待。据朝鲜《李朝实录》宣祖朝三十四年(1601)二月己丑记载：

往年北道点兵与老土相战时，北道人物被掳者善手铁匠，今在老酋城中。而昔胡地素无铁丸，兵器、斧、镰等物，以水铁反铸，得用极贵。一自铁人入去之后，铁物兴产，以此老酋欣然接待，原给杂物、牛马亦给。

努尔哈赤既然对朝鲜冶铁匠如此厚赏，而对女真本族冶铁匠更为优厚了，所以女真地区的冶铁匠地位很高，因而女真冶铁业得到优先发展。据天命五年(1620)朝鲜人李民葵《建州闻见录》，他把自己在建州地区亲眼所见，向朝鲜国王报告说：

银、铁、革、木皆有其工，而惟铁匠极巧。

明人程开祜的《筹辽硕画》卷首记载当时后金赫图阿拉城的情况时也说：

内外见居人家约二万余户，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孤矢。

综观上述，可见女真铁业的发展是很迅速的，而且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正像《满文老档》卷四记载的，从此“所需的金银铁等物，都已炼得，即使人们从未想到的东西，只要想到即可得到”。当年女真冶铁锻造的情景现在已不可见，但是辽宁省新宾县永陵博物馆的陈列室，却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珍贵实物。如冶铁残存的生铁锭、铁腰刀、铁铡刀、铁小刀、铁矛、铁镢、铁马蹬、铁盔、铁铲、铁叉等等，从这些历史文物的种类和质量来看，可以说明那时女真冶铁锻造业是比较发达的。

女真铁业，从依靠外地输入到“得正铁改造”，从“贸大明铁自造”到开矿冶铁锻造，大约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女真铁业的兴起和发展，曾对女真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下面做两点简要

的分析。

恩格斯指出：“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71]由于女真铁业的发展，首先使得女真的农业生产工具发生了重大变革，由过去生产效率低劣的骨木农具，改变为广泛使用生产效率高的铁制农具，如铧、铲、锄、斧、镰、耨。女真人使用铁的生产工具，反映了女真社会生产力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其次是使用铁制农具，扩大了耕地面积。据朝鲜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记载，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出使建州，自满浦渡鸭绿江，沿浑江支流新开河、富尔江至费阿拉城，途中所见“无野不垦，至于山上，亦多开垦”。当时不仅建州腹地如此，而且把耕地扩张到宽甸六堡和开原、抚顺附近。再次是铁制农具广泛使用，使农业生产由粗放变为精耕细作，从而作物品种增多，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此时在建州的朝鲜人李民寅说：这里“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72]。这些土地单产很高，“田地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73]。所以建州女真地区早先是依靠明朝供应粮食，但是至晚到了明万历初年，已有少量粮食运往辽东抚顺关马市出售^[74]，这种数量虽然不多，却十分深刻地反映了女真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另外，16世纪末，女真社会出现了要求统一的历史趋势。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为明军杀害为由，率“遗甲十三副”起兵，投入了统一女真的洪流，南征北战三十多年，终于“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俱征服”，使“诸部始合为一”^[75]，结束了女真社会的长期分裂与动荡不安的局面。接着，努尔哈赤又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领导后金军民打败十多万明军的进犯，取得了萨尔浒自卫战争的胜利，保卫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从而改变了辽东的形势，后金由防御转为进攻，明朝由进攻转入防御，这为以后清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努尔哈赤得到如此的成就，当然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因素虽然不是武器,但是武器是胜负的重要因素。努尔哈赤拥有一支用铁制兵器武装起来的军队,士兵防身的有铁头盔、铁铠甲、铁皮盾,进攻的武器有弓箭、铁矛、腰刀、大刀等。因此,如果女真没有铁业的发展,并用铁制兵器来武装自己的军队,要在东北迅速崛起,是有一定困难的,从这一点来看,女真铁业对该民族的勃兴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第四节 关于三万卫

一、三万卫设卫的时间

关于三万卫设置的时间,尽管中外学者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它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即拟设和置卫两个阶段。

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攻占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是太尉纳哈出、平章高家奴、知院哈刺张、丞相也先不花等一批故元残余势力,仍拥兵辽东,“彼此相依,互为声援”^[76],奉元为正朔,反对明王朝。辽东“南俯沧溟,北控朔漠”^[77],“乃东北之雄藩,实国家之重镇”^[78]。明朝为了统一东北,积极遣使“诏谕辽阳等处官民”^[79]。

洪武四年(1371)二月,故元辽阳平章刘益,派右丞董遵、合院杨贤,以辽东州郡地图和兵马钱粮册籍,奉表归降。明廷为“表嘉其诚”,在得利羸城(今辽宁复县),“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以益为指挥同知”^[80]。五月,刘益被叛将洪保保等杀害,于是明廷命马云、叶旺率师从山东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占领辽阳、沈阳等地。七月,明朝设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于辽阳,“以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81]。洪武八年(1375)十月,明朝“以在外各处所设都卫,并改为都指挥使司”,故改“定辽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82]。洪武十年(1377),又“革所

属州县置卫”^[83]，各卫担负“招降纳附，开拓疆宇”^[84]之使命，成为明朝开发经营东北的基地。

当时居住在我国东北境内的女真族，分布活动在朝鲜和故元遗兵之间，明朝进入辽东后，一则为了切断朝鲜和故元遗兵的联系，二则是想尽快消灭东北的故元遗兵。所以积极招抚女真各部，于是大批女真首领率部来归，明朝的势力迅速扩展到松花江、图们江、黑龙江和日本海一带。由于明廷对女真招抚取得很好成效，因此亦就加速故元残余势力的灭亡，这又反过来推动明廷对女真地区加强管理和经营，三万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它是明王朝在女真地面设立的第一个卫所，隶属于辽东都指挥使司统辖。

三万卫何时设置？据朝鲜《李朝实录》太宗七年（明永乐五年，1407）三月己巳条记载：“礼曹参议安鲁生回自京师，赉礼部咨文来。咨曰：该兵部于兵科抄出建州卫指挥莽哥不花奏：洪武十九年间，有本处杨哈刺赴京，蒙除三万卫百户职事。”^[85]

这段引文材料说明两点：第一，朝鲜使臣由明京师返国时，带回的咨文，其中莽哥不花所奏内容，是抄录兵科档案，因此材料是可信的；第二，洪武十九年（1386），女真人杨哈刺赴京师归明，明廷授他三万卫百户。我认为应该指出的是：这时的三万卫并非已立卫的实体，只是明廷考虑拟立而已，虽授百户职事，但还不能视为三万卫已设置。因为明廷没有明令立卫，又未设立治所，更未行使卫的职能，所以称之拟立。

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明廷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率师二十万赴辽东，征讨纳哈出等故元遗兵。六月，明军把纳哈出等包围在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兵败投降，至此故元在东北的残余势力被消灭，从而为明朝进一步经营东北扫平了道路。是年十二月，明廷正式决定“置辽东三万卫指挥使司，以千户侯史家奴为指挥僉事”^[86]，并赐给“白金二百两，文绮帛各六匹，钞

五十錠”〔87〕。

为了更深层次说明和证实三万卫设置时间,现抄录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三万卫选簿》中的有关材料。此簿是明朝政府编的三万卫官员履历事迹表,史料价值很高,是研究三万卫的最直接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1. 侯镇条载:

侯升,辽阳人。有祖侯史家奴,洪武十二年,将领头目嘉州等处,招附官民。十四年,钦除草河所副千户,节次招附速江、忽刺温等处,升正千户。(二十年)十二月升指挥僉事(即三万卫职)。〔88〕

2. 马选条载:

马升,系三万卫指挥僉事。高伯祖马啖答,女直人。洪武……二十年,除三万卫前所世袭百户。〔89〕

3. 王凤翔条载:

王斌,三万户人。兄王塔失,前托温所千户。洪武十七年归附,十八年于辽东都司支粮住坐,二十年除授三万卫左所百户。〔90〕

4. 裴承祖条载:

裴牙失帖木儿,女直人,前店哈千户所达鲁花赤。洪武十七年,垛充小旗。二十年,钦除三万卫中所世袭百户。〔91〕

以上所引档案史料,有一点值得注意,《选簿》记载三万卫的最早授官职年代,皆为洪武二十年事,虽然没有具体月日,但是从授卫的指挥僉事,所的世袭百户来看,显然是置卫时的命官。因此,这和《明实录》所载设卫时间是一致的。所以,它是洪武二十年十二月设置三万卫的有力佐证。

二、卫治的变迁

三万卫设置以后,指挥僉事侯史家奴,“领步骑二千,抵斡朵里

立卫”^[92]，这就是说卫的治所设在“斡朵里”，那么“斡朵里”又在何处呢？

据《元史》记载：

合兰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镇抚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一曰斡朵怜。一曰脱斡怜。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即松花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93]

又据明正统年间，朝鲜朴彭年的《龙飞御天歌》记载：

斡朵里、火儿阿、托温三城，其俗谓之移阑豆漫（按：女真语移阑为三，豆漫为万），犹言三万户也。盖以万户三人，分领其地，故名。……斡朵里地名，在海西江（即松花江）之东，火儿阿江（即牡丹江）之西。火儿阿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下。二江皆自西北流，三城相次沿江。

又载：

斡朵里豆漫（即万户），夹温（姓也）猛哥帖木儿（名也）。火儿阿豆漫，古论（姓也）阿哈出（名也）。托温豆漫，高（姓也）卜儿察（名也）。^[94]

由上可见，《龙飞御天歌》所载的斡朵里、火儿阿、托温三万户，就是《元史》记载的合兰水达达路下属斡朵怜、胡里改、桃温三个军民万户府。三万户分设在松花江和牡丹江汇合处一带，元末明初，斡朵里（即斡朵怜）万户猛哥帖木儿，火儿阿（即胡里改）万户阿哈出、托温（即桃温）万户卜儿察。显然明朝设置三万卫，实因三万户而得名。其中斡朵里就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马大屯，因此许多中外学者把这里视为当年三万卫指挥僉事侯史家奴立卫的治所。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斡朵里不仅是个地名，而且也是女真族一个部的名称，故在明朝和朝鲜的史籍中，常见有“斡朵里部”、“斡朵里部落”、“斡朵里人”的记载。正由于斡朵里是个部，所以随着不同时

间和形势变化,以及自然气候等因素,经常迁徙,火儿阿、托温两部也是如此,这样往往地名与部名一同迁移流动,在新的地方重现。

元末明初东北大动乱时期,女真各部出现频繁的迁徙。三万户居住的地区,经常遭到西边蒙古人,北面兀狄哈人的侵扰,不得安宁,于是离乡背井,溯牡丹江而上,向东南大迁移。其中斡朵里部,洪武五年(1372)前已离开故乡马大屯,南徙到珲春河流域居住。朝鲜《东国輿地胜览》记载:“训春江(即珲春河),源出女真之地,至东林城入于豆满江(即图们江),斡朵里野人所居。”^[95]可是这里仍不安全,还是不断受到兀狄哈“突入作贼、侵夺家产,因而部落人民离散,不能自存”^[96]。大约在洪武九年(1376)至十七年(1384)之间^[97],被迫再次迁徙,“避地到来本国(即朝鲜)东北面庆源、镜城地面居住当差役,因防倭有功,就镜城等处万户职”^[98]。到了洪武二十年(1387)左右^[99],猛哥帖木儿带领部众南移到朝鲜阿木河(今朝鲜会宁)地方居住。另外火儿阿部和斡朵里部同时离开故里,在其万户阿哈出的率领下,向南迁徙到图们江以北、珲春河以西的奚关地区住下,不久该部有一部分又迁移到朝鲜境内吉州一带居住^[100];还有托温部,与斡朵里、火儿阿部同时南进,迁移到朝鲜的稳城定居,据朝鲜《东国輿地胜览》记载,稳城“本高句丽旧地,女真乘虚入居,号多温平(即托温村)”^[101],可见由于托温部众人居而得此名。

据《李朝实录》,太宗八年(1408)二月丙戌条云:

钦差千户陈敬,百户李实等斋礼部咨来,咨曰:……一件起取人民事,准兵部咨,先该建州卫指挥莽哥不花奏,有三万卫百户杨哈刺,洪武十九年将带家小于土地面寄住三十三年……据镜城等处万户崔咬纳供,杨哈刺等系玄城附籍人^[102]。

这条材料清楚说明,据斡朵里人崔咬纳供称,三万卫百户杨哈刺,“原系玄城附籍人”,玄城在朝鲜境内,庆源府以东二十五里处。

他于洪武十九年，“将带家小于土门地面寄住”，即迁往图们江一带。可见，明廷拟设三万卫（时为洪武十九年），授杨哈刺为三万卫百户时，他是居住在玄城，或土门地面，而不是斡朵里改地。

综观上述，在洪武二十年三万卫设立之前，斡朵里、火儿阿、托温三万户都已经离开松花江和牡丹江交汇处的故里，辗转迁徙到图们江、珲春河一带，以及朝鲜境内的庆源、镜城、吉州、阿木河等地居住。我认为既然明朝设三万卫是根据三万户而取的名称，那么设立三万卫时，三万户已经迁走十多年了，当然三万卫的治所不可能设在旧地，而应该置于新的住所。因此，侯史家奴“抵斡朵里立卫”，绝不是依兰的马大屯。

据《明实录》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辛丑条云：

徙置三万卫于开元。先是招指挥金事刘显等置铁岭立站，招抚鸭绿江以东夷民，会指挥金事侯史家奴领步骑二千，抵斡朵里立卫，以粮饷难继，奏请退师，还至开元（即开原）。^{〔103〕}

又据朝鲜《李朝实录》太宗七年（1407）三月己巳条云：

洪武十九年间，有本处杨哈刺赴京，蒙除三万卫百户职事。洪武二十一年间，都指挥史侯史家奴等于斡朵里开设衙门。后因三万卫复回开原立卫，起发人民之时，有百户杨哈刺等将带家小于土门地面一向寄住。^{〔104〕}

根据以上材料，对以下两个问题做出分析。

其一，所谓斡朵里立卫。

从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率部众迁移时间和居住地点来看，三万卫的治所应在朝鲜境内的庆源、镜城，或阿木河。《明实录》记载，刘显置铁岭立站，受命前去“招抚鸭绿以东夷民”，“会”同侯史家奴“抵斡朵里立卫”，可见两地相近，不然何必会同前往呢？《李朝实录》记载，三万卫百户杨哈刺，曾“根”（跟）随侯史家奴于斡朵里开设衙门，当后来三万卫迁回开原时，他“带家小于土门地面

(即图们江)一向寄住”,这说明斡朵里离图们江不远。

其二,所谓三万卫徙置开元。

从侯史家奴“抵斡朵里立卫”,“开设衙门”,到他“奏请退师,还至开元”,前后总计两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立卫不久,就要求撤离斡朵里,决置三万卫于开元呢?我认为除了“粮饷难继”以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斡朵里部在朝鲜境内,猛哥帖木儿已为朝鲜命官,部众皆受朝鲜役使,故在此立卫,有名无实,形同虚设,所以迫使三万卫回开元立卫。正因为这个原因,到了永乐初年,明廷为了加强对女真地区的经营和管理,曾几次遣使,取道朝鲜,得其认可,前往阿木河地区,招抚猛哥帖木儿,使斡朵里部返回明境,置建州左卫。

三、三万卫的职能

明洪武二十一年,三万卫回开元立卫,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地界边隅,实为神京股肱”^[105]。它界于辽东都司与女真地面之间,又是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因此三万卫兼备内地和边区卫所的双重职能,具有以下特点:

——多民族性。三万卫的官员,既不同于女真地面“随俗而治”,“因其部族……官其酋长的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共属”^[106];又不同于内地“以汉治汉”,“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107]的军事行政机构,其官员基本上是汉人。当时三万卫,隶属辽东都司,下辖前、后、中、左、右五个所。根据《三万卫选簿》记载,隆庆年间,对该卫由指挥使到镇抚官员的民族成分统计,在166名官员中,汉人70名,女真人91名,蒙古人5名。其中指挥使,汉人4名,女真人15名,蒙古人2名。指挥同知,汉人5名,女真人20名,蒙古人1名,指挥僉事,汉人18名,女真人35名,蒙古人1名。正千户,汉人3名,女真人4名。副千户,汉人6名,女真人6名。百户,汉人32名,女真人7名。

镇抚,汉人1名,女真人5名,蒙古人1名。从以上各级官员民族成分,可以充分反映出三万卫的民族特色,即行政、官员结构多民族化。

——出征戍边。三万卫地处要冲,担负着保国守疆的重任。洪武二十八年(1395)三月癸亥,“是月敕总兵官周兴,令都督金事宋晟领辽王府中护卫、都督刘真领宁王府中护卫,指挥庄德领三万卫军马,征剿野人,毕日领还”^[108]。据《辽东志》记载,“裴牙失帖木儿,女直人……洪武辛酉(1381)率众来归,授百户,历战有功,升千户。先是东夷野人数为边患,永乐初承诏往谕,诸夷率其部落来款,贡献不绝,以功升三万卫指挥金事,训练士马,劳来远人,谄夷信服。八年(1410)从征迤北,率所部精甲为前锋,至静虏镇败虏兵,进广武,戍虏逆,战矢如雨,裴牙失帖木儿与麾下直当共前,下马列阵,引满齐发,虏不能支,大兵继至,虏众败溃,俘获无算。升指挥同知。十年复平定沙漠,诏为前锋,时病已久,力疾请行,卒于师”^[109]。正统十二年(1447)闰四月壬申,“升辽东……三万卫指挥使宋政,具为都指挥金事,以提督辽东军务,右都御史王翱奏,其出境剿寇有功也”^[110]。据《三万卫选簿》记载,三万卫指挥同知裴震,因“创忽儿河及辽河、洮儿河等处,杀贼有功……升指挥使”^[111]。这样的事例很多,不再枚举,说明三万卫派兵出征安边是其职能之一。

——招抚安置。明廷对女真采取积极招抚政策,三万卫经常受命担任此项任务,这在《三万卫选簿》中屡见不鲜,是该卫官员一项重要使命,为了说明问题,选录如下。

1. 董朝用条云:

董弼,南京人。父董奴札,洪武……二十一年,征金山、一迷河,调升三万卫正千户,故,弼系嫡长男袭。……永乐二年,差往哈刺温地面招谕,回还升本卫指挥金事。^[112]

2. 刘卯罕条云:

永起五年五月，刘卯罕系三万卫前所流官户，因差往哈刺温等处地面招谕，回还先次钦升本卫副千户，永乐八年副千户升正千户^{〔113〕}。

3. 张泮条云：

张掌，眉州人。高祖张安裕，洪武年间充三万卫点甲，故，曾祖张效补，并胜充总旗。永乐十九年奴儿干招谕，“升试百户”^{〔114〕}。

由上可见，三万卫招抚女真，远至奴儿干、哈刺温等地。许多受抚的女真部要求迁居三万卫，永乐六年（1408）四月戊子，“兀者右等卫指挥使、千百户贾你等奏，愿居辽东三万等卫。从之”^{〔115〕}。十月庚寅，“打捕女直头目阿里帖木及兀兰亦儿等卫指挥、千百户、镇抚阿升哥等，诣阙自陈，愿居三万卫，成守自效。从之”^{〔116〕}。七年（1409）四月乙亥，“扎肥河等卫千户秃鲁忽等，自陈愿于三万卫及快活城居住。从之”^{〔117〕}。正统十一年（1446）三月癸未，“辽东三万卫百户马哈刺招谕野人额卜里等男妇十五人来归，给赐彩币表里钞布，令还辽东开原居住”^{〔118〕}。

——朝贡纳赋。尽管三万卫隶属辽东都司，理应如内地卫所行使军事统治职能，没有朝贡纳赋的义务。但是三万卫却有管理女真地面的任务，其官员多数是女真人，因此就以时朝贡。宣德元年（1426）三月，“辽东……三万卫头目郑舍奴等，进马及金银器皿等物”^{〔119〕}。三年（1428）正月癸卯，“三万卫百户赵锁右奴等来朝贡马”^{〔120〕}。十年（1435）十二月己酉，“辽东三万卫千户杨满扁等来朝贡”^{〔121〕}。正统五年（1440）十月戊子，“三万卫士官余丁曹兀良哈等俱来朝，贡马及貂皮”^{〔122〕}。这些三万卫朝贡的官员，同女真地面卫所赴京朝贡官员一样，受到明廷的款待和赏赐，如前述郑舍奴来朝，赐钞彩币、表里、金织裘衣。杨满扁来朝，赐彩币等物。曹兀良哈来朝，赐彩币、纱绢等物。这就反映出三万卫的特殊职能，是内地卫所没有的。

——收纳流民。三万卫地处边远，是明朝发配“罪犯”的地方。他们到三万卫后称之流人，或流民，这些“罪犯”大体包括两种人。

其一，官吏犯罪。洪武二十三年(1390)，镇江人耿孟惟，“为事发充三万卫左所军”^[123]。二十八年(1395)九月癸巳，“五军断事官奏，清平卫千户曹迪受贿卖军，命杖之，谪戍辽东三万卫”^[124]。二十九年(1396)九月乙丑，“五绍断事官言，军校四十五人，皆犯重法当死。上曰：此罪非怙于利则胁于威，致陷重辟。然其情亦有可矜者，其以情之至重者一人置于法，余皆减死，发戍三万卫”^[125]。成化二十三年(1487)六月庚辰，“工部尚书万祉义子万爚，因诬奏罪，杖之百，发辽东三万卫充军”^[126]。正德二年(1507)十月己丑，“初镇守延绥总兵官都督同知陈英以失机，谪戍辽东三万卫”^[127]。

其二，反上民众。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庚辰，“清水江中平等寨，群蛮聚众为乱，贵州守御官军捕之，获从乱蛮人五百，械至京师，俱宥死，给食，谪戍三万卫”^[128]。六月辛丑，“先是会同县奏所辖上下十八洞，凡十六里，惟洞口二里遵约束，其余蛮民各立寨栅，置标枪、刀弩，拒命不供赋役，恐日久生变，乞捕之。遂命湖广都司发后讨捕。至是，以所获顽民械送京师，诏宥之，谪戍三万卫”^[129]。成化八年(1472)七月壬戌，“山东滕县韩能，造妖惑人，事觉，发充辽东三万卫军”^[130]。

除了以上官吏犯罪、反上民众被发配到三万卫处外，还有一批杀人、夺财的罪犯被充军到三万卫。这些流人，对三万卫的经济开发起过一定作用。

四、三万卫的社会经济概况

三万卫是辽东边徼之地，有关它的经济状况记载甚少，故很难做出全面深入的叙述，只能从官书私籍中寻觅一些零星材料，进行综合简介，以观一斑。

1. 人口

三万卫徙置开元立卫后,有部分韩朵里人迁到此处居住,明廷以兵戍之,同时又招抚和安置从黑龙江、松花江来归的女真人,以及收纳关内流人,形成了军户民籍。据明正统时毕恭的《辽东志》记载:

三万卫户口 7487,马队额军 660 名,步队额军 116 名,屯田军 395 名,煎盐军 51 名,炒铁军 54 名,寄籍民 28 名,共计 8791 名。^[131]

到了明嘉靖时李辅的《全辽志》记载:

三万卫额户 650,口 7487。寄籍户 42,口 120。新发军户 233,口 670。^[132]

马军 660,步军 116,屯军 395,盐军 51,铁军 54^[133]。

共计 9553 名。

李辅的《全辽志》是据毕恭的《辽东志》增删重辑的,两书比较,《全辽志》载明三万卫额户 650,寄籍户 42,《辽东志》不载。另外,从《全辽志》记载可看出寄籍户的人口增加 92 名,新发军户 670 名。但是,根据两书的记载统计,当时三万卫不超一万人。

2. 农业

明初,三万卫有额田 348 顷 84 亩,额粮 9300 石^[134]。洪武早年,辽东明军官兵给养是从内地经海上运往,后因“储支动计数千艘,供费浩繁,冒涉险阻,始制屯田法”^[135]。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俱令屯田自食,以纾海运之劳”^[136]。于是有了军屯,戍卒屯守比例各卫不同,有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也有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而三万卫则是二分守城,一分屯种^[137]。另外还有民屯,除了一般民户外,其中流民,以屯种赎罪,期满为民。

三万卫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作物有大麦、小麦、黄豆、黍等。因为这里地瘠天寒,技术粗放,单产很低,所以岁收屯粮,仅够自用,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军民生活就很困难。如永乐十二年(1414),明廷原命三万卫“调兵行粮,并接济毛怜、建州诸卫”,后又

考虑到三万等卫,岁收屯粮仅给本卫官军,而且此去“道路既远,供给不敷”,故改为“沈阳各卫与之”^[138]。

明朝政府为了解决三万卫的粮食问题,景泰二年(1451)十二月,左都御史王翱以三万卫“粮储少积,欲开中盐粮”。明廷采纳此议,“三万卫淮盐四万引,粟米八斗,黑豆二斗,浙盐一万五千五百四十八引,每引粟米五斗,黑豆二斗”^[139]。三年十二月,左副都御史李纯上疏,指出三方卫“今岁田亩多被灾伤,米价腾涌”,建议“诏谕军民纳粟补官”,“校尉民匠等俱许于三万……纳米百石,米豆相兼者,授试百户,能加六百石升一级,皆注原籍卫所管事,子孙承袭”^[140]明廷从之。五年十月,户部奏:“辽东三万……等卫,操守军马数多,粮储不敷,宜以淮浙长芦景泰六年存积盐,共一十九万六千十一引,召商中纳盐粮,今定则例三万、辽海卫,淮盐每引米豆七斗,浙盐四斗,长芦盐三斗……”^[141]明廷以此为开中盐粮额,显然比以前减少了,以资鼓励。

3. 冶铁业

三万卫是辽东重要的冶铁基地之一。由于辽东农业生产和军队戍屯都需要大量铁器,另外女真地区,因“不解炼铁”,所用铁器皆从辽东输入,这就刺激和促进三万卫冶铁业的发展。

据《明实录》永乐九年(1411)五月己巳条云:

工部右侍郎刘仲廉言:辽东都司三万卫,地临边境,成造兵器用铁数多,卒难应办,宜依定辽左卫例,设置铁场,定拨畸零军百二十名,以其半炒铁备用,半屯田以给。从之^[142]。

三万卫设铁场百户1名,炒铁军60名(按《辽东志》记载为54名),铁场百户所设在威宁营东(今辽宁本溪威宁营)。正统年间,三万卫额铁10035斤,到了嘉靖时,就增加到20412斤,说明该卫铁的产量不断增加。

4. 商业

三万卫所在地开原,它是辽东通往女真和蒙古地区的交通要

道。永乐四年(1406),明廷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原因,在开原开设马市两处,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一于开原城东以待蒙古朵颜三卫,进行商业贸易。马市分为官市和私市两种:明朝政府收购马匹等“攻战之具”,称之官市;各族人民之间换取“食用之物”,称之私市。马市每月一次,初一至初五,为期五天,贸易很繁荣,交换的商品有来自蒙古、女真的马匹、貂皮、人参等土特产品,来自汉族地区的耕牛、种子、铁铤、粮食、盐、布、锅、衣服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随着辽东和女真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原马市欣欣向荣,不断扩大,不仅开市的日期增多了,而且入市的人数多达几千人。由于商业的繁荣,许多归附的女真人要求到三万卫定居。

有些学者依据《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到了明中叶以后,三万卫已不存在,这种看法有误。以本文所引用的《三万卫选簿》来看,它是明朝政府编的三万卫官员履历事迹表,现存的原始档案材料。此簿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由武选司主事陆经修,依据隆庆四年(1570)六月车驾司员外郎赖嘉谟、武选司主事谢东阳编修颁布的《三万卫选簿》事例二十一条重修而成,以后又有增补,直至崇祯年间。从《三万卫选簿》的上下年限来看,上到洪武,下至崇祯,贯串有明一代。

另外根据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明代辽东档案》,其中有弘治四年(1491)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三万卫呈走回男子马俊供称路通达贼事》,万历九年(1581)三月初八日的《三万卫经历司为窃贼捕擄永宁堡哨夜事给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呈文》,万历二十年(1592)的《呈报清查三万、辽海、铁岭三卫与安乐州已未完均徭银两及各项支用细册》,万历年间的《广宁、铁岭、三万、定辽、沈阳、海州卫所属城堡马步编制及逃故军士名册》,可见弘治、万历年间三万卫依然存在。

从以上档案材料说明三万卫在明中叶以后,不仅存在,而且行使着职能,直到明朝丢失辽东,退入关内,三万卫随之消亡。

第五节 后金对朝鲜的两次战争

一、“丁卯之役”

所谓“丁卯之役”，即天聪元年（1627）由后金汗皇太极发动的一次入侵朝鲜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后金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互不侵犯的“兄弟之盟”，它对后金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后金的策略

列宁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143〕}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后金汗努尔哈赤发布反抗民族压迫的“七大恨”，作为反明檄文，公开对明朝宣战。翌年三月，后金打败明军四路来犯之师，取得著名的萨尔浒自卫战的重大胜利，自此后金从防御转向进攻。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三月，后金一举攻占辽东重镇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堡，于是后金从偏僻狭窄的苏子河畔，进入广阔富饶的辽沈地区。所以努尔哈赤声称：“自古以来岂有一姓之中尝为帝王，一君之身寿延千万”^{〔144〕}，“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145〕}。由此可见，后金把夺取全国统治权作为战略总方针。

明王朝看到后金日益崛起，十分恐慌，为了扼制和消灭后金，便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屯兵辽西和沿海诸岛，对后金形成了弧形包围。于是辽东经略熊廷弼提出“恢复辽左，须三方布置”^{〔146〕}。特别强调“三方建置，须联合朝鲜。请遣使往劳，俾尽发兵，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再诏恤辽人之避难朝鲜者，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与登莱声息相通”^{〔147〕}。明廷内部对“三方布置”，虽然朝议两端，看法各异，但是双方在联合朝鲜，从海上牵制后金的意见是一致的。

当时明金对峙，朝鲜的态度确实举足轻重。后金与朝鲜仅一江之隔，因此后金要想西进伐明，就要考虑东邻朝鲜的行动，为此在后金统治集团内有两种意见，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第三子洪太时（即皇太极）常劝其父欲犯我国，其长子则每以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则大非自保之理，极力主和，务要安全，非爱我也，实自爱也。”^{〔148〕}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而不敢冒险，故对朝鲜采取拉拢的政策，曾多次派遣使臣赴朝投书，希望朝鲜与明朝脱离关系，同后金结盟，所谓“不事南朝，子子孙孙，永结盟约”^{〔149〕}。但是，朝鲜不为所动，仍坚决支持明朝，反对后金。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明辽东巡抚王化贞，为了组织明军出广宁、渡辽河，从正面进攻后金，便派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领军丁二百余人，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五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由三岔河驾船到猪岛、鹿岛、禽岛、石城、长山、色利、獐子等地进行安抚辽民工作。此时，辽东廩生王一宁来会，建议前往朝鲜求助，共谋大计。七月初，他们来到朝鲜的弥申堡，得探报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派兵外出，城防空虚，令千总陈忠过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日深夜，毛文龙率领三千人马，围攻镇江，陈良策归降，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收兵万人，旧额兵八百人。镇江捷报，全辽震动，宽甸、礮阳、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投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150〕}，“归顺之民，绳绳而来”^{〔151〕}。于是毛文龙因功授参将，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

后金获悉镇江失守，大为震惊，命阿敏、皇太极等人率领大军前去镇压，毛文龙退走朝鲜境内，后金兵几次入朝进击。并且遣使致书说：“如果我两国真正想友好相处，那么就逮捕毛文龙、陈良策交来。”^{〔152〕}朝鲜为了不使事态严重，“恐有日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153〕}。此议得到明廷的同意，认为毛文龙寄身海岛，“有此可用之众”^{〔154〕}。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十一月十

一日,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皮岛(即椴岛、稷岛、从云岛)。此岛位于明朝、后金和朝鲜之间。据《明通鉴》记载:“皮岛即东江,在登莱大海中。”^[155]“地广衍,有险可恃”^[156],“南可以屏蔽登莱,东可以联络朝鲜,北可以攻冲辽沈,乃平辽隘要区也”^[157]。

此后,朝鲜为了防御后金侵犯,大力支援毛文龙:划给大片“闲田”^[158],使其兵民驻耕;免征商税,“以助军饷”^[159];供给大量粮食,以解数十万国民的生计^[160];补充大批火器,增强明军战斗力^[161]。因此,毛文龙在朝鲜的支持下,势力大增,除了拥有一支十多万人的精壮大军外^[162],而且还控制着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昌城、满浦、獐鹿、长山、石城、广鹿、三山、旅顺等地,这对后金形成了很大威胁^[163]。因此,他一方面经常派兵袭扰后金,又派人潜入后金,鼓动辽民起来反对后金政权,如天启三年二月,一次就派出五十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164],致使一些辽民“叛去”^[165],逃往明地,还有一些辽民揭竿而起,聚众“叛乱”^[166]。毛文龙对后金的军事行动,虽是骚扰性的,但“牵制则有余”^[167]。因此,后金的贝勒大臣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168],这说明毛文龙已成为后金的“腹心之大患”^[169]。

随着毛文龙势力日益壮大,后金就更加归罪朝鲜的支持,正如毛文龙所言:“奴酋之恨臣掣尾,每转恨于朝鲜之假地。”^[170]努尔哈赤虽然多次致书要朝鲜断绝与毛文龙往来,如果擒献毛文龙,则以朝鲜降将姜弘立作为交换,但是遭到朝鲜严辞拒绝。当时后金战略的重点是在辽西,而对东江的毛文龙则封官许愿,采取招抚之策,然而毛文龙乃无降金之意。因此,后金陷于被包围之中。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患毒疽身死,由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他上台后在分析后金的形势时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就是东江,只为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的动静言语霎时便知,可恨!可恨。”^[171]又

据朝鲜所得情报说：“奴酋死后，第四子黑还勃烈（即皇太极）承袭，分付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172〕}皇太极虽然继续推行其父努尔哈赤入主中原的战略总方针，但是为了摆脱受包围的困境，在对明的策略上有所改变，公开遣使与辽东巡抚袁崇焕进行议和，暗地里则把进攻的矛头由西转向东，积极准备攻打朝鲜和毛文龙，以解后金的后顾之忧，“丁卯之役”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2. 出兵两图

天聪元年（1627）一月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为统帅，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随军东征。皇太极亲授方略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照此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173〕}又据《旧满洲档译注》记载：“朝鲜国对满洲国犯有重重之罪，虽然如此，但这次并非指着朝鲜而来讨伐的。因明的毛文龙，住在靠近朝鲜的海岛，经常收容逃亡者，因此生气而来找他。”^{〔174〕}可见，后金此次出兵主攻目标是毛文龙，次攻方面是朝鲜。阿敏率领三万余骑出征，进军十分谨慎，他把大军隐匿在凤凰城，并且向朝鲜降将姜弘立了解情况，问曰：“我今缚送毛文龙，则朝鲜将从乎？”答曰：“缚送则未可知，而我国岂有顾惜之理。”^{〔175〕}十三日，后金兵渡过鸭绿江，逼近朝鲜义州，阿敏先命总兵官楞额礼、备御官雅逊、叶臣、孟安等率领八十人，偷袭明军驻守的哨卒，将其全部擒获，无一人逃脱；然后又遣朝鲜人韩润等人，“变着华衣，潜随猎骑入城”^{〔176〕}，以为内应；此外，还令人登南山呼曰：“城中将士，解甲出降，南土军兵，悉出归乡，不然铁骑蹂躏，乱杀靡遗。”^{〔177〕}十四日，后金兵突然围攻义州，命艾屯巴图鲁任主将，率军攀梯登城，朝鲜守将李莞、崔梦亮等仓猝应战，此时韩润“焚火军器，一城大乱，反恨开门”^{〔178〕}，遂克义州。李莞、崔梦亮等被执处死，城中有明兵一万，朝鲜兵二万，劝降不从者皆遭杀害。当后金兵攻打义州时，

阿敏就派遣济尔哈朗等率领大军进攻毛文龙驻守的铁山,由于毛文龙自冰合后,移驻皮岛,未能拿住,而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被杀,许多明兵和辽民遇害。

阿敏根据形势变化,认为毛文龙避居皮岛,隔海相望,未备水师,无法进攻;而后金兵却轻易攻取义州,说明朝鲜防御力量很弱,足以取胜。因此,他改变原定战略,把主攻目标由毛文龙转向朝鲜,于是留大臣八人,兵千人驻守义州。十五日,阿敏亲率大军与济尔哈朗会合,然后挥戈东进,为了减少和削弱朝鲜军民的抵抗,“一边进兵,一边求和”^{〔179〕}。十七日,后金兵进驻定州,阿敏派人向该城守将金搢投致朝鲜国王书,书曰:“我两国原无仇恨,今何为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此一宗也。我得辽东,既系邻国,尔曾无一句好语。乃窝隐毛文龙,助他粮草,尚不较正。写书与尔国,毛文龙等绑来,我两国和好,尔又不肯。辛酉年我来拿毛文龙,尔国屯民鸡犬不动,尔又不谢,此二宗也。尔还把毛文龙放在尔国,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宗也。我先汗归天,有仇如南朝而尚来吊问,赍礼来贺新汗,况我先汗与尔国毫无不好心肠,尔国无一人吊贺,此四宗也。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笔难尽述。因此,我方统大兵来。尔国要和好,差官认罪,火速来讲。”^{〔180〕}朝鲜答书称:“我国与尔本来无怨恨。我国臣事皇朝二百余年,皇朝伐尔国时要我兵马,既有天子敕命,何敢违也?……毛将既是天朝将官,来寄我疆,义不可拒。……今者尔国无故动兵,出我不意,攻我城池,杀我人民,是我国未尝负尔,而尔先负我。……尔若息兵通好,则必以礼义相接,不可以兵戈相胁。”^{〔181〕}

阿敏遭朝鲜严厉驳斥后,便“麾兵进迫”^{〔182〕},遂克定州。阿敏取得定州之役胜利后,坚定了征伐朝鲜取胜的信心,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就派人向皇太极上书报告自己的进军方案。他告知后金兵顺利攻取义州、铁山,毛文龙已逃往皮岛,“……如内情合适,即进趋王京”^{〔183〕}。皇太极收阅来书,基本上是同意的,但要小心谨慎,

故在所复诏书中说：“前进事宜，你们要深思而行”，“切勿强行……凡事委你们出征者相机而行”^{〔184〕}。这就表明皇太极赞同阿敏把朝鲜作为主攻目标和进攻方向。

朝鲜国王李倬得知后金兵渡江东进，定州失守的消息，惊恐万状，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毫无结果。由于朝鲜国力衰败，李倬决定行将后妃送往江华岛，称之“为避乱之计”^{〔185〕}。另下“罪己书”^{〔186〕}，传旨“命诸道勤王”^{〔187〕}，命下三道“征兵”^{〔188〕}等等，这些措施无一收效。

阿敏率军乘胜向前推进，十九日后金兵渡过青川江驻营，先遣部队已抵达安州城下。安州守将南以兴等，“前数日，城中闻贼兵日追降，整顿兵械，为死守计”^{〔189〕}。故后金兵招降，“城中不答”^{〔190〕}。二十日，阿敏统领大队人马到达安州城外，派人巡城呼曰：“无罪南兵开城出送，城中将士解甲出降，我且按兵以俟汝降战之答。”^{〔191〕}南以兴命人答曰：“我国只知战与死而已，本无降与和耳。”^{〔192〕}然后阿敏又派遣使者投书，书大意如前，“又添七宗恼恨”^{〔193〕}，答书曰：“连得二书，要息兵修好，共享太平，其意甚好。但前书既云要好，而兵随其后，此我之所以未晓也。自今以往，彼此解兵，两国和好，岂不美哉。”^{〔194〕}

二十一日清晨，后金兵发动攻城，双方展开激战，据记载：“是日黎明，远近烟雾不辨咫尺，贼中吹角鸣鼓，呐喊飏旗，万骑并进，云屯雷击。城中炮射，一时俱发，坠骑落壕，死者山积。前仆后入，左冲右突，并驱骆驼，输进长梯，一时登城，长枪短兵，彼此相搏，势如风火，措手不及，贼满城中，追逐乱杀。”“贼兵之焦毙者，亦不知其数。”^{〔195〕}安州保卫战，表现了朝鲜爱国军民英勇不屈的精神，最后虽孤立无援，城陷人亡，但给后金军沉重打击，伤亡很大，“遂驻军安州，息马四日”^{〔196〕}。

二十五日，阿敏率领大军向平壤挺进。安州失陷后，李朝上下一片恐慌，各路守军纷纷溃散，据都体察使张晚驰启：平壤、黄州、

凤山、瑞兴、平山等邑军民，“鸟惊鱼骇，望风先溃”^{〔197〕}。因此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诸将士皆逃匿，无一人当其锋”^{〔198〕}。二十六日，阿敏等未遇任何阻挡，占领了平壤。此时后金将领内部对进军朝鲜王京汉城，发生了意见分歧，“一半则欲还，一半则以为不可”^{〔199〕}。阿敏坚持深入，直取汉城，而岳托、济尔哈朗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此次出征主要是讨伐毛文龙，而不是朝鲜。阿敏不从，是日渡过大同江，二十七日至中和驻营，便遣使至汉城致书迫降，“使者未达而返”^{〔200〕}。同一天，朝鲜国王李倧离开汉城，逃往江华岛。并命已归降后金的姜弘立之子姜瑋、朴兰英之子朴沔，“持国收送虏中，欲谕退贼兵，乃探贼情”^{〔201〕}。书曰：

自古以来，欺弱凌卑，谓之不义，无故杀捕人民，是为逆天啊！如果说有罪的话，应当先派人来问，然后声讨，方合义理。或是今先退兵再议和的话，才可言的吧！^{〔202〕}

这是朝鲜首次遣使到后金营中投书议和，可是阿敏对议和不感兴趣，二十八日他在致朝鲜的回信中指出七条罪状^{〔203〕}，“如果要和好相处，速派使者来，我愿听之”^{〔204〕}。二月五日，阿敏率军占领黄州，他“遣使胁迫，要以三事：一曰割地、二曰捉文龙、三曰借兵一万，助伐南朝”^{〔205〕}。六日，朝鲜派姜瑋、朴沔二人前来通知，国王李倧已派亲信大臣来营中谈判，但是阿敏仍欲率军深入。此时岳托、李永等等，希望阿敏不要违背前言，驻军黄州，以待来使。阿敏不听，又进兵至平山扎营。八日，朝鲜使臣来到平山后金大营，他说：“我们的王听说贝勒你将至。……愿意承认我们的错，你们要如何结束此事，愿把我们贫乏之国所出产的东西，只要能收获的都给你。”^{〔206〕}阿敏听了此言，仍然要向汉城进兵。岳托、济尔哈朗等出面劝阻，他们认为“我等统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于外，且蒙古与明逼近我国，皆敌人也，宜急归防御”，况且“朝鲜王京阻江为险，江岸置木棚枪炮，兵马环列，且闯冰已解，亦恐难渡”^{〔207〕}，“不可深入”^{〔208〕}。阿敏还是不从，于是岳托、济尔哈朗，以皇太极曾谕令阿

敏与出征诸贝勒“公同议定”^[209]为由,主持召开八旗大臣会议,会上七旗大臣都主张议和,惟有阿敏所领的镶蓝旗大臣反对。因此,阿敏被迫停止进军,接受议和,从而后金和朝鲜的关系,由交战转为议和。

3. 后金与朝鲜的议和与盟誓

后金与朝鲜议和,在李朝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司瞻直长朴日省、韩肃一等上疏,“力陈和议之非”^[210];太学生尹鸣殷等上书,“请斩金使与朴兰英等首,函送天朝,举义斥和,背城一战”^[211]。还有一些人说:“朝廷不思大义,通好丑虏,忠义之士扼腕,介胄之士解体”^[212],可见他们反对议和。而朝鲜国王李倧等主张议和,认为“今日之势,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奈何不和?”^[213]与后金议和是“羁縻之道”、“缓敌之计”^[214],“未为不可矣”^[215]。后金朝鲜议和,并非一帆风顺,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争论。

——永绝明朝。二月二日,阿敏在给朝鲜国王书曰:“两国和好,共言美事,贵国实心要好,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216]这是后金第一次提出要求朝鲜永绝明朝,李倧认为“大义所系,断不可许”^[217]。但是,李倧在遣使答书中则避重就轻,模棱两可地说:“只论两国之好而已,不必提不当之言乎?”^[218]他又致书阿敏,解释说:“事大交邻,自有其道。今我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皇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矣。”^[219]阿敏见朝鲜对明朝的态度坚持不改,故对永绝明朝一款不再强求,却说“朝鲜二百年臣事皇朝之言,极有信义,若与之交好,则可久矣”^[220]。所以,十四日他向朝鲜来使表示:“不绝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强要。”^[221]

——入质纳贡。二月八日,阿敏派汉人刘兴祚(朝鲜称刘海)为使臣,前往江华岛与朝鲜议和。当时朝鲜对后金提出的入质纳贡持反对态度,国王李倧说:“质子之路,处之诚难。而至于岁币,则答之以物力荡残,无以办出可矣。”^[222]所以,九日刘兴祚到达江

华岛，朝鲜国王李倭拒不接见。十日刘兴祚向朝鲜提出“国王若不亲见，则当自此回去”^{〔223〕}。十一日刘兴祚在给朝鲜的揭帖中说：“今贵国王惜一接见之礼，不念小民之涂炭，独何忍哉！吾恐金人再为一激，势必下王京，不惟四部道受害，八部道生民亦难安矣。事机一错，祸不忍言。”^{〔224〕}当天，李倭便接见刘兴祚，十五日朝鲜接受后金的人质纳贡条件，给阿敏书曰：“和好是两国所致，故曾遣重臣，兼致礼物。”“自今以往，两国兵马，更不过鸭绿江一步地，各守封疆，各送禁约，安民息兵，父子夫妇，各相保存。”^{〔225〕}并且“以木棉一万五千匹、绵绸二百匹、白苧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张、鹿皮四十张、倭刀八柄、鞍具马一匹送于虏中”。^{〔226〕}

——去明年号。朝鲜在致后金书中皆书明天启年号，阿敏对此非常不满。二月七日，他在给朝鲜国王李倭的信中明确指出：“今见来文，照旧书天启年月。既如此，怎么讲得好。”^{〔227〕}八日，他再次给李倭去信要求“以‘聪’字易‘启’何如？”^{〔228〕}可是朝鲜不同意。于是阿敏对朝鲜施加压力，他说：“昨接来札，内书天启年号，极难达于我汗皇。……看来贵国拿天启来压我，我非天启所属之国也。若无国号，写我天聪年号，结为唇齿之邦。”^{〔229〕}此时，朝鲜国王李倭提出“年号依中国揭帖例不书何如”^{〔230〕}。后金使臣刘兴祚亦说：“国王答书，非如咨奏公文之比，天朝揭帖，则本不书年月，如广宁袁巡抚所送揭帖例为之，则天启二年，自然不书。”^{〔231〕}最后双方都做了让步，接受“不书年号，从揭帖式”^{〔232〕}的折中意见。

——莅盟宣誓。朝鲜国王李倭不愿意亲盟鸣誓，并且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233〕}为由，拒绝杀白马黑牛与后金盟誓。阿敏得知十分不满，认为朝鲜“国王既不发誓，是不愿讲和之意，何糊涂以了事塞责？”^{〔234〕}二月二十八日，阿敏致朝鲜书曰：“和好两国之愿，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今贵国王悻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235〕}然后进一步威胁说：“岂不知近日兵器有备，士卒有练，欲一战以较胜负。”^{〔236〕}此时阿敏又派刘兴祚

从中进行斡旋,二十九日刘兴祚在给李倬重臣李廷龟的信中举了韩信、孙臆、勾践夫差等说。“此三人皆不以一时之辱,坏终身之大道。今贵国为一誓之辱,不顾王弟之质,黎民之殃,社稷之危乎?”^[237]又说:“天朝与蒙古和,杀白马黑牛以祭天地,与金国和亦然。不如是,则何以表信?”^[238]三月二日,刘兴祚提出解决莅盟宣誓的新建议,他说:“主盟之人,亲自宰牲礼也!而国王在忧服中,不敢强请,国王则于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处刑牲以誓,则俺等当以好辞回报,以完大事。”^[239]盟誓一事在李朝内部有不同意见,但是在后金的压力下,李倬妥协、让步了,他说:“上有宗社,下有生灵,不得不尔。”^[240]最后接受了刘兴祚的建议。

后金和朝鲜经一个多月的交涉、协商,以上四个问题都达成协议和。三月三日,朝鲜国王李倬率领群臣和后金南木太等八大臣在江华岛焚书盟誓。发誓时,李倬亲行焚香告天礼,由朝鲜左副承旨李明汉宣读誓文曰:“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监听此誓。”^[241]读讫礼毕,李倬回宫,随后双方与盟大臣来到誓坛,烧香,对天杀白马,对地宰黑牛,各以一器皿装肉、白酒、血、骨、土。由朝鲜李行远读誓文曰:“若与金国计仇,存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骨暴。若金国大臣仍起不良之心,亦血出骨白,现天就死。二国大臣,各行公道,毫无欺罔,欢饮此酒,乐食此肉,皇天保佑,获福万万。”^[242]然后由后金的南木太等誓之曰:“朝鲜国王今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人道偕处,皇天保佑,获福万万。”^[243]这次江华盟誓,阿敏虽然在誓书上署名了^[244],但是对誓文很不满意。因此盟誓议和后,不予承认,一方面“令八旗将士,分路纵掠三日”^[245],“海边一带,已成空壤”^[246],“子女财富,荡覆无余”^[247],另一方面后金兵抵平壤立营,不再后撤,扬言“在同江以西,不可复还”^[248],又说“待执毛文龙后归

去”^[249]。于是朝鲜被迫于三月十八日派遣王弟李觉赴平壤后金大营,再次举行盟誓,誓书曰:大金国之贝勒阿敏等发誓,“如果朝鲜国王李倬将应送金国之礼物背约不送,对金国派来的使者,不像对明的使者一样恭敬,对金心怀恶意,巩固城郭,整顿兵马,并将金所获得的已剃发的人,如逃来朝鲜,就据为己有而不给回。王曾说过:与其和远方的明往来,不如和近处的金国往来。如果违背上述之言,则将向天地控告,而讨伐朝鲜国。天地以朝鲜为非,殃必及之,寿命不到就死了。如朝鲜国王不违背誓言而相处时,金国的阿敏贝勒启衅讨伐的话,则必遭殃而死。我们两国遵守誓言而相处,天地必眷佑,而让我们世远年久地过太平的日子”^[250]。我们把江华盟誓和平壤盟誓加以对照比较,立刻发现两者内容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平等的,后者则是不平等的,朝鲜要对后金承担一些义务,实际上后者比前者索取了更多的权益。因此,阿敏罢兵后撤,四月十七日回到沈阳,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欢迎。

4. 义州撤兵

平壤盟誓后,阿敏率军撤离朝鲜,但是命冷格里等领三千人马留驻义州。后金驻兵义州主要目的是防御明军毛文龙,因为皇太极发动“丁卯之役”,原想一举消灭毛文龙,解除后顾之忧,结果事与愿违,未能得手,正像明熹宗朱由校所言:“奴失东袭,毛帅锐气未伤。”^[251]又据毛文龙的报告说:“职坚守不拔,所伤不满千人。”^[252]可见毛文龙的势力并未受损,仍然对后金起牵制和威胁的作用。所以,当明廷接到朝鲜求援的来书后,考虑到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253]。于是“上命文龙相机战守,并命登抚暂移登、青、莱三府仓储接济,励戎士以状军声”^[254]。因此,毛文龙不断派兵袭击入侵朝鲜的后金兵,“五战而五胜……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255]。就在平壤盟誓以后,阿敏准备率军渡江返回沈阳时,毛文龙对后金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四月五日他“传集诸将,面授方略,度地远近险要,发兵设伏,出奇夹攻,俱约至

十三日齐到义州、鸭绿江边，水陆合并截杀”，此役“死伤达贼六七千余，打死孤山三名，牛鹿八名，并马骡千有余匹”^[256]。这份塘报的数字虽有夸张不实，但亦反映了毛文龙给予后金兵沉重的打击，所以后金为了监视、防御毛文龙，不敢轻易从义州撤兵，故导致朝鲜与后金的义州驻兵去留之争。

此时后金向朝鲜要求驻兵义州，但是朝鲜坚决不同意。朝鲜国王李倧在致后金书中指出：“今见来书，有留兵助粮等语，恐非告天立誓息兵安民之意也。”^[257]后金却认为“毛将在焉，我何卷归，贵国缚给毛将，则我乃回兵矣”^[258]。七月初，朝鲜遣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沈阳上国书，交涉要求后金撤走义州驻兵。七月七日，他们到沈阳，可是皇太极一直不见见。直到十二日，皇太极方派高且、大海等来见，说是“连日有故，未及相见，勿以为讶”^[259]。申景琥、朴兰英向他们提出，“当初讲和，约以各守封疆，至于誓天。而撤兵之后，余众尚留我境”^[260]，这是何故？大海等说，此事“非吾等能擅答，当言于汗处”^[261]。十四日，皇太极命大海等来言曰：“义州留兵，非疑贵国。毛兵在贵境，我兵既撤之后，彼若乘虚夺据，则非但往为阻绝，恐伤两国和好之义。欲押送交替兵马，将以今十五日打发耳！今者贵国书恳切，今当卷还，弟未知以你国之兵力，能制毛兵，使不得下岸耶？”^[262]申景琥等答曰：“本国与贵国曾无嫌怨，今春被兵全由于毛将。及其兵锋深入之后，彼窜伏海岛，终不出救，今何颜面更下岸耶？”^[263]

这时皇太极与明议和中辍，宁锦之役又惨遭失败，辽东形势对后金十分不利。因此，皇太极对朝鲜请求撤退义州驻兵，不能不认真对待，不然刚刚达成的“兄弟之盟”很可能破裂，“丁卯之役”的胜利果实就要丢失，又要重陷东西夹击的困境。所以，皇太极从后金的战略全局考虑，以义州撤兵的小局，服从联合朝鲜的大局，从而打破明王朝设置的弧形包围圈。于是，七月十九日，皇太极命什达尔汉、霸奇兰随同朝鲜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呈递国书，书曰：

“我们两国本无事故和好相处，因明之故，才交恶。理应照旧和好相处，故天复令和好。如果彼此珍惜这和好，互相和好相处，不以破坏者为非吗？我兵之所以驻守义州，并不是因为不相信你们而驻守的。我们之所以交战，是因明而战的，恐怕明再来破坏和好，为了监视明才驻守的呀！今如不让明进入你境内之地，则你王弟写下‘不让明进入’之保证书，并让住民守兵来义州，则我军可立即撤退。如在居义州之民兵来到义州之前，我兵即撤退，恐明将乘隙来入驻。”^[264]皇太极这次致朝鲜书和以往大不相同，除了明显表示同意撤兵外，而且全篇的语气是平等的、友好的，没有那种以胜利者自居的傲慢态度，所以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朝鲜的复书曰：“差人将书来，具知盛意，欲谨守和约，共享无疆之福，甚善甚善。贵国之留兵义州固知本无反意，但业已誓天罢兵，而犹复屯兵他境，非各守封疆之意，故前书及之。今贵国有意卷退，我国地方，我自住守，宁有任人窃据之理。便即差官偕来使替守，慎固疆场，不至貽贵国虑也。”^[265]可见，朝鲜表示决不把义州交给明军，以威胁后金的安全，这正是皇太极所希望的。因此，九月十二日，留驻义州的后金兵奉旨全部撤退，朝鲜的义州府尹严愧率领兵民进入义州城。

皇太极发动的“丁卯之役”，是入侵朝鲜的不义战争，它给朝鲜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对后金的发展却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摆脱了孤立的困境，经济上冲破了禁运封锁，军事上粉碎了明军的包围，从而消除了内部危机，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二、“丙子之役”

“丙子之役”(1636)，是清太宗皇太极继“丁卯之役”(1627)以后发动的又一次侵朝战争。如果说“丁卯之役”皇太极胁迫朝鲜签订“兄弟之盟”，打破明朝的包围圈，解除了后顾之忧，那么“丙子之

役”皇太极则强逼朝鲜承认“君臣关系”，完全脱离明朝，并参加对明战争。因此，“丙子之役”对刚刚建立的清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 所谓“败盟逆命”

清代的官书私籍记载“丙子之役”发生的原因时，皆指责朝鲜因“败盟逆命”所致，其实并非如此，把历史写颠倒了。“丙子之役”的爆发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正如列宁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266]

朝鲜与明朝接壤，又与后金为邻，当时明金对峙，朝鲜的向背确实举足轻重。因此，后金要想西进伐明，就要考虑东面朝鲜的行动，为此在后金统治集团内有两种意见，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第三子洪太时（皇太极）常劝其父欲犯我国，其长子贵永介（即代善）则每以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则大非自保之理，极力主和，务要安全，非爱我也，实自家也。”^[267]后金汗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故对朝鲜采取拉拢的政策，希望与朝鲜结盟和好，一致反明。可是朝鲜不为所动，仍支持明朝，反对后金。

此时，明辽东巡抚王化贞，企图组织明军，出广宁、渡辽河，从正面进攻后金，便派部将毛文龙率领军丁二百余人，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故驻守皮岛。朝鲜为了抵御后金侵犯，积极支援毛文龙，因此毛文龙的势力日益壮大，严重威胁后金的安全。皇太极即位后，公开批评其父努尔哈赤对朝鲜的安抚政策，他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就是东江（即皮岛），只为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的动静言语霎时便知，可恨！可恨！”^[268]所以，他改变了过去对朝政策。天聪元年（1627），发动侵朝战争，即“丁卯之役”，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平壤盟约，后金与朝鲜结成兄弟之盟，使后金在政治上摆脱了孤立困境，经济上冲破了禁运封锁，军事上粉碎了明军包围，从而解

除了西进伐明的后顾之忧。

皇太极通过“丁卯之役”，虽然向朝鲜索取许多权益，但是仍然承认朝鲜对明朝的臣属关系，而后金与朝鲜仅约为兄弟之邦。随着后金国力不断壮大，兵势日益强盛，皇太极对朝鲜游移在明与后金之间的两面外交政策不满，企图撕毁盟约，不再承诺朝鲜与明朝维护君臣关系，而要改变与朝鲜兄弟相称，把朝鲜置于后金直接控制下的藩属。早在天聪五年（1631）一月，他就致书告诫朝鲜国王说：“王勿听偏向明国诸臣之言，二心视我。”^{〔269〕}可见对朝鲜亲明疏金的态度十分恼怒。第二年十一月，后金赴朝使臣直言不讳地说：“当革兄弟之盟，更结君臣之约，待来差以天使之礼。”^{〔270〕}

到了天聪九年（1635）四月，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获得传国玉玺。十二月二十八日，后金满、蒙、汉诸贝勒大臣，认为“远人归附，国势日隆”，而且“又得历代相传玉玺”，因此“合辞陈奏，请上进称尊号”^{〔271〕}，改元称帝。皇太极想利用上尊号之机，采取外交手段，迫使朝鲜称臣，永绝明朝。于是天聪十年（1636）二月二日，就趁吊朝鲜王妃丧逝之便，命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塔等率领包括蒙古使臣在内的 175 人庞大代表团赴朝鲜，他们带去以后金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及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的名义，致书朝鲜国王。书曰：“我等谨遵上谕，遣使相闻，王可即遣亲近子弟来此，共为陈奏，我等承天意，奉尊号，事已确定，推戴之诚，谅王素有同心也。”^{〔272〕}

十六日，英俄尔岱等率领使团渡江，到达朝鲜义州，他向义州府尹说明此次出使的来意，因“我国既获大元，又得玉玺，西挾（即蒙古）诸王子愿上大号，欲与贵国议处”^{〔273〕}，故“致书于主上，陈僭号，请与共尊汗为帝，同为臣事”^{〔274〕}。义州府尹立即将此情飞报朝鲜国王，对拥戴皇太极上尊号一事，朝议两端。反对派洪翼汉说：“臣闻今者龙胡（即英俄尔岱）之来，即金汗称帝事也。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此言奚为而至哉。……今于服事胡虏，

偷安仅存，纵延晷刻，其于祖宗何，其于天下何，其于后世何！……臣愚以为戮其使而取其书，函其首奏闻于皇朝，责其背兄弟之约，僭天子之号，明言礼义之大，悉陈邻国之道，则我之说益申，我之势益张矣。”^[275]主和派崔鸣吉却说：“答其循例之书，而拒其悖理之言，君臣之义，邻国之道，得以两全。权宜缓祸之策，亦何可全然不思乎？”^[276]与此同时，朝廷许多部门亦纷纷上疏表态。弘文馆“札请以大义责虜使，严辞痛斥，以折僭逆之心”；樞院疏称：“胡差之到馆，严辞斥绝，以明大义，益砺奋发之志，以为备御之策，则中外人心，岂不耸动，忠义之士，皆欲为殿下决一死战。”宪府启曰：“金差所言不忍闻，藩阃之臣，所当严辞峻斥。”^[277]朝鲜国王李倧没有主见，只是根据多数廷臣的主张，决定不接见来使，不拆阅来书，以示朝鲜不同意为皇太极上尊号称帝。

二十四日，后金使臣英俄尔岱等到达汉城，他们向负责接待的勾管所官员，“出汗书三张示之，一则春信问安，一则国恤致吊，一则致祭物目也。又有二封书，一则面题金国执政八大臣，一则面题金国外藩蒙古，而皆以奉书朝鲜国王书之”。可是勾管所官员不接受执政八大臣和外藩蒙古贝勒致朝鲜国王书，认为：“人臣无致书君上之规，邻国君臣一体相敬，何敢抗礼通书乎？”英俄尔岱怒曰：“我汗征讨必捷，功业巍巍，内而八高山，外而诸藩王子，皆愿正位。我汗曰：与朝鲜结为兄弟，不可不通议云。故各送差人奉书而来，何可不受？”^[278]此言传出以后，备局上疏指责说：“胡差入京之后，其所言悖慢，所当据义峻斥。”馆学儒生请求“焚虜书，斩虜使，以明大义”^[279]。

英俄尔岱等“密知其机，益生疑惧之心，破关步出，散入闾家，夺马而走”，途中截获朝鲜国王谕其边臣书三封，惴惴不安地回到沈阳。

皇太极看了英俄尔岱等夺回的朝鲜国王为斥和主战给边臣的谕书，书曰：“国运不幸，忽遇丁卯年之事，不得已误与讲和。十年

之间……含愧忍辱，前为一番，以雪其恨，此我拳拳所注念者也。今满洲日益强盛，欲称大号，故意以书商议，我国君臣，不计强弱存亡之形，以正理决断，不受彼书。满洲使臣，每日在此恐吓索书，我辈竟未接待，悻悻而去。都内男女，明知兵戈之祸在于眉捷，亦以决断为上策。……大人可晓谕各处屯民知悉，正真贤人，各虑谋略，激励勇猛之士，遇难互相救助，以报国恩。”^[280]因此，皇太极召诸贝勒大臣传阅此书，指出朝鲜“决意断绝”两国盟约。所以，诸贝勒大臣认为可乘机兴兵问罪，一举攻灭朝鲜。但是，皇太极考虑到要集中力量上尊号，便先遣人持书往谕以利害，“令其以诸子大臣为质”，如若不许，则将出兵“征罚”^[281]。

朝鲜国王李倧看到后金使臣气愤回国，又夺走了斥和主战的谕书，深感问题严重，于是采取两项应急措施：一是积极备战。三月一日，李倧给全国下谕书说：“我国卒致丁卯之变，不得已权许羁縻，而溪壑无厌，恐喝日甚，此诚我国家前所未有之羞耻也。……今者此虜益肆猖獗，敢以僭号之说，托以通议，遽以书来，此岂我国君臣所忍闻者乎！不量强弱存亡之势，一以正义断决，欲书不受。……兵革之祸，迫在朝夕。……忠义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愿从征，期于共济艰难，以报国恩。”^[282]二是遣使致歉。三月二日，命罗德宪、李廓等出使后金，在致后金汗书中解释说，不接见英俄尔岱等使臣，是因“寡人有疾，不即相见，不料贵使发怒径去，殊未知其故也”。不受执政八大臣和外藩蒙古贝勒致朝鲜国王书，是因“此则非但前例之所无，抑条约之所未有，故接待幸臣，不敢收领转示，亦是事体当然，寡人非有所失也”。最后请求皇太极“恕谅”^[283]。

四月十一日，皇太极举行祭告天地，受尊号大典。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被劫持参加朝贺，但是在群臣行三跪九叩大礼时，他们坚决“不拜”^[284]，于是“胡差等殴摔廓等，衣冠尽破，虽或颠仆，终不曲腰，以示不屈之意”^[285]。皇太极虽然很气愤，却制止众人虐

待使臣。他说：“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无理处……皆朝鲜国王有意揖怨。欲朕先起衅端，戮其使臣，然后加朕以背弃盟约之名，故令其如此耳。”^[286]十五日，遣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回国，并在致朝鲜国王书中申言：“尔王若自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不然朕即于某月某日，举大军以临尔境。”^[287]

朝鲜国王李倧没有屈服于皇太极的军事威胁。六月十三日，李倧把致皇太极的信，称之檄书，书中指责后金说：“如今番信使之往，劫以非礼，困辱百端，是果待邻国使臣之礼耶！贵使来，辱我臣僚，无复礼数，劫卖横夺，靡有止极。当初结盟，本欲保境安民，而今则民无余力，市无余货，沿途州邑，所在空匮，若此不已，与被兵而覆亡等耳。”而且表示“我国无兵可挟，无财可资，而所讲者大义，所恃者上天而已”^[288]，如若兵火来临，国人皆奋，坚决打击入侵者。

朝鲜国王为了阻止和抗击清军入侵，其备御之策除了传谕全国八道加强战备外，就是遣使请求明朝给予支持和援助。可是，当时的明王朝处在农民军与清兵的夹击之中，自身难保，不能给朝鲜多少支援。虽然几次派人赴朝表彰其反清精神，但是又说：“见贵国人心器械，决难当彼强寇，勿以一时奖谕，以绝羁縻之计。”^[289]这些话使朝鲜君臣感到失望，动摇了抗敌的信心。

皇太极改元称帝，驱逐朝鲜使臣以后，没有立即兴兵征朝，却想采取一箭双雕之策，既打击明朝，又迫使朝鲜畏惧就范。五月，皇太极命阿济格、阿巴泰等率军伐明，进入长城，威胁京师，俘获大批人畜，九月大军凯旋沈阳。可是朝鲜没有因为清军的胜利而改变对清的态度，因此皇太极的目的没有达到。于是皇太极又改变策略，企图制造军事进攻的压力，胁迫朝鲜接受议和。十月，皇太极派遣马福塔等到朝鲜义州，向府尹林庆业说：“我以十一月二十六日，当举兵东来，尔国若遣使更讲和好，则虽兵发在道，当罢归。且我国称帝，南朝之所不能禁，而尔国欲禁之何也。”^[290]十一月，

皇太极对朝鲜来使小译说：“尔国若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大臣王子，更定和议，则我当大举东抢”，并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曰：“贵国多筑山城，我当从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捍我耶。贵国所持者江都，我若蹂躏八路，则其可以一小岛为国乎。贵国持论者儒臣，其可以挥笔却之乎。”^[291] 尽管边将使臣传其言与书，但是朝鲜国王不为所动。

皇太极看到以上所使计谋皆未得手，便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讨论对朝鲜用兵一事。大贝勒代善说：“朝鲜区区守礼义而衰弱之国也，今姑置之，专意西事，得以成功，则不劳发一矢，而彼自然臣服。且我虽空国而西，彼无气力，必不敢躐我后也。以我兵力，蹂躏不难，而但本国，山多野小，道路甚险，且有炮技，或恐损我兵马，不如不伐。”可是“九王（多尔袞）及龙（英俄尔岱）马（马福塔）两将，力劝动兵”^[292]。皇太极同意后者意见，决定兴兵朝鲜，所以“丙子之役”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条件下爆发的。

2. 围攻南汉山城

皇太极为了入侵朝鲜，积极做出征前准备。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笃恭殿召集诸贝勒大臣，宣布将统率大军亲征。二十五日，皇太极率诸王贝勒世子及文武群臣祀天、祭太庙，并告征朝鲜之由，进行出征前的思想动员。二十九日，又传谕朝鲜军民说“朕因是特起义兵，声罪致讨，原非欲加害尔等也。亦尔之君臣，贻祸于尔等耳！尔等但安居乐业，慎毋轻动，如妄自窜走，恐遇我兵见害。凡拒敌者必诛，奔逃者则俘之，倾心归顺者，秋毫无犯，更加恩养”^[293]，企图以分化瓦解、动摇朝鲜臣民之心，来减少进军阻力。十二月一日，皇太极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沈阳，巩固后方。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驻牛庄，备边防敌。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驻噶海城，收集边民。是日，蒙古诸王贝勒各率兵应约会于沈阳，整装待发。二日，皇太极亲自率领 12 万大军，往征朝鲜。行至沙河堡东岗，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袞、多罗贝勒豪格等率左翼兵，从宽甸入长山口，

以牵制朝鲜东北诸道兵力。三日，命马福塔、劳萨等率领三百人，伪作商人，日夜兼程，潜往朝鲜都城。接着又派多铎、硕托等率领护军千人，继马福塔等往围之。九日，皇太极恐怕马福塔、多铎等率领的先头部队兵力不足，又命岳托、杨古利等率三千人马，速往增援。十三日，驻营定州，命贝勒杜度，及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率精骑，往攻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一带，以阻止和切断明军对朝鲜的援助。

当清军渡过鸭绿江，向汉城推进时，朝鲜境内陷入一片混乱。十二日，朝鲜国王见到义州府尹林庆业的报告，得知“贼兵弥漫……分路渡江，倍道亟进”。十三日，报告再至，清军已到平壤，于是汉城“上下慌忙，莫知所措，徒媢媢而已，城中恟惧，出门者相继”^{〔294〕}。十四日晨，派人把宗室嫔官送往江华岛。午后，他带领大臣出汉城南门，将向江华岛，这时突然探卒驰报说：“贼已过延曙驿，胡将马夫大（即马福塔）率数百铁骑已到弘济院，而以一枝兵遮阳川江，以截江都（即江华岛）之路。”^{〔295〕}因此只好退回城内。朝鲜国王在南门城楼召见群臣，问道：“事急矣将奈何？”可是“大臣诸宰慌忙罔措，不知所对”^{〔296〕}。这时“上下遑遑，罔知所为，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声载路”^{〔297〕}。于是令申景祜率军出城阻击清军，结果“为贼所尽没，只余数骑”^{〔298〕}。李倧又计划逃往汉城东三十里的南汉山城，于是遣崔鸣吉前往清营见马福塔等人，企图以缓其师，乘机率众奔南汉。当日午夜，李倧刚入南汉，立足未定，金鑾认为“孤城驻毕，外无所援，刍粮亦乏。江都则在我便好，在彼难犯，而且伊贼意在上国，必不与我久相持矣。臣故曰幸江都便。”^{〔299〕}李倧接受他的建议，决定移避江都。十五日晚，朝鲜国王出南汉山城往江都，由于“大雪之后，山阪冰冻，御乘跌跌，上下马步行，累次颠仆，玉体不宁，还入城中”^{〔300〕}。

马福塔等发现自己中了缓兵计，朝鲜国王逃入南汉山城，便于十五日领兵进围此城。十六日，多铎、岳托等率领的两支援军，亦

相继到达南汉。此时，清军共有四千余人，对南汉城“立寨围之”。他们“伐取松木，列栅于城下八十步，张以绳索，悬以金铃，人有逾越者，铮然有声，使中外不能相通，是谓松栅”^[301]。

南汉山城，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朝鲜国王退守该城后，一方面加强城防，命申景禎守东城望月台，李曙守北门，元斗杓守北城，贝宏守南将台，李时白守西将台，贝仁厚守南门。全城守军一万三千八百人，分堞戍守。另一方面下诏抗敌，书曰：“出于猝迫，上奏天朝，权许羁縻者，只为保全一国生灵之命故也。今者此虏至称僭号，要我通议，耳不忍闻，口不忍说，不计强弱，显斥其使，只为扶植万古君臣之义故也。……予出驻南汉，期以死守，存亡之势，决于呼吸。”动员臣民“各奋智力，或纠合义旅，或资军粮器械，奋勇北首，廓清大乱，扶植纲常，树立勋名”^[302]。

朝鲜国王被围困在南汉山城以后，不断以蜡书下谕诸道求救，书称：“君臣上下，寄在孤城，危若一发，汲汲之势，卿可想也，星夜驰赴，前后合击，期剿灭，以救君父之急。”^[303]于是各地臣民纷纷起兵勤王，发布檄文说：“国运不幸，奴贼逼京，大驾驻孤城，贼兵合围，道路阻绝，号令不通，存亡之机决于呼吸。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期以一心趋敌，以救君父之急。……协心一力，共济国难，不胜幸甚。”^[304]结果三起勤王之师，皆为清军打败，两次突围之战，亦以失败告终，城内粮草缺少，“每兵二人，日给一人之粮”^[305]，因此人心浮动，不断有人逃亡。

二十九日，皇太极率领大军到达南汉山城西门外驻营。崇德二年（1637）正月初一，他登上望月峰，环视南汉山城的布防形势，认为此城高大坚实，易守难攻，决定采取政治上致书谴责，军事上围城打援，胁迫朝鲜国王献城投降。二日，遣英俄尔岱、马福塔往南汉山城，以清帝的名义致书朝鲜国王，指责他“败盟逆命”，“阳为和顺，阴图报复”^[306]。三日，击败朝鲜全罗道沈总兵，忠清道李总兵所率援兵。七日，再次击败沈、李所率援兵。此时多尔袞、豪格

等率领左翼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携火炮,到达南汉山城,清军实力大增。朝鲜君臣看到清大兵压境,救援无望,粮草日缺,因此抗清态度开始松软。十一日,朝鲜国王遣使致皇太极书曰:“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诗书,不事兵革,以弱服强,以小事大,乃理之常,岂敢与大国相较哉”^{〔307〕},但仍不愿出城投降。

皇太极从俘虏口中得知,“朝鲜国王受困城中,粮米薪水俱乏”,“国王与长子及群臣俱在南汉,其余妻子在江华岛”的情报,决定改变突破口,打破对峙局面,先攻江华岛,“若得其妻子,则城内之人,自然归顺,若犹不顺,然后攻城”^{〔308〕}。十八日,命多尔袞等率左翼兵约三万人,大小战船八十余只,往攻江华岛。另外,对朝鲜国王加紧迫降,在望月峰上升起白旗书招降二字,以示城中;又致书朝鲜国王说:“今尔有众,欲生耶,亟宜出城归命,欲战耶,亦宜亟出一战。”^{〔309〕}十九日,朝鲜国王迫于形势,遣使复书,称皇太极为“陛下”^{〔310〕},示自己为臣,并说:“诸藩合辞,共进尊号,天人所归。”^{〔311〕}承认皇太极上尊称帝。因为“重围未解,帝怒方盛”^{〔312〕},所以不能“出城归命”,请求在城上拜天子。

二十日,皇太极拒绝朝鲜国王的请求,派英俄尔岱等往谕朝鲜国王说:“命尔出城见朕者,一则见尔诚心悦服,一则欲加恩于尔,令永主尔国,旋师之后,示仁信于天下耳,若以计诱尔,何以示信天下。”^{〔313〕}当天,朝鲜国王复书,仍然表示不能“出城归命”,书曰:“今日满城百官士庶,同见事势危迫,归命之议,同然一辞。而独于出城一节,皆谓我国从来未有之事,以死自期,不欲其出,若大国督之不已,恐他日所得不过积尸空城而已。”^{〔314〕}清使臣英俄尔岱见此书与皇帝书意不同,拒绝接受。二十三日,朝鲜国王又命李弘胄等往清营,致书皇太极说:“陛下既以贷罪许臣,臣既以臣礼事陛下,则出城与否,特其小节耳,宁有许其大而不许其小者乎?……欲待天兵退舍之日,亲拜恩敕于城中,而设坛望拜,以送乘舆,而即差大臣充谢恩使,以表小邦诚心感悦之情。自兹以往,事大之礼,

悉照常式，永世不绝。”^[315]依然表示不愿出城归降。此书又被清方退回，城内人心更加动荡不安，希望早日议和。

是日，皇太极下令攻城。可是久攻不下，诸将认为“此城之险，实天所设，必致死伤之多，不如坚守松城，待其自涸之愈也”^[316]。因此，皇太极不再攻城，改命汉军向城内炮击，“大炮中望月台，大将旗柱折，又连中城堞，一隅凡尽破坏，女墙则已无所蔽。……丸之落于城中者相继，人皆畏惧”^[317]。尤其是“每向行宫而放之，终日不绝，落于司仓，凡家贯穿三重，入地底尺许”^[318]，君臣上下惊恐万状。

与此同时，二十二日，多尔袞等率大军至江华岛渡口。前一天，朝鲜江华岛守将金庆徵得到清军来攻的探报，认为“江冰尚坚，何能运船”。随之又得探报，军情如前，“始为惊动”，仓猝进行迎敌部署，“以海崇尉尹新之守大青浦，全昌君柳廷亮守佛院，俞省曾守长零，李垌守加里山，金庆徵出阵镇海楼下”。可是“兵数零星”，“人皆逃散”^[319]。因此，凤林大君、金庆徵等退守城中。当多尔袞等率清军来攻，守岛的朝鲜兵乘大小战船三十余只，分两路拒战，皆为清军红衣大炮击溃。二十三日，清军攻占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子二人、王妃、阁臣、侍郎各一人，及群臣妻子家口等。二十四日，皇太极遣使通告朝鲜国王，清军已占领江华岛，宗室嫔官及文武百官的妻子都被俘。朝鲜国王和群臣得知此讯，虽然举朝震惊，但是不敢相信。二十六日，朝鲜使臣洪瑞凤等赴清营复书，英俄尔岱、马福塔出见曰：“尔国所恃者江都也，吾已攻陷，执嫔官，两大君及夫人矣！”洪瑞凤表示不信，英俄尔岱“乃示大君手书，韩兴一状启，又示江都所获宗室珍原君，宦官罗业二人”^[320]。二十七日，洪瑞凤等返回南汉山城，向国王和群臣报告了在清营见到宗室珍原君、宦官罗业的情形，并奉上大君书及状启。这时“上看了惊惨痛苦，城中臣庶，送家累到江都者，举皆号哭。于是朝廷震骇，罔知攸处，遂定出降之议”^[321]。朝鲜国王命崔鸣吉等往清营，致书皇太极

说：“今闻陛下旋驾有日，若不早自趋诣，仰覲龙光，则微诚莫伸，追悔何及？第唯臣方将以三百年宗社，数千里生灵，仰托于陛下”^[322]，表示愿出城投降。

3. 三田渡受降

崇德二年(1637)正月二十八日，皇太极又收到朝鲜国王来书，称皇太极为皇帝，朝鲜为小邦，自己为臣，而且主动把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二人，作为斥和者“送诣军前，以俟处分”^[323]，此书无疑进一步表示投降的诚意。因此，皇太极认为此时胁迫朝鲜签订“城下之盟”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征求诸贝勒大臣的意见，皆表示赞同。于是，皇太极遣使敕谕朝鲜国王李倧，提出投降条款一十七项：

- 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
- 躬来朝谒，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
- 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
- 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
- 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
- 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
- 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收，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饌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
- 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不得有误；
- 朕今移师攻取皮岛，尔可发鸟枪弓箭手等兵船五十艘；
- 大军将还，宜备礼献犒；
- 军中俘获，过鸭绿江后，若有逃回者，执送本主，若欲赎回，听从两主之便；
- 尔与内外诸臣，缔结婚媾，以固和好；
- 新旧城垣，不许擅筑；

- 尔国所有瓦尔喀俱当刷送；
- 日本贸易，听尔如旧，当导其使者来朝；
- 其东边瓦尔喀，有私自逃居于彼者，不得复与贸易往来；
- 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黄金百两，白银千两……米万包。^{〔324〕}

朝鲜国王接受了以上条款，但是吏曹参判郑蕴据理反对。李倧不听，便派洪瑞凤、崔鸣吉等往清营，商量出城投降事项。清方由英俄尔岱负责接待谈判，他告知洪、崔等人：三田浦（渡）已筑受降坛，明日可行此礼，并规定朝鲜国王出城时不得穿龙袍，只穿青衣，不许出正门（南门），只准走西门。

三十日辰时，朝鲜国王李倧，身穿青衣，带领群臣和长子李湮、次子李湍、三子李浚等，出西城门，步行至汉江东岸三田渡，向清帝皇太极投降。皇太极在此设坛受降，坛为九层阶，他南面坐于坛上层，张黄幕，立黄伞；兵甲旗纛，森列四周；精兵数万，结阵拥立；张乐鼓吹，四野震撼。命英俄尔岱为朝鲜君臣作前导，引至坛外，行三拜九叩大礼。然后，再领到坛下，其他依次坐定。然后举宴，宴间行射艺表演。宴罢，皇太极命英俄尔岱赐李倧黑貂袍套，白马雕鞍，又赏给世子、大臣等貂皮套。并且令朝鲜君臣会见被俘的嫔宫及夫人，相互洒泣曰：“稍缓数日，我等皆为灰烬矣。”^{〔325〕}又命英俄尔岱、马福塔送朝鲜君臣和嫔宫夫人返回汉城，留下长子李湮、次子李湍为人质。二月二日，皇太极先行班师，命多尔袞、杜度率领满、蒙、汉大军，携所俘获在后行。派硕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领部众，携红衣大炮往攻皮岛。二十一日，皇太极得胜回到沈阳，举城欢庆。

清军撤走时，分为四路，“一枝仍执世子等夫妻并其僚属，置诸军中，从大路以去；一枝兵逾铁岭、出咸镜道、渡头满江以去；一枝兵由京畿右道山路，至平安道昌城碧潼等地，渡鸭绿江上流以去；一枝兵自汉江乘船下海，悉取沿海舟楫，以真挾及孔耿所领辽兵，

参杂藏书，仍胁本国西路败卒，张其形势，以图皮岛”^[326]。皇太极为了防止清军沿途掠夺，招致朝鲜军民反抗，于二月四日，传谕各路军将领说：“嗣后尔等，各宜严禁彼地满洲、蒙古、汉人士卒，勿得劫掠降民，违者该管章京及骁骑校、小拨什库等，一并治罪，劫掠之人，置之重典，为首者斩以徇。”^[327]可是，一些清军官兵阳奉阴违，不听禁令，依然抢掠，给朝鲜民众带来不幸。

八日，多尔袞、杜度等率大军，携大量财物，押着五十万朝鲜俘虏，及国王长子李湮、次子李湊的内眷、侍卫、宰臣等五百余人，离开汉城往沈阳。朝鲜国王李倬到昌陵送行，见此国破家亡的情景，“百官上下，一时号恸，上亦泣下”^[328]。所经沿途城镇官民，在道傍迎送，皆感到极大的羞辱，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损伤。由于人物众多，行军缓慢，只须十多天的路程，却走了七十多天，直到四月十五日才全部回到沈阳。

二月二日，硕托、孔有德等奉命合朝鲜兵往攻皮岛，朝鲜国王命信川郡守李崇元、宁边府使李浚领黄海道战舡赴之。当时明将沈世魁等率二万余众，配有大量火器，以及充足粮草，驻守皮岛。朝鲜虽然降清，但是心仍向明，故把清军攻打皮岛的情报“流传于岛中”^[329]，使明军早有准备。因此，硕托等“攻皮岛久未下”^[330]，于是皇太极命阿济格率兵一千，前往助攻。四月五日，他在郭山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攻打皮岛新的作战方案。据清方档案材料记载：“因皮岛不可一路攻取，欲分兵两路偷袭。议定，将我国所造小船由身弥岛北潜逾二十里以外之出，拉运至皮岛西北熬盐之河港。遣八旗护军参领及每牛录所出护军各一员，命步军固山额真萨穆什喀在前统领偷袭。令步军官员等率领步军继其后，攻打皮岛西北隅之山嘴。又命固山额真昂邦章京阿山、叶臣乘我国新造小船在后督战。再，另一路遣八旗骑兵、骑兵诸官员、四边城四百兵及全部官员、汉军及其诸官员、三顺王军、三顺王下诸官员及朝鲜兵，乘我军在各地所获船只及朝鲜来援之船，赫然列于身弥岛口，命兵

部承政车尔格统领进攻。又命汉军固山额真昂邦章京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在后督战。”^[331]六日，阿济格致书皮岛守将沈世魁，劝其归降，未得答复。八日，阿济格下令进攻皮岛，按计划行动，分兵夹击，经过一番激烈恶战，明军溃败，沈世魁被擒，因拒降为马福塔所杀。清军攻占皮岛，斩杀明军万余，俘获男女三千四百多人，大船七十艘，炮十位，其余金银、衣缎、马牛、宝器等物无算^[332]。

阿济格等率军攻占皮岛这个战略要地，是皇太极发动“丙子之役”的又一重大胜利，亦是完成了十年前“丁卯之役”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任务。从此切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正如朝鲜廷臣崔鸣吉所言：“椴岛（即皮岛）失守，极可惊惨……天朝之路，今已绝矣。”^[333]同时亦拔掉了一个威胁清后方安全的明军据点，对稳定辽沈地区的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丙子之役”是以清的胜利、朝的失败而告终。它对清、朝双方，以及明王朝都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如果把“丙子之役”与“丁卯之役”的后果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重大变化。

一是政治上，清与朝兄弟的“平等”关系，变为君臣的隶属关系。而且朝鲜自此永绝明朝，奉大清为正朔，改用崇德年号。这种臣属宗主的关系，几乎维持了整个有清一代，没有什么变化。

二是经济上，丁卯年的平壤盟约，虽然朝鲜每年要向后金进贡，但是后金也要给予回纳，双方所献物品尽管不等，却是对等的，可是，丙子年的城下之盟，变为朝鲜单方面纳贡，而且贡物的数量大增，如黄金百两、白银千两、茶千包、大小纸二千五百卷、大米万包等，可见，清从朝鲜勒索财物之多是以往没有的。

三是军事上，朝鲜从后金的敌人，变为清伐明的助手。“丙子之役”，不仅解除了清的后顾之忧，粉碎了明的东江防线；而且从此朝鲜不再支持明朝，却派兵、运粮参加对明战争，因此清的军事实力大增。

总之，皇太极通过“丙子之役”，既控制了朝鲜，又削弱了明朝，

为他实现入主中原的战略总方针铺平了道路。

第六节 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

一、进入早期奴隶制社会

16世纪70年代前,明代女真社会已进入早期奴隶制。

天聪九年(1635)十一月,后金汗皇太极将其所属族名正式命名为“满洲”,故称之为满族,这标志着满族共同体最后形成,从此它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实体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它的先世,曾以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的不同名称先后见于我国史籍。它们从很早的古代起就生息在美丽富饶的“白山黑水”这块祖国的疆土上,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到了明朝初年,大体按照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以及地区分布,把女真分为三大部,即建州、海西和“野人”,其中建州女真分散在牡丹江、图们江流域;海西女真居住在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活动在黑龙江流域,而建州女真“实居中雄长,地最要害”^[334]。明王朝为了加强对女真的统治,在女真地面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和许多卫所,作为地方行政机构,并委派任命各级官员,所谓“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335]。

在元末明初辽东大动乱时期,女真各部出现频繁的迁徙。元朝在建州女真地区设置五个万户府,任命了五万户,其中有两个万户,即胡里改万户阿哈出和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居住在现今松花江与牡丹江汇合处的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胡里改阿哈出部在牡丹江入松花江江口以东,斡朵里猛哥帖木儿部在牡丹江入松花江江口以西,互相为邻。这里由于经常遭到北面兀狄哈人的侵袭,不得安宁,故于明洪武五年(1372)左右,猛哥帖木儿率部离开故乡,溯牡丹江而上,南徙到珲春河流域居住。大约到了洪武九年

(1376)至十七年(1384)间,又离开珲春河畔,南渡豆满江(即图们江),进入朝鲜东北庆源、镜城一带居住。洪武二十一年(1388),又南移到阿木河(即吾音会,今朝鲜会宁)地方居住。

与此同时,洪武五年(1372)前后,胡里改阿哈出也率部背井离乡,沿着牡丹江南进,迁徙到图们江以北、珲春河以西居住下来。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阿哈出等赴明朝应天(即南京)朝贡,明廷在胡里改住地设建州卫,命阿哈出为指挥使。他向明廷推举自己的近邻和亲戚、居阿木河的猛哥帖木儿,称他“聪明,识达天道”^[336]。永乐帝便遣使前往招抚,永乐三年(1405)九月,猛哥帖木儿随明使到应天,觐见永乐皇帝,明廷授他为建州卫指挥使。

永乐四年(1406)春,阿哈出因与朝鲜关系恶化,再加上兀狄哈南下侵扰,故率部众由图们江北岸,西迁到辉发河上游的凤州(即吉林省海龙县境内)居住。永乐九年(1411)四月,猛哥帖木儿也因与朝鲜关系不好,加之兀狄哈侵袭,率部众迁往凤州,与建州卫阿哈出住一地。永乐十年(1412),猛哥帖木儿入京朝贡述职,明廷考虑到他和阿哈出原皆为元朝的万户,现在却是建州卫管辖的部属,显然不妥。因此,增设建州左卫,命猛哥帖木儿领其卫,任指挥使。

永乐九年(1411),阿哈出逝世,由其子释家奴袭官。大约永乐十八年(1420),释家奴去世,由其子李满住承袭,统辖建州卫。因为凤州经常遭到蒙古的侵扰,永乐二十年(1422)九月,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向明廷请求,由于“有达达(鞑靼)常川往来,搅扰边境,去处住坐不得”^[337],希望迁往他处定居。永乐帝敕谕猛哥帖木儿,“可于朝鲜地移居”^[338],“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339]。永乐二十一年(1423),猛哥帖木儿率部众回到朝鲜境内阿木河驻牧,但是仍同明朝保持密切的臣属关系,为明廷悉心任事。宣德八年(1433)八月,猛哥帖木儿协同明军镇压杨木答兀叛乱遇害。永乐二十年(1422),建州卫李满住也向明廷请求迁往别处安居。永乐二十一年(1423)初,李满住“蒙圣旨,许于婆猪江多回坪等处居住”^[340]。

永乐二十二年(1424)四月,李满住率部众到达婆猪江的西岸兀喇山南麓瓮村一带居住。宣德八年(1433)六月,李满住因遭到朝鲜侵袭,由瓮村迁到兀喇山北的吾弥府(即辽宁省桓仁县古城子)。正统三年(1438)初,又率部迁徙到浑河上游,六月又移往灶实山(即辽宁省新宾县烟筒山),随之同来的还有他的叔父猛哥不花领有的毛怜卫。

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死后,其子董山为兀狄哈掳去,明廷命凡察(猛哥帖木儿异父同母弟)执掌建州左卫事务。他分析形势,深感在阿木河实难久居,故想返回明境定居。由于朝鲜反对,几经周折,正统五年(1440)六月,率部经婆猪江,九月到达苏子河与李满住会合。明廷得知后,将凡察所领的建州左卫安放在以苏子河上游赫图阿拉(即辽宁省新宾县境内)为中心,包括海龙县以南,桓仁县以西的丘陵地带居住。当董山被掳,后由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赎回,明廷授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随其叔父一同迁到苏子河。不久董山与凡察为了争夺建州左卫的统治权,叔侄之间发生了“卫印之争”。正统七年(1442),明政府分建州左卫为二,增设建州右卫,董山领左卫事,凡察掌右卫事。这里的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史称建州三卫。

正统年间,建州三卫紧挨着辽东,沿佟家江、浑河上游、苏子河流域定居下来。这里丘陵起伏、森林遍野、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很适于农耕和采猎。由于建州女真人民辛勤开发与惨淡经营,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如果说元代女真人尚处于“无市井城廓,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341]的落后生产水平,那么明初建州女真则是“乐住种,善缉纺”^[342],“屋居耕食,不专射猎”^[343],农业生产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自南迁以后,通过朝贡和马市,引进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再加上大批汉人流入建州地区,带来了熟练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农业发展很快。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在建州女真住地婆猪江一带,“率皆农耕,农

人与牛，布散于野”^[344]。早先依靠明朝供给粮食，至晚到万历初年，已有余粮运往辽东抚顺关马市出售^[345]，这种深刻的变化，反映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这个时期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手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一般只进行加工，不生产商品。由于农业生产需要大量铁制农具，狩猎和打仗需要大批铁制武器，因此制铁业得到了优先发展。原先建州女真使用的铁器，主要是依靠明朝供给，正统四年（1439）以后，明朝为了控制和约束建州女真，经常下令严行铁禁^[346]。结果造成“男无铧铲，女无针剪”^[347]，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这些内外因素迫使建州女真发展制铁业，他们便“货大明铁自造”^[348]，将“所易之锅、铧……毁碎融液”^[349]，制造各种器具。尽管此时已有“冶匠”，可是“不解炼铁，但得正铁改造耳”^[350]。可见只能加工，不能冶炼，所以对明朝还有很大的依赖性。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与农业密切结合的家庭纺织业有了发展，建州女真已能以麻为原料，生产麻布，这种麻布还远销辽东等地^[351]。

建州女真传统的采猎业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此时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量的采猎物是对外主要输出产品，正是这种采猎经济，促进了商业交换，他们以人参、貂皮、药材等名贵土特产品，通过朝贡和马市，换取铧、铲、锄等铁制生产工具和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以及米、盐、绢、布、衣、靴等生活用品。朝贡除了各卫所官员按指定时间赴京述职，并向朝廷缴纳赋税、贡献方物外，他们所带货物，允许在京师市场上出售，分官市和私市两种，朝廷所需货物由官家收购，剩余的就在私市上交易，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运回去。建州女真每年十月至十二月“验收入关”，每次贡使率众多达五百人^[352]，隆庆五年（1571）甚至高达六百零七人^[353]。另外，设在辽东边城的马市，也分为官市和私市，“凡马之到市者，官为收买之，其余听其售于诸人”^[354]。天顺八年（1464），明朝专为建

州女真开设抚顺马市,后来又在清河、绥阳、宽甸三处增设马市对建州女真贸易。原先马市每月开放一次或两次,每次只有五天,可是到万历初年,几乎成了日市,根据辽宁档案馆藏的《定辽后卫经历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项清册》统计,抚顺马市每月约有二十二天开市^[355],建州女真前往该地交易的人数一次就多达二百五十人^[356],可见当时马市贸易十分繁荣。如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记载,建州女真首领来力红,“万历初,鬻贩貂皮、人参、松板以为利,结轂连骑,炫燿于道”^[357],这就反映了马市交易兴隆的状况。上述概况说明,16世纪70年代以前,建州女真以农业为主,采猎为辅,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业为各部首领所控制,没有独立的商人,总起来看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但是,这种生产力的水平已经能使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品,除自身消费外,尚可提供一些剩余产品,也正是有了剩余产品,它是一切阶级剥削赖以发生的物质前提。根据历史资料来看,这个时期建州女真社会中已有了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现象,氏族社会已逐渐解体,开始进入早期奴隶制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1. 奴隶已成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

建州女真的奴隶来源,一方面是“剽掠上国(即明朝)边氓,做奴使唤”^[358];一方面是“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359],两者皆为汉族。如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就曾把大批汉人掠到会宁地区“为奴使唤”^[360]。明朝山东巡抚御史胡汝辅奏称:建州等卫“一岁入寇九十七次,杀掳人口十余万”^[361],虽然有所夸大,但也可以看出掠夺汉人为奴的一个侧面。这些汉人成为女真人的奴隶,有的在在家中“为奴婢使唤”^[362],有的则“驱使耕作”^[363]，“勤治农事”^[364],他们是建州女真社会中的直接生产者,因被“抢掳使唤,不堪其苦”^[365],纷纷起来反抗,许多奴隶逃亡,如朝鲜给明朝的一份文书里,列举了被掳汉人奴隶逃到朝鲜,经朝鲜送回辽东的就有一千零三名^[366]。

2. 建州女真的奴隶制是种族奴隶制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野人（即建州女真）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367]，这说明在女真人之间是“不相为奴”的，奴隶都是汉人。此时建州女真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互不统属的部，各部中原有的血缘氏族开始分裂为若干个小家族，并出现了个体家庭私有制，他们为了维系这种私有制，就把奴隶吸收到家庭中，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有的作为奴隶主的妻妾收养，有的作为家内奴婢使役，有的被驱使耕种。因为奴隶分散在各个小家庭中，所以每个家庭的奴隶人数并不多，一般是几名或十几名。

从以上两个特征，建州女真社会可称之早期奴隶制。由于明王朝长期在该地区推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368]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其陷于分裂割据状态，这就阻碍了建州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州女真早期奴隶制大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直到努尔哈赤兴起后，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庄园奴隶制的发展

16世纪80年代后，满族社会处于庄园奴隶制发展时期。

万历十一年（1583），满族杰出领袖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起兵统一了分散割据的建州、海西和“野人”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从而加速了满族奴隶制的发展。

1. 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概况

这个时期，满族的农业生产比以前有了显著发展。首先是广泛使用铁制农具，自万历二十七年（1599）起，由过去“资大明铁自造”^[369]的加工阶段，开始能够开矿冶铁，制造犁叉、犁耳、锄、斧、铲、镰、锹、镢等生产工具，于是打破了明朝的铁禁，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是耕地面积的扩大，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鲜出使建州的申忠一，从佟家江到费阿拉城，沿途所见，“无野不垦，至于山上亦多开垦”^[370]。不仅建州腹地如此，而且把耕地扩大到宽

甸六堡和开原、抚顺附近；再次是农作物品种增多、单产增加。据当时流落在建州的朝鲜人李民寔说：这里“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371]，而且单产很高，“田地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372]。

此时手工业，有些已脱离农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许多带有浓厚的军工色彩。这里“银、铁、革、木，皆有其工”^[373]。如赫图阿拉城，“内外见居人家约二万户，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374]。工匠中已有满族人，据朝鲜使臣河世国说：“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城周围八十余里许，城门七处。……甲匠十六名，箭匠五十余名，弓匠三十余名，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无日不措矣。”^[375]在手工业中，冶铁业最受重视，努尔哈赤对铁匠十分优待，赏给马牛，以资奖励。所以，冶铁业最发达，所谓“铁匠极巧”^[376]，冶炼技术较高，生产大批农具和武器，保证了农业生产与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当时除了冶铁业外，就算纺织业了，以往“女工所织，只有麻布”^[377]，丝绸棉布皆依赖输入。到了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布告国中，开始养蚕以织绸缎，种棉以织布帛”^[378]，纺织工匠大都是汉人，所谓“织锦刺绣，则唐人所为之”^[379]。

采猎业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就以人参而言，由于明朝停止互市，曾使新鲜人参不能及时出售，腐烂了十余万斤，可见人参产量不少。努尔哈赤为了防止鲜参腐烂，发明了蒸晒法，使人参便于保存，“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380]，于是促进了人参的生产。此外，满族对马匹饲养很重视，每家皆养有骏马，所谓“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也不下十数匹”^[381]。还饲养许多耕牛，用来耕种和驮运。

农业、手工业和采猎饲养业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分工，促进了商业的活跃，不仅关内有不少商人到关外与满族人贸易，而且满族内部已出现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这些商人都受努尔哈赤支配，主

要贩卖东珠、人参和貂皮等土特产。如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一次就派三十名商人,前往东海瑚尔哈部收购貂皮。又如乌拉部盛产“东珠紫貂”,努尔哈赤派商人去“不与全价”,转手后以“厚价”出售^[382]。所以《武备志》记载:“奴酋……岁以貂参互市,得金钱十余万。”^[383]当时抚顺马市交易十分繁荣,这里有来自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等地的商人^[384],收购建州运来的土特产,转销内地,与此同时,大批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输入建州,推动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

以上几点概述了满族未进入辽沈地区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此时在农业、手工业、采猎业和商业等生产部门,都出现了以前所没有的新东西,从而为满族奴隶制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活用品,以往依赖明朝输入,现在基本上能够自给。努尔哈赤就曾说过:“天赋把我的地方出产财货,有三种貂皮,以及黑白红的狐皮、猞猁孙皮、豹皮、虎皮、水獭皮、黄鼠狼皮、貂皮、鹿皮、狍皮等皮张;又有棉花、丝绵、布匹、葛布、盐等物产;其他金、银、铁等都自地中皆产,穿的吃的都可获得。”^[385]

2. 以“拖克索”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在以农业为主要物质生产部门的满族社会中,土地关系是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础,也是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

所谓“拖克索”,据《清文鉴》说:“田耕的人所住的地方叫做拖克索”^[386],就是奴隶主占有的、驱使奴隶耕作的奴隶制庄园。关于“拖克索”的情况,朝鲜人申忠一在《建州图录》中有详细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出使建州,沿途见到六处“农幕”(即拖克索)。这些“拖克索”都属于努尔哈赤家族和有权势的首领所有。如努尔哈赤自己有一处,其弟速尔哈赤有两处,速尔哈赤的女婿童时罗破有一处,努尔哈赤的从弟童阿斗有一处,另外地方首领童流水有一处。“拖克索”设有管庄人,努尔哈赤的管庄人叫王政,速尔哈赤的管庄人叫双古,他们负责管理庄园和监督奴隶生产。

16世纪末,“拖克索”土地所有制处于萌芽时期,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不大。根据《建州图录》记载统计,申忠一出使建州见到三十一名首领中,只有五人有“拖克索”,仅占百分之十六。而且“拖克索”占有的耕地面积也不多,如童流水在蔓遮川的“拖克索”,“起耕仅二十余日”,总共只有一百多亩^[387]。

但是,随着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顺利进行,统辖地区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发展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奴隶人数愈来愈多。因此,“拖克索”不仅数量急剧增多,而且占地面积也迅速扩大了。由此而反映出来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更加明显,阶级对立日趋尖锐。这种变化和发展的情况,在天命四年(1619)朝鲜人李民宪写的《建州见闻录》里有所记载,如果以此同申忠一的《建州图录》记载比较,时过二十四年,最突出的变化之一,就是“拖克索”有了很大发展,它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不再是少数首领所占有,而是上自努尔哈赤和贝勒大臣,下至八旗士兵“皆有奴婢、农庄”。虽然此时后金全境有多少“拖克索”,确实无法知道,可是当时仅一名八旗将领就占有“拖克索”“多至五十余所”^[388],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拖克索”数目之多,而且已成为满族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既然“拖克索”已成为后金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因此就必然有适应它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说:“如果没有阿哈(奴),纪真(主人)何以为生?如果没有诸申(自由民),贝勒(诸王)何以为生?”^[389]从这段话来看,满族内可分纪真和阿哈两大对立的奴隶主与奴隶阶级,此外还有诸申自由民阶层。如果再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分配关系和在生产中的地位来看,每个阶级包括不同等级与阶层的人。

奴隶主阶级包括努尔哈赤及其家族、八旗将领、归降的首领和官员。他们拥有大量的“拖克索”和可以买卖、屠杀、殉葬的奴隶以及不同程度的占有诸申与其他自由民。这些奴隶主平日“但砺刀剑,无事于农田”^[390],不参加劳动生产,专靠剥削奴隶的全部剩余

劳动为生。正像恩格斯深刻揭示的那样：“用自己的劳动来取得生产资料，被认为是只该奴隶去做的事，这种行为甚至比抢劫还更可耻些。”^[391]

奴隶阶级是由战争俘虏和诸申降为阿哈的两部分人组成。这些阿哈，不但被迫从事家内劳动，而且更多地是用于农业耕作。如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一次就从诸贝勒的“拖克索”抽调阿哈八百人，前往浑河一带打晒粮食^[392]。他要“阿哈把耕田所得谷物同纪真共同吃”^[393]，这就说明阿哈是社会的直接生产者。但是，纪真占有生产资料和阿哈，阿哈劳动产品全部被纪真占有，《建州见闻录》记载：“奴婢耕作，以输其主”^[394]，《满洲秘档》也说：“仆夫力耕以供其主，不敢自私。”^[395]

此外，阿哈毫无政治地位，他们的居住、生活、婚姻、嫁娶全无个人自由，必须听从主人安排。而主人对阿哈有生杀予夺之权，任意买卖、毒打、屠杀等，阿哈遭受非人待遇，把人与牲畜同列，无疑成为会说话的工具。这些阿哈的子女世代为奴，不能自行离开主人，逃跑要治罪。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 and 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396]

诸申阶层，有建州自由民和归降的百姓与士兵。诸申人身是较为自由的，对自己的财产具有完全所有权，但他们必须依附八旗旗主和纪真以求保护，并对他们承担一定的义务。如自备马匹、军械、口粮应征、出战和服无偿劳役等等。当时努尔哈赤把诸申作为自己的私产，可以任意赏赐给部属，可见诸申虽是自由民，但社会地位还是比较低的。

总的说来，满族未进入辽沈地区以前，它的生产关系与“拖克索”土地所有制是相适应的，正处在奴隶制发展时期。

3. 以八旗制度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

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397]的“军政合一”，又是

“出则备战，入则务农^[398]”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起着行政管理、军事征伐和组织生产的作用。它反映和保留了部族联合的组织形式，而为奴隶社会的剥削制度服务，是奴隶主有力的阶级压迫工具。

八旗制度的产生同一切政治制度出现一样，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这时满族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发展时期，但是各部之间经常存在着“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399]的敌对局面，奴隶主无法集约来维护奴隶制度，因而迫切需要建立足以巩固奴隶制度的暴力机关。与此同时，当努尔哈赤兴兵发动统一女真各部战争的时候，他的力量是很弱小的，要想战胜强大的分裂割据势力，就必须组建一支能攻善战的武装部队。又因此次削平诸部，归附日众，需要设官管理和组织社会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努尔哈赤创建了适应奴隶制发展的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是因袭满族先世金人的兵民合一猛安谋克^[400]的部族组织形式，同时又结合当时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的牛录制度^[401]而建立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对原来带有一定军事组织形式的牛录制度^[401]加以整顿、改造和规范化，始定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纪真一人，这年共编了四十个牛录，由努尔哈赤、其弟速尔哈赤、其子褚英、代善分别统领，出行时打着各色旗号。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牛录大约增加到二百个左右，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因此，这年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把全部所属满族官民，包括所有掠夺、被俘、投降、归顺、买卖的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等，皆编入八旗组织，不久设黄、红、蓝、白四正色旗和在四正色旗上施以白边的四镶旗，称之八旗。每旗设主旗贝勒一人，固山纪真一个，副职梅勒纪真二人，管辖五个甲喇；每甲喇设甲喇纪真一人，管辖五个牛录；每牛录设牛录纪真一人，管辖三百人，每旗有七千五百人，八旗总共六万人，这是指

出征官兵,以后牛录数目不断增加。而牛录又是八旗制度的基层组织,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纪真下设副职二人称为带子,再设四名章京,四名拨什库,并把三百人组成的一牛录,分编成四个塔坦(村或部落),一章京和一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和各种事务,包括出征和生产,既管兵又管民。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和统治者,他亲任两黄旗主旗贝勒,其余的主旗贝勒、固山纪真皆由其子侄女婿担任,于是控制了满族的军事、行政和生产的大权。所以“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即牛录),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402]。显而易见,八旗制度是一套完整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把分散的满族各部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战斗。在后金政权没有建立以前,八旗制度已经具有一般政权机关的作用,成为奴隶主统治和压迫奴隶的工具。它的最重要的职能是保护满族奴隶主阶级的权益,公开宣称八旗将领的财产不可侵犯。努尔哈赤说:“仆宜为其主”^[403],要阿哈听从纪真的压迫和剥削,不能进行任何反抗,如有反抗就进行残酷镇压,对逃亡的阿哈,“无论尼堪(即汉人)或诸申,若是偷越皇帝的边境,凡是看见偷越边境的人就杀之,若是看见不杀,要罪及不杀之人”^[404],这就反映了八旗制度的阶级实质。

三、向封建农奴制过渡

天命六年(1621),后金占领辽沈地区后,遇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一是满族以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进入到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比自己高的汉族地区,这就发生了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二是满族奴隶制内部,已经包含有封建制的因素,如牛录屯田就是一例,这种新的封建制因素,到了辽沈地区有了更适合它生长的土壤,必然要发展壮大,从而加剧了旧的奴隶制和新的封建制的矛盾;三是满族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原来大批被俘被掠沦为奴隶的汉

人,回到了辽沈地区,他们迫切要求摆脱奴隶制的枷锁,重返家园,过那种有自己经济的封建农民的生活,因此出现了大批奴隶逃亡。努尔哈赤为了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统治政权,于是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以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 封建农奴制的确立

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尔哈赤参照明朝辽东屯田,结合满族原有的牛录屯田,颁布实行“计丁授田”,“计丁授田”制度的出现,标志着满族社会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它对以后清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计丁授田”规定对满族军士和辖区汉民,“每一男丁,给地六日(一日合六亩),以五日种粮,一日种棉,按口均分。……其纳赋之法,每男三人,合耕官田一日;每二十人中,以一人应役”^[405]。这种“计丁授田”制度,就其土地所有制来说,当时把土地分为官田和份地,直接生产者除了无偿劳役耕种官田外,便在自己的份地上经营自己的经济;就其生产关系来说,不像奴隶那种人身隶属关系,而是对土地的一种隶属关系,他们是以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是自己养活自己的劳动者;就其分配形式来说,官田实行的是劳役地租,份地则是“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从此出”^[406]。由此可见,“计丁授田”的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和分配形式,都反映出封建生产方式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计丁授田”的土地仍属后金所有,分得份地的男丁,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真正的所有权,因为份地不许自由买卖。而且耕种土地的男丁成为土地的附属物,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迁移,不能垦荒耕种,就连土地上种植什么作物,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再生产。所以,在“计丁授田”下的男丁身份,是半自由的封建农奴。这种极其深刻的变化,是一个革命性的重大质变,它意味着旧的奴隶制崩溃,新的封建制诞生。随着“计丁授田”的实行,对于满族原有的“拖克索”奴隶制庄园发生了强烈的

影响。此时满族奴隶主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于是努尔哈赤在“计丁授田”的基础上,对“拖克索”进行了改革,实行“庄田制”。天命十年(1625)十月,他颁布了“庄田谕”:规定“所有汗和贝勒之庄,每庄十三男、七牛、田百日,其中二十日交纳官粮,八十日自己食用”^[407]。这就十分清楚,庄田上的男丁,不是早先“拖克索”没有自己经济的奴隶,而是已有了自己经济的农奴;不是奴隶主任意驱使、毫无自由的直接生产者,而是已有半自由的劳动生产者;不是把全部剩余价值“以输其主”,而是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封建徭役和赋税缴纳给领主。从此,庄田制只保存了“拖克索”的躯壳,却填充了封建农奴制的内容,因此获得迅速发展和壮大。

努尔哈赤以“授田制”和“庄田制”取代了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从而确立了封建农奴制的生产方式。到了皇太极时期,基本上是沿袭下来了,土地分为庄田和屯田两种,只是在个别方面做了一些调整。

首先,满汉分屯别居。努尔哈赤推行“计丁授田”,满族八旗官兵和辽东汉民都授田,他们四处一屯,耕种屯地,向后金交纳官粮,这些民户实际上是后金的农奴户,屯地是由牛录纪真负责管理。因为满汉“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408]。特别是授田时,“上等肥饶之地,或被本营官占种,或被豪家占地,余剩薄地,分与贫民,名为五日,其实不过二三日”^[409],受害最大的当然是汉民,这就激起了汉民的不满和反抗,于是汉民“多致逃亡”^[410],甚至揭竿而起,“窃马牛或行劫杀”^[411]。皇太极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天聪元年(1627)他下令满汉“分屯别居”,汉民“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412],严禁满人到汉人住地“擅取庄民牛、羊、鸡、豚”^[413]等财物,而且一再告示要汉民“归顺各屯,令各安心农业”^[414]。

其次,编审男丁,削减庄田丁数。满族贵族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凭藉自己的政治特权,无限制地扩大庄田和占匿男丁。当时庄田很多,如沈阳附近“诸王设庄,相距或十里,或二十里,庄有大小,

大不过数十家,小不满八九家,而多数是汉人及吾东(即朝鲜)被掠者也……庄居颇稠”^[415]。大贝勒代善的儿子瓦尔达一人就有“庄二十三处”^[416]。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下令审查男丁,要求“牛录额真各察其牛录壮丁,其已成丁无疑者,即于各庄屯完结……此次编审时,或有隐匿壮丁,将壮丁入官,本主及牛录额真、拔什库等,俱坐以应得之罪。若牛录额真、拔什库知情隐匿者,每丁罚银五两,仍照以应得之罪”^[417]。而且规定每个庄田从原有的十三名男丁,削减为八名男丁^[418]。皇太极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要削弱满族贵族的权益,加强自己的势力。

2. 反映封建制的上层建筑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说努尔哈赤在确立封建农奴制的经济基础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那么皇太极则在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努尔哈赤到了晚年,他为了防止和消弥子侄之间“自相争夺杀害,乃至败亡”^[419],竭力倡导与推行八旗联合共治的办法,所谓八旗旗主共议国政,均分财物,这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落后的原始氏族社会的军事民主的组织内容,移植到封建农奴制社会中来,那是行不通的,必然阻碍社会的发展。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嗣位,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皆一一排列坐在他的左右,共理政务。而且他们“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执月贝勒掌理”^[420],实际上是四大贝勒轮流执政。同时,“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于贝勒”,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421]。各贝勒为了扩大各自的权益,争斗不休。皇太极为了发展封建制,除去努尔哈赤遗留下来的弊病,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反对分权,主张集权。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罢三大贝勒办理国事”^[422]的特权。四年(1630),皇太极又以阿敏“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之罪,把他“免死幽之”^[423],夺其土地、

人口与财物,不久阿敏死在狱中。五年(1631),皇太极重新任命八旗的固山纪真,直接掌握旗务,他们可以和贝勒诸王偕坐议政,因而贝勒诸王不能随心所欲地干涉政务和旗事了。六年(1632),皇太极废除了“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的旧制,改为惟有自己“南面独坐”^[424]。同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对皇太极失礼,拔剑相向,被革去大贝勒,降为一般贝勒,三大贝勒仅剩下代善一人,后因一些小事,皇太极遂定他四条罪状,罚鞍马甲冑等物。这时皇太极控制了八旗中的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实力大增,其余贝勒无力和他抗衡。

第二设立行政机构。皇太极明确要求“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425],故其行政制度,多仿封建的明朝制度。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设立文馆,“命儒臣,分为两直,榜式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榜式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得失”^[426]。五年(1631),皇太极“议定官制,设立六部”^[427],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主管人皆是八旗贝勒,下设满、汉、蒙承政、参政、启心郎和办事笔帖式等职。虽然八旗贝勒分掌六部,但是实际上八旗贝勒已被架空,他们和皇太极不是原先的平列关系,而是君臣的隶属关系。何况不久又“停王贝勒领部院事”^[428],六部直属皇太极管辖,政事不论大小,全由他一人裁决,独主后金政权。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等;内秘书院,负责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和敕谕等;内弘文院,负责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内三院行同明朝的内阁,是皇太极的左右手,秉承皇太极的意旨,处理各项政务。此外还设立都察院,掌管监察、弹劾事务。又设置理藩院,负责管理蒙古等的事务。

第三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皇太极认为封建思想是维护和加强自己统治不可缺少的手段,所以大力提倡,推崇封建伦理道德。他反对“戮儒”^[429],说他们“读书明道理”,主张“量才录用”,实行“开科取仕”,并且要诸贝勒大臣让自己的子弟上学,“习于学问,讲明

义理,忠君亲上”^[430]。命令达海等人翻译儒家经典,供满族官民学习。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封建等级制度,这种名分“皆有定制,昭然不紊”^[431]。随着服装颜色、公文格式,都显示出上下之分,贵贱有别。而且这些封建的伦理道德,也反映在后金法律条文里,如天聪六年(1632)颁布的“离主条例”,就明确规定:“若子告父,妻告夫,及同胞兄弟相告,果系反叛逃亡,有异于上及诸贝勒者,许告,其余不许。若有告者,被告照常审拟,原告罪亦同,不准离主。”^[432]崇德元年(1636)又参照明律,制定“十恶”令,把对父母、兄弟、丈夫的不敬,都视为大逆不道。

皇太极在政权建设方面,一再强调“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433]。他把明朝的封建典章制度移植到后金政权中来,要比努尔哈赤推行的八旗联合共治进步得多,而且适合已经建立起来的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的要求,所以说皇太极在上层建筑方面实行的改革,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推行封建农奴制,对于原先处在奴隶制的满族来说,无疑是个大进步,但是应视为仅仅是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么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434]满族进入已经封建化的辽沈地区后,虽然后金政权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变革的措施,但是毕竟刚刚跨入封建制的门槛,而离真正的封建化还有一段路程,然而满族社会则从低级走向高级,从局部达到全面,这种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是长期的、复杂的,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到康熙年间才完成。

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于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问题,一直是有争论的。本书从满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侧重对其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进行了探索,认为满族入关前经历了早期奴隶制、庄园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三个时期。

注:

[1] 欧阳修:《新唐书》卷 219《北狄传》。

[2] 唐开元元年(713)崔忻奉命出使渤海。当他回来时,途经旅顺,在黄金山麓的井栏上刻石写道: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史称“鸿胪二井”。

[3]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 16。

[4] 同上书卷 7。

[5][6][8]《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1。

[7] 萨英额:《吉林外记》卷 2,《钦定满洲源流考》卷 14,山川。

[9]《大清一统志》卷 45,吉林 1。

[10]《钦定盛京通志》卷 18,京城。

[11][12]《清太宗实录》卷 21。

[13][日]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神田信夫等译注的《旧满洲档》天聪九年(1)124~125 页。

[14]《钦定盛京通志》卷 14。

[15] 齐召南:《水道提纲》卷 24。

[16]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

[17] 陈循:《寰宇通志》卷 116。

[18] 李贤: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89,《女真》。

[19][20][23] 毕恭:《辽东志》卷 7,庐琮《东戍见闻录》。

[21] 魏焕:《皇明九边考》卷 2,《辽东镇边夷考》。

[22]《明经世文编》卷 453,杨宗伯奏疏《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诰问以折狂谋事》。

[24]《老满文上谕》。

[25][36][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 27,十二年三月癸未。

[26][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 57,六年七月庚申。

[27][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 269,二十三年九月乙未。

[28][57]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女真》。

[29] 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卷 108,《朝贡通例》。

[30] 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 107 号。

- [31][35][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 228,二十年五月丁亥。
- [32][47][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 21,九年十月壬寅。
- [33][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 29,十二年八月乙未。
- [34][37][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 57,六年七月辛酉。
- [38][48][58][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 52,二十年正月戊辰。
- [39]张鼎:《辽夷略》叙言。
- [40]《明宪宗实录》卷 195,成化十五年十月丁亥。
- [41][42]《明英宗实录》卷 54,正统四年四月己丑。
- [43][44]《明宪宗实录》卷 159,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壬戌。
- [45][52][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 276,二十四年四月丁未。
- [46][51][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 25,十一年六月辛亥。
- [49][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 106,二十六年十一月丙子。
- [50][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 21,十二年八月戊申。
- [53][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 52,六年二月辛巳。
- [54][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 59,十五年三月乙亥。
- [55]《明宪宗实录》卷 172,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
- [56][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 52,六年二月辛巳。
- [59]《明孝宗实录》卷 195,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
- [60][67][朝鲜]《李朝睿宗实录》卷 2,即位年十一月癸亥。
- [61][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 253,二十二年五月壬午。
- [62][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 257,二十二年九月己卯。
- [63][朝鲜]《李朝成宗实录》卷 259,二十二年十一月壬午。
- [64][朝鲜]《李朝宣祖实录》卷 23,二十二年七月丁巳。
- [65][朝鲜]《李朝宣祖实录》卷 69,二十八年十一月庚寅。
- [66][朝鲜]《李朝宣祖实录》卷 69,二十八年十一月戊子。
- [68]《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2。
- [69]《沈故》卷 3,《开矿》。
- [70]我于 1980 年 9 月到辽宁省新宾县赫图阿拉城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时,据该县永陵博物馆的李荣发同志介绍,解放前有位姓宗的农民,在赫图阿拉城北门外犁地,发现了大量生铁锭,拉了两大车。解放后,1958 年又在这里掘出许多生铁锭和铁锭残块。此物现藏新宾县永陵博物馆。

-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页。
- [72][朝鲜]李民葵:《建州闻见录》。
- [73][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 [74]辽宁档案馆,明档乙105号《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项清册》万历六年八月,这是一份记载抚顺关互市的残档,该档册中记录建州有九次出售粮食。
- [7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 [76]《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壬寅。
- [77]毕恭:《辽东志》卷1,地理志,形胜。
- [78][84]毕恭:《辽东志》书序。
- [79]《明太祖实录》卷56,洪武三年九月乙卯。
- [80]《明太祖实录》卷61,洪武四年二月壬午。
- [81]《明太祖实录》卷67,洪武四年七月辛亥。
- [82]《明太祖实录》卷101,洪武八年十月癸丑。
- [83]毕恭:《辽东志》卷1,地理志,沿革。
- [85][104]《李朝太宗实录》卷13,七年三月己巳。
- [86]《明太祖实录》卷187,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庚午。
- [87]《明太祖实录》卷188,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壬午。
- [88][89][90][91][111][112][113][114][1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三万卫选簿》。
- [92][103]《明太祖实录》卷189,洪武二十一年三月辛丑。
- [93]《元史》地理志。
- [94][朝鲜]朴彭年:《龙飞御天歌》卷7,第53章,注云。
- [95][朝鲜]《东国輿地胜览》庆源都护府,山川。
- [96][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92,二十三年正月丙午。
- [97][朝鲜]《李朝太宗实录》卷9,五年四月乙酉。
- [98][朝鲜]《李朝太宗实录》卷9,五年五月庚戌。
- [99][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20,五年四月乙亥。
- [100][朝鲜]《李朝太宗实录》卷15,八年六月壬辰,九年正月甲子。参见徐健竹:《明代建州卫新考》。
- [101][朝鲜]《东国輿地胜览》卷50,稳城府建置沿革。参见徐健竹:《明代建

州卫新考》。

- [102][朝鲜]《李朝太宗实录》卷15,八年二月丙戌。
- [105]《开原县志》卷上。
- [106]天顺《大明一统志》卷89,女直。
- [107]《明史》卷89,兵志。
- [108]《明太祖实录》卷237,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癸亥。
- [109]毕恭:《辽东志》卷5,官师;裴牙失帖木儿。
- [110]《明英宗实录》卷153,正统十二年闰四月壬申。
- [115]《明太宗实录》卷78,永乐六年四月戊子。
- [116]《明太宗实录》卷84,永乐六年十月戊子。
- [117]《明太宗实录》卷90,永乐七年四月乙亥。
- [118]《明英宗实录》卷139,正统十一年三月癸未。
- [119]《明宣宗实录》卷15,宣德元年三月丁酉。
- [120]《明宣宗实录》卷35,宣德三年正月癸卯。
- [121]《明宣宗实录》宫本卷12,宣德十年十二月己酉。
- [122]《明英宗实录》卷72,正统五年十月戊子。
- [124]《明太祖实录》卷241,洪武二十八年九月癸巳。
- [125]《明太祖实录》卷247,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丑。
- [126]《明宪宗实录》卷291,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庚辰。
- [127]《明武宗实录》卷31,正德二年十月己丑。
- [128]《明太祖实录》卷245,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辰。
- [129]《明太祖实录》卷246,洪武二十七年六月辛丑。
- [130]《明宪宗实录》卷106,成化八年七月壬戌。
- [131][134]毕恭:《辽东志》卷3,兵食。
- [132][133]李辅:《辽东志》卷2,赋役;兵政。
- [135]李辅:《辽东志》卷6,外志,史考。
- [136]《明太祖实录》卷233,洪武二十七年五月戊寅。
- [137][138]《明太宗实录》卷93,永乐十二年七月丙子。
- [139]《明英宗实录》卷211,景泰二年十二月戊子。
- [140]《明英宗实录》卷224,景泰三年十二月壬子。
- [141]《明英宗实录》卷246,景泰五年十月戊子。

- [142]《明太宗实录》卷 115, 永乐九年五月己巳。
- [143]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见《列宁全集》第 23 卷。
- [144]《后金徽明万历皇帝文》, 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1 辑。
- [145]《满文老档·太祖》卷 41, 天命七年四月十七日。
- [146]《明熹宗实录》卷 11, 天启元年六月辛未。
- [147][156]夏燮:《明通鉴》卷 77。
- [14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 第 3085 页。
- [149][201][205]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 23, 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1 辑, 第 428 页。
- [150]谷应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 4, 毛帅东江。
- [151]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 1, 天启六年八月初九日具奏。
- [152]《满文老档·太祖》卷 28, 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 [15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实料》8, 第 3164 页。
- [154]张岱:《石匱书后集》卷 10, 毛文龙列传。
- [155]夏燮:《明通鉴》卷 78。
- [157]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 1, 天启元、二两年塘报, 原眉批。
- [15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 第 3231 页。
- [15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 第 3227 页。
- [16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 第 3227、3231、3272 页。
- [16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 第 3225 页。
- [162]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 4, 天启五年九月初四日具奏; 卷 7, 崇祯元年五月初七日具奏。
- [163]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 4, 天启五年六月初十日具奏。
- [164]《满文老档·太祖》卷 46, 天命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 [165]《满文老档·太祖》卷 47, 天命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卷 49, 天命八年四月十二日。
- [166]《满文老档·太祖》卷 49, 天命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 [167]《明熹宗实录》卷 25, 天训二年八月丁丑。
- [168]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 4, 天启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具揭。
- [16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 7。

- [170]《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平辽总兵毛文龙奏本。
- [171]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6,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启。
- [17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284页。
- [173]《清太宗实录》卷2,第2页。
- [174]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四月八日。
- [175][22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9页。
- [176][177][178][182][187][189][190][191][192][195]赵庆男:《乱中杂录》6。
- [17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33页。
- [180][19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30~3331页。
- [181][19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31页。
- [183][184]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正月十八日。
- [18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291页。
- [18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290页。
- [18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287页。
- [19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32页。
- [196]《清太宗实录》卷2,第15页。
- [198]《承政院日记》第17册,第802页。
- [199][223][22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0~3311页。
- [200][202]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 [203][204]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 [206]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二月八日。
- [207]《清太宗实录》卷7,第12~13页。
- [208]《八旗通志初集》卷130。
- [209]《清太宗实录》卷2,第14页。
- [210][211][212][214][21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2页。
- [213][239][24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1页。
- [216][217][21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1页。
- [21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3页。
- [22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3页。
- [22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7页。
- [225][22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4页。

- [22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4页。
- [22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08页。
- [22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5-3316页。
- [230][23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5页。
- [23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8页。
- [233][237][23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0页。
- [23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8-3319页。
- [235][23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19页。
- [241][242][24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2页。
- [244]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三月初三日。
- [245]《清太宗实录》卷2,第26页。
- [24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4页。
- [247][24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25页。
- [248]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3,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451页。
- [250]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三月。
- [251][253][25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
- [252][254]《明熹宗实录》卷82。
- [256]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6,天启七年四月二十日塘报。
- [25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36页。
- [25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51页。
- [259][26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60页。
- [261][262][26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61页。
- [264]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天聪元年七月十九日。
- [26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365页。
- [266]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3卷。
- [26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083页。
- [268]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6,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启。
- [269]《清太宗实录》卷82。
- [270][274][277][279][285][290][292][294][295][296][301][303][316]

- [317][318][328][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27,丙子虏乱。
- [271]《清太宗实录》卷 26。
- [272]《清太宗实录》卷 27。
- [27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546 页。
- [27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547 页。
- [27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549 ~ 3550 页。
- [27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548 ~ 3549 页。
- [280][281][284][286][287]《清太宗实录》卷 28。
- [282][28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550 ~ 3551 页。
- [28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555 页。
- [289][291][朝鲜]罗万甲:《丙子录》记初头委折。
- [293]《清太宗实录》卷 29。
- [297][298][300][朝鲜]罗万甲:《丙子录》急报以后日录。
- [29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573 页。
- [302][304][朝鲜]《丙子胡难湖南诸公倡议事实》。
- [305][朝鲜]《承政院日记》第 54 册,第 570 页。
- [306][308][309][311][312][313][314][323][324][325]《清太宗实录》卷 33。
- [30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582 页。
- [31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585 页。
- [31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591 页。
- [319][朝鲜]罗万甲:《丙子录》记江都事。
- [320][321][朝鲜]《南汉解围录》,见刘家驹:《清初政治发展史论集》第 168 页。
- [322]《丙子录》急报以后自录。
- [326][朝鲜]《朝野记闻》,见刘家驹:《清初政治发展史论集》第 143 页。
- [327]《清太宗实录》卷 34。
- [32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600 页。
- [330][332]《八旗通志初集》卷 140,阿济格传。
- [331]《盛京满文原档》第 7 号,四月五日条,见《历史档案》1982 年第 3 期。
- [33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 3603 页。
- [334]黄道周:《情物典汇》卷 20,四夷,奴酋。
- [335]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89,女直。

- [336][朝鲜]《李朝实录》太宗朝卷 9,五年三月丙午。
- [337][朝鲜]《李朝实录》世宗朝卷 21,五年八月辛亥。
- [338][朝鲜]《李朝实录》世宗朝卷 24,六年六月癸酉。
- [339][朝鲜]《李朝实录》世宗朝卷 20,五年四月乙亥。
- [340][朝鲜]《李朝实录》世宗朝卷 24,六年四月辛未。
- [341]宋濂:《元史》卷 59,地理志。
- [342]毕恭:《辽东志》卷 7,卢琼“东戍见闻录”。
- [343]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 24。
- [344][朝鲜]《李朝实录》世宗朝卷 77,十九年六月己巳。
- [345]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 105 号,《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偿夷人银两各项清册》万历六年八月。这是一份记载抚顺关互市残档,从这份档册中可以看出建州女真有十一次卖粮食。
- [346]《明英宗实录》卷 54,正统四年四月己丑。《明宪宗实录》卷 159,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亥。
- [347]《明宪宗实录》卷 172,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
- [348][朝鲜]《李朝实录》世祖朝卷 47,十四年十一月丁巳。
- [349]《明孝宗实录》卷 195,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
- [350][朝鲜]《李朝实录》成宗朝卷 52,六年二月丁未。
- [351]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 105 号,《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偿夷人银两各项清册》万历六年八月,该份残档中,记载建州女真十七次卖麻布。
- [352]《万历大明会典》卷 107,东北夷,海西、建州。
- [353]《明穆宗实录》卷 60,隆庆五年八月己酉;卷 62,隆庆五年十月癸丑、丙辰。
- [354]《明宣宗实录》卷 113,宣德九年十月丁巳。
- [355][356]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105 号,《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偿夷人银两各项清册》万历六年八月。
- [357]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11,来力红传。
- [358][朝鲜]《李朝实录》成宗朝卷 80,八年五月丁卯。
- [359][367][朝鲜]《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 17,二年八月己亥。
- [360][朝鲜]《李朝实录》世宗朝卷 32,八年七月癸卯。

- [361][朝鲜]《李朝实录》中宗朝卷 100,三十八年正月丁未。
- [362][朝鲜]《李朝实录》世宗朝卷 59,十五年二月己亥。
- [363]《明英宗实录》卷 103,正统八年四月庚戌。
- [364][朝鲜]《李朝实录》世宗朝卷 81,二十年四月辛酉。
- [365][朝鲜]《李朝实录》世祖朝卷 21,六年八月丙辰。
- [366][朝鲜]《李朝实录》文宗朝卷 13,二年四月癸未。
- [368]《明经世文编》卷 453,杨宗伯奏疏:《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
请乞赐诰问以折狂谋事》。
- [369][朝鲜]《李朝实录》睿宗朝,即位年十一月癸亥。
- [370][372][387][朝鲜]申忠一:《建州图录》。
- [371][373][376][377][379][381][388][390][394][402][朝鲜]李民英:《建州
见闻录》。
- [374]程开祜:《筹辽硕画》卷首,《东夷奴儿哈赤考》。
- [375][朝鲜]《李朝实录》宣祖朝卷 69,二十八年十一月戊子。
- [378]《满文老档》太祖 5,天命元年正月。
- [38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2。
- [382]程开祜:《筹辽硕画》卷 2,张涛揭为属夷家事互构事。
- [383]《武备志》卷 228,四夷女直考。
- [384]《满文老档》太祖 6,天命三年四月。
- [385]《满文老档》太祖 15,天命五年四月。
- [386]《清文鉴》卷 19。
- [389]《满文老档》太祖 2,万历四十年九月。
- [39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392]《满文老档》太祖 7,天命三年九月。
- [393]《满文老档》太祖 17,天命六年闰二月。
- [395]金梁:《满洲秘档》太祖谕厚待仆夫。
- [396]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397]《清朝文献通考》卷 179,兵考一。
- [398]《明清史料》丙编,第 1 本,敕谕部将高鸿中稿。
- [399]《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1。
- [400]所谓猛安谋克制度,猛安即千夫长,谋克为百夫长,金初规定三百户为

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猛安谋克平时组织练兵、生产和管理行政事务，战时率兵出征。

[401]所谓牛录制度，“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位，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意为大箭〕纪真（意为主）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403]《满洲实录》卷6。

[404]《满文老档》太祖1，万历三十六年三月。

[405]《满文老档》太祖24，天命六年七月。

[40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士俊谨陈末议奏。

[407]《满文老档》太祖66，天命十年十月。

[408][410][412][413][414][418]《清太宗实录》卷1。

[409]《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杨方兴条陈时政奏。

[411]王先谦：《东华录》天聪2，元年六月戊午。

[415]《沈馆录》卷3。

[416]《清太宗实录》卷25。

[417]《清太宗实录》卷7。

[419]《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420][429]《清太宗实录》卷5。

[421]《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

[422]《清王朝实录采要》太宗卷1。

[423]金梁：《满洲秘档》太宗责阿敏等弃城罪。

[424]《清太宗实录》卷11。

[425][433]《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

[426]王先谦：《东华录》天聪4，三年四月丙戌。

[427]《清王朝实录采要》太宗卷2。

[428]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八旗六部二院。

[430]《清太宗实录》卷10。

[431]《清太宗实录》卷42。

[432]《清太宗实录》卷8。

[43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第二章 清朝的开国

第一节 努尔哈赤与萨尔浒之战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形成、发展和巩固有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曾出现过中央政权和一个或几个地方割据的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民族矛盾不可能得到公正解决,并往往导致民族之间的战争。这里所讲的萨尔浒之战,就是反动腐败的明王朝为了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调集十多万大军,对满族建立的后金地方政权发动的一次进攻。满族在自己杰出领袖努尔哈赤的领导下,打败疯狂进犯的明军,取得民族自卫战争的重大胜利。这个胜利是一个转折点,从根本上改变了辽东的形势。明朝从进攻转为退却,后金由防御转入进攻,从而为清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满族的先民,曾以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的不同名称见于我国史籍。从很早的古代起,它们就生息在“白山黑水”这块美丽富饶的祖国疆土上,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到了明代,女真分为三大部,即建州、海西和“野人”。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图们江流域;海西女真居住在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活动在黑龙江流域。明朝为了加强对女真的统辖,在该地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和卫所作为地方行政机构,并委派各级官员,所谓“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以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1]。这些地方官员除了

“抚绥属部”^[2]，“看守地方”^[3]外，还负责征税、从征和戍守边塞等事务。永乐元年(1403)，明朝在建州设置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永乐十年(1412)，又建立建州左卫，命猛哥帖木儿为指挥。正统七年(1442)，因建州左卫的凡察和董山叔侄之间发生“卫印之争”，明廷为了解决纷争，又增设建州右卫，以凡察为都督同知。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史称建州三卫，这是满族的直系祖先。

建州女真，一则为了躲避“野人”女真和蒙古骑兵的侵扰；二则为了与辽东及关内建立经常的经济联系，所以不断向南迁徙。几经辗转迁移，到了明正统年间，它们紧挨着辽东，沿佟家江、浑河上游、苏子河流域定居下来。这里丘陵起伏、森林遍野、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适于农耕和采猎；再加上广泛接触汉族的先进经济与文化，不断输入铁制农具、耕牛及生产技术；特别是女真人民披荆斩棘，辛勤开发，从而推动和促进了建州女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女真社会进入一个新时期。当时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4]，建州女真内部也是“掠夺货财，兄弟交嫉”^[5]，相互厮杀。这种分裂割据、战乱不休的局势，阻碍和破坏女真各部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女真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因此，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统一女真各部，是女真人民的共同愿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努尔哈赤顺应历史潮流，走上了统一女真的道路。

1. 努尔哈赤——满族的民族英雄

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身于奴隶主家庭。他是建州左卫人，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他早年丧母，分居自立。不久离家从戎，投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6]，是一员英勇的战将。而且勤奋好

学,爱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结交汉人知识分子,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身世和阅历的捶打下,他“多智习兵”^[7],成为女真族的杰出领袖,从政治和军事才能来看,远远在与他同时的女真各部首领之上。

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在帮助明军征讨阿台时,惨遭明兵杀害。于是他含着满腔悲愤,离开李成梁返回建州^[8],继承父职,担任建州指挥^[9]。同时,以父祖“遗甲十三副”^[10]起兵,开始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他既是明朝的地方官,又是建州女真的首领。在政治上“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11];经济上加强“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12];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向明朝“遣使能好,岁以金币聘问”^[13],向朝鲜表示“永结欢好,世世无替”^[14],向蒙古给予“厚赏”,“互相结亲”^[15]。与此同时,对周围邻近的女真各部,则实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16]的方针。由于以上种种措施,致使努尔哈赤领导的统一女真的战争得以顺利进行。他先后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把“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都俱征服”,使“诸部始合为一”^[17],基本上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大业,结束了女真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这对于女真社会的发展,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巩固东北边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促进和加速了新的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女真的统一,进一步推动了女真的社会经济发展。首先是农业生产,由于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以及大批汉民被俘、招徕,“惧罪脱逃”^[18],“因避差徭繁重”^[19],纷纷流入建州,这不但提供大量劳动力,而且带来先进熟练的生产技术。因此,耕地迅速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据朝鲜申忠一的《建州图录》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出使建州,在其境内所见“无野不垦,至于山上,亦多开垦”。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朝鲜李民寅的《建州闻见录》也说,这里“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而且粮食的

单产也很高,“田地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云”^[20]。因为农业生产和统一战争的需要,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冶铁、皮革、纺织、制盐等,都已成为专门的手工业部门。其中冶铁业尤为突出,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始炒铁,开金银矿”^[21],从此建州可以开矿冶铁,而且在银铁草木诸业中,“惟铁匠极巧”^[22]。当时手工业,除了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外,都带有浓厚的军工特色,生产许多弓箭、刀枪、甲冑、云梯等物,如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的“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23],军队里也配备有各种工匠,随军出征,直接为战争服务^[24]。在生产的基础上,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同明朝、蒙古和朝鲜之间的贸易很频繁。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建州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自由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越来越重。他们开始建立奴隶主庄园“拖克索”,来对奴隶进行剥削和统治。这就加深了阶级对立,奴隶们以破坏工具、怠工和逃亡等形式进行反抗。奴隶主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镇压奴隶反抗,便修筑城堡、订立法制、创建八旗军,最后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了后金政权。后金的诞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统一代替了分裂,这是一个进步。早在后金建立之前,明朝对女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政治上采取分而治之,在女真各部之间制造矛盾,进行离间、分裂活动,使它们相互敌视、憎恶甚至仇杀,其目的是“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25],破坏其各部的统一;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停止朝贡和互市,致使建州女真的新鲜人参不能及时出售,腐烂十余万斤,损失很大。而且还禁输铁器、耕牛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甚至强令他们“所种之田不容收获”^[26],这就严重影响女真人的经济生活,阻碍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军事上大搞武力镇压,明朝不仅“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掠夺”^[27],还唆使叶赫、哈达、乌拉等部攻打建州,甚至出兵叶赫给予支持。这种充满民族压迫的社会条件,对努

尔哈赤来说,不能不有所感触和刺激。所以,他曾对朝鲜使臣金希元气愤地说:“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十三年,不敢犯边,非不为恭顺也”^[28],可是“有辽东边官,只要害我途(图)功升赏”^[29]。

列宁说:“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反抗。”^[30]确实如此,后金在致明朝万历皇帝的书中说:“我本公正之人,必欲杀之,屡行欺逼,势不容我,含忍不过,故将我历来苦辱之情,具奏上天,方敢起兵。”^[31]这就说明,由于民族压迫,致使满族起兵反抗,虽然努尔哈赤为了本阶级的私利,却以民族的名义兴兵反明,在客观上是顺应了满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趋势,所以得到了满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努尔哈赤在公开向明宣战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颁布“训练兵法之书”^[32],日夜加紧操练;而且秘密派人上山伐木,制造攻城器械;同时又传令八旗将士:“治甲冑、修军器、豫畜牧。”^[33]于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宣布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特色的“七大恨”为伐明檄文,亲率八旗劲旅,一举攻占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和五百余处堡寨。明总兵张承允率军驰援,遭到八旗兵伏击,“全军覆没”^[34]。接着后金又攻克抚安、花豹冲、三岔儿等十一堡,很快又占领清河城。努尔哈赤旗开得胜,使“全辽震动”^[35],“举朝震骇”^[36],京师的“当事大臣几至闻雷失筋”^[37],就连神宗皇帝也惊呼“辽左覆军隕将,边事十分危急”^[38]。

明朝统治者如此惊惶失措不是没有原因的,辽东乃是京师左臂,如有一失,就要威胁京师的安危。虽然许多“辽事议者,以必剿为主”^[39],但是“而今九边空虚,亦惟辽左最甚”^[40],此时“辽东战士不满八千,而建州控弦之骑三万”^[41],兵力对比十分悬殊。明在辽东的驻军,更是腐朽不堪,正如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所说:“今之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腕战,面孔殊

无生色”^[42]，许多士兵“不能开弓，或开弓而不及十步”^[43]，这种军队如何能同后金的八旗兵交锋呢？所以，明朝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分路来侵”^[44]，企图一举消灭后金，这就是萨尔浒之战的历史背景。

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明廷任命所谓“熟谙辽事”的兵部左侍郎杨镐经略辽东。并从全国调将征兵、筹饷集粮、购马置械，经过九个多月的准备，到了第二年二月，援辽的各路明军先后到达，共有八万八千多人^[45]。杨镐与诸将制定了声东击西、分兵合击的进攻方案。以总兵杜松率领约三万明军和一万三千朝鲜兵^[46]，出晾马佃攻其东，四路约共计十一万人，直逼后金政治重心赫图阿拉城，其中以杜松一路“最冲”^[47]。原定四月四日先后出师，因为大雪迷径，故改为四月九日以后再出兵，“约以三月初一日（阳历四月十四日）齐集奴城下”^[48]会师。杨镐为了麻痹后金，就在发动进兵的前两天，四月八日差人送书给努尔哈赤，一面表示愿意“修好”，一面又扬言将“于三月十五日月明之时，分八路进兵”^[49]，攻打后金。

其实，明“兵未发，而师期先泄，建州得预为备”^[50]，当努尔哈赤侦知明军的作战部署和行动计划后，便召集诸贝勒大臣共同商讨对策。他指出明兵虽分四路来攻，实以杜松一路为主力，尽管东路发兵最早，但山高水险，行军艰难，而西路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可达赫图阿拉。所以“明使我先见南（即东）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即东）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51]。根据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52]的集中优势兵力的打法。于是努尔哈赤仅派五六百骑兵阻击东路刘綎的明军，而亲自统率大约六万八旗兵，奔赴西线，迎击杜松率领的明军主力部队。双方决策制定后，明军和后金兵的大战开始了，两军首先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之战的序幕。

2. 萨尔浒之战

整个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萨尔浒、吉林崖战斗。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二月二十八日,杜松率领明军离开沈阳。二十九日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而上。三月一日,渡过浑河,到达萨尔浒一带,杜松得知后金正在加紧赶修“形势险要,扼锁阳之咽喉”^[53]的铁背山上的界凡城,藉以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两万人在萨尔浒山麓扎营,而自己率领一万人渡过界凡渡口,进抵界凡城下吉林崖一带。

与此同时,三月一日晨后金倾“全城所有的兵,准备出发时”,在“纽望雅哈路(清河)又发现了敌兵”,这是李如柏率领的由南路进攻的明军。此时大贝勒代善说:“纽望雅哈路虽有兵来,一时还不会到来,派二百兵前去守卫,总之我兵应先往西边去。”^[54]随后代善率领八旗先锋,直奔西路迎击来犯的明军。当他下午抵达铁背山的太栏冈时,看到杜松指挥明军包围吉林崖,进攻界凡城,立刻派一千人,火速增援界凡城,命令右翼四旗进攻吉林崖下的明兵,其余左翼四旗监视萨尔浒方面的明军。此时天色已晚,努尔哈赤来到前线,问明作战部署后,便收回成命,他说:“现已申时,天已晚了,左翼四固山的兵,先攻打站立萨尔浒山上的敌兵,将此兵击败后,立于界藩山上的敌兵自然动摇。”^[55]于是从右翼抽调一旗到左翼去,留下右翼三旗“瞭望”杜松的动向,而自己率领五旗三万七千多人,以优势兵力,猛攻驻守萨尔浒的明军,明军仓促应战,结果大败。除了死伤以外,纷纷抢渡萨尔浒河向西逃命,又有许多人被淹死,后金兵紧紧尾追,最后一些残兵败将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努尔哈赤立刻回军围攻杜松,界凡城的守军也自山上冲下,实行前后夹击。吉林崖的明兵,见萨尔浒大营已破,早成惊弓之鸟,哪有抵抗能力?一经交锋,明军就被杀得丢盔弃甲,抱头鼠窜,主将杜松战死,剩下的明兵向北一直溃退到浑河,由于抢着渡河,你

推我挤，人马杂踏，被杀死、淹死的不计其数。有些明兵过河后，经营盘，逃至硕钦山，被追击的后金兵全部消灭。

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吉林崖的战斗中，以优势兵力，速战速决，消灭了明军西路进攻的兵力，取得了第一仗的辉煌胜利。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56]所以，后金初战告捷，为以后战斗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尚间崖、斐芬山战斗。总兵马林率领北路明军，原计划从开原出发，出靖安堡，可是临时改由三岔口（即三岔儿堡）进入后金地界。三月一日晚，马林率军到达富勒哈山的尚间崖，在此安营扎寨，命潘宗颜率一支人马驻守斐芬山，和西路败退到斡琿鄂漠的龚念遂部互相犄角，彼此声援。当后金兵在硕钦山消灭杜松残部后，发现尚间崖的明军，正在“掘壕设营”，大贝勒代善传令前哨部队，严密监视明军的动向。三月二日清晨，代善跃马执戈，准备偷袭明营时，已被明军觉察。随后发现尚间崖西边的斡琿鄂漠和东边的斐芬山皆有明军驻扎。他将此情况派人飞马报告努尔哈赤，暂停对尚间崖的明军发动进攻，却派四贝勒皇太极率兵围攻斡琿鄂漠的龚念遂部，万骑夹击，明兵大败，从而剪除了尚间崖明军的右臂。此时努尔哈赤赶到，他察看明兵阵势后，认为“我们的兵当先占领山上（尚间崖山），由上向下冲击，则此兵必败”^[57]。就在后金兵要去强占山顶时，明军发动进攻，所以努尔哈赤立刻命令：“速停止我兵攻取山上之举，下马步行应战。”^[58]代善率两旗冲入敌阵，于是两军混战，反复射砍攻杀。努尔哈赤又命令其他六旗全部投入战斗，明兵势不能敌，大败而走，后金兵乘势追杀，死者满山遍野，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

努尔哈赤打败马林，攻占尚间崖后，便集中所有兵力，围攻斐芬山的潘宗颜部，明兵以有利地形和精良枪炮，进行抵抗。但在强大的八旗兵的攻击下，全军被歼。至此，后金又粉碎了北路侵犯的

明军,取得了尚间崖、斐芬山大捷。

第三阶段是阿布达哩冈、富察战斗。总兵刘綎统率的东路明军,担任声东佯攻的任务,所以出师最早。二月二十六日,刘綎率明军自宽甸,过瞭马佃,深入到榛子头。因为此“道独险远,重冈叠岭,马不得成列”^[59],而且“雪晴风起,寒冽殊甚”^[60],再加上“师行仅赍三日粮”^[61],粮尽无济。同时沿途又不断遭到后金小股骑兵的阻击,所以进军比较迟缓。三月二日明军渡过深河,三日到达离赫图阿拉城仅五十余里的阿布达哩冈。与此同时,被明朝胁迫征调而来的朝鲜兵,在元帅姜弘立的率领下,因为“士卒饥馁,运粮未到”^[62],一直尾随明军前进,四日在距阿布达哩冈十里的富察扎营。

努尔哈赤粉碎西、北两路来侵犯的明军后,得知“进入南董鄂路的敌兵(指刘綎部),向着我大城而来(指赫图阿拉)”。另由呼兰路进入之敌兵(指李如柏部),也是向着我大城而来”^[63]。于是派达尔汉率领一千人奔赴东路迎敌,随后又增派阿敏率领两千人前往。三日,努尔哈赤派代善率领一些随从奔回赫图阿拉城,察看东线的形势。当他到赫图阿拉时,明军已经逼近该城只有五十余里,形势十分紧张,许多人都惊惶失措地忙问他:“现在又听说有两路兵前来,怎么办?”^[64]代善见此情形,一方面安定人心,他说,西边来的两路兵,都被我们杀了,此路的来兵,我们的兵已去迎战了,暂时还不会到来;一方面立刻返回界凡,向努尔哈赤报告赫图阿拉的紧张气氛和东线的情况。四日早晨,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回到赫图阿拉,他除了留下四千人留守,监视南路来犯的明军外,命令代善率领所有人马前往东线迎击明军。

当天中午代善率领大军赶到东线时,明军都退守在阿布达哩冈的山顶。他派四贝勒皇太极带领右翼四旗去强占阿布达哩冈山顶,再由上向下冲击明军,自己率领左翼四旗进行夹击,企图一举消灭明军。但是,皇太极进攻未能得手,代善只好从中路突入明军

阵地，即而血战一番，明军溃败，刘铤被杀，有部分明军抢渡深河逃往富察与朝鲜兵会合。代善随即挥兵南下，绕过家哈岭，把明军和朝鲜兵隔开，集中兵力攻打刘铤残部，结果明军“举皆覆没”。然后又把八旗军分为两路，将朝鲜兵团团围住，不断“驰突，势如风雨”，“瞬息间两营皆没”。最后“元帅姜弘立以下，全军投降”^[65]。

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率领明兵火速撤退，免遭败灭的厄运。因为李如柏畏惧后金，出兵后“逗留不进”^[66]，所以只到虎栏一带。当他受命遁回时，听到山上后金哨兵的鸣锣声，疑为伏兵四起，“夺径路而遁，相蹂残者千余人”^[67]。

萨尔浒战役，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后金，打败了明军，这决不是偶然的。虽然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作战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条件，但首先取决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以及人心的向背。萨尔浒之战，对于后金来说是一场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反映满族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从而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以，后金的八旗兵，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如守卫界凡城的四五百人，敢于面对多于自己二十多倍的明军作战。驻守深河一带的五六百名骑兵，敢于阻击两三万敌兵的进攻。而且老百姓坚壁清野，明兵所到之处受冻挨饿。

其次是努尔哈赤作战指挥的正确。他很重视调查研究，知己知彼，“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而长安邸报，皆用厚资抄往”^[68]，对敌情了如指掌。而且充分利用自己熟悉的地形，发挥骑兵勇猛神速、善于野战的特点。这样正确估计敌我力量，使主客观条件相符合，制定作战方针和计划。萨尔浒之战，如果从表面上看，明军力量占绝对优势，但实际上它是“以短击长，以劳赴逸，以客当主，非计之得”^[69]，况且杨镐把优势兵力分散使用，努尔哈赤看清明军的弱点，则采取集中兵力的战略战术。于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为打退明军进犯，夺取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明朝战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得人心,兵民厌战。明万历年间,政治极端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处于阶级大搏斗的前夜。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下级官兵,由于生活贫困,对现实不满,反对这场战争。所以,从全国强迫征调来的士兵,许多人“不愿出关”,有些军官也“都求调”^[70],而且大批士兵逃亡,“前调三千到辽止八百”^[71],一次就逃走两千多人。

第二,主帅无能,指挥错误。杨镐“本庸才”,当廷臣“不知边计”,“欲其速战”,他“皇遽,计无所出”^[72],结果不管天时、地利、人和,制定一个错误的分散兵力的作战计划,企图侥幸取胜。当部将刘铤提出“地形未谙”^[73],“欲退师期”^[74],杨镐斥责他说:“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并“悬一剑于军门”^[75],不许部下说话。他却把明军西路主力,担任主攻任务的重任,交给“不听节制”、“刚愎少谋”、“贪功轻进”^[76]的杜松指挥,致使全军覆没。

第三,将领不和,互不声援。杨镐和刘铤共事“素不协”^[77],杨镐不但派亲信二人到东路“持红旗督战”,而且还派人暗里监视,“刘若逗留,则当总领东路马军”^[78]。刘铤率领的明军,“器械龃齬,又无大炮火器”^[79]。所以,他对朝鲜元帅姜弘立说:“杨爷(杨镐)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恩,以死自许。”^[80]除了将帅不和外,诸将之间也闹矛盾,各人自保,互不援助,当“刘铤深入中伏”时,有人“劝(李)如柏往援,不从,铤遂覆没”^[81],如果李如柏“偏师策应,杀人重围,刘铤当不至死,或夹击成功,未可知也”^[82]。

上述说明,后金进行的是一场得道多助的正义战争,所以上下团结一致;反之,明朝发动的是一场失道寡助的非正义战争,内部矛盾重重。正如明人付国在《辽广实录》里说的,“彼一国之政如一家,而我上下隔阂”^[83]。因此,萨尔浒之战以后金获胜、明朝失败而告终。

萨尔浒之战,是关系到后金是否能生存下去、明朝是否能在辽

东统治下去的关键一仗。所以,它无疑对双方都有深远的影响。

明朝为了发动这场不义之战,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结果四路出师,三路败绩,大小将官死了三百多员,军士阵亡四万五千余名,“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衄”^[84]。明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开原、铁岭,“人逃亡尽矣”^[85],随之沈阳、辽阳也风鹤频惊,“民逃军逃,将哭道哭,大小将吏,无不私蓄马匹为逃走计者”^[86]。与此同时,京师上下也都惊恐万状,“人心惶怯,谈虎生变”,“大小臣工,无不骇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卒多携家避难而去”,甚至感到“国家之计岌岌乎殆哉”^[87],“其间惶惶之状,不能以旦夕待”^[88]。从此,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一蹶不振,对于后金的军事威胁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兵之力。河东一带,“赤地千里,刍粟一空,人马倒卧,道路枕藉”^[89],开、铁、辽、沈等城,皆置于后金的兵锋之下。明廷为了守卫辽东,以保京师的安全,于是把战争的沉重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加紧征收“辽饷”,先是亩征银二厘,不久增加到九厘,每年勒索九百万两,这种对人民的榨取和掠夺,加速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萨尔浒之战戳穿了明朝这只纸老虎,从此努尔哈赤把战略重点转向辽东,矛头直指明王朝。他为了切断明朝对叶赫的支援,控制整个海西,并从北向打开进入辽河流域的大门,不断派兵到铁岭、柴河、抚安等地探明虚实。这年六月十日,努尔哈赤派大贝勒代善率领四万人,往攻辽东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开原城。明总兵马林闭门固守待援,结果城破被杀,开原失陷。七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铁岭,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战,终于占领了这个通往辽沈的咽喉要道。因此,“辽阳、广宁岌岌不保,关内人心惶惶靡措”^[90]。天启元年(1621)三月,后金一举攻占沈阳,接着又占领辽阳,随后辽河以东,镇江、海州、耀州、盖州、复州、金州等地皆为其所有。因此,努尔哈赤的势力迅速增强,同明王朝相对抗,不再满足割据一方的后金地方政权,而要入主中原夺取明朝的统

治权,如改称天朝(明朝)为南朝,公开指责“万历皇帝心不公正”,“南朝昏迷”,而且宣称“自古以来岂有一姓之中尝为帝王,一君之身寿延千万”^[91],毫不隐讳地说:“大而变小,小而成大,古来兴亡变迁之例甚多……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92],这些话十分清楚,努尔哈赤要取代明王朝统治中国。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对新占领的辽沈地区的统治,把势力伸到辽河以西和山海关一带,密切与蒙古的联系,便迁都辽阳,不久又迁往沈阳。

由上可见,后金由于取得了萨尔浒自卫战争的重大胜利,不但保卫了自己的生存,而且壮大起来,很快又进入封建经济发展较高的辽沈地区,这为以后建立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清朝乾隆皇帝曾说:萨尔浒“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辽阳,王基开,帝业定”^[93],这就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萨尔浒之战,是明清兴亡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次战争。

第二节 宁远之战与努尔哈赤之死

17世纪初,我国东北的满族在其杰出的领袖努尔哈赤的领导下日益兴起,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了后金地方割据政权,成为与明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强大势力。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起,直到天启六年(1626)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大战之前,明和后金之间经历了清抚、萨尔浒、开铁、辽沈、广宁等次大战,每役皆以明军溃败,后金获胜而告终。惟有宁远之战,明军以少胜多,首次取得大捷,士气振奋,举朝欢庆。后金却损兵折将,努尔哈赤“遂大怀忿恨而回”^[94],于是抑郁在胸,不久身患毒疽而死;由此使明金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双方由战争状态转入议和阶段,可见宁远之战的意义十分重大,影响也非常深刻。

一、明与后金之间的宁远之战

天启二年(1622)正月,辽西重镇广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政府大为震惊,上下一片慌乱。此时关外“满目兵燹,河西七百里边城,俱为烬,关以外几成异域矣”^[95]。而“山海一关止有残兵五万,皆敝衣垢面,一带城垣仍低薄塌圯,罗城内器械填塞,莫为查验,而溃兵逃民聚如斗之城,互煽互凉,立见兽散之势”^[96]。如何应付这一严重事态的发展,便成了明政府的当务之急,当时在明朝统治者内部,有些人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关门,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是推行这条逃跑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在晋素不习兵,亦无韬略,却刚愎自用,独断独行。他到职以后,害怕和后金交战,接受了蓟辽总督王象乾的建议,“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97]。因此,王在晋向朝廷疏称,认为关外已不可守,只能退守山海关,如果要守住山海关,就必须在关门附近再修重关一道,不然也不可守。其理由是“山海形势,南则海天,虏加舍骑登舟,瞬息直达,北则为角山山脉……关城枚之,缭垣于山,是为边墙,而峰峦更高于垣”^[98]，“贼如凭高击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间,中辟为关,乃欢喜岭蜿蜒绵邈,紧抱关门,岭高于城,张弧决拾,矢达城楼。登岭下瞰,一城尽在目中。若架大炮,楼堞何能遮蔽?高岭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由他看来,“山海关必非易守……势不得不于关外再筑一城”。所以他说:“臣与诸臣再三酌议,相度地形,无如八里铺者。……今傍三道关起脚,逶迤至海,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队,守望相助,不惟十七里之危,边前有障蔽,而二十里之巉岈作罅,大半收括囊中。欢喜岭在新城之内,凭高眺远,败来我悬镜以矚其形矣”^[99]。这番话似乎很动听合理,实际上是欺人耳目,并无坚守关门的诚意和决心,正如杜应芳等人所指出的,“议筑重关于山海关外八里铺,其意即守关亦非所乐,势不得不守,而又耻于莅关无所

为，则人将议之，而金钱亦未可遽请，欲问关外则所不敢，于是撤离关八里复设官，其说以即外关破，内关尚可守，而外关之兵无可逃”^{〔100〕}。达就十分清楚，所谓“重关设险”不过是一块掩饰逃跑的遮羞布。

王在晋在八里铺修筑重关的计划虽然得到明政府批准，但是却遭到以兵部尚书孙承宗为首的一批主张御敌将领的反对。这年六月，孙承宗亲赴山海关一带视察，他和王在晋之间，对放弃关外，修建重关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孙承宗问：“新边城即移旧边之四万以守乎？”

王在晋答：“当另有兵。”

孙承宗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有守乎？其战兵即守兵乎？另有战兵乎？筑关在八里铺，新城之背即旧城之址也，其品坑地雷将为敌设乎？为新兵设乎？若新城能守，则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新兵四万退转旧城之下，将开关以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在晋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

孙承宗问：“若是，则敌至兵逃如故，安用重关？”

王在晋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承宗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又安用重关？且败兵入三道关，敌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溃，不又踏全辽覆辙乎？”“今不为恢复计，划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

王在晋自知理亏，无言可答。孙承宗则严厉指出，现在正将是“秋高马肥，敌且西来，当为战备，而旧关未固，胡不合新旧之费且筑旧城，待旧城可守，再筑新城，似为有备，如两城并筑，而一瑕是未有备也。皇上倚豪杰为万里长城，那得潦草，而况百万金银轻掷于无用之版筑，似当详察”。这席话分量很重，“在晋始丧气失色”^{〔101〕}。

孙承宗知道废重关，守关外事关重大，所以他在回京之前又到关外巡视，登上中前所城楼眺望，“遥见宁前形势，天设重关，以护神京。觉华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可厄敌之用”。孙承宗看到宁远形势如此险要，更加增强了坚守关外的信心和决心，于是要王在晋火速增兵驻守宁远、觉华岛等地。可是王在晋不同意，孙承宗“乃推心告语凡七昼夜，而在晋终缩朒不应”^{〔102〕}。

孙承宗见无法说服王在晋，便回京向明廷奏称：“敌未抵镇武而自烧宁、前，此前日经、抚罪也；我弃宁、前，敌终不至，而我不敢出关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将吏置关内，无能转其畏敌之心以畏法，化其谋利之智以谋敌，此臣与经臣罪也。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勿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统其后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人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然后孙承宗又向天启帝朱由校面奏，认为“在晋不足任”，因此不久王在晋被调离辽东，“而八里筑城之议遂熄”^{〔103〕}。

王在晋任辽东经略半年多，关外形势不仅毫无起色，而且日益恶化。他的去职无疑是对主张放弃关外、准备逃跑的一伙人的沉重打击。那么谁来接替经略一职呢？明政府一时找不到适合的人选；许多大臣也视此职为畏途，不敢问津。惟有孙承宗挺身而出，自请出任辽东经略，他说：“经略去矣，代者且将奈何，与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不如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我。”并且疏称：“皇上急催更易经略，一时诸臣同心忧国，无不悉心商榷，而目前人才止是如此。但关城之事担阁已久，半年来兵未合营，将未束伍，独有逃官逃将，议筑议凿，口口声声俱说要守，而将不简，兵不练，何以为守？”^{〔104〕}所以必须赶快整顿防务，以保京师的安全。明政府接受了孙承宗的自荐，命他赴山海关督师。由天启帝颁敕说：“朕念狡酋狂逞，数载于兹，辽水东西，悉被陷没，惟榆关内外作我

藩篱，关系不细。朕不惜征兵转饷为战守资，而文武将吏尚未有固守决胜之画，克称朕意。近者卿往阅视，具悉情形，诸所规谋，切中窾会，兹又不避艰险，自请视师，朕甚嘉赖。兹特命卿以原官督理辽东、薊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驻扎山海关，凡阌外兵马、钱粮、招讨、攻守一应等务，便宜行事。”^[105]这话清楚不过地说明，明政府对孙承宗赴关誓师抱有很大的期望。

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走马上任，他为了贯彻实行以守为攻、相机收复失地的战略方针，采取了以下措施：

——安置辽民，以辽人守辽土。自从后金开战以来，明军节节败退，丧城失地，造成大批辽民离乡背井，纷纷逃亡。许多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关内的官吏，都把这些受战火涂炭的辽民视为“土寇”，即便是那些英勇抗击后金的辽民也被看成“盗贼”，王在晋曾说：“迹缘胡越一家，音闻得达，或父母在虏而呼子弟以取贼，或妻子车辽地而思挈众以同奔，衣食难周，既萌偷生之想，故乡人梦辄怀臣庶之思。”^[106]因此他“立法不用辽人”^[107]。孙承宗反对把辽人作为敌人看待，认为辽民可用；并提出安置辽民的具体办法。他说：“有关内之辽人，玉田、丰润之间，拥车犍载妇女，朝东暮西而呼号于道者是也，法当登籍，分屯卫所，量州县大小分拨乡堡，无令流移不定而事久生变也；有关上之辽人，环关城之外片席为窝者是也，法当籍其拳尽募为兵，置之中前二屯，渐及宁远，更择其有家口者为屯牧，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此大计也；又有关外十三站之辽人义民十余万，因山为寨，以待救者是也，法当如袁崇焕议，驻兵宁远，觉华，迎护以归，强者为兵，弱者屯牧；此复辽之资也。”^[108]孙承宗正是在这种“以辽人守辽土”的思想指导下，“招募辽人以充兵额”，所以遣祖大寿“于觉华岛抚练新归辽人”^[109]。

——修城练军，加强防卫。孙承宗到关督师后，针对严重的防务废弛状况，大力进行整顿。首先，裁减冗员劣畜，以节省粮饷草料，据《明实录》记载：“孙承宗开报汰过关门兵马数，原额官兵一十

三万四千四百三十三员名,今共汰过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七员名,见在官兵一十一万七千八十六员名。原额马羸驴驼牛五万九千五百一匹头只,今汰过五千六百四十九匹头只,见在五万三千八百五十二匹头只。岁省饷银及米豆草等项共六十余万两”^[110]。其次,修筑城堡,加强防守。孙承宗“罢八里铺工,使并力于旧关,城加高五尺或七尺”^[111]。并且派兵在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右屯等地,总共修缮城堡五十四座。这样使关外各个军事据点之间,不仅可以独自固守,而且还能互相支援,同时也构成了以宁远、锦州为主体的新防线。再次,使用火炮,增强攻守力量。孙承宗很重视发挥火炮的威力,当时西洋大炮传入中国不久,只有京师的火器营会使用,他便调京营火炮技师彭簪古到关上专门组织训练炮兵^[112],并且让彭簪古率领所练炮兵驻守宁远,他们在以后的宁远大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孙承宗督师薊辽的四年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所谓“迨枢辅当关,军威大振,于是驱逐汰冗,选将征兵,设三大帅于关前,提十万人于境上,层层布置,节节安排,边亭有相望之旌旗,岛屿有相连之舸舰,分合俱备,水陆兼施,真可称率然在山矣”^[113]。他“前后统城堡数十,练兵十一万,造铠数百万,开屯田五千顷”^[114],因此“兵民安堵,文武辑睦,商旅云屯”^[115];与此同时,收复关外大片疆土,把蒙古哈喇慎等部基本上移往河西,据《督师纪略》记载,“公既恢宁前,即以虎墩八里铺之抚场,于兴水县,小歹青八里铺之抚场,移于黑庄窝,拱兔八里铺之抚场,移于塞儿山,哈喇慎八里铺抚场,移于高台堡,皆在二百里之外”^[116]。这不但消除了关门的威胁,而且确保了京师的安全。

就在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企图拉拢孙承宗入伙,遭到他的拒绝,所以“魏忠贤与群小畏忌之,诬左袒东林”^[117]。另外他们还利用辽东耀州之役失利一事,大肆攻击孙承宗,迫使他离职归里。他们却任命阉党分子高第为辽东经略,此人是个怛怯的胆小

鬼,他步王在晋的后尘,主张放弃关外河山,退守山海关一线,他说:“自广宁弃后,蓟镇单弱,所赖以内护邦畿,外拒奴虏者,惟榆关为扼要。”^[118]并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这一撤退逃跑的罪恶行径,结果造成“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119],关外除了宁远等几座孤城以外,大片疆土皆拱手让给后金了。

努尔哈赤得悉辽东经略易人,新任经略高第自动撤除锦、右一带的防务,仓皇逃入关内。于是在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大军征明,企图一举夺取关外诸城。十七日渡过辽河,军分两路直趋宁远,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遭到明宁远守将袁崇焕勇敢无畏的坚决抵抗。

袁崇焕,广西藤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先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入京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其“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隘塞情形,以边才自许”^[120]。当广宁失陷以后,正在许多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他却独自单骑出关巡阅形势,回来声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个足守此”^[121],这反映出他了解敌情、胸有成竹的战略措施和英勇气概。在他知道王在晋退守山海关的逃跑计划后,认为王在晋“无远略”,对修建重关“以为非策”,因此他向王在晋陈述了关外不可弃、重关不可建的意见,结果“力争不能得”^[122]。但是袁崇焕并没有因此而罢休,却向前来山海关视察的兵部尚书孙承宗进一步述说自己的看法。他分析了关内外的形势,提出以守宁远而后攻的战略方针,指出自广宁溃败以后,关外几乎皆为蒙古科尔沁诸部所据,他们阳奉大明,暗结后金,时刻威胁着山海关的安全;还认为在关外十三山一带有数万义民进行抵抗后金的斗争,对他们不该袖手旁观、不闻不问,而应该给予积极支援,团结义民一同战斗;同时,特别强调宁远乃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要道,也是保卫关门的屏障,在此构筑坚固防线,派兵驻守,进可攻,退可守,相机即可收

复辽东失地。

孙承宗对袁崇焕提出的坚守关外、捍卫关内的积极防御方针表示完全赞同,并认为“崇焕英发贴实,绰有担当”^[123],是个有真知灼见的将领,所以对袁崇焕十分赏识,予以重用,不久便调他任宁前兵备道驻守宁远。袁崇焕到宁远上任以后,除了加紧训练军队,屯田积粮外,特别重视修建城堡,安装火炮,加强防御力量。他按照“以台护銃,见銃护城,以城护民”的原则,大力修建宁远城,此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地广三丈四尺……遂为关外重镇”。由于“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124]。

正当袁崇焕积极经营宁远,取得显著成效时,天启五年(1625)高第代孙承宗为辽东经略,他一反孙承宗的措施,自毁自弃关外各项军事防御,强迫大批军民撤入关内,袁崇焕对于高第这种逃跑行动坚决反对,他指出:“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可是高第不听劝告,“且欲并撤宁、前二城”。袁崇焕拒不从命,表示“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125],誓与宁远共存亡。

由于高第撤防逃跑,招致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城内,见“虏势甚张,人心惶骇欲逃”^[126]。高第得知这个消息,“拥兵关上不救”。明政府惊闻之下“谓宁远必不守”^[127]。但是,袁崇焕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虽然宁远只有一万多守军,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他仍然镇定自若,井井有条,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首先集合全体将士,刺血为书,激励士气,誓死守城;其次动员城外百姓,各自携带战具兵器入城,与城内居民一同配合明军保卫宁远;再次说服城边的居民,以大局为重,自动焚毁房屋,使攻城的敌军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掩体。即命四员战将,满桂领兵守东门,左辅领兵守西门,祖大寿领兵守南门,朱梅领兵守北门。同时四面城墙上都架设有西洋大炮,东北两面由火器把总彭簪古负责,西南两面则命

罗立指挥,这两人都精熟火器。另外还有人“城上及四门为援”,有人“专一城内搜拿奸细”,有人“宣传督阵”,有人做“宁远外援”^[128];最后表示,“苟能同心死守,我为牛羊以报是所甘也”,于是“众感其意”^[129]“人心始固”^[130]。这就是袁崇焕坚守宁远孤城,抵御努尔哈赤来攻的军事布置。

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军到达宁远,便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关大路驻营,以切断宁远和关内的联系,并防备明朝从水陆两路派来援军。努尔哈赤虽然是首次与袁崇焕交战,但是早已深知袁崇焕是个有智谋的将领,再加上后金兵“星夜倍道疾驰,士马疲罢,恐袁兵出战,皆坐马佛寸”^[131],所以不敢轻易挥军攻城。因此先派人去招降,他对袁崇焕说:“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袁崇焕拒绝投降,并义正辞严地质问努尔哈赤说:“汗何故遽加兵耶?”向他坚决表示“义当死守,岂有降理”^[132]。

努尔哈赤见劝降不成,就于二十四日清晨发动猛烈进攻,后金兵先打宁远城的西南角,他们“戴楯穴城,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闾府罗立发西洋巨炮”^[133],数十门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134],敌人死伤无数,迫使后金兵移营。然后努尔哈赤又转移攻打宁远南门,战斗更加激烈,后金兵在板车厚盾的掩护下不断攻城,可是遭到城角两台相对交驻射击,死伤惨重。但在一些大炮火力不及之处,后金兵用斧凿城数处,使城垣圯丈许。袁崇焕在这危急关头,身先士卒,亲自担土搬石堵塞缺口,不幸负伤,部将皆劝他自重,他则厉声表示说:“偷息以生,复何乐也!”随即“自裂战袍,裹左伤处,战益力;将卒愧,厉奋争先相翼,蔽城复合”^[135]。他看到后金兵仍不退却,还在掘城不止,城基俱成凹龛,兵匿深处挖掘,城上炮火、弓箭、飞石都不能及。袁崇焕便以“捆柴浇油,并搀火导,用铁绳系下烧走,至二更方才打退。又选健丁五十名从城上系下,用棉花火药等物,将达贼战车尽行烧毁”,因此

“贼风稍挫”^[136]，不得不停止攻城，向后撤退。

二十五日，努尔哈赤不甘心失败，再次组织猛烈进攻，他亲临前线督战，从早到晚双方激战了一整天，后金兵完全暴露在明军的火力之下，多次遭到城上西洋大炮的轰击，人仰马翻，伤亡很大。结果“复攻又不能克，乃收兵”^[137]，于是退到离城五里的九龙宫扎营。

二十六日，努尔哈赤无奈，只好放弃攻打宁远。他知道明军关外军需粮草俱屯于宁远南十六里的觉华岛，于是领兵进攻该岛，先打东山，再攻西山，守岛明军“以寡不敌众，故四营尽溃”^[138]，后金兵烧毁明军“船二千余及粮草千余堆”^[139]，这就算做他战败后的一种报复吧。

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带领从宁远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满怀仇恨地返回沈阳。努尔哈赤此次进犯宁远，是他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遭受挫败，而且损失也是前所未有的。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师，满朝震动，欣喜若狂。兵部尚书王永光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140]天启帝朱由校也说：“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141]宁远的胜利，大大振奋了明政府的精神，据《明史》记载，努尔哈赤兴兵以来“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142]。袁崇焕在敌强我弱，外援断绝的不利条件下，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绝非偶然，这是由以下主客观因素造成的。

宁远之战，明朝军民是为了自卫，特别是广大辽民为了保卫乡土，免受蹂躏而战，是正义的战争，而后金则是为了攻城略地，奴役人民，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是非正义的战争。所以袁崇焕主张积极抵抗，便得到人民群众和官兵上下一致的拥护与支持，宁远被围攻期间，全城老百姓众志成城，以不同方式投入了战斗，如果不是这样，“何宁远独无夺门之敌，内应之奸细乎？”^[143]确实如此，尽管努尔哈赤善于用兵，会利用奸细，但是在宁远之战中没有能使像辽

阳、广宁的溃败重演,这说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是明军获胜的原因之一。

宁远大战之前,孙承宗和袁崇焕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大力经营宁远,修城练兵,安置辽民,筹备粮饷,制造战具等,使宁远城固若金汤。正因为袁崇焕等人有了充分准备,当敌人打来时足以应敌。可是久经沙场的努尔哈赤,在这次战斗中未能做到知己知彼,却犯了骄兵必败的错误,正如他的谋臣刘学成说:“汗不到半天就攻占沈阳,一天攻占了辽阳,其他的城无数,今为何两天还没有攻占宁远呢?不是辽阳、沈阳的人比宁远的少,或是庸懦的缘故,也不是枪炮少钝劣的缘故。汗占领辽东以来,步兵、骑兵三年没有作战了,兵的厄真(满语,此处指主将)怠惰,兵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武器已不锐利。因为汗轻视宁远,所以天使汗劳苦。”^[144]这是明军获胜的原因之二。

后金的八旗兵,习于野战,不善攻坚,可是打宁远则是遇到一场攻坚战,因为明军守城主帅是智勇双全,誓与城共存亡的袁崇焕。因此不仅是用弓箭、刀、矛、钩、梯等兵器,要攻破宁远城不容易,即经努尔哈赤亲自督战,也不能奏效。总之,攻打宁远城这对努尔哈赤来说是以短击长,以劳赴逸,而明军则是以己之长击彼之短,仗打得很主动。袁崇焕根据实战的需要,认为明军“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145]。他除了积极修筑宁远城以外,特别重视使用射程远、杀伤力大的西洋大炮,当时宁远城就配备有十几门西洋大炮,此外还有子母炮、快铳等火器。这些火炮对于防守和进攻都有很大威力,所以在宁远战斗中,“其得力多藉西洋炮”^[146]。这是明军获胜的原因之三。

宁远之战的后果,对明和后金双方都有重大意义和深刻影响。

首先,后金内部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失败后,因心情郁忿,是年八月十一日患疽死去,这对后金是一沉重的打击。由他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遵照他的遗命,

实行八和硕贝勒共同主政,这使后金最高统治者内部汗权与王权的斗争日益激化;另外努尔哈赤晚年在辽沈地区推行一些错误政策,由于政策失误造成后金统治不稳,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飘摇动荡之中。因战争失利,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与此同时,明朝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对后金构成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时刻威胁着后金的统治政权。皇太极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决定实行一系列的內政改革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所以对明的政策也有所改变,他采纳了廷臣议和的建议,所谓“我国处南朝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147]。因此明和后金的关系,由过去的战争状态,转入议和阶段。

其次,明朝取得宁远大捷,从而改变了以往认为满洲八旗兵不可战胜的看法,增强了广大军民保卫关外、收复失地的信心和决心。袁崇焕乘胜收复了被高第放弃的锦州、右屯、大凌河、松山、杏山、塔山等城,重新建立了宁锦防线,并且修城筑堡,练兵造械,屯田积粮,招抚逃亡,加强防御力量。因为皇太极对明推行议和的政策,而明朝也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所以明军也无力进攻辽东,因此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在此期间,后金兵虽然也曾多次入关骚扰,但是不敢从锦州、宁远一路闯入山海关,而是绕道内蒙入关,即使入关也不敢久留,惟恐后路被截断,沈阳受攻,所以很快就又退出关外。可见,宁锦防线发挥了守卫关门,保护京师的显著作用。

再次,由于西洋大炮在宁远大战中起了重要作用,使得后金也要倚重火炮力量。它开始重视制造西洋大炮,天聪五年(1631)造成第一门新式火炮,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接着明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带来大批火器,从而战斗力大大增强。这也是由于宁远之战,后金受到致败而发生的影晌。但我们必须指出,宁远之捷,虽然得力于火器,但更重要的是袁崇焕能够团结军民,使之同心同德,一致对敌。毛泽东同志说过:“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48]保卫宁远,赢得胜利,主

要关键,端在于此。

二、努尔哈赤之死

长期以来,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在许多明清史的论文和专著中,都认为是在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攻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时,为明军炮火所击,身负重伤,不治而死。这个论断惟一的史料根据是朝鲜李星龄撰写的《春坡堂日月录》。为了搞清问题,特将此段材料抄录如下:

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柜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绵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队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赤先已重伤,及是俱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恟恟而毙云^[149]。

现就我们所见的材料,对努尔哈赤“先已重伤”的说法提出如下质疑:

——据《春坡堂日月录》记载,“目见”宁远大战的韩瑗是在战前[即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以前]随同朝鲜赴明使团中的一名译官。但是,除《春坡堂日月录》外,我们看到的一些明朝和朝鲜的官

书私籍,均未见到此时朝鲜遣使来明和明朝接待来使,以及韩瑗在宁远观战情况的记载。尽管明人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一书中曾说,“天启六年三月,朝鲜陪臣全堤等庆贺礼辞归”^[150]。然而全堤何时出使明朝,何时途经宁远,韩瑗是否就是跟从全堤而来的译官,皆无材料证明。因此,有无韩瑗其人,是否“目见其战”,这是怀疑的问题之一。

——据《春坡堂日月录》的记载,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在宁远战斗中“奴儿赤先已重伤”,那么作为守卫宁远的最高将领,并在韩瑗身旁的袁崇焕,对努尔哈赤的伤情,更应一清二楚。况且袁崇焕还曾“即送一使”前往后金阵地察看过。倘若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明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资激奋军民的情绪和保卫辽左的决心。但是,无论是袁崇焕屡次向朝廷报告宁远大捷的战况,还是明廷多次表彰袁崇焕守卫宁远的功绩,以及许多朝臣庆贺宁远之战胜利的奏疏,都只字不提此事。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对明军作战中,有无身受“重伤”,是否“满悲而毙”,这是怀疑的问题之二。

——从大量记载看,努尔哈赤自宁远败退回到沈阳直到死去的八个月期间,并没去寻医治伤,而是“修整舟车,试演火器”^[151],并且到“近边射猎,挑选披甲”^[152],积极准备再攻宁远,以洗前次败走之耻。四月初,当青草长大,战马得食,他即亲率大军,渡过辽河,攻明之前,西向进军蒙古喀尔喀等部。到五月上旬,得知明将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则又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叩见,努尔哈赤亲自带领贝勒大臣,“出郭迎十里”^[153]。从他的这些活动看,努尔哈赤哪像身受“重伤”的病人?这是怀疑的问题之三。

根据以上三点综合分析,可以认定“奴儿赤先已重伤”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努尔哈赤之所以放弃攻打宁远,退回沈阳,并非他身

负“重伤”所致，实是军事上失利和挫败的结果。

努尔哈赤围攻宁远，遭到明军的坚决反击，在两天的攻城战中，损失很大。据明兵部尚书王永光奏称，“虏众五六万人，力攻宁远，城中用红夷大炮，及一应火器诸物，奋勇焚击，前后伤虏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遗弃车械钩梯无数”^{〔154〕}。后金兵遭到如此惨败和重大损失，就连努尔哈赤也不否认，他说明军“婴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满洲兵不能进。少却，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二十六”^{〔155〕}，最后只好“大兵遂退”^{〔156〕}。

努尔哈赤的宁远之败，对他的打击是很沉重的，他“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仇恨而回”^{〔157〕}。不久便于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死去，终年六十八岁。

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据清朝最早的一部原始资料《满文老档》的记载：

丙寅年(1626)七月二十三日，汗因病前往清河温泉，于八月初一，遣贝勒阿敏赉书还，使瓦尔喀旺善萨哈尔察等陪祭，向显祖神主祷告，几因身体有病，命贝勒阿敏代祭，望保佑儿的身体早日痊愈^{〔158〕}。

又据清崇德元年(1636)修成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

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十三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太子河而下，遣人请后迎之于浑河相遇，至暖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在位十一年，寿六十八^{〔159〕}。

再据清乾隆四年(1739)成书的《清太祖实录》记载：

(七月)癸巳，上不豫，幸清河坐汤。八月庚子朔，丙午上大渐，欲还京，乘舟顺太子河而下，使人召大妃来迎，入浑河，大妃至，溯流至暖鸡堡，距沈阳城四十里，庚戌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年六十有八。^{〔160〕}

由上观之,清人的记载皆说努尔哈赤死于疾病,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可靠的。但是,他们把努尔哈赤因何病死的,却有意隐瞒避讳了。

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是死于何病呢?

据辽东巡抚袁崇焕向明廷报告努尔哈赤死因时说:“而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161]又如朝鲜抓到一名后金俘虏则说:“奴酋去(按应为今)七月间得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井(即温泉),而病势渐重,回向沈阳之际,中路而毙。”^[162]这两条材料分别来自明朝和朝鲜,而且都是从后金内部传出的消息,其情节同清人记载也很一致,因此这种记载是可信的。

此外,在明人和朝鲜的史籍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如明御史汪若极说,因宁远大捷,使“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矣”^[163]。又如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记载,“本年(即明天启六年)初十日(按应为十一日),老奴酋疽发背死”^[164]。再如彭孙贻的《山中闻见录》记载,“建州国汗,疽发于背疽”^[165]。还有朝鲜的《丙子录》记载,“建州虏酋奴儿赤,疽发背死”^[166]。

综观上述,努尔哈赤自宁远战败以后,悒悒不自得。这年七月,他背上患了毒疽,此种毒疮,当时医疗水平是很难治愈的。努尔哈赤不是死于身负“重伤”,而是毒疽夺走了他的生命,这是确凿无疑的。

第三节 皇太极的继位

努尔哈赤死后,由其子皇太极继位,是为清太宗。

长期以来,中外许多明清史研究者,皆认为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是以阴谋狡诈的手段篡夺的。皇太极的汗位是否夺立,按照唯物史观来看,这不影响今天我们对他的历史评价。

一、努尔哈赤是否已立嗣子

持皇太极夺立后金汗位看法的史家,认为太祖努尔哈赤生前已立其子多尔衮为自己的继承者,皇太极正是从多尔衮手中篡夺了汗权^[167]。

笔者认为努尔哈赤已立多尔衮为嗣子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根据现存清朝最早的一部原始资料《满文老档》的记载来考察,发现努尔哈赤汗位的继承和汗权的交接是有一个复杂历史过程的。努尔哈赤到了晚年,由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的确曾经考虑过选择继承人的问题。早在建元天命以前,努尔哈赤就命长子褚英执政,要把褚英立为嗣子。但是后来察觉到褚英“心胸狭隘”,对诸贝勒大臣十分专横跋扈。他强迫四个弟弟(即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向自己立誓,“不得违抗兄长的话,更不许将兄长所说的各种话告诉父汗”。并且扬言“凡与我不友善的弟弟们,以及对我不好的大臣们,待我坐上汗位以后,均将之处死”。贝勒大臣们就联合上书向努尔哈赤告发,经努尔哈赤调查属实后,遂气愤地对褚英说:你竟对“同父生的四个弟弟,以及父亲任用的五大臣(即额亦都、扈尔汗、何和里、费英东、费扬古),如此不睦,并使之困苦,怎么能让你执政呢?”即使今后“父我不能打仗,不能断理国事,年纪老了,也不把国家大政移交给你!”

从此,失意的褚英对其父和诸贝勒大臣更加仇恨,于是私下勾结党羽,进行阴谋活动。他将“出征的父汗,以及弟弟们和王大臣们等的名字写在咒书上,对天地焚烧”,妄图咒死他们。并对党羽说:“前往乌拉作战的我兵,希望被击败,若被击败,我将不使被击败的父亲及弟弟们入城。”褚英的这些言行又被人揭发。努尔哈赤先将他“囚禁于高墙之中”,后又深恐褚英“日后破坏生存之道,败坏国家”,而于1615年八月二十二日将他处死^[168]。努尔哈赤处死褚英以后,并没有取消择立嗣子的打算。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

五年(1620),努尔哈赤曾说“待我死后,要将我的幼子等,以及大福晋,托大阿哥照顾抚养”^{〔169〕}。他所说的大福晋即他的大妃纳喇氏,大阿哥即代善。努尔哈赤要把妻儿托给代善,说明在褚英死后,努尔哈赤又以代善为后金汗位的继承人。可是就在这一年,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代善被牵连进去,而且负有很大责任。

第一件,即同年三月,努尔哈赤的庶妃代因扎揭发了代善和继母大妃纳喇氏之间的暧昧关系,并有阿敏、皇太极、莽古尔泰等人的作证。使努尔哈赤深感嗣子代善是个蔑父欺君的不肖之子,虽然努尔哈赤怕家丑外扬而没有声张,但是他和代善之间的矛盾与裂痕加大了。

第二件,即同年九月,努尔哈赤在调查代善第二子硕托企图投明未遂一案时,发现系代善听信后妻的谗言,要将硕托杀害,才迫使硕托叛逃。此外,努尔哈赤在审理此案时发现诸贝勒大臣皆沉默不语,据莽古尔泰说:“我辈诸弟、诸子及国内诸大臣都怕兄嫂。”因此,努尔哈赤斥责代善“因为妻的唆使便想除掉亲子与诸弟,像你这种人如何够资格当一国之君?”

因为以上两件事,努尔哈赤对代善十分厌恶,不仅削去他的嗣子地位而且夺去他的臣民和财产。既然废除代善为嗣子,可是又找谁为继承人呢?当时努尔哈赤的诸子中,可称为嫡子的有莽古尔泰、德格类、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袞、多铎,他们六人都有可能被立为嗣子。但是,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的生母继妃富察氏因“窃藏金帛”得罪而死,加上这二人性情粗野,不受人们拥护,自然不能择为嗣子。阿济格、多尔袞、多铎,也因生母大妃纳喇氏得罪失宠,以及三人年龄太小,当然也不能立为嗣子。至于皇太极,他在开国之初虽有功勋,声望颇高,然而心胸狭窄,与某些贝勒的关系很不融洽,所以也不是择为嗣子的合适人选。努尔哈赤在选择嗣子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找不到一个善治国政的继承人。

努尔哈赤为了解决这个大难题,便改取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

的办法。早在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在处理代善事件后,他就提出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规定此后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170]八王为八和硕贝勒。为汗者接受所给予的八旗人众、食其贡献。政务上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贝勒若有违犯扰乱政治的恶行,其余七位和硕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可杀则杀之。生活道德谨严,勤勉政事者,纵使治国之汗出于一己私怨,欲罢黜降,其他七旗对汗可以不让步^[171]。

到了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训谕诸子,他说:“继承父为国主时,不要立强有力的人为主,如果强有力的人为国主时,仗恃他的力为生,恐怕天以为非。一人有些见识能及众人的共议吗?你们八子为王,如果八王共同商议,就没有失败。推举不拒绝你们八王话的人,继承你们的父为国王,如不听你们的话,不听众兄弟的话,仍旧悖理行事,那么开始定罚罪,如还不听,就没收诸申。……”^[172]从这段汗谕可以看出,努尔哈赤已决定推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并作了比较详细具体的规定,特别强调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都要经八和硕贝勒商讨处理,不许一人独断专行,不称职的汗,可以罢免重新推选。皇太极即位初年,是完全遵照太祖的遗训去做的。

有人根据朝鲜李星龄的《春坡堂日录》记载:“努尔哈赤临死,谓费永介(即代善)曰:九王(即多尔衮)当立而年幼,汝可摄位,后传于九王。”^[173]认为努尔哈赤已立多尔衮为嗣子,皇太极即位称汗就是夺立的。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综合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努尔哈赤临终前立多尔衮为嗣子一事,就笔者所见史料,明清史籍里未见记载,仅见于朝鲜的《春坡堂日录》一书,这在朝鲜的历史文献中也只是一条孤证,且在同期的朝鲜史籍里还有记载努尔哈赤临死前立代善^[174]或皇太极^[175]为继承人的。故以此作为努尔哈赤已立多尔衮为嗣子根据是难以置信的。

第二,多尔衮的生母纳喇氏,自从和代善之间的暧昧关系被揭露后,即遭到努尔哈赤的厌弃。努尔哈赤临死前,特命她殉死。既然努尔哈赤对多尔衮的母亲如此痛恨,怎么能让多尔衮继承汗位呢?况且在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只有十五岁,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他在诸王贝勒之中还不是旗主,而同弟弟多铎合管一旗,既无卓著的战功,又无崇高的威望,如何能指挥诸贝勒大臣,肩负起新汗的重任呢?

第三,努尔哈赤生前先后将褚英、代善废嗣后,便不再立嗣子,改为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办法。如果从1620年开始算起,到1626年努尔哈赤死时止,在后金境内已逐步试行了六年多,基本上是满意的。因此,努尔哈赤在临死前突然改变主张,是难以理解的。

二、皇太极是否逼迫大妃死殉

认为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是夺立的史家,还指出在太祖努尔哈赤死时,皇太极勾结诸王,逼迫九王多尔衮的生母大妃纳喇氏死殉,以达到从多尔衮手中篡夺汗位的目的。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现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此事的真实情况。

1. 关于大妃纳喇氏死殉的问题

大妃纳喇氏,名阿巴亥,是乌喇部贝勒满泰的女儿,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万历二十九年(1601)嫁给努尔哈赤为妻,万历三十一年(1603)被太祖立为大妃。此人聪明美丽,在诸妃中最受努尔哈赤的宠爱。但是,天命五年(1620)三月初十,她同大贝勒代善的不正常关系被告发了。努尔哈赤的庶妃代因扎揭发说:“大福晋(即大妃纳喇氏)两次备饭送给大贝勒(即代善),大贝勒接受吃了……另外大福晋一天就二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大概有什么共同商议的事吧?大福晋本人有二三次黑夜出院去……”又据诸贝勒和众大臣们揭发,每当他们“在汗家集筵时,或是相聚议事时,大福

晋总是金饰、东珠盛装打扮，作出动作眼望大贝勒”^{〔176〕}。虽然努尔哈赤因怕家丑外扬有失自己的名声，暂时没追究，可是他内心却十分痛恨大妃纳喇氏。后来，他便以追查大妃纳喇氏私匿财物为名，指出“大福晋偷盗许多缎子、蟒缎、金银、财务隐藏了，拟罪，命把匿藏财物的器具，皆倒空了检查。大妃纳喇氏得知后，非常恐慌，因而把许多东西分送往别人的家里去隐藏，送到达尔汉虾山上家的，就有用绸布单包的三包袱财物”。此事被达尔汉虾告发了，努尔哈赤便“派人往达尔汉虾山上的家里去查看，确实曾送有东西前往隐藏”。于是遂下令进一步搜查。就在此时，据蒙古福晋揭发说：“大福晋在阿济格阿哥家中的两个柜子里，尚藏有三百匹绸缎。”努尔哈赤“遂即差人往阿济格阿哥家里查看，果然查到了三百匹绸缎”。后“又命人往大福晋的娘家去搜查，又在一个暖木面子的大匣子里，查到了所放的银子，将这些银子拿了回来”^{〔177〕}。

因为大妃纳喇氏作风不正和私藏财物，努尔哈赤对她既厌恶，又痛恨。便当众宣布她的罪恶说：“此福晋存心奸诈、险恶，是个心狠虚伪的贼徒，凡是人们所有之凶恶心肠，她全都具备。我以金、珠装饰你的身体，使你不胜其用，以人所未见的好绸缎使你穿用，加以恩养。而你不爱为汗的丈夫，背着我的眼睛，将我放置于一旁，越过我而去看视别人，如此罪行不杀怎么可以呢？”然而努尔哈赤又想到，若是把她杀了，“怎能忍心使我心肝一样的三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哭泣呢？”当时阿济格十六岁、多尔袞九岁、多铎七岁，为了让大妃“看护照顾他们”，所以没有把她处死。可是太祖从此和大妃纳喇氏分居了，并且宣布“现今任何人也不要接受大福晋给的东西，任何人也不要听她的话，违背这指示，无论男女任何人听了大福晋的话，接受给的东西，即将杀死”^{〔178〕}。

由上可见，努尔哈赤对大妃纳喇氏深恶痛绝，早有处死之心，所以到他死以前还不忘此恨，命大妃死殉，正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的那样，大妃纳喇氏“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

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日俟终必令殉之”^{〔179〕}。这段话是真实的,反映了努尔哈赤对大妃纳喇氏的看法,这一点诸王是很理解的。所以,当大妃纳喇氏向诸王哀求不死时,诸王皆不同意。她又说:“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地下。吾二幼子多儿哄(多尔袞),多躲(即多铎),当恩养之。”诸王回答说:“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大妃无奈,只好挂弓上吊身死,“与帝同柩”^{〔180〕}。

综观上述,大妃纳喇氏之死,同皇太极没有关系。

2. 关于逼死大妃谋夺多尔袞汗位问题

上文已经写明,一则太祖努尔哈赤没有立多尔袞为嗣子,二则皇太极没有逼迫大妃纳喇氏殉死。既然如此,皇太极逼死大妃谋夺多尔袞汗位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但是为了把这件事情说得更清楚,我们还可以从他们二人的日后关系上考察,无疑也是很必要的。

皇太极恪守向大妃纳喇氏死殉前许下的诺言,对继母留下的三个小弟弟十分照顾,特别是对聪明果敢的多尔袞更是“特加爱重”。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即位后,总是让多尔袞以贝勒的身份和诸王一同管理政务。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领军攻打蒙古察哈尔罗特部,他把多尔袞带在身边。回师以后,皇太极指出多尔袞从征有功,“宜赐美号,以示褒嘉,于是赐贝勒多尔袞,号为墨尔根戴青(即聪明的统帅的意思)”^{〔181〕}。并晋升为固山贝勒,成为镶白旗的旗主。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设立中央六部,任命多尔袞掌管吏部事务。天聪九年(1635)多尔袞偕同岳托进军察哈尔,招抚林丹汗的儿子额哲,这些战斗中多尔袞身先士卒,建立奇功。特别是在收服察哈尔部林丹汗时,他将缴获的元代传国玺献给皇太极,这为皇太极称帝创造了条件。所以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特晋封多尔袞为睿亲王。从此,皇太极对多尔袞备加赏

识,委以重任。崇德三年(1638),皇太极授他为奉命大将军,统率清军入关伐明,掠夺大批人口财物而还。崇德七年(1642),多尔衮在松锦之战中击败明军,俘获明军主帅洪承畴,迫使祖大寿献锦州归降,这为清朝占据全辽,入主中原扫清了道路。因此,多尔衮很快成为一名很有权势、地位显赫的亲王。正因为如此,在皇太极死后,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二人,共同辅佐六岁的顺治帝福临主政,称之摄政王。

由上观之,多尔衮从一名不懂事的少年成长为文武超群的八旗旗主,从一个普通贝勒晋升为赫赫有名的亲王,除了多尔衮本人所具备的才智外,当然和皇太极的培养提拔是分不开的。多尔衮为皇太极共理机务,多所赞画,随太宗出征,运筹帷幄,奋武戎行,诛携服叛,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他确实是“助成大业”的有功之臣,所谓“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182]。所以皇太极曾对多尔衮说:“朕爱尔过于诸子弟,费尔独厚,以尔勤劳国政,恪尊朕命故也。”^[183]多尔衮也曾对众人说:“夫太宗恩育予躬,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也。”^[18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兄弟二人之间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彼此十分亲切。如果说皇太极是篡夺多尔衮的汗位,那么在太宗即位以后,就必然要时刻提防,处处压制,甚至设法迫害多尔衮,而多尔衮也必然会寻机报杀母夺位之仇。可是,皇太极在位十七年,多尔衮始终是他最得力的帮手。

三、皇太极的汗位是否夺立

主张皇太极的汗位是夺立的史家,还提出在太祖努尔哈赤死后,诸贝勒之间,特别是皇太极和代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后金汗位的斗争。最后,皇太极击败了他们,而登上汗位,接着大搞独尊,削弱旗主势力,加强汗权,因此反映了这一斗争的继续。我认为这里所谓争夺汗权与强化汗权是两回事。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患毒疽不治而死,由谁来继承汗位呢?尽管努尔哈赤生前早有安排,要求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后金汗要由诸贝勒推举产生,可是谁是合适的人选呢?不能不在诸贝勒中有所考虑。当时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即代善、莽古尔泰、阿敏、皇太极)的权势最大,其中又以皇太极实力最强,皇太极无论是政治眼光、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都在众贝勒之上,所以皇太极是后金汗比较合适的人选。

就在努尔哈赤死的当天,代善的长子贝勒岳托和三子贝勒萨哈廉,向代善提出:“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也表示赞同。于是第二天在诸贝勒大臣聚于朝时,他“告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诸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经众贝勒商讨,“皆喜曰:善。议遂定,乃合词请上即位”^[185]。皇太极被推举为后金汗。

关于皇太极被推举为汗一事,除了清人记载以外,在朝鲜史籍中也有反映。如朝鲜的《丙子录》云:“贵荣介让北弘佗时(即皇太极),曰:‘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弘佗时略不辞让而立。”^[186]又如朝鲜的《鲁庵文集》云:“诸将欲立嗣后举哀,贵荣哥(即代善)曰,父欲立弘佗始(即皇太极),弘佗始曰,当立者兄也,相让走避。于是要土(即岳托)等往谓荣哥,不出,又请弘佗始,不出,号呼奔走于两间曰再三,凡三日,贵荣哥竟使要土等率诸将六七人群拥弘佗始抬举而至尸前,及发表。”^[187]从上面两条朝鲜史料来看,代善主动推举皇太极为后金汗,这一点同清人的记载是一致的。因此,笔者认为皇太极称汗是推举,而不是夺立。

皇太极被推为后金汗以后,同年九月初二日,他与诸贝勒祝告天地。接着他对天立誓曰:“谨告于皇天后土,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

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遭，夺其寿算。”特别是对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皇太极感谢他们“推戴，初登宸极，不遽以臣礼待之”^{〔188〕}。这十分清楚地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皇太极公开承认自己登上汗位不是嗣立，而是诸贝勒“推我为君”；二是，皇太极公开宣布要敬兄长、爱子弟，不能任意损害他们的利益，不以臣礼待之，汗与诸贝勒是平等的关系。这也就是努尔哈赤所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新汗须尊敬八和硕贝勒的具体体现。

皇太极即位初期，遵照太祖遗训，积极推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这种反映氏族社会军事民主的合议制是倒退落后的，把它移植到开始进入封建制的后金后，出现了种种弊病。在政治上，皇太极和诸贝勒共理政务，“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189〕}，实际上是众贝勒轮流执政；在经济上，所得人口和财物也由八旗平均分配，所谓“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190〕}。因此，当朝鲜送来物品，“礼单入去后，八高山（即八旗主）例为均一分之，如有余不足数，则片片分割”^{〔191〕}。在军事上，八旗主互不统属，为了扩大自己的权益，相互明争暗斗，甚至不听调遣。如大贝勒阿敏擅自放弃滦永四城，回师沈阳，根本不同皇太极商议，自行其事。后金汗皇太极处处受到诸贝勒的“掣肘”，成了“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192〕}。这种汗权和王权、集权和分权之间尖锐矛盾的现象，并非所谓皇太极立汗造成的，实是推行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的必然产物。

皇太极对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现象，没有熟视无睹，而是大胆实行政治改革，加强和巩固汗权。当时，八旗旗主牢牢地控制着后金决策机构议政会议，并以此束缚着汗权。天命十一年（1626）十月以后，皇太极设法逐步让所有的贝勒都参加议政会议，还要每旗增派三人议政，这样议政人员多了，使各旗旗主失去了控制权，

议政会议变成了谘询机关。与此同时,皇太极集中力量,狠狠打击足以与自己争权的三大贝勒的势力,天聪三年(1629)二月,皇太极以“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政事的权力,“遂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193]。天聪四年(1630)七月,皇太极以大贝勒阿敏弃滦永四城为口实,把他幽禁起来,不久病死。天聪五年(1631)八月,皇太极与大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莽古尔泰拔剑相向,皇太极以此革去其大贝勒衔,降为普通贝勒,莽古尔泰为此气愤而死。天聪六年(1632)二月,皇太极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旧制,改由自己“南面独坐”^[194],从而突出汗的独尊地位。到天聪九年(1635)十一月,皇太极指责代善对己不恭,罗列了四条罪状,罚银罚物,迫使他惟命是从,于是三大贝勒的势力全部消除。此外,皇太极还十分重视把自己的势力伸向各旗,他除了增强自己所统辖的两黄旗以外,还积极扶持多尔衮、多铎,把两白旗也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通过代善长子岳托的工作,又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两红旗。因此,皇太极的力量最强大,为其他贝勒所不及,于是他的汗位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八旗旗主的势力削弱了。随着皇太极汗权的加强,权力的集中,推动了后金的各项政治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证了对蒙古和明朝战争的胜利。

以上三个方面,清楚地说明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没有立嗣子,而是确立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皇太极在其父死后未逼大妃纳喇氏死殉,更没有从幼弟多尔衮手中篡夺汗权一事。太宗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的,实非夺立。因此,清人蒋良骐的《东华录》顺治八年二月己亥诏内所说的多尔衮“背誓肆行,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195],实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因平日遭受多尔衮的打击排挤,故而无中生有地罗织此条罪名而已,此举却给太宗皇太极蒙上了夺位之冤以达三百五十多年之久,今天应该恢复历史真相了。

第四节 清朝开国及其对明议和策略

自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18),清明双方处于敌对战争状态长达26年之久,最后以清胜明败而告终,试问原因何在?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也是智谋的较量,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父子二人,皆是善于谋略的统帅。他们依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成功地运用了议和策略,达到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目的,这是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深入研究清对明议和策略,无疑对了解清朝开国的真谛是有一定意义的,现就各个阶段议和的背景、进程、结局和作用加以论述。

一、皇太极的缓兵之计

17世纪20年代初,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女真诸部,结束了女真社会长期分裂、割据和动乱的局面。伴随统一战争的发展,地域不断扩大,人口日渐增多,并进行一系列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同时在管辖区内,以女真族为主体,吸收汉、蒙、朝等民族,形成了新的满族共同体。于是努尔哈赤的势力大增,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他认为“帝业已成”^[196],遂称汗登位,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建都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从此成为与明王朝相对抗的地方割据政权。

当时明朝政治极端腐败,万历皇帝“二十余年深宫静摄,付万事于不理”^[197]。主管中央政府的内阁大学士亦“悠悠忽忽,若罔闻知,一应票拟,动多错差,危而不恃,颠而不扶”^[198]。而户部“停阁已久,各边请饷,无人发给,各处解银,无人批收”^[199];刑部则“狱囚积至千人,莫为问断”;礼部“亦以部堂无官,遂至停滞”^[200]。由上可见,整个统治机构“如咽喉梗塞,一切饮食出纳皆不得通”^[201],从上到下乃五官犹存,运动皆滞,如同一部生锈的机器,

无法开动运转。它面对女真的统一和满族的崛起,却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致使后金国势日益强盛。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以后,摆脱了原先对明朝的臣属关系,变为公开同明朝对抗,而且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种民族矛盾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往往导致民族之间的战争。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公开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次日,他兵分两路,命左翼四旗攻取东州、马根单等地,而自将右翼四旗进攻抚顺,明军守将李永芳献城投降;后金旗开得胜,攻占台、堡、屯五百余座,获得人畜近30万。

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得知辽东巡抚李维翰命总兵张承荫等,率领明军一万援救抚顺,于是三面设伏,致使张承荫部全军败没。这个消息传到京师,“举朝震惊”^[202],“当事大臣几至闻雷失筋”^[203],就连万历皇帝也感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204]。明王朝为了巩固在辽东的统治,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辽事议者,以必剿为主”^[205],因此调兵遣将,决定发动一次旨在消灭后金的战争。于是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积极筹集粮饷,购马置械,派兵出关。

身经百战,足智多谋的努尔哈赤,并没有沉溺在对明战争首战告捷的凯歌声中,而是清醒地知道明廷绝不会甘休,必然要派大军前来报复。他便施缓兵之计,声言求和,其目的是麻痹明廷,争取时间,调整内部,加紧备战,实行以和为攻的策略。闰四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释放被俘的张儒绅等四名汉人,命其进京,致书请和。因为他们是明东厂差官,“藉以闻帝座,谋最秘”^[206],“实以儒绅等行间”^[207]。据《明神宗实录》记载:

建酋差部吏章台等执吏前印文,送进掳去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四名,进关声言求和。传来申奏一纸,自称为建国,内有七宗恼恨等语言:朝廷无故杀其祖、父;背盟发兵出关,以护北关;暖阳、清河汉人出边打矿打猎,杀其夷人;又

助北关将二十年前定的女儿，改嫁西虜；三岔、柴河、托安诸夷，邻边住牧，不容收禾；过听北关之言，道他不是；又西关被他得了，歹助南关，逼说退还，后被北关抢去。及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住他地，好信实，赴贡罢兵等言。^[208]

从以上努尔哈赤致明廷书的内容来看，明确提出议和的三点要求：一是“自称为建国”，要明朝承认后金政权；二是“内有七宗恼恨”，要明廷接受后金起兵有理；三是“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住他地……赴贡罢兵”，要明遣使到后金去谈判。他明知明廷不会同意，致书求和不过是看看明的反映如何，可是明廷不给予答复，便对明施加压力，于五月十七日发兵征明，一举攻占法纳哈、松山屯等十七个城堡。掠夺大批人畜、财物和粮食。

果然，六月二十二日，新任辽东经略杨镐，鉴于后金致书求和，明朝征讨人马未到，为了稳住局势，派遣使臣、通事等七人，到后金议和。明使言：“欲两国修好，可送还尔所俘数人，并遣使前来。”努尔哈赤对此十分不满，故向来使说：“征战时所获之人，何可还耶？倘以我为是，则除俘获之人外，尔应增送金银绸缎与我；倘以我为非，则我不求和，征讨如故。”^[209]遂下逐客令，遣明使离境，返回广宁（今辽宁北镇）。

九月十五日，努尔哈赤为了迫使明廷议和，派兵深入明境，攻占安堡诸地，并致书明廷，以武力相威胁，其书曰：“若不以我为公正而欲战，则订军期，出边界，或十日，或十五日，毁城相战。不然必以我为公正，输财帛以寝事焉！”^[210]

在后金武力的胁迫下，十二月二日，辽东经略杨镐派遣李继学等人出使后金，表面是谈判议和罢兵，实际是探听虚实。天命四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遣明使李继学等人赍书回，书曰：

帝若能责辽东之人，撤回出边之兵，乃以我为是，释我七恨，封我王号，岂不休战哉？至我旧赏抚顺敕书五百道，开原

敕书一千道，尚仍令给我军士，并给我及为首诸贝勒大臣，绸缎共三千匹，银三千两，金三百两^[211]。

这些议和条件，明廷不可能接受，当所调人马抵达辽东后，便于二月二十四日，遣使致书，美言修好，实为战书，其书曰：“我明领兵大臣及议政诸贝勒均已到齐，我大兵四十七万，将于三月十五日月明时，兵分八路进发。”^[212]至此，后金与明议和谈判完全破裂，双方即将列阵大战。

努尔哈赤把对明议和作为手段，为其政治、军事目的服务，始终掌握议和谈判的主动权，致使明廷“而谈辽事辄高阁束之，肘后置之矣。夷书之淳漫不见怒形于色，酋势猖狂犹且谈笑而道”^[213]。所以，明廷发动进攻后金的战争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后金却利用这段时间，练兵囤粮，积极备战。正因为如此，在萨尔浒大战中，后金粉碎明军四路进攻，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胜利，使辽东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后金获萨尔浒大捷后，便乘胜扩展势力，战争结束不到一个月，就兴兵进攻铁岭、柴河、抚安等堡。不久又攻打抚顺、开原等城。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后金军攻占沈阳、辽阳等七十余城堡，把后金都城迁到辽阳，然后又迁到沈阳，势力由狭窄贫困的苏子河畔，进入广阔富饶的辽沈地区。

明朝看到后金日益崛起，十分恐慌，为了扼制和消灭后金，便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屯兵辽西和沿海诸岛，对后金形成了弧形包围；特别是明将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皮岛（即椴岛、稷岛、从云岛），此岛位于明朝、后金和朝鲜之间，“南可以屏蔽登莱，东可以联络朝鲜，北可以攻冲辽沈，乃平辽要区也”^[214]。而且他还控制着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昌城、满浦、旅顺等地，因此对后金构成很大威胁。

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今辽宁兴城）被明守将袁崇焕战败后，郁忿成疾，于八月十二日，身患毒疽病逝，由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皇太极年轻气盛，急于求功。据早

先毛文龙所言：“奴苗之恨臣掣尾，每转恨于朝鲜之楫地。”^[215]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第三子洪太时（即皇太极）常劝其父犯我国。”^[216]又据明朝《塘报》消息，后金的贝勒大臣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217]。皇太极亦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就是东江（即皮岛），只为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的动静言语霎时便知，可恨！”^[218]因此，他决定先出兵攻打毛文龙和朝鲜，以解后顾之忧，然后收兵再进攻宁远，以报宁远战败之仇。但是为了避免辽西明军支援，陷入两线作战，便采取缓兵之计，与辽东巡抚袁崇焕进行议和。

当时袁崇焕听说努尔哈赤已死，便“以奴死，虏信未的，奏遣喇嘛僧李锁南，以烧纸为名往侦之”^[219]。于是十月十三日，派李喇嘛、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三十三人，前往沈阳吊丧，“侦其虚实”^[220]。皇太极明知来使是潜窥国情，但仍以礼相待，表示和好的态度。由于后金“将讨朝鲜，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221]。所以，十一月十六日，皇太极派方吉纳、温塔石等人随李喇嘛同往宁远，致书袁崇焕说：

尔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并贺新君即位，尔循聘问之常，我定有他意，既以礼来，当以礼往，故遣官致谢。至两国和好之事，前皇考往宁远时，曾致玺书与尔，今汝转达，至今尚未回答，汝主如答前书，欲两国和好，我当览书词以复之：两国道好，诚信为先，尔须实吐衷情，勿事支饰也。^[222]

皇太极来书求和，与袁崇焕一拍即合，因为袁崇焕正想争取时间，早日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建成宁锦防线，扼制后金军西进南下。但是，明天启皇帝朱由校对议和一事，传旨称：

夷使同来，正烦筹策，抗则速遣之，驯则徐问之。无厌之求，慎无轻许，有备之迹，须使明知。严婉互用，操纵兼施，勿挑其怒，分堕其狡。夷在，无急款以失中国之体；夷去，无弛防以启窥伺之端。战守在我，叛服听之。^[223]

十二月二十八日，袁崇焕根据天启帝的旨意，对议和“无厌之求，慎无轻许”。所以，他命后金使臣方吉纳、温塔石等返抵沈阳，并指出：“大明国，大满洲国，字样并写，不便奏闻，故不遣使，亦无回书。”〔224〕

皇太极对明议和受挫，并没失去信心，为了政治和军事的目的，仍然打起义和的旗号。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一月八日，他命大贝勒阿敏等率军入侵朝鲜，为了防止袁崇焕起兵援朝，进攻沈阳，就在出征的同一天，派方吉纳、温塔石再次赴宁远，致书袁崇焕请求议和，书曰：

今尔若以我为是，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匹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匹馈赠，以为和好之礼。礼成之后，以两国彼此馈赠之礼，以东珠十，貂皮十张，人参千斤送尔，尔则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疋，毛青细蓝布三十万疋送我。若欲如之馈赠往来，以修两国和好。则誓诸天地，永归和好。袁大人，尔即以此言转奏尔皇帝，否则乃是尔仍愿兵戈也。〔225〕

袁崇焕立即向明廷报告，奏疏中未言及后金提出的议和条件，只是谈些如何诘问来使，何故起兵，来书中为何把皇帝改写成满文，要求去后金年号，奉明为正朔等等。

二十六日，明廷对袁崇焕很满意，天启帝传旨表彰袁崇焕，并亦向后金提出议和条件，旨称：

奴兵压境，持之有备，奴使求款，应之有权，战守可恃，操纵合宜，深慰朕怀。然而十年荼毒，奴罪已深；一旦输情，听信匪易。侵地当谕令还，叛人当谕令献。当不止去僭号，奉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也。与其疑信异同，拒之既题之后，无宁讲信妥当，慎之未题之先，该抚想有成算，或别有妙用，悉听密筹。封疆事重，不厌叮咛，鼓舞吏士，明烽远消，仍旧戒严，务保万全，纾朕东顾。〔226〕

由上可见,明廷议和条件是不承认后金政权,归还侵占的土地和掳去的人民。

三月五日,袁崇焕遣使臣杜明忠等至沈阳,带去他和李喇嘛致皇太极书各一封。袁崇焕书曰:

屡蒙书教,知崇敬明帝,停息干戈,抚养国民之意。……往事七宗,汗仍抱为长恨,我焉能听之忍之。……今若修好,城池如何退出,官生男妇,如何归还。若还,乃汗之贤明慈惠,敬天爱人也。……若书中所列诸物,以中国之大,皇上既恩养四诸申,岂无此物,或吝惜乎?然前书未载,多取违天,乃当汗自裁。既通使往来,又出兵朝鲜,何故耶?我文武官员,皆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若未撤,则令撤回,则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矣。停息干戈,辨明前后诸事,往来书信,勿书动怒之言;恐有碍奏闻。……汗以实心恭敬我帝,宣扬圣德,料理边务,颁谕安抚诸申汉人等,则有疆臣在,勿忧美意不上闻也。^[227]
李喇嘛书云:

汗之七恨,乃往事也,夫道不违,再一说明,便可弃之。……汗与诸贝勒等还存善心,可弃者弃之,难忍者忍之,佛说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停息干戈,便足极乐矣。^[228]

袁、李两书是希望后金接受明廷的条件,实现议和。但是此时后金已战败朝鲜,两国结为兄弟之盟,同时又把毛文龙赶下海;从而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皇太极的态度非常强硬。

四月八日,皇太极遣明使杜明忠还,并复袁、李二人书,对袁、李的来书逐条加以批驳。致袁崇焕书曰:

尔来书云,欲我忘七恨等语。尔先世君臣,欺凌我国,遂成七恨,致起干戈,为将此情事,今尔闻知,辨明是非,两国修好,以忘七恨矣。……又云:倘欲修好,城池地方,如何退出,官生男妇,如何归还等语。蒙天垂佑,以我为是,赐以城池官民等,今令退还,乃尔不愿和好,有意激我之怒也。……又称

我等所列诸物，前书未载等语。前书所列诸物，较之此次有多有少，尔已知之矣。且又云：既通使往来，且又出兵朝鲜，何故？……遂于己未年，朝鲜以兵犯我，除战中被杀者外，其余官兵，我皆留养遣还，以期重修和好。然朝鲜无一善言相报，反妄自尊大，肆言轻我，并纳我逃人，资助逃人，从始至终，与我交恶。……又如往来书信，勿书动怒之言，恐有碍奏闻等语。陈明是非，再行修好，方能牢固，若言而未尽，便强令勿书动怒之言，则难以修好矣。……又云，汗以实心恭敬我帝，宣扬圣德，料理边务等语。尔帝之圣德，当由尔等宣扬，我乃异国人，何从知之。所谓料理边务，尔之边界尔料理之，我之边界我料理，尔国边界，我如何料理？……且又云：所列诸物，酌量裁减等语。我已酌减之。……尔等渐加轻慢我，袁都堂来文尊明帝如天，喇嘛书中以异国君主列于明臣之下，是皆尔等偏私所致，非义也。……我乃循礼而行，书明帝比天低一格，书我比明帝低一格，书明国臣工比我低一格。……再者，凡尔书信，书明帝比我高一格，若将明国臣工与我并书，我将不受之。〔229〕

在答李喇嘛书中除了指出明廷种种不是外，则对书中所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一语，认为“此言良是，既向我言之，则亦当向明帝言之，无论谁人，肯回头，岂不美哉。尔喇嘛系精通佛教，明达道理之贤人，何为有意轻我”〔230〕。

值得注意的是，这天皇太极就明军修筑锦州等城，又给袁崇焕致一书，书称：

至此书中所言，专为修城事，两国诚欲和好，先分地段，从何处为明地，从何处为诸申地，各修各地。尔一面遣使议和，一面急修城垣……不愿太平，而愿兵戈。〔231〕

这里明确提出，如果议和，要求“先分地段”，即双方划分疆域，此议遭到袁崇焕的拒绝。

此时，皇太极认为对明议和，所施缓兵之计收到很好效果，打败了朝鲜和毛文龙，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决定把进攻的矛头从东转向西，攻打宁远以报父仇。

五月六日，他以反对袁崇焕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由，率军进攻锦州、宁远，结果如同其父努尔哈赤一样，遭到惨败，致使辽东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讲和自固

皇太极在宁锦战败后，锐气受挫，头脑却清醒了，发现面临一大堆问题：

——后金按照太祖遗训，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出现了种种弊端。他们“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232]，实际上是大家轮流执政。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233]，这就反映出汗权和王权、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尖锐矛盾。

——后金政权统治不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汉族人民“每被侵扰，多致逃亡”^[234]，也有用投毒、暗杀乃至揭竿而起的方式进行武装斗争。而在后金社会内部，许多农奴承担繁重的差役，“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235]，于是激起农奴反抗农奴主的斗争，它已成为后金社会的严重问题。

——后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惟是年来，国用不舒，仓廩空虚，民众地薄，生养不足”^[236]。由于明朝和朝鲜对后金采取封锁和禁运的政策，使得后金“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因此“盗贱繁兴，偷窃牛马”。而且天灾严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237]。

——后金民众厌战。因为后金长期征战不息，大批丁壮弃田出征，他们“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238]。所以，许多人“闻有征调，各抱妻孥相哭，祖昔之勇健悍鸷，稍有间矣”^[239]。正

由于后金民众厌战,勇猛善战的八旗兵不再是战无不胜的。

除了以上内忧以外,外部的的问题亦很严重,东面朝鲜虽然与后金结为兄弟之盟,但和明朝仍保持密切关系;西面蒙古察哈部林丹汗,在明的支持下与后金争雄;南面的明朝仍有相当实力,有能力调集兵力、物力来从事战争。因此,皇太极深感不安,认为“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亏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240],一旦联合发动进攻,那么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皇太极清楚地知道,要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入主中原的战略总目标,必须在策略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当时的形势。当时后金一名谋士进言:“我国处南朝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待我国益富、兵益强,乘间再投破竹长驱,传檄天下矣。”^[241]皇太极采纳此议,就是要通过对明“讲和”,争取时间解决后金存在的问题,以达到“自固”的目的,然后时机成熟,再兴兵攻明,夺取全国政权。正如朝臣高士俊指出的,“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兵,彼国和易为因循,易为怠惰,臣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242]。

皇太极通过各种渠道对明进行议和活动。

天聪元年十月二日,皇太极通过蒙古敖汉都令喇嘛致书崇祯皇帝,书称:

金国汗奏书大明国皇帝:从李喇嘛到后,为两国和事来往数次未妥。……而将其书寄讨敖汉都令喇嘛去,若谓兵戈非吉,太平乃吉,则差人来,彼此皆得好。人通往将心事尽讲明,而后和成方无丝毫挂念,如不罢兵,彼此皆无安稳矣。^[243]

天聪二年(崇祯元年,1628)正月,皇太极命被俘明兵银柱回宁远,携书与总兵祖大寿,书曰:

我愿太平,欲通两国和好之路,拟遣员同白喇嘛致祭尔先帝,并贺新君即位。……若谓前来行礼为善,我将遣使

前往。^[244]

皇太极两次致书议和，皆未得回音，于是采取以打压和的办法。五月十一日，他命贝勒阿巴泰等率军往略明地，并致书明廷诸臣，书曰：

满洲国皇帝，致书于明国诸臣。尔国事日非，如大厦将倾，文武诸臣，尚执迷不悟。……我本欲罢兵修好，共享太平，故屡遣书，开诚相示，尔其熟思之。如以我言为然，可即遣使来报，毋貽悔也。^[245]

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一月十三日，皇太极命郑伸（信）、任得（大）良往宁远，致书袁崇焕，书称：

金国汗奉书袁老大人阁下：前差方巾（吉）纳等往返讲和之际，我兵东伐朝鲜，以致南朝说我何为伐之，遂罢讲和，督兵前进，我闻之去迎，于是使乃绝矣。……我伐朝鲜，原与南朝两不相干，况非朝鲜无罪妄举贪利之兵也。……我欲罢兵，共享太平，意谓何因朝鲜之事误我两国之和，故于去年正月差银柱执书去，不见回报。……乃遣秀才郑伸并百总任得良，持书奉候，乞赐回报，无吝是望，己巳年正月日。^[246]

这封求和书信，希望不要因为“朝鲜之事误我两国之和”，并在书后不写后金天聪年号，只写己巳年，以示求和诚意。

闰四月初二日，袁崇焕派杜明仲随郑伸、任得良赴沈阳，致书皇太极，书曰：

奉帝命统辖边兵之兵部尚书袁，敬复于汗陛下：来书所言议和者，盖不忍两家赤子遭罹锋鏑也。汗之美意，天地共鉴之者也。唯议和有议和之道，非一言能定之者也。自我帝嗣位，贤明果断，严于边务，若非十分详实，则不可奏闻。汗诚以怜恤众生而休兵，当思议和之道，则边官有荣，亦不失汗之美意，我将乐意转奏之。边务之事，当由边臣等议，不涉及朝臣。印信者，诚为证据，倘若非赐封者，则不得使用，中国之法例如

此，请汗毋以为奇。^[247]

从此书内容看，一则说明前阶段议和没有进展的原因；二则表示以后愿意转告朝廷继续议和。皇太极得到复书喜出望外，非常重视。因此很快遣使复书，提出议和的具体办法和要求。二十五日，他派白喇嘛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袁见来书仍是两年前划界纳贡的旧话重谈，而且事关重大，何况此时正忙于东江问题，所以没有复函。

六月二十日，皇太极见“出使喇嘛，久未见还”^[248]，怕其中有诈，于是又遣图鲁什携书往边界，付哨卒转交袁崇焕。到了二十七日，他仍不见人回复书，于是又派图鲁什选被执明哨卒赵登高赍书往宁远，书称：

我本诚心欲和，是以致书往。……若不遣还去使，其数人之增减，无碍大局，若失信义，则人将不复信矣！天意愿息兵而享太平，去奸伪而行忠信也。倘厌太平而愿兵戈，以弃忠信而尚奸伪，则孰是孰非，唯天鉴之。^[249]

七月三日，袁崇焕见皇太极不断遣使致书，便就来使未归和划定国界一事，命白喇嘛、郑伸等赍书返抵沈阳。书中一是说明“使臣来时我出海，是以久留，别无他事”^[250]；二是指明“我国幅员九州，即失一辽东，何足为惜。况其地原非汗所有，辽东人西来，而其坟墓均在于彼，我强压其思念先骨之情，可乎？办不合众意，止有受而不可言，故未奏帝知之”^[251]。

十日，皇太极对袁崇焕来书不满，认为不能归还辽人辽土，于是遣任得良持书去宁远，书曰“观我使臣携来之书，谓辽东人之骨骼坟墓皆在彼等语，此非令我还辽东地方乎？辽东地方，我凭力攻取之，非尔恩赐者也。昔我两国，并无嫌隙，和睦相处，尔据界内九州地方，尚不知足，夺我界外区区之地。……天鉴是非以辽东地方界我，我何敢还尔哉。且自古以来，或兴或衰，非取决于尔等大国，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众人之天下也，天赐与谁，则谁

得之”^[252]。

十八日，皇太极认为与袁崇焕讲和，他不仅避重就轻，不谈实质问题，而且借故不向明廷奏报，致使议和拖延，于是命赵登科携致明诸臣书回，书曰：

我欲息兵以享太平，曾屈尊遣使议和。……尔若欲和好而我不从，致起兵端，我民被诛，则非尔诛之，乃我自诛者也。我若欲和好，而尔不从，致起兵端，尔民被诛，则并非我诛之，乃尔自诛之也。我诚心和好，尔自大不从，谅天亦鉴之，人亦闻之矣。^[253]

此书皇太极表明积极要求议和，指责明廷“自大不从”。尽管未得答复，议和受挫，但没有灰心，依然高举议和大旗，以达到“自固”的战略目的，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方式。当皇太极看到，几年来与明诸臣致书谈判毫无结果，便决定率军入关直接与明帝交涉。同时还可以大肆掠夺人畜财物，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十月二日，皇太极率八旗大军并集蒙古诸部，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关。十五日，后金兵到达通州（今北京通县）。皇太极沿途传谕明境官民，一是阐明兴兵反明的原因，以示正确；二是表明议和诚意，但屡遭拒绝，因此现在战火由关外燃烧到关内，责任在明而不在金。

二十二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遣归降的王太监“赉议和书致明帝”^[254]，表示议和的意愿。可是崇祯帝“恃其国大兵多”，又“耻城下之盟”^[255]，故凭城坚守，期待勤王援军，所以把议和一事不予理睬。到了天聪四年（崇祯三年，1630）二月九日，皇太极再次致书崇祯帝，希望明金议和，书曰：

金国汗上书于大明国皇帝：以我思之，师旅频仍，至相诛戮，而天生之民，因此罹祸。我等自身，亦不获安宁。我念及此，欲盟天地修好，使我两国军民子孙，世世享太平也。不然，何时罢兵而享太平耶？故缮写议和书，遣人赉往，惟尔等熟计

而明示之。^[256]

皇太极在关内转战四个多月，返回沈阳之前，分析了明金形势，认为议和对双方都有利，如果打下去明军必败。他此次率军进关，虽然未能实现议和，但是用反间计杀了主要对手袁崇焕，使明在关外失去一位著名的抗金将领，并亦报了其父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之仇。自此以后，仍不断对明发动议和攻势，使金立于主动地位，为达到自固的目的服务。

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1）八月十四日，皇太极遗书明锦州守将祖大寿曰：

前李喇嘛、方吉纳等来时，我诚心欲和，因尔等一面遣使往来，一面修筑锦州城，故我以书付尔使杜明仲寄尔，言尔等如不罢锦州城工，我将发兵等语。而后我即兴师，往来之使遂绝。其后，获尔哨卒银柱，我仍欲和，释之遣归，并无回报。后于进征北京之际，屡致书欲和，而明君臣，惟以前宋帝为鉴，竟无一言回报。然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夫征战者，岂我所愿乎？不得已而后用之矣。我厌兵戈而愿太平，故又遣书往。^[257]

天聪六年（崇祯五年）三月，皇太极率军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林丹汗率众西逃，于是计议南下征明。他给明境大同、阳和、张家口、宣化等城致书，给两边的议和书：

我之兴师，非欲取龙位得天下也。……今我开诚相告，我小国人民，惟愿两国和好，财货丰足，相互贸易，各安狩猎放鹰，以永享太平也。……倘能速行决断，以成此举，实为两国之福矣。我将驻此十日，以待回音，切勿迟延。^[258]

又致书得胜堡参将、守备等曰：

讲和之事，我已预告天地，汝果有爱民之心，宜速成此事，莫效辽东所为也。若延迟时日，我纵有候代之心，其如军中粮尽，将奈之时，所以约期十日者，为此故耳。^[259]

天聪七年(崇祯六年,1633)六月,皇太极致书朝鲜国王李倭,希望他出面“紹介其间”,从中斡旋,书曰:

贵国既以南朝为父母,以我为兄弟,我国与南朝十数年来,兵连祸结,而贵国介于其间,坐观胜败,不为和解。……贵国果以南朝为父母,以我为兄弟,王乃一国之主,不比南朝臣僚,惧彼南朝诛戮,不敢擅为担当。王于父母兄弟之间,通情解和,力为主张,未为不当也。诚如是,则普天之下,立见太平,不惟两国罢兵乐业,即贵国造福,亦自不小。又想兵乃凶器,实非人所乐为,只因欲和不成,遂至欲罢不能耳。^[260]

朝鲜国王李倭派人将此书送给明驻东江总兵,认为这是后金求和输诚的表现,请求明廷考虑后金议和的意愿,但是明朝没有答复。

此时,皇太极除了要朝鲜向明廷说合外,还通过蒙古向明廷转告议和的愿望。如蒙古向崇祯皇帝奏称:

闻满洲汗云:屡欲讲和,南朝不允,将马喂肥,惟有挑战,天意永眷,亦未可知?彼有此言,皇上若悯小民之苦,释守边人之怨,许与满洲和好罢兵,则民得太平,臣将守边之人,亦蒙恩矣^[261]。

从现存史料来看,自皇太极即汗位以来,这个时期后金提出议和最为频繁,所谓“上疏称臣,求救再四”^[262],可是明廷基本上不予理睬。但是,他对明推行“讲和与自固”的策略方针,虽然未能实现议和,却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改革,加强与巩固了后金的统治,大大增强了后金的国力。同时,皇太极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东边朝鲜及西边蒙古的威胁,前者结盟,后者臣服,使后金由天聪初年“四境敌国”,被孤立和包围的局面,转变为对明朝形成三面合围的形势。因此,皇太极踌躇满志,非常得意,告其父努尔哈赤之灵的祝词云:

甲戌年十月二十七日,即位四孝子敢昭告于父汗曰:我自

受命以来，与管八旗子孙，一心一意，夙夜忧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已有八年。臣等同心行事，蒙天地鉴助，复仗父汗积业，所到之地，懷之以兵，招之以德，周围敌国，归附甚众。兹谨述数年来所为之喜事，奉告圣灵，以期喜慰。今朝鲜称第纳贡，喀尔喀五部俱已归附，阿鲁地方各部皆已来归，喀喇沁、土默特部亦皆来归，察哈尔汗兄弟，其先归附者半，察哈尔汗亲携其余众，避我西奔唐古特部落，未至其地，死于西喇卫古尔部住所西喇之野地，其部执政诸大臣，各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仅有明国。^[263]

所以，皇太极在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264]因此，他公开宣称弃汗称帝，改大金为大清，年号崇德，自此对明由积极议和转为大肆进攻，寻机决战。

三、以战逼和

崇德元年（崇祯九年，1636）五月三十日，皇太极命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人率军入关侵扰，进抵北京近郊，明廷震惊。清军退走后，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人，认为当前主要敌人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主张集中力量消灭农民军，避免两面作战，而与清议和罢兵。此时，虽然清的国力强盛了，总战略由以往议和为主转入以进攻为主，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放弃对明议和的策略，所以议和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杨嗣昌密奏崇祯帝，同意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监高起潜秘密派遣熟知辽东境况的算卦盲人周元忠等六人，赴清议和。四月十二日，杨嗣昌在御经筵毕，向崇祯帝“述孟子‘善战者服上刑’语，盖欲款建州”^[265]。五月七日，他又“复借天变言款事”，同时方一藻“亦言宜款”^[266]。

四月四日，当周元忠等人到达沈阳时，皇太极一方面遣大学士

希福等人热情“迎宴”^[267]，另一方面“以事重大，今瞽人来直玩我耳”^[268]，怕其中有诈。但是，许多降清汉官纷纷上疏，希望掌握时机，与明讲和，如张春、张福宏、李华等人，皆开款直言，认为一则顺民心；二则定边界；三则息战乱；四则兴农耕；五则行贸易；六则得赏银，显然对清有利。因此，他们指出既然“南朝有和好之心”，建议派人“赴南朝内外经管各衙门投递，往说讲和，往回不过两个月，其事可知矣，如其不然，再发大兵往征未迟”^[269]。皇太极采纳了汉官们的意见，六月清兵屯大青山，遣使致书方一藻议和，“方一藻奏闻，以我弱引隆庆封俺答故事，兵部尚书杨嗣昌阴主之”^[270]。当杨嗣昌等人秘密与清议和一事曝光以后，在明廷内部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结果议和“中寝”^[271]。

八月，皇太极见议和受阻，便发兵征明，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八旗军入关，进抵北京，攻占济南，明德王朱由榘被执。崇德四年（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皇太极企图利用军事上的胜利，迫使明廷议和，便遣使赴明致书崇祯帝，并带去明德王朱由榘上崇祯帝疏及太监冯允升与明当事诸臣书。皇太极给崇祯书曰：

朕见尔国军民涂炭，实惕于心，故屡欲通好，以享太平之福，曾与袁崇焕及宣大边臣言之，不啻再三。奈尔国不从，轻视民命，乐于构兵，以致失地丧师，死亡百万，兵戈之祸，实尔君臣不听和议之所致耳。倘两国通好，讲信修睦，安有此祸哉。若谓朕之言和，乃诈诱之计，尔曾见朕与人和而复有背盟之事耶。且朕又何所迫而为此诈诱耶。在尔自谓预防我国之计诱，尔果能预防乎。尔纵能预为之防，城池又何尝不失陷，军民又何尝不覆没也。……如和事果成，则俘获之亲王、郡王、奉国将军及冯太监等，一切释还，即使和事不成，若以金币来赎，亦可听尔。尔若不顾骨肉，既不通好，又不赎还，朕必尽加诛戮。尔既骨肉之罔念，朕养仇敌以何为。且朕之欲通好

者，实从民命起见，尔若不惜民命，不愿修好，则天地自能鉴之，朕亦奈之何哉。若疑朕既屡言修好，何又兴兵不已，试思和议未成之先，何所据而罢兵。果有欲和之意，必彼此议定，誓告天地，夫然后可以罢兵矣。^[272]

德王朱由柢上崇祯帝疏曰：

臣等世受圣恩，经今七世，奈臣罪恶滔天，失守封疆，百姓涂炭，臣罪何逭。……念宗脉之情，或两国通和，或赎臣等得归土，再睹天颜，臣六世祖塋，再得奉祀，臣亦得复生，万世顶戴不尽^[273]。

太监冯允升与明诸臣书曰：

总督太监冯允升致书于当事诸大臣。……今欲讲和，常人尚惜生灵，升岂不念民命。如两家讲和，亲王回国，升等还朝，干戈平定，生灵幸甚，岂不为美。先曾几次奉遣讲和之人及文书，俱不能至御前，此番万不可隐蔽，有误国事，致亲王不得还朝，众大臣思之，因允升不得面君，祈将此书抄腾转奏。^[274]

明廷对皇太极来书不予答复，将德王书信烧毁，不令外传。虽然崇祯帝有议和之意，但是不够坚决，因此在主战的群臣谏阻之下，无可奈何，于是抚膺长叹曰：“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谓，至以于此。”^[275]

皇太极原先对明廷派遣周元忠等人赴沈阳议和一事，就表示怀疑，怕其中有诈，但是在汉官们的劝说下，接受明廷议和，通过几次交涉，看到明廷对议和没有诚意，因此要寻明决战，以武力解决问题，于是选择了关外重镇锦州作为大决战之处，便加紧进攻的准备和部署。

崇德五年（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领兵修筑义州城（今辽宁义县），作为进攻锦州的前线指挥部和粮草供给地。六年春，清军在锦州城外安营扎寨，掘壕巡逻，并

用大炮不断向城内轰击,使明军惶惶不可终日。明锦州守将祖大寿派人向明廷求援。崇祯帝得知锦州告急,便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步骑十三万往援,七月二十六日在宁远誓师,二十八日进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迫使清军后撤。八月十四日,皇太极率援军到达锦州北,很快在松山和杏山之间,“横截大路,绵亘驻营”^[276],“各处挖壕,断绝松山要路”^[277],从而对明军形成了反包围。洪承畴见清军“环松山而营,大惧。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278]。二十一日晚,明军突围失败,死伤惨重,洪承畴率残部退守松山城。七月二十八日,清军攻占松山城,次日洪承畴被俘,不久降清。次年三月八日,祖大寿献锦州城降清。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攻占杏山。至此,松锦决战以清胜明败宣告结束,从此明在关外精锐丧失殆尽,再无力抵抗清军进攻,而清控制了辽东与关内之间重要战略走廊,打开了通向中原的门户。

这时明朝在关外松锦决战中失败,清军随时都可能入关,进攻北京。而关内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大地,兵锋指向京师。明王朝两线作战,腹背受敌,崇祯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企图先安关内,集中力量镇压农民军,于是重开对清议和。但是,他不出面议和,却要兵部派人前往交涉,这样可以文过饰非,罪及他人。早在松锦大战后期,崇祯帝让兵部尚书陈新甲出面议和,陈新甲便遣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兵部司务朱济之与参将李御兰、周维庸等人为使臣,秘密出关赴清议和。

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马绍愉等离开京师,至宁远与清军统帅郑亲王济尔哈朗联系议和事。济尔哈朗认为没有崇祯帝的敕书不能接待,同时又将此事飞报皇太极。此时有些汉官接受过去的教训,如祖可法、张存仁等,指出明朝遣使求和,乃是缓兵之计,不可不防。因此,马绍愉派人向陈新甲报告情况,等待崇祯帝的敕书,方可到沈阳与清谈判议和。到了三月中旬,马绍愉收到崇祯帝的敕书,这敕书是他给陈新甲的,而不是直接给清的,

敕书曰：

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此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信音回奏^{〔279〕}。

皇太极看了敕书非常不满，一则明廷既要议和，为什么不直接致书，而给陈新甲；二则敕书内容仍充满敌意和傲慢态度；三则认为敕书不合定式，怀疑作伪行诈。因此，皇太极用同样的方式，敕谕诸王贝勒以答明朝，谕云：

阅尔等所奏，明之笔札，多有不实，若谓与我国之书，何云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既谓与陈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宝，况其所用之宝，大而且偏，岂有制宝不循定式之理，此非真宝明矣。况札内竟无实欲讲和之意，乃云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等语，此皆藐视我国，实无讲和之真心。然彼虽巧诈，朕以实情言之，向来启此兵端，原非我国之愿，因明国不辨是非，凌辱我国，情实难堪，故不得已而起兵耳，其相凌之事，不能枚举。朕从前屡欲和好，而明国不从，今明国口称欲和，其真伪不得而知，然和好固朕之夙愿，朕岂有所迫而愿和欤。……惟是我朝兵强国富，尚且谆谆愿和，奈明国执滞不通，自以为天之力，鄙视他人，口出大言，不愿和好，不知皇天无亲，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继，永不易位者乎。自古及今，其间代兴之国，崛起之君，不可胜数，明之君臣，虑不及此，不愿修好，致亿万生民死于涂炭者，皆明之君臣杀之耳，其罪在彼，朕无与焉。朕以实意谕臣等知之，尔臣等其传示于彼。^{〔280〕}

皇太极在此谕中，不仅严厉批驳了崇祯给陈新甲的敕书内容，而且态度强硬乃以武力相威胁。崇祯阅后，再次敕谕陈新甲，允许

正式对清议和。五月，马绍愉、朱济之等持谕赴沈阳谈判，皇太极以礼相待。此次，马绍愉带来的敕书仍然是给陈新甲的，内容很简单，与前次没有多少变化，该敕书称：

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昨据卿部奏称，前日所谕休兵息民事情，至今未有确报，因未遣官至沈，未得的音，今准该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实探确情具奏。^{〔281〕}

六月三日，清遣明使离沈还京，皇太极命大臣设宴饯行，仍以书报明朝，书中提出明清议和条件：

若两国各能审度祸福，矜全亿兆，而诚心和好，则自兹以后，宿怨尽释，彼此不必复言矣，至我两国尊卑之分又何必较哉。……至两国有吉凶大事，则当遣使交相庆吊。每岁贵国馈兼金万两，白金百万，我国馈人参千斛，貂皮千张。若我国满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我国，贵国人有逃叛至我国者，亦遣还贵国。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山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倘愿如书中所言，以成和好……尔速遣使赍和书及誓书以来，予亦遣使赍和书及誓书以往。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其亿兆死亡之孽，于予无与矣。^{〔282〕}

马绍愉回到宁远后，立即派人将议和情况秘报陈新甲，他阅后随手放在几上，被书童不慎误为塘报发付续抄，于是明清秘密议和一事面世，举朝哗然。有些以天朝自尊，不务实际的廷臣，反对议和，纷纷上疏弹劾陈新甲。崇祯帝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推卸求和的责任，便杀人灭口，将陈新甲弃市，中止了和谈。十月，皇太极以“屡欲与明修好，而彼国君臣执迷不悟”^{〔283〕}为由，命阿巴泰等统率八旗军大举攻明。

由上可见，议和作为清明战争中一种重要的辅助斗争手段，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清的最高决策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在很复杂的情况下，冷静地分析判断形势，适时地打起议和的旗

号,以缓兵之计,麻痹敌人,取得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并打败朝鲜和毛文龙部,解除后顾之忧。以讲和为手段,争取时间,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达到自固的目的。以军事斗争的胜利,逼迫明廷让步,接受议和谈判。说明清利用议和旗号,取得了成功。而明的最高统治者却恰恰相反,此时处于清与农民军两面夹击的危急境地,朝廷一些有识之士,要求放弃两线作战,与清议和,先全力对付农民军,然后再收复辽东失地。但是,毫无战略眼光而且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即以“宋帝为鉴”,耻于“城下之盟”,于是把主和的著名抗金将领袁崇焕,以“谋款通敌”处死,结果自毁长城。从清明对议和策略的运用,进行横向比较,不难看出清胜明败是有一定必然性的,正因为清成功地推行议和策略,使军事斗争亦取得辉煌战绩,两者结合起来为清朝开国打开了胜利之门。

四、皇太极与火炮

皇太极是清朝开国之君,也是一位杰出的有为之君,他善于发现和揭露面临的问题,采取改革手段,学习新事物,使后金政权自我完善,不断向前发展。当他看到八旗劲旅对明军作战中,长于野战,却无致远摧坚之具,往往受挫,因此开始制造和使用火炮,从而促进后金军的发展和壮大,这对清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八年,1618)四月,后金汗努尔哈赤宣布“七大恨”,兴兵反明,旗开得胜,下抚顺、清河等城堡。翌年,又取得萨尔浒大战的胜利,致使明军三路丧师,一路惊溃。随后,取开铁,占辽沈,进辽南,破广宁,后金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明军则闻风丧胆,屡遭惨败,退守辽西宁锦一线。此时,明朝一些有识廷臣,提出凭坚城、设重炮固守御敌之策,特别强调火炮在城防中的重要作用,徐光启曰“当今兵疲将弱,刀枪剑戟,不能制胜,非火器莫能御敌也”^[284]。可是明军火炮制造粗糙,性能很差,故纷纷上疏力请引进和仿制威力强大的西洋火炮,明人又称为红夷

大炮^[285]。

早在13世纪末,我国发明的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传入欧洲,16世纪,西方在火器制造方面已赶上和超过我国,到了17世纪初,火炮制造技术尤精,性能更强,射程远,破坏力大,这种西洋火炮配有供发射瞄准的远镜、度板,炮身“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286],被誉为“不餉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287]。因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前后,在廷臣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协助下,明廷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中共购买西洋大炮三十门,运回京师,其中十一门由山海关转运到宁远(辽宁兴城)。崇祯三年(天聪三年,1629),明廷又向葡商购得十门,其中六门运回北京,四门留涿州(河北涿县)加强城防。明朝在购炮的同时,还聘请西方炮师,指导造炮和训练炮手。由于输入西洋大炮,在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和保卫京师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金汗皇太极亲身经历了宁远、宁锦两次战斗,被明军拒于坚城之下,遭西洋大炮重创,损兵折将。他看到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288]。于是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289]。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领大军,避开明军坚城重炮的宁锦防线,取道内蒙入关,进逼北京,可是“去京师而不攻,环涿州而不攻,皆畏锐也”^[290]。足智多谋的皇太极,被明军西洋大炮的沉重炮声惊醒了,充分认识到此炮在战斗中攻击和杀伤的巨大威力,深感后金兵虽然勇猛,但仅凭刀矛弓箭,要想攻取架设西洋大炮的坚城,极为困难。因此,他要以敌之长,补己之短,决定制造西洋大炮。

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1)正月初,皇太极命总兵官额驸佟养性为督造,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为监造,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一批汉官汉匠负责制造红衣大炮^[291]。造成以后,

赐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凡四十具”^[292]，后金先是“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293]。这标志着后金开始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对后金军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意义。是年七月，皇太极亲统大军进攻大凌河城，首次命总兵官佟养性用牛骡挽车载红衣大炮、大将军炮四十位随征。当后金进抵大凌河城时，皇太极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令佟养性将红衣大炮、大将军炮运至锦州大道而营，既可攻城，又可击援，在大凌河战斗中，火炮发挥了巨大威力。八月十二日，用红衣大炮“击贼城西隅台，降守台兵，又击贼城南隅，坏楼堞。翌日，击东一台，台圯，守者宵遁，尽歼之”^[294]。九月十六日，佟养性率领炮兵随皇太极打击明援军，“敌望风遁”^[295]。二十四日，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率领马步四万余，由锦州来援大凌河城，“养性承旨屯敌营东，举炮攻毁敌营”^[296]。十月九日，佟养性率旧汉兵载红衣大炮六位、大将军炮十四位，往攻于子章台，这是一座大的墩台，地势险要，驻有重兵，垣墙坚固，“炮攻该台三日，击毁墙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台人惶忧，力不能支，第四日遂降兵”。攻下此台后，“周围各台明人闻之，近者归降，远者皆弃台而遁。”^[297]十一月，佟养性“率兵攻克马家湖台，自大凌河至广宁，明所置台墩悉毁之”^[298]。由上可见，“其年征明，久围大凌河，而功以成用大将军力也”^[299]，于是“自此凡遇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300]。

大凌河战后，有些汉官就造炮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上疏献策。天聪六年（崇祯五年，1632）正月，佟养性奏曰：“军中长拔，攻打城池必须红夷大将军，紧要必用，其别号次之……目今火器，虽有大号将军，然尚少，宜亟谕令金、汉官员各营地方，有遗下各号大将军炮，尽数查出送来。似再多方铸造，酌议收拾，方可有用。大炮百位不多，火药数十方就少。”^[301]七年三月，总兵官马光远奏曰：“一件，火炮虽有，要平日收拾得所，演放得法，方为实用。今将现在火炮查堪，应随营者，即着落营官管理，应守城者，即着恪守城

官管理,务要经心收藏,不许风雨损坏,责任分明,缓急有赖,临期不致推诿误事矣。……一件,大小火炮车辆,已经采有木植造作矣,但造成之后,为似前不收拾,不扇盖,万一出门,方才手忙脚乱收拾车辆,怎得坚固?临期岂不误事,事在该管车辆之官,时时查看,时时修理,又要总兵额真时之稽查,不许情误,自干罪戾,方得实用矣。……一件,火药硝黄造作,虽有派就人夫收藏,务要得法,给散务安分明。造作不堪,罪在匠役,分发不明,罪在将官,计人计药,多多备办,或出或入,俱要节省……一件,炮局、药局,虽有地方,而无房屋,凡遇暴日寒天,匠役无处遮盖,苦楚难当。合无每局造厂房十数间,以蔽风雨,庶匠役不致偷安,造作可得长便矣。……一件,造炮铁匠,并造药匠役,有各贝勒家下之人,有各官下新来之人,本身虽有田地,只身无人耕种,时刻不离,顾此失彼,其苦楚与兵役大不相同,既要令他打造,必须厚加吃穿,此人方得安心效力矣。”^[302]七月,参将祝世昌奏曰:“若攻打城池,必须红衣大炮……遇攻战则星罗棋布,摆列攻打,不但易于攻克,在敌人亦胆落心寒。若说红衣炮沉重,少拿一二十位,别拿二将军、三将军、三眼枪,是有火器之名耳,气微力少,不得实用。……然人多不知红衣炮好处,苦于难拿,只持轻便省力者;但不知一红衣大炮 13 万人之敌,虽是沉重,加之脚力、人力,引走亦易。况南朝岂不知我有红衣大炮,防守自然比常不同,此举必多用红衣为妙。”^[303]皇太极对于他们的建议十分重视,酌情采纳。

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清军攻占锦州后,皇太极利用明原有的制炮厂,“命梅勒章京马光辉、孟乔芳率刘元源旗下杨名高、祖泽润旗下李茂、佟图赖旗下佟国荫、石廷柱旗下金玉和、吴守进旗下孙德盛、金砺旗下柯永盛、巴颜旗下高拱极、墨乐根侍卫李国翰旗下杨文魁铸炮牛录章京金世昌、王天相等往锦州,铸神威大将军炮”^[304]。这种炮是用铜铸造,炮身前细后粗,底稍敛,全长 264 厘米,口径 13 厘米,底径 48 厘米,有 4 道箍,及准星、照门,

重 3900 斤, 安装在 4 轮车上, 上有横梁驮炮身, 发射时, 装火药 5 斤, 铁弹 10 斤。此炮由于炮管长、装药多、弹丸大、射程远、毁力强, 是攻坚制敌的利器^[305]。

皇太极除了制造火炮外, 另一个来源是收缴明军的大量火炮。早先缴获大批明军火炮, 多敝弃之不用, 仅有少数作为预警信炮。天聪五年(崇祯四年, 1631)以后, 便将收缴的明军火炮全部集中, 交由汉军使用。是年大凌河之战, 皇太极“以大凌河所获大小火炮三千五百位, 并鸟枪、火药、铅子, 命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管理”^[306]。天聪七年(崇祯六年, 1633)四月, 明叛将登州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致书皇太极求降, 书曰: “本帅现有甲兵数万, 轻舟百余, 大炮火器俱全。”^[307]皇太极见书十分重视, 遣人前往招抚。五月, 孔有德、耿仲明率部降金, 携来大量火炮火器, 仅红衣大炮就有六七位^[308], 其中多数是直接购自澳门葡萄牙的优质火炮。十月, 皇太极为了庆祝后金兵攻占旅顺, 举行阅兵, 这时共有红衣大炮三十位, 还有许多各种大小炮^[309]。崇德二年(崇祯十年, 1637)四月, 清军占领皮岛, 获得“红衣法炮、西洋等炮共十位”^[310]。崇德五年(崇祯十三年, 1640)至七年(崇祯十五年, 1642), 明清松锦大战, 以清胜明败而告终, 根据档案资料统计, 清军在松山获大炮 2363 门, 其中红衣大炮 6 门, 火枪 910 支; 在锦州获大炮 488 门, 其中红衣大炮 7 门, 火枪 121 支; 在塔山获大炮 452 门, 其中红衣大炮 1 门, 火枪 15 支; 在杏山获大炮 380 门, 其中红衣大炮 2 门, 火枪 473 支, 共计获大炮 3683 门, 其中红衣大炮 16 门, 火枪 1519 支, 另外还获大量各种炮子枪弹和火药^[311]。

由上可见, 皇太极自制造和使用火炮起, 直到他病逝, 经历了 13 年, 后金(清)的火炮从无到有, 由弱变强, 到清入关前, 明朝在关外以 1 比 10 的火器劣势处于“茫无所恃”的境地^[312], 清军已占绝对优势。

天聪五年(崇祯四年, 1631)正月初八, 后金造红衣大炮成, 加

之战争的需要,于是第一次组建了独立的新兵种乌真超哈(ujen cooha),汉译为重兵,即炮兵部队。二十一日,皇太极考虑到汉人短于弓矢而长于火器,因此从满洲八旗中拨出部分旧汉兵,大约两千多人,单独编为一汉军旗,命额驸佟养性为昂手章京统领,敕谕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如属员有不遵尔言者,勿徇情面,分别贤否以闻。尔亦当弹厥忠忱,简善绌恶,恤兵抚民,竭力供职,勿私庇亲戚故旧,陵轹疏远仇仇,致负朕委任之意。”同时又谕诸汉官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尔众官不得违其节制。如有势豪嫉妒,藐视不遵者,必罹祸谴。如能恪遵约束,不违节制,非仅敬养性,是重国体而钦法令也。”^[313]汉军旗初建,不像满洲八旗那样规范,既没有设固山额真(旗主),亦未见何色旗纛。三月十三日,皇太极“出阅新编汉兵,命守战各兵,分列两翼,使验放火炮鸟枪。以器械精良、操演娴熟,出帑金赉军士”^[314]。

十一月,大凌河战后,佟养性统管的火炮数量猛增,每门火炮都固定有一组炮手,多达20人,少则10人。是时,他仅统领6甲喇汉兵,共计3000人。因此深感炮手不足,要求增加炮手,扩大炮兵队伍。天聪六年(崇祯五年,1632)正月二十三日,佟养性疏言:

今当开创之初,我国兵士雄强,固不待言。先将目前紧要大事,政当昼夜调停,刻不容缓,至于别务,尚且从缓。……一曰增兵威,往时汉兵不用,因不用火器。夫火器南朝仗之固守,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彼之兵,既不能与我相敌抗,我火器又可以破彼之固守,何不增添兵力,多拿火器,以握全胜之势。目今新编汉兵,马步仅三千余,兵力似少,火器不能多拿。况攻城火器,必须大号将军等炮,方可有用。然大号火器拿少,又无济于事。再思我国中各项汉人尚多,人人俱是皇上赤子,个个俱当出力报效。若果从公查出,照例编兵,派定火器,演成一股,有事出门,全拿火器,火张军威,无事归家,

各安生理，一则不废民业，一则又添兵势。如此一行，敌国声闻，自然胆落，无坚不破，无城不取也。^[315]

七月，佟养性病逝，由石廷柱代为昂邦章京，总理新编汉兵。皇太极对佟养性生前进言很重视，天聪七年（崇祯六年，1633）七月，下令扩编汉军，“命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绵甲一，共一千五百八十户。命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筹统之，分补旧甲喇之缺额者”^[316]。因此，汉军一旗，6甲喇约3000人，增补1550人，共有4580人，近20个牛录，这些牛录人丁与满洲牛录不同，众寡不一。第二年五月，皇太极曰：“朕仰蒙天眷，抚有满洲、蒙古、汉人兵众，前此骑、步、守、哨等兵，虽有营伍，未分名色。……今宜分辨名色，永为定制。……旧汉兵为汉军。”^[317]这里所定“汉军”即为“乌真超哈”^[318]，可见把原先属于满洲八旗的旧汉兵，一律称为“乌真超哈”，并规定汉军旗纛色为元青（墨色）。

崇德二年（崇祯十年，1637）七月中旬，汉官鲍承先上奏，建议按照满洲旗制整顿和增编汉军，奏曰：

今汉营所立规矩不善，以致混乱军法。……汉固山内，一家有至三五百丁□七八百□丁者，虽立牛录拔什库，亦系□□，上至固山额真，下至牛录拔什库，有势者□□都偏苦，是何法纪？……今我国汉营□□□国规矩，又不是蛮子规矩，所以令人难守其□□。愚见将官下人丁照满洲规矩，每三百编□□□，照满洲披甲兵丁之数，人人挨查，苦乐均平，□□用。今我国渐大，人众炮多，然马步兵丁近万□，分为两营，不惟行走利便，抑且药炮易于看□。^[319]

皇太极采纳了鲍承先的建议，二十九日命“分乌真超哈一旗为两旗。以昂邦章京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以昂邦章京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两固山纛色皆用元青”^[320]。虽然设立两旗汉军，但是先前旗纛未分，仍为黑色，牛录大约增加到三十多个。

崇德四年(崇禎十二年,1639)六月,因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渎职议罪,皇太极决定将两汉军旗分为四汉军旗,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先是分汉军为二旗。一以石廷柱为固山额真,一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至是,上命内院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刚林,户部承政多罗额駙英俄尔岱,吏部启心郎索尼等,赦廷柱、光远罪,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每旗设牛录十八员、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正黄、镶黄两旗,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马光辉、张大猷为梅勒章京,戴都、崔应泰、杨名远、张承为甲喇章京。正白、镶白两旗,以石廷柱为固山额真,达尔汉、金维城为梅勒章京,金玉和、佟国萌、佟代为甲喇章京。正红、镶红两旗,以王世选为固山额真,吴守进、孟乔芳为梅勒章京,金砺、郎绍贞、王国光、臧国祥为甲喇章京。正蓝、镶蓝两旗,以巴颜为固山额真,李国翰、佟国赖为梅勒章京,张良弼、曹光弼、刘仲锦、李明时为甲喇章京。初两黄旗熏色皆用元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元青镶黄,石廷柱纛以元青镶白,王世远纛以元青镶红,巴颜纛纯用元青。^[321]

汉军由两旗分为四旗时,大约有牛录六十多个。

到了崇德七年(崇禎十五年,1642)六月,由于清在松锦大战取胜后,收降大批明兵,汉军牛录激增。为了加强管理,照满洲、蒙古八旗制定汉军八旗。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初汉军止设四旗,至是编为八旗,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国赖、石廷柱、巴颜、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八人为固山额真,祖可能、张大猷、马光辉、祖泽洪、王国光、郭朝忠、孟乔芳、郎绍贞、裴国珍、屯泰、何济吉尔、金维城、祖泽远、刘仲金、张存仁、曹光弼为梅勒章京。^[322]

至此汉军八军制定,祖泽润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刘之源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吴守进为正红旗固山额真,金砺为镶红旗固山额真,

佟国赖为正白旗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镶白旗固山额真,巴颜为正蓝旗固山额真,李国翰为镶蓝旗固山额真^[323]。祖可法、金维城为正黄旗梅勒章京,马光辉、张大猷为镶黄旗梅勒章京,祖泽洪、王国光为正红旗梅勒章京,孟乔芳、曹光弼为镶红旗梅勒章京,何济吉尔(何济吉)、郭朝忠为正白旗梅勒章京,祖泽远、郎绍贞为镶白旗梅勒章京,屯泰(佟代)、刘仲金(刘仲锦)为正蓝旗梅勒章京,裴国珍、张存仁为镶蓝旗梅勒章京^[324]。是年汉军八旗领有的牛录161个,其中正黄旗23个牛录、镶黄旗23个牛录、正红旗14个牛录、镶红旗20个牛录、正白旗27个牛录、镶白旗16个牛录、正蓝旗23个牛录、镶蓝旗15个牛录^[325]。汉军由4旗分为8旗时,旗纛色不用元青,改用相对应的满洲旗旗纛,即黄、红、白、蓝4正色旗,黄心红边、红心白边、白心红边、蓝心红边4镶边旗。

汉军八旗是以火炮为基本装备,炮兵为中心,步骑为护卫,用火药进行战斗的兵种,具有致远摧坚的强大威力,既能支援和掩护步骑协同作战,又能独立地执行火力任务。因此,皇太极一直很重视这支炮兵部队,从初建汉军一旗开始,“凡遇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投入战斗^[326],为大凌河之战、关内之战、伐察哈尔、侵朝鲜、松锦大战等,都发挥了炮兵的作用,它是后金(清)战胜敌人,壮大自己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皇太极制造火炮后,又将长于火器的汉人组建成炮兵,在这个基础上,战术有了新的变化。因为刚刚进入冷热兵器并用的时期,所以战术反映了两相结合的特点。所谓战术,简言之就是指导战斗的方法,也可以说是部队对武器装备运用于战斗实践的反映。自努尔哈赤反明以来,从总体而言,后金处于攻势,明居于守势,八旗劲旅无致远摧坚的武器,面对凭坚城重炮固守的明军,却以刀矛弓箭、楫车云梯等冷兵器进行轮番强攻的人海战术,结果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宁远之战就是一个典型战例。现从战术的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加深对以后战术变化的理解。

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亲率6万大军,进攻辽西宁远城,当时明驻守该城的将领袁崇焕采取“凭坚城,用火炮一策”^[327],以守为攻的战术,将11门西洋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东、西、南、北四面,还配有子母炮、快铳等火器,命精熟火炮的彭簪古、罗立负责指挥。努尔哈赤率军到达宁远后,二十四日清晨发动进攻,后金兵先攻打宁远城的西南面,此时袁崇焕命罗立发西洋巨炮,数十门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329],后金兵死伤无数,被迫后撤。然后努尔哈赤下令攻打宁远南门,战斗更加激烈,后金兵在板车厚盾的掩护下不断攻城,可是遭到城上东西两个角楼相对交叉火力射击,死伤惨重。因此,不得不停止攻城,向后撤退。次日,努尔哈赤不甘心失败,亲临前线督战,从早到晚一次又一次地攻城,皆为城上大炮轰击,人仰马翻,伤亡很大,深知“复攻又不能克,乃收兵”^[330],退到离城五里的九龙宫扎营,努尔哈赤束手无策,只好放弃攻打宁远,率残兵败将返回沈阳。由上可见,就兵器而言,明军处于优势,后金兵处于劣势,所以明军“其得力多藉西洋炮”^[331]。更为重要的是战术,努尔哈赤此战轻敌,未能像以往攻城多用智取,而是不惜人力强攻,则以己之短击敌之长,而袁崇焕则凭坚城重炮,则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显然前者战术错误,后者战术正确,从而说明战术在真正的战争中的重要性。

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师,举朝震动,欣喜若狂。兵部尚书王永光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332]天启帝朱由校说:“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333]宁远的胜利大大增强了明廷以坚城重炮抗击后金兵进攻的信心,史载:努尔哈赤兴兵以来,“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334]。因此,明朝更加重视修筑城池,制造火炮,行凭坚城重炮御敌的战术。

皇太极拥有火炮以后,根据冷热兵器的性能,骑步炮兵种的特

点,明军的战略战术,攻坚城采取围城打援新的作战手段,大凌河之战便是首次演习。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1)七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大凌河城,于是命昂邦章京佟养性率领炮兵第一次出征,携带红衣大炮、大将军炮40门随营。当后金兵进抵大凌河城时,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进行作战布置曰:

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因命正黄旗固山额真额駙达尔哈,率本旗兵围北面之东,贝勒阿巴泰率护军在后策应。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率本旗兵围正南面,莽古尔泰、德格英两贝勒率护军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宗室篇古,率本旗兵围南面之西,贝勒济尔哈朗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纳格率本旗兵围南面之东。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北,额尔克楚北尔贝勒多铎率护军在后策应。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南,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袞率护军在后策应。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駙和硕图,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北,大贝勒代善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率本旗兵围正西面。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南,贝勒岳托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诸部贝勒各率所部兵围其隙处。总兵官额駙佟养性率旧汉兵载红衣炮、将军炮,当锦州大道而营,诸将各固守汛地,勿纵一人出城。^[335]

这是个保全自己,消灭敌人,既周密,又高明的作战方案。首先对大凌河城,不像过去对宁远、宁锦之战那样,不惜大量伤亡进行强攻,而是在明军火炮射程之外,“掘壕筑墙以困之”。据《满文老档》记载:“壕沟周长三十里,城与壕之间有三里。壕深一丈,广一丈,壕外砌墙,高一丈,墙上有垛口。于墙内五丈外掘壕,其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覆以黍秸,掩上其土,于周围尽扎营。营外亦掘壕,深五尺,广有五尺,防守既固,困于城内之人不能出,城外之人

不能入。”^[336]可见以围代攻，克服了八旗兵不善攻坚之短，“彼兵若出，我则与战”，这正发挥了八旗兵精于野战之长。其次将新建的炮兵，“当锦州大道而营”，前可以攻城，后可以打援，大凌河城四周建有不少墩台，内有明军，相互策应，炮兵用火炮把多数墩台摧毁，使城与台失去了犄角之势。当锦州援兵到来时，佟养性受命率炮兵屯于敌营东，发大炮毁其营，明军伤亡甚重，纷纷溃退。再次是“外援若至，我则还击”，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钟纬等，率马步兵四万余，出锦州来援大凌河城，欲解其围，明军离开坚城，如虎落平阳，被动挨打，八旗兵却充分发挥善于野战的优势，结果明援军大败，张春被俘，吴襄逃走，自此关外明军再无力派兵援救了。明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等，见“外无援兵，内无刍粮，军民危急已极”^[337]，献城归降。由此可见，这次皇太极围城打援的新战术演习是成功的，入侵朝鲜的南汉山城之战、明清松锦大决战，则是此战术的进一步发展。

战争的胜利是以兵器的生产为基础的，当明军凭坚城重炮取得宁远大捷后，明廷有些人就怕后金也掌握火炮，徐光启说：“贼中甚畏火器，模仿制用，刻意求工，岂无奸细窃依式成造者，臣故加意防范。”^[338]大凌河之战，明廷已知后金始有火炮，王应朝说：“火器原为中国（朝）长技……但所为长技者，已为奴有，则我之防范可不为绸缪，以遏其将来之狂乎！”^[339]到了崇德年间，明人哀叹说：“当今清人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倘若清军排列大炮百位，一齐轰击，城非铁壁，人非铜柱，岂能抵当得住？”^[340]西方传教士汤若望也说：“清军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早已胜过明军，近来火器又与明军相当。火器中威力最大的，莫过于西洋大炮，今则清军不但有，而且为数甚多，明军虽说掌握西洋大炮在先，可惜发展迟缓，素无多备。”^[341]皇太极制造火炮，组建炮兵，战术革新，这对明清战局的变化，以及进取中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五节 皇太极与松锦大战

17世纪前期,在明清战争的舞台上,皇太极导演了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这就是著名的松锦大战。此役是以清胜明败而告终,清军夺取了山海关的锦州、松山、塔山、杏山四城,控制了整个辽西走廊,为尔后人关建立清王朝铺平了道路^[342]。

列宁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343]天命四年(1619),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大战胜利后,就把进取中原作为后金战略的总方针。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在宁远(辽宁兴城)战败,因心情郁忿,患毒疽身亡,由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皇太极主政后,南进灭明的战略不变,由于努尔哈赤晚年推行一些错误政策,致使社会生产停滞,人口大量流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后金的统治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飘摇动荡之中。他为了尽快解决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决定实行一系列的內政改革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其中关键是如何巧妙而又妥善地处理好与明王朝的关系。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征求群臣的意见,最后采纳了一位汉官提出的对明议和的韬晦之计,所谓“我国处南朝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344]。这个策略显然是以对明“讲和”为手段,欺骗明廷,争取时间来处理和解决后金内部与周边地区存在的许多迫切问题,从而达到后金政权“自固”的目的,然后待时机成熟,再举兵攻明,夺取全国统治权。因此,后金和明朝的关系,由过去的战争状态,转入“讲和”阶段。

皇太极审时度势,认为战略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随着历史的转变而改变的,这一改变对当时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都起了重要作用。所以,皇太极的“讲和”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在此期间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大改

革,于是调整了满族贵族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封建君主集权制;发展了社会经济;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整顿了八旗制度;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革新了国家机构;加速了后金封建化的步伐。与此同时,皇太极大批使用汉官,扩大了后金的阶级基础。并且统一了黑龙江流域,从新满洲得到了充足的兵源。他还竭力破坏和瓦解明朝、朝鲜和内蒙的三方联合,以军事和外交的手段迫使朝鲜结盟,内蒙臣服,这就消除了来自东西两面夹击后金的威胁,打破了明朝构筑的弧形包围圈。到了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即位时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后金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此时皇太极踌躇满志地说:“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345]这无疑是表示向明挑战,认为大举攻明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收起“讲和”旗号,企图寻明决战,以实现梦寐以求的入关灭明的战略总方针。

皇太极选择明清大决战的战场是经过反复慎重考虑的,当时从辽东入关陆路有两条道:一是经宁锦入山海关,一是取道内蒙入关,前者雄关险隘,易守难攻;后者道路崎岖,行军不便。皇太极对这两条入关之路并不陌生,早在即位之初,曾两次亲统八旗劲旅攻打宁锦皆受挫败,招致重大伤亡,所以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346]。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避开宁锦,从内蒙绕道入边,围攻北京不下,次年正月占领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命阿敏等人驻守,企图以此为据点,西可进逼京师,东可内外夹攻山海关,由于后金兵孤立无援,反被明军逐出关外,这就说明了未打开山海关大门之前,要想立足于关内是不可能的,正如章京盛忠所言:“年来我兵内入,累次破城获捷,而不得坐守其地者,皆因关门阻隔,首尾难顾,是以得其城而不能保。”^[347]皇太极原想入关“夺其无备之城”,在明朝腹地建立据点的意图,又遭失败,使他一时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最后无奈对明施行蹂躏残毁,大肆掠夺的方针,却激起关内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清军所到之处皆遭到沉重的打击。由

上可见,清军几次入关寸土未得,实因“关门未开,盖以关外之八城未得耳”^[348]。因为明军控制锦州、宁远、山海关一线,致使清军一怕后路被截断,二怕明兵乘虚进攻沈阳,所以不敢久留关内。皇太极总结以往清军几次进关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要想夺取中原,必须夺取山海关;要想夺取山海关,必须夺取关外八城;要想夺取关外八城,必须夺取锦州,不然清军深入关内,兵饷难继,进退失据,必遭失败。因此,他适时地改变了对明斗争的策略,由原先避开明重兵驻守的宁锦防线,转而强攻宁锦,夺取山海关,直取北京的作战方略。所以,皇太极选择锦州作为战略大决战的地方,所谓“定鼎之谟,在此一举,时不容缓,机不可失”^[349]。于是“移其兵于东,山海以外日事战争矣”^[350]。

此时腐败的明王朝,如同在狂风怒涛中将要沉没的航船,进行着拼命的挣扎。它面对清军和农民军的東西战场,已经无力应付两线作战,所以在东线战场,采取坚壁清野,固守城池的防御方针,凭借坚固的宁锦防线,以牵制和约束清军的行动,而调集主要兵力进攻西线战场,镇压农民起义军,这项战略措施收到一定的效果,致使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连遭挫折,张献忠、罗汝才所率农民起义军诸部兵败“受抚”,因此明末农民战争暂时受挫转入低潮。明廷乘机把进攻矛头由西线转向东线,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任命总督三边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洪承畴为蓟辽总督,负责主管东线军务;并且密切注视清军向锦州一带聚集,企图突破宁锦防线的意图,所以迅速调兵遣将支援关外诸城。

锦州是明朝设置在辽西的军事重镇之一,它地处辽东湾西北,大小凌河之间,南十八里是松山,松山西南三十里是杏山,杏山南十余里是塔山,东南四十里是海口,海口有运饷之仓,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地理形势非常险要。由此可见,锦州不仅是关内外连接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是宁锦防线的一个重要环节,担负着保卫关城,拱卫京师的重任。所以明朝统治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锦州

这个战略要地，相反想凭着宁锦防线有利的条件，企图取得第二次“宁远大捷”，以改变东线战场的被动形势，维护明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正如明山西道御史米寿图所说：“关外之存亡，神京之安危，决于一战。”^[351]

综观上述，既然“明清之兴亡系于关外诸城之得失”^[352]，而锦州则居诸城之首，因此就成了明清双方必争之地，从而导致著名的松锦大决战的爆发。

松锦大战是由皇太极首先发动，明清双方各自投入十多万大军，从崇德四年（1639）二月拉开战幕，到七年（1642）四月战争结束，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根据整个战役的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围锦打援（崇德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至六年八月十七日）

崇德四年二月十四日，皇太极“倾众犯辽，多载炮火，大攻松山，将欲尽力一举，妄图破克，以摇撼八城”^[353]，二十日，他率领八旗劲旅进抵松山，企图攻占北城，以毁锦州的屏障，便在松山南台下扎营七处，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清军发动多次强攻，皆遭到守城军民的英勇抵抗，伤亡惨重。但是，皇太极不甘心失败，他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遣将，运来大炮二十七门，炮弹一万发，火药五百斛；另一方面在松山城南穿地道，为了激励士气，宣布“有能穴地以炮崩溃之者，城破时为首效力，及运送火药之人，无主者赏而授之以官，奴仆则赏以人牛，准离其主；其指示督率官员，照先登大城例升赏。协同穴城兵丁，视其出力多少，以资赏赉”^[354]。虽然采取了以上措施，可是松山明军“防守甚严”，清军“力不得逞，亦无能为力”^[355]。最后皇太极无奈，遣使招抚，宣称：“若能察天意，顺时势，速来归命，则不特军民免于死亡，尔等之丰功伟绩，何可限量乎？”^[356]亦遭到明松山守将金国凤等人的拒绝，直到四月中旬，皇太极深感攻守两难，只好罢兵退回沈阳，沈阳城中的官民得知证明

“军兵大半见败，大将数人亦为致毙，行术之人，多有遑遑不乐之色，城外远处，则坊曲之间，哭声彻天”^{〔357〕}。

皇太极在松山初战失利，使他感到明军宁锦防线的坚固，不是轻易可破的。因此，皇太极会同诸贝勒大臣商讨对策，决定采取“由远渐近，重围锦州”^{〔358〕}，以迫使明军献城投降的战术。所以，崇德五年（1640）三月，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等人领兵修筑义州城（辽宁义县），此乃锦州北面的一个重要门户，两地相距九十里，清军在这里“驻扎屯田，令明山海关外宁锦地方不得耕种”^{〔359〕}，作为围攻锦州的前线指挥部和粮草供给地。他们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修城筑室，俱已完备，义州东西四十里地，皆已开垦”^{〔360〕}。皇太极在义州建立据点，如同一把尖刀威胁锦州，对战局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但明宁锦官兵十分惊恐，如辽东总兵刘肇期奏称：“奴屯义州几及一月，不进不退，不掠不攻。屡据回乡口称，节凭前锋哨报，谓奴盘旋义土，开垦种田，往来山中，采取木植，一图盖房，一图耕食，其为久踞之计无疑矣。且以哨马特扰松、锦，断我樵关；又以游骑尝实海隅，梗我粮道，其内困我之计又无疑矣。奴一日不去，则辽一日受危。”^{〔361〕}而且使清军从松山受挫的颓废情绪中振作起来，原先认为攻打锦州是下策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也改变了看法，他上书说：“臣观今日情势，围困锦州之计，实出万全。但略地易以得利，而围城难以见功，必须旷日持久，将士不无苦难懈怠之心，愿皇上鼓励三军之气，坚持围困之策，截彼侦探，禁我逃亡，远不过一岁，近不过数月，自有可乘机会。”^{〔362〕}清军除了在义州驻扎屯田外，并开始包围锦州城，“外筑土城，且挖坑堑，以为久住之计”^{〔363〕}。从此锦州被围，坐守待援，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明廷报称：“锦城米仅供月余，而豆则未及一月，倘狡虏声警再殷，宁锦气脉中断，则松、杏、锦三城势已岌岌，朝不逾夕矣。”^{〔364〕}

五月中旬，皇太极亲自来到义州，布置清军围困锦州的作战方案。首先派兵清除锦州外围的明军墩台，使锦州守军失去监视清

军和传递消息的据点；其次经常派遣军卒尽刈锦州城郊的庄稼，以断绝锦州的粮草；再次命睿亲王多尔袞为锦州前线总指挥，并敕谕：“将两翼兵暂行分驻，一断敌往来之路，一捉城人可乘便而来，一我兵易于收获，弗为敌乘间窃刈，其已收粮草，择坚固两处存贮。”^[365]可是，多尔袞没有执行皇太极围困锦州的方略，他却下令每牛录甲兵三人还家一次，后来又允许每牛录甲兵五人，每旗章京一人还家一次，还竟然下令把包围锦州的清兵后撤三十里驻营，致使军心浮动，明军乘机运大批粮草入城。皇太极得知后“大怒”，严责多尔袞说：“原令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今离城远驻，敌必多运粮草入城，彼此相持，稽延月日，何时能得锦州耶？”^[366]他为了严肃军纪，以“不能防塞之罪”^[367]，免去多尔袞的职务，降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

崇德六年(1641)三月，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锦州前线总指挥。济尔哈朗比较好地贯彻了皇太极的作战意图：一是亲率四万余骑离锦州城只有五六里地安营扎寨，在锦州城外“每面立八营，营深壕，沿壕筑垛口，两旗之间，复浚长壕，近城设逐卒哨探”^[368]；二是采取间、遣人策反锦州城内的蒙古兵，结果诺木齐、吴巴什等人归降，约为内应，清军攻占外城，明兵退守内城；三是调集几十门大炮，不断向锦州城轰击，使明军陷于紧张混乱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总兵祖大寿在这种“锦州被围，填壕毁堑，声援断绝”^[369]的情况下，派人突围向明廷求救。崇祯皇帝得知锦州告急，便命薊辽总督洪承畴率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及副将以下官员二百余名，步骑十三万，火速驰援锦州解围。洪承畴老谋深算，不敢冒进，把大军驻扎在宁远，窥探锦州方面的势态。五月，洪承畴为了探明清军虚实，命总兵杨国柱率领一支精兵，深入到松山境内，被济尔哈朗发现，于是，“令右翼兵击之失利，山顶立寨两红旗、镶蓝旗三旗营动，为敌所夺”，另外四

旗摆矛喇兵等与明军交战，“人马中伤者甚众”^[370]。皇太极认为“右翼山营被夺，损伤士卒，皆郑亲王指挥失律之故”^[371]，将济尔哈朗去职，由多尔袞接替前线总指挥。

与此同时，在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对如何解锦州之围，则是“朝议两端”^[372]。以兵部尚书陈新甲为首的一批京官认为明军长期集结关外，深怕清兵乘虚而入，同时十多万军队供给困难，“兵多饷艰”^[373]，主张速战速决；而以蓟辽总督洪承畴为首的关外将领认为明军“久持松杏，以资转运，且锦宁颇坚，未易撼动……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也”^[374]，主张且守且战。崇祯皇帝先赞同洪承畴等人的意见，然后又接受了陈新甲等人的建议，于是派遣职方郎中张若麒前往宁远监军，又命令绥德知县马绍愉出关赞划军务，他们到了军前，见到明兵取得一些小胜，就过高地估计明军的力量，皆上书说：“边兵可战”，所以明廷“遂不用承畴持久之计”^[375]，便传旨催战。

洪承畴迫于崇祯旨意，七月二十六日在宁远誓师，二十八日明军进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当时多尔袞率右翼驻守在乳峰山东面的东石门，豪格率左翼驻守在乳峰山西面的西石门，阻止明军进入锦州城。洪承畴决定“东西二门并进兵以分其势，遂立车营，环以木城，部署略定，建州兵大骇”^[376]。多尔袞“颇劳心焦思，亲自披坚执锐”^[377]，迎战明军。二十九日，洪承畴命总兵杨国柱率领所部攻打西石门，却遭到清军的伏击，杨国柱中箭身亡，明军首战受挫折，损兵折将。八月二日，多尔袞率领清军“直冲汉阵，不利而退，清人兵马死伤甚多”^[378]，将领被斩杀二十余员，军卒死亡一百三十多人^[379]，损失惨重。自此明清双方在争夺乳峰山战略要地时，虽然两军“数战围不解”^[380]，但是清军围锦打援的战术失利，反而陷于腹背受敌，战局发展日益对清军不利。而洪承畴则抓住战机，给清军以沉重打击，据多尔袞说：“洪军门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我兵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381]于

是,迫使“大清师退六十里,分守各隘,上疏请兵”^[382]。皇太极得知“锦之围兵,屡战屡败,势将退北”^[383]，“急报请援”的消息，完全出乎意外，“闻之忧愤呕血”^[384]。他为了稳住前线清军的阵脚，立刻采取应急措施，命满洲学士额色黑往谕多尔袞：“敌人若来侵犯，王等可相机击之，不来切勿轻动，各当固守汛地。”^[385]接着又派固山额真英俄尔岱等率领三千军士驰援^[386]。九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下达总动员令，“传檄各部兵马，星集京师”^[387]，“悉发清蒙之兵，年十五以上”^[388]，一律随军出征。十四日，他未等病愈，命济尔哈朗留守沈阳，亲率“沈中入丁，西赴锦州”^[389]，企图改变锦州前线的不利形势。

第二阶段，即松山决战（崇德六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皇太极率领援军，日夜兼程，十八日到达锦州城北五十里的戚家堡（辽宁锦县齐家堡），此时他已有一个初步的破敌方案，便派遣大学士刚林往谕多尔袞等人曰：“朕当即至矣，可令前遣之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多罗额驸英俄尔岱兵，及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兵，察哈尔琐诺木塞桑等兵，先在高桥驻营，俟朕至时，合围松山、杏山。”^[390]十九日，他带领亲兵深入到松、杏间的前沿阵地，登上松山城南的山阜，观看明军的营寨，只见松锦一带岗峦起伏，曲折盘旋，明军以步兵在松山城北和乳峰山之间立七营，以骑兵驻松山东西北三面，非常严整。但是，皇太极“横窥洪（指洪承畴）阵久之，见大众集前，后队颇弱，猛省曰：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391]。于是，他命令清军在松山和杏山之间，“横截大路，绵亘驻营”^[392]，“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西海口等处下营，各处挖壕，断绝松山要路”^[393]。从以上皇太极来到锦州前线后的整个作战布置看，还是采取围锦打援的战术，如果说过去的重点是围困锦州，而现在的重点则是打击援军，对明军形成了反包围，把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大军，紧紧包围在松山一带，致使锦州、松山、宁远成了三个孤立的据点，无法互相救援，清军由被

动变为主动,迫使明军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决战。

洪承畴见清军“环松山而营,大惧。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394]。于是,他收缩兵力,“撤其七营步兵,迎松山城而营”^[395],企图突破重围。二十日,明清两军列阵大战,接战良久,杀伤相当,未分胜负,可是明军屯积在笔架山的大批粮草为清军所夺,退路又被截断,故“汉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气挫势穷”^[396]。二十一日,洪承畴召开军事会议,共谋对策。他对诸将说:“彼兵新旧迭为攻守,我兵既出,亦利速战,当各敕本部,与之力斗,余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制胜,在此一举矣”^[397],想要与清军决一死战。洪承畴以决战“解围制胜”的意见,遭到一些将领的反对,他们提出“因饷乏,议回宁远就食”^[398]。他不仅没有严斥这种逃跑求生的邪念,反而产生了共鸣,因为考虑到以下几点:一是“奴势重大,终不能闯壕,恐日久根固,此贼尤难剿杀,而粮草尤难转运”^[399];二是“海仓之粮,未及运入,为清所夺。松山城守兵,自有一年之粮,城外列屯十万援兵,粮道既绝,城中之粮,欲分不足”^[400];三是代表明廷监军的张若麒支持率军南逃,他说:“松山之粮仅给三日,且今不但锦州困,松山又困,各帅既欲暂回宁远,以图再战,似可允也。”^[401]所以,洪承畴同意逃往宁远的意见,便把明军分成两路,命总兵王廷臣等人率领左路,马科等人率领右路,决定初更时突围南逃。这个逃跑行动,无疑涣散和动摇了军心,“于是诸将各怀去志,议不一”^[402],预示明军将遭失败的下场。

是日,皇太极得到情报,知道明军要突围南逃,因此立刻做了周密的军事布置,他对诸将说:“今夜敌必遁,我左翼四旗护军可至右翼汛地排列,右翼四旗护军又骑兵,蒙古兵前锋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之遁者,有百人则以百人追之,有千人则以千以追之,如敌兵众多,由蹶后追击,直抵塔山。”^[403]可见明军南逃的海陆两路皆为清军封堵。当天晚上,明总兵王朴“怯甚”,还没有到全军约定的突围时间,率领部众“已先遁”,此使明军大

乱，“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遥望火光，谓敌兵在前，走还，遇伏大溃”^[404]。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退守松山城，冲杀出来的明军，在尖山、石灰窑一带遭到清军的截击，伤亡惨重。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等奔入塔山；监军张若麒、马绍愉等由海上乘渔船逃回宁远；其余的残兵败将，奔向海边，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明军“赴海死者，不可胜计”^[405]。

二十二日，皇太极把大营扎在松山城外，“欲四面浚壕围之”^[406]。是日夜间，洪承畴组织明军分道突围，皆未成功，惟有驻守乳峰山的总兵曹变蛟率部冲出重围，“潜入汗阵”^[407]，“军中大惊”^[408]，双方展开激烈的拼杀，结果曹变蛟中创退入松山，有部分明军闯出清营，奔入杏山。皇太极为此大怒，除了把守卫大营的“门将，以不捍汉兵，斩杀”^[409]，惩处几百名有牵连的官兵外，便加强对松山城的包围。此时，锦州、松山皆为清军围困，惟有杏山未被清军控制，而且退入大批明兵，于是皇太极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杏山，命内大臣锡翰等率军“一伏于高桥大路，一伏于桑噶尔寨堡（即大兴堡），以杏山逃兵必由此路也”^[410]。清军设伏后，不久有明军的一千多人，由杏山遁出南逃，遇伏败，追至塔山，斩获甚多。二十六日，逃入杏山壕吴三桂、王朴等，率领残余部众，向宁远退却，遭到清军的追击。他们败奔高桥，清军“伏兵四起，阻截前路，追兵蹶后……合力进击”^[411]。明军被歼，吴三桂、王朴仅以身免，狼狈逃回宁远。自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皇太极命清军“行猎山野，并搜剿遁敌”^[412]，把逃亡和藏匿的明军全部收降。这次历时十二天的战斗，清军取得胜利，斩杀明军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余人，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冑九千三百四十六件，另外投海死亡的明军，马匹盔甲也以数万计。

第三阶段，即攻占松、锦、杏三城（崇德六年九月至七年四月）

皇太极虽然取得松山大捷，消灭了明军援锦的主力，但是松山、锦州、杏山三城仍为明军所据，关外的宁锦防线尚未彻底摧毁，

发动此役的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因此立刻调集大军,围驻松、锦、杏三城。皇太极采取的战术不变,不去攻坚,而是围困,不过围攻的重点是松山。他为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当时的形势,做了以下的安排:首先是加强指挥力量,九月八日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然后又增派贝勒杜度、阿巴泰等人专力围守锦州。十二日遣贝勒多铎、阿达礼等负责包围松山。同时还派郡王阿济格等人围困杏山,这些都是清的著名将领;其次是加紧围困,传谕曰:“锦州、松山所掘壕堑可周围巡视,其城外薪草,即令我兵割取。”^[413]据从松山城逃出的明将汪镇东目睹,“奴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其狡已极”^[414]。又如明宁前道石凤台塘报称:“看得松山自八月二十一日闯围之后,奴营遍布,水泄不通,督抚在松山,许久音耗寂然,本道屡差探听,无路可入。”^[415]可见,松锦杏三城被围困的明军已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

洪承畴战败退入松山城后,人多粮少,处境十分艰难。他派人执“密札”^[416]求援,结果援兵无望;几次组织突围,皆告失败;最严重的是粮食问题,早先每人每日发米两碗,不久只能发米一碗,后来杀战马充饥,甚至出现人相残食的凄惨景象。就在这种“转饷路绝,阖城食尽”^[417]的绝望情况下,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密约降清,许为内应,并以其子夏舒为质。崇德七年(1642)二月十八日夜,清军应约攻城,由南城登梯而入,“众俱继之,敌兵方觉”^[418],遂克松山城。次日晨,夏承德率部生擒洪承畴及诸将领,然后进行全城大搜杀,诛斩明军兵道副将以下官员一百多人,兵丁三千余名,俘获三千一百多人,甲冑军械一万五千二百多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多位^[419]。皇太极下令把洪承畴、祖大乐送往沈阳,将总兵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就地处决,并把松山城“毁如平地”^[420]。到了五月,洪承畴剃发降清,成为清朝的重要谋臣。

清军占领松山城后,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已知解围无望,明军斗志迅速瓦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且“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

计穷”^[421]。此时皇太极派新近投降的祖大乐赴锦州劝说其兄祖大寿降清,表示不计前嫌,以礼相待。三月八日,祖大寿献城归降,清军占领锦州,凡不属于祖大寿部属都遭到屠杀,斩副将以下官员十七人,兵丁八千余人,俘获一万二千四百多人,甲冑军械七千二百多件,各种火器六百多位^[422]。

四月中旬,皇太极遣使招抚杏山城明军官兵,要他们献城投降,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二十一日,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率军攻城,占领近城的几处墩台。二十二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毁城垣约二十五丈,明军守城副将吕品奇率部不战而降,清军占领杏山城,俘获六千八百多人,甲冑军械二千七百多件,各种火器八百五十多位^[423]。

至此,松锦大战,最后以清胜明败宣告结束,这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清方看,自皇太极即位后,对明清之间将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次大决战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他进行内政改革,加强君权,对外联络朝鲜、蒙古,孤立明朝。因此清不仅上下团结一致,而且又无后顾之忧,所以,它就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投入这场战争,从而保证了松锦大占赢得胜利。

另外,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战略打击目标的选择、作战时机的把握、用兵方略和临阵指挥等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的是:他吸取了以往对明战争的经验教训,扬八旗善于奔袭野战之长,避其不长于攻坚城之短,因此在松锦大战中,始终采取围攻城打援助的战术,不仅消灭了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援军,而且困逼松山、锦州明守将献城投降,摧毁了明军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为人关灭明铺平了道路。

从明方看,这次松锦大战失败,致使关外明军精锐尽丧,松锦杏三城俱失,造成这种惨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廷的政治腐败,在此役中反映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盲目催战。当时崇祯皇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偏信“原属刑曹，本不知兵”^{〔424〕}的辽东监军张若麒轻敌冒进之言，一味催战。因此，洪承畴“轻进屯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形见势绌……遂使重臣宿将迭率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425〕}。

——督监不和。蓟辽总督洪承畴根据关外兵力和锦州守将祖大寿“逼以车营，毋轻战”的意见，主张且战且守，逐步推进以解锦州之围。而监军张若麒却反对，“振臂奋袂，挟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426〕}。总督和监军两者互相掣肘，严重影响了明军的战斗力。

——指挥失误。洪承畴虽然精通兵家权谋，由于考虑个人得失安危，所以屈从于陈新甲、张若麒等人的权势，当“陈新甲趣之，未免轻进以屯师”时，他就孤军深入；当“张若麒惑之，倏焉退师以就饷”^{〔427〕}时，他就率军南逃。因此，洪承畴在指挥作战上，表现出犹豫和动摇，这就必然导致明军失败。

——将官畏死。明军在松山与清军对阵时，兵员和火器都胜于清军，本应决一死战以解锦州之围，但是一些将领畏死，却弃城南逃，如总兵王朴为了自己活命，不顾全军安危，违约先遁，造成明军松山大败。又如明廷为了解救洪承畴，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可是“皆敛兵不敢出”^{〔428〕}。

松锦大战以后，关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时，明王朝不仅松锦兵败，损兵折将，苦心经营十多年的宁锦防线为清军攻破，而且一度转入低潮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又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规模之大、发动之广、威力之猛，都是空前的，因此明廷处于东有清军，西有农民起义军的夹击之中。当洪承畴兵败退守松山城的消息传到京师后，明廷上下十分恐慌，崇祯皇帝一方面“屡旨巢援”，实际上“未发一兵，未通一信”^{〔429〕}；另一方面命兵部尚书陈新甲召集群臣，商讨解围之策，可是他们提不出“制虏

奇策”，只是“有云解围宜先通消息者，有云或用水师捣巢者，有云宜设法运粮者”，就连陈新甲也说：“甲忧劳欲死，今日解围无策。”^{〔430〕}在这种无兵可援、无策可献的情况下，有些廷臣主张对清议和，陈新甲亦有此意，所以“兵部会议御奴之策，大端以息兵为言”^{〔431〕}，企图向清谋和，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因此，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初，陈新甲通过大学士谢升向崇祯皇帝建议与清议和。八日，崇祯“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升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432〕}。陈新甲领旨后，积极准备，获悉二月十八日松山城破为清军占领，于是三月中旬命职方郎中马绍愉、兵部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壖等人秘密出关议和，他们到达宁远后，派人到锦州与清方接触，并以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敕书作为明廷求和的证明，书曰：“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以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433〕}

皇太极阅毕非常气愤，对诸王贝勒大臣说：“明之笔札，多有不实，若谓与我国之旧，何云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既谓与陈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宝，况其所用之宝，大而且偏，岂有制宝不循定式之理，此非真宝明矣。”^{〔434〕}因此，清拒绝谈判，明使马绍愉等人只好回京禀奏，在此期间锦州、杏山、塔山相继被清军占领，宁锦防线已不复存在了。四月底，陈新甲又再次奉旨，再遣马绍愉、朱济之等人前往沈阳议和，此次明清议和谈判，在清的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以满族贵族为主的一方反对议和，他们认为“明之国运将亡，正宜寻此机会，攻取燕京，安用和为”^{〔435〕}；二是以汉族官员为主的一方支持议和，他们认为“明寇盗日起，各方饥馑，兵力竭而仓廩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边文武重臣，皆为我擒，兵将散失八九，今遣使乞和，计必南迁，应邀其纳贡称臣，划地以黄河为界”^{〔436〕}。皇太极采

纳了汉官主张对明议和的意见,与明使经过二十多天的磋商,到了六月三日为马绍愉等人设宴饯行时,他在致崇祯皇帝书中提出了议和条件:

一、两国吉凶之事,则当遣使相庆吊;

二、每岁明馈清金万两,银百万两,清赠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三、明清双方潜入境内的逃人,一律遣还对方;

四、明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界,清以塔山为界,并以连山为适中之地,明清两方在此进行互市贸易。^[437]

以上所提条件表面上看并非苛刻,实际上皇太极不是想索取土地和财物,而是要求明王朝承认清是独立的政权,明清双方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但是明廷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以上条款,议和一事就夭折了,这是因为崇祯皇帝遣使议和是秘密进行的,所以马绍愉等人离开沈阳回到宁远后,立即派人把议和谈判情况秘报陈新甲,陈新甲阅后,一时疏忽,将来书放在几上,结果被家人误作塘报送出传抄,于是满朝哗然,许多廷臣上疏弹劾陈新甲私行议和。崇祯皇帝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文过饰非,把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不久陈新甲作为替罪羊被处死,明清议和告吹。

皇太极对明清议和中辍,没有引起反响,因为松锦大战后,明清力量对比已发生很大变化,正如明辽东巡抚黎玉田所言:“我之所以制酋者,向惟火器为先,盖因我有而酋无,故足以取胜,后来酋虽有而我独多,犹足以微幸也。今……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酋之抢掠万马立致,我之市骏一骑无增,以至器械等项,件件措处为艰,独以空言,不更可危乎?……奴器械精、粮草备、人马健、将酋勇……我军马草、火器少、饷银无、地势孤。……迄于今而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矣;抢夺马匹器械,百倍于我之马匹器械矣;虏掠丁壮兵民,又酋十数万生聚矣;捆截辎重金帛,又不止百万财宝矣。其富其强,盖以骄悍之性,无厌之欲,方张之势,内攻

山海,外攻宁辽,此必至之情,必然之势也。”^[438]所以皇太极在明清议和停止后,便于九月五日对祖可法、张存仁等汉官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砍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439]

正当皇太极准备出兵入关攻明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利用明清松锦大战的时机,明军精锐调往东线无暇四顾的时候,重振旗鼓,使农民战争由低潮转入高潮。农民起义军挺进河南,攻克洛阳,南下湖广,占领襄阳,整个中原大地淹没在农民起义军的狂涛之中,明王朝的统治危在旦夕。所以皇太极看到关内形势变化,于是便改变策略,想利用农民起义军与明朝拼杀,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十月十四日,他命贝勒阿巴泰、内大臣图尔格等入关联络农民军,第二天送行时特别面谕:“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440]尽管阿巴泰在关内寻找农民起义军半年之久,但是未能与农民起义军联系上,皇太极企图联合农民起义军消灭明朝的战略没有实现。顺治即位,多尔袞摄政后,继承了皇太极欲联合农民军的策略,所以顺治元年(1644)正月,派遣迟起龙等人为使臣,入关给农民军将领致书,书中说:“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泥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441]此信送到大顺军镇守榆林的将领王良智手中时,李自成已率农民军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了,当李自成得到王良智的报告,农民军就要攻占北京城,因此对清的建议未予理睬,不了了之。

由上可见,松锦大战的社会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促使明王朝早日退出历史舞台,并为清王朝的建立铺平道路,正如康熙皇帝把萨尔浒大战与松锦大战比较时所指出的:“太祖一战而王基开,太

宗一战而帝业定。”^[442]这种评价前后两次明清大战的历史意义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注：

- [1]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89,女真。
- [2]《明英宗实录》卷 49,正统三年十二月辛未。
- [3]罗福成:《女真译语》二编,肃慎馆来文。
- [4][10][1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1。
- [5]《老满文上谕》。
- [6]彭孙贻:《山中见闻录》卷 1,建州。
- [7]《明神宗实录》卷 444,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丁酉。
- [8]徐乾学:《叶赫那拉氏家乘》。
- [9]海滨野史:《建州私志》卷上。
- [11]《清太祖实录》卷 2。
- [12]《满洲实录》卷 2。
- [13]《清王朝实录采要》卷 1。
- [14][20][29][朝鲜]申忠一:《建州图录》。
- [15][21]《满洲实录》卷 3。
- [1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3。
- [18]《明神宗实录》卷 524,万历四十二年九月壬戌。
- [19]《明神宗实录》卷 455,万历三十七年二月甲寅。
- [22][朝鲜]李民奭:《建州见闻录》。
- [23]程开祜:《筹辽硕画》首卷,东夷奴儿哈赤考。
- [24]《满文老档》太祖 27。
- [25]《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类,卷 1,兵部职方司主事叶世英题东夷渐炽等事疏。
- [26]《清太祖实录》卷 2。
- [27]《清太祖实录》卷 5。
- [2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 75。
- [30]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 [31][91]《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
- [32][33]《清太祖实录》卷 5。
- [34]《辽事迹》，第 11 页。
- [35]《明神宗实录》卷 573，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庚申。
- [36]夏燮：《明通鉴》卷 75。
- [37][39][61][66]《都督刘将军传》。
- [38]《明神宗实录》卷 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 [4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
- [41]《辽事迹》，第 8 页。
- [42]程开祜：《筹辽硕画》卷 4，仰陈未议大伸挹伐疏。
- [43]《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类，卷 3，辽东巡按熊廷弼题骄虏再兵不一等事疏。
- [44]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四年三月。
- [45][8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 1。
- [46][48][60][62][74][78][朝鲜]李民奭：《棚中日录》。
- [47]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 40。
- [49]《满文老档》太祖 8，天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 [50][72][73][75][77]《辽事迹》，第 14 页。
- [51]《清太祖实录》卷 6。
- [53]《抚顺县志稿本》疆域、古迹。
- [54][55][57][58]《满文老档》太祖 8，天命四年三月一日。
- [56]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59]王鸿绪：《明史稿》列传 117，刘廷传。
- [63][64]《满文老档》太祖 8，天命四年三月。
- [65]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 23，深河之役。
- [67]《清太祖实录》卷 6。
- [68]《明神宗实录》卷 582，万历四十七年五月己酉。
- [69]《明神宗实录》卷 572，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壬辰。
- [70]《明神宗实录》卷 571，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壬戌、甲午。
- [71]《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类，卷 4，户部主事杨嗣昌题为军容再肃等事疏。

- [76]《明神宗实录》卷 580,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
- [79][80][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 [81]《明史》卷 271,贺世贤传。
- [82]《明神宗实录》卷 581,万历四十七年四月丁卯。
- [83]《辽广实录》卷上。
- [85]《辽事迹》,第 20 页。
- [86]《熊廷弼书牋》卷 1。
- [87]《明神宗实录》卷 580,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戊戌。
- [88]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 2。
- [89]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 1。
- [90]《明经世文编》卷 488,徐光启:《辽东陆危已甚疏》。
- [92]《满文老档》太祖 41,天命七年四月十七日。
- [93](满汉合璧)《太祖皇帝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事文》。
- [94][132][137][139]《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4。
- [95]《明熹宗实录》卷 38,天启三年九月丁未。
- [96]《明熹宗实录》卷 19,天启二年二月己丑。
- [97][103][122]《明史》卷 250,孙承宗传。
- [98]《明熹宗实录》卷 22,天启二年五月丙午。
- [99][10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 9。
- [100][113]杜应芳:《督师纪略》卷 7。
- [101][102][108][109][121]孙铨:《孙文正公年谱》卷 2。
- [104][105]杜应芳:《督师纪略》卷 2。
- [10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 10。
- [110]《明熹宗实录》卷 62,天启五年八月戊子。
- [111]杜应芳:《督师纪略》卷 3。
- [112]杜应芳:《督师纪略》卷 15。
- [114]夏燮:《明通鉴》卷 78。
- [115]孙铨:《孙文正公年谱》卷 3。
- [116]杜应芳:《督师纪略》卷 16。
- [11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14,孙承宗殉节。
- [118]《明熹宗实录》卷 63,天启五年九月丁卯。

[119][120][124][125][132][133][142][145]《明史》卷 259,孙承宗传。

[123]陈伯陶:《东莞县志》卷 61,袁崇焕传。

[126]谈迁:《国榷》卷 87。

[127][128][13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 15。

[129]夏允彝:《幸存录》卷上。

[130]夏燮:《明通鉴》卷 80。

[131][13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袁崇焕守宁远。

[135]《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 3。

[136]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 29。

[140][143]《明熹宗实录》卷 68,天启六年二月乙亥。

[141]《明熹宗实录》卷 68,天启六年二月丙子。

[144]《满文老档·太祖》卷 71,天命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146]孙铨:《孙文正公年谱》卷 3。

[147]《明清史料》甲编,第 1 本,天聪二年奏本。

[148]《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2 页。

[149][166][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 27。

[150]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 29。

[151]《明熹宗实录》卷 69,天启六年三月丙辰。

[152]《明熹宗实录》卷 70,天启六年四月丁丑。

[153]《满洲实录》卷 8。

[154]《明熹宗实录》卷 68,天启六年二月甲戌。

[15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4。

[15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袁崇焕守宁远。

[157][159]《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4。

[158]《满文老档·太祖》12,天命十一年八月。

[160]《清太祖实录》卷 10。

[161]《明熹宗实录》卷 76,天启六年九月戊戌。

[162]《李朝实录》仁祖卷 14,四年九月庚寅。

[163]《明熹宗实录》卷 77,天启六年十月戊申。

[164]沈国光:《两朝从信录》卷 30。

[165]彭孙貽:《山中闻见录》卷 4。

- [167]笔者在戴逸同志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一册中,负责撰写第一章时也持此种看法,后经研究,实感有误,因此改变了以往的观点。
- [168]以上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满文老档·太祖》卷3。
- [169][176][177][178]《满文老档·太祖》卷14。
- [170]原文多铎和多尔袞行文之间没有标点,说明他们二人合领一旗,因此出现了八旗九王的情形。
- [171]以上引文没有写明出处的,均引《旧满洲档》的《藏档字》《无编号残档》,转引自冈田英弘:《清太宗继位考实》。
- [172]《满文老档·太祖》卷38。
- [173][186][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7。
- [174]朝鲜的《丙子录》记载:“努尔哈赤疽发背死,临死命立子贵荣介(即代善)”。
- [175]朝鲜金宗一的《鲁庵文集》记载:“初红拔突(即褚英),欲名破土里既死,贵荣哥(即代善)以次当立,老汗(即努尔哈赤)临死日,洪佗始(即皇太极)能成吾志,终无所命而死”。
- [179][18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 [181][185]《清太宗实录》卷4。
- [182][195]蒋良骐:《东华录》卷5,卷6。
- [183]《清史列传》卷6,多尔袞。
- [184]《清世祖实录》卷22。
- [187][朝鲜]金宗一:《鲁庵文集》。
- [188][189]《清太宗实录》卷1。
- [190][192]《天朝朝臣上奏议》卷上,胡贡明五狂瞽奏。
- [191][朝鲜]《备边司誊录》第4册。
- [193]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二月。
- [194]《清太宗实录》卷11。
- [196]《清太祖实录》卷4。
- [197]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卷6,江西道御史唐世济题为阁臣尸位等疏。
- [198]程开枯:《筹辽硕画》卷35,薛敷政:辽事败坏难支疏。
- [199][200][201]夏燮:《明通鉴》卷74。

- [202]《清太祖实录》卷5。
- [203][205]《都督刘将军传》。
- [204]《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 [20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建州。
- [207]海滨野史:《建州私志》卷中。
- [208]《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
- [20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3月出版,(书名不同)第65页。
- [210]《满文老档》68页。
- [211]《满文老档》72页。
- [212]《满文老档》73页。
- [213]程开祜:《筹辽硕画》卷12,薛凤翔:朝政用人要疏。
- [214]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1,天启元、二年塘报。
- [215]《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平辽总兵毛文龙奏本。
- [21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8,第3085页。
- [217]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4,天启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具揭。
- [218]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6,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启。
- [219][223]《明熹宗实录》卷79,天启六年十二月辛亥。
- [22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
- [221]《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 [222][224][234]《清太宗实录》卷1。
- [225]《满文老档》第807~808页。
- [226]《明熹宗实录》卷80,天启七年正月甲午。
- [227]《满文老档》814~816页。
- [228]《满文老档》817~818页。
- [229]《满文老档》818~821页。
- [230]《满文老档》823页。
- [231]《满文老档》824页。
- [232][255]《清太宗实录》卷5。
- [233]《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
- [23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扈应元条陈七事奏。

- [23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孙应时直陈末议奏。
- [237]《清太宗实录》卷3。
- [238]《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宁完我等谨陈兵机事奏。
- [239]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32。
- [240]《清太宗实录》卷9。
- [241]《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天聪二年奏本。
- [242]《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士俊谨陈管见奏。
- [243]《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金国汗致大明皇帝书。
- [244]《满文老档》,第875页。
- [245]《清太宗实录》卷4。
- [246]《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金国汗致袁崇焕书。
- [247]《满文老档》,第932~933页。
- [248]《满文老档》,第934页。
- [249]《满文老档》,第935页。
- [250][251]《满文老档》,第936页。
- [252]《满文老档》,第937~938页。
- [253]《满文老档》,第939~940页。
- [254]《满文老档》,第961页。
- [256]《满文老档》,第996页。
- [257]《满文老档》,第1140~1141页。
- [258]《满文老档》,第1297~1299页。
- [259][260][261]《天聪实录稿》,转引李光涛:《明清之际史事丛考》。
- [262]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朝鲜国咨文。
- [26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18页。
- [264][朝鲜]《沈阳状启》。
- [265][266][268]《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 [267]《清太宗实录》卷41。
- [269]《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张福宏奏为清派员赴明议和事本。
- [270]《明崇祯实录》卷11,崇祯十一年六月,是月。
- [271][275]李清《三垣笔记》笔记上,崇祯。
- [272][273][274]《清太宗实录》卷47。

- [276][278]《清太宗实录》卷 57。
- [277]《明清史料》乙编,第 4 本,兵部题行宁前道石风台塘报稿。
- [279][280]《清太宗实录》卷 59。
- [281]《清太宗实录》卷 60。
- [282]《清太宗实录》卷 61。
- [283]《清太宗实录》卷 63。
- [284]徐光启:《火攻要略》。
- [285]所谓红夷大炮,并非荷兰所制,乃英国制造,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第 226~228 页。
- [286]《明史》卷 92,兵 4。
- [287]《徐光启集》卷 4,练兵疏稿 2,附录 1,李之藻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
- [288]《明清史料》甲编,第 1 本,第 48 页。
- [289]《清太宗实录》卷 6,天聪四年二月甲寅。
- [290]《徐光启集》卷 6,再陈一得以裨庙胜疏。
- [291]红衣大炮即红夷大炮,明人称满族为夷,因此谐音改为红衣大炮。
- [292]《清史稿》卷 231,佟养性传。
- [293]《清太宗实录》卷 8,天聪五年正月壬午。
- [294][295][296][298]《清史列传》卷 18,佟养性传。
- [297]《满文老档》下,第 1160 页。
- [299]《清朝文献通考》卷 194,兵 16。
- [300][326]《清太宗实录》卷 10,天聪五年十月壬子。
- [301][315]《天聪朝臣工奏议》,佟养性谨陈末议奏。
- [302]《天聪朝臣工奏议》,马光远又请整饬总要奏。
- [303]《天聪朝臣工奏议》,祝世昌请及时大举奏。
- [304]《清太宗实录》卷 62,崇德七年八月己亥。
- [305]参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第 254 页,刘旭:《中国古代火炮史》第 87 页。
- [306]《清太宗实录》卷 10,天聪五年十一月癸酉。
- [307]引自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 145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308]《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收抚孔耿办法奏。
- [309]《清太宗实录》卷 16,天聪七年十月丙寅。

- [310]《清太宗实录》卷 34,崇德二年四月丙戌。
- [311]郭美兰翻译:《崇德七年奏事档》(满文),见《清代历史档案丛编》第 11 辑。
- [312]引自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见《清史研究集》第 4 辑。
- [313]《清太宗实录》卷 8,天聪五年正月乙未。
- [314]《清太宗实录》卷 8,天聪五年三月丁亥。
- [316]《清太宗实录》卷 14,天聪七年七月辛卯。
- [317]《清太宗实录》卷 18,天聪八年五月庚寅。
- [318]《八旗通志》卷 26,兵制志 1。
- [319]《明清史料》丙编,第 1 本,鲍承先奏本。
- [320]《八旗通志》卷 1,旗分志 1。
- [321]《清太宗实录》卷 47,崇德四年六月丙申。
- [322]《清太宗实录》卷 61,崇德七年六月甲辰。
- [323]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附表 3。
- [324][325][日本]阿南惟敬著、陈桦翻译:《汉军八旗成立之研究》,《清史译文》第 11 辑。
- [327][328][334]《明史》卷 259,袁崇焕传。
- [329]计六奇:《明崇北略》卷 2,袁崇焕守宁远。
- [33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4。
- [331]孙铨:《孙文正公年谱》卷 3。
- [332]《明熹宗实录》卷 68,天启六年二月乙亥。
- [333]《明熹宗实录》卷 68,天启六年二月丙子。
- [335]《清太宗实录》卷 9,天聪五年八月戊申。
- [336]《满文老档》下,第 1131 页。
- [337]《清太宗实录》卷 10,天聪五年十月甲寅。
- [338]《徐光启集》卷 6,闻风愤激直献弔疏。
- [339]方裕谨辑:《明与后金大凌河之战史料片断》,见《历史档案》1981 年第 1 期第 28 页。
- [340][341]引自郭成康:《明清武器竞赛》,见《历史大观园》1987 年第 5 期。
- [342]笔者曾写《论明清松锦大战》一文,发表在《辽宁师院学报》1981 年第 7

- 期上。近年看到了一些明清档案材料,并到锦州、松山、杏山等地进行了考察,故在原文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着重论述皇太极的军事谋略。
- [343]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3卷。
- [344]《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天聪二年奏本。
- [345]《清太宗实录》卷20,第37页。
- [346]《清太宗实录》卷6,第19页。
- [347]《盛忠奏陈攻取山海关外八城策略事本》,《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第32页。
- [348]《段学孔奏陈攻取关外八城方略事本》,《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第33页。
- [349]《清太宗实录》卷56,第26页。
- [350][375][376][381][382][401][402][404][427]谷应泰:《明朝纪事本末补遗》卷5,《锦宁战守》。
- [351]《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兵科抄出南京山西道御史米寿图题本。
- [352]《锦西县志》卷1,地理,兵事。
- [353]《兵部呈为高起潜题松山防卫获胜事本》,《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第5页。
- [354]《清太宗实录》卷45,第21页。
- [355]《兵部呈为方一藻题松山孤城获全民心屹固事本》,《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第4页。
- [356]《清太宗实录》卷45,第23页。
- [357]《沈阳状启》庚辰年四月二十二日。
- [358]《清王朝实录采要》卷8。
- [359]《清太宗实录》卷50,第12页。
- [360]《清太宗实录》卷51,第20页。
- [361]《兵部为辽东署总兵官刘肇期奏报战守机宜事行稿》,《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第4页。
- [362]《清太宗实录》卷51,第18~19页。
- [363]《沈阳状启》己卯年三月二十日。
- [364]《兵部为总兵官祖大寿题御敌之策事行稿》,《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

第7页。

- [365][368][395][405][413]蒋良骐:《东华录》卷3。
[366]《清太宗实录》卷55,第4~5页。
[367]《沈阳状启》辛巳年三月二十二日。
[369][372]《明史》卷261,丘民仰传。
[370]《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崇德六年六月乙酉。
[371]《清太宗实录》卷56,第14页。
[373][380]《锦县志》卷14,宦绩。
[374][379][425]谈迁:《国榷》卷97。
[377][381]《多尔袞摄政日记》。
[37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687页。
[382][39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大清》。
[383][388][朝鲜]《沈阳日记》辛巳年八月二十日。
[384][38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686页。
[385]《清太宗实录》卷57,第17页。
[386]《沈阳状启》辛巳年八月二十八日。
[387]《清太宗实录》卷57,第18页。
[390][433][434]《清太宗实录》卷57,第19页。
[392][394]《清太宗实录》卷57,第21页。
[393][399][415][416]《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兵部题行“宁前道石凤台塘报”稿。
[396][400][朝鲜]《沈阳日记》辛巳八月二十五日。
[403][421][442]《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满汉合璧》)。
[406]《清太宗实录》卷57,第26页。
[407][409][朝鲜]《沈阳日记》辛巳八月二十二日。
[408][410]《清太宗实录》卷57,第27页。
[411]《清太宗实录》卷57,第28页。
[412]《清太宗实录》卷57,第29页。
[414]《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兵部题“御前发下原任宁夏镇标参谋汪镇东奏”稿。
[417][428]夏燮:《明通鉴》卷88。

[418]《清太宗实录》卷 59,第 7 页。

[419][422][423]《崇德七年奏事档》二月二十四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1 辑。

[420]《明清史料》丙编,第 1 本,松锦记事残叶。

[424][426]《明清史料》乙编,第 4 本,兵科抄出南京山西道御史米寿图题本。

[429][431]《明清史料》乙编,第 4 本,兵部行“御前发下兵科给事中张缙彦题”稿。

[4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卷 25,第 10 号。

[432]《明史》卷 257,陈新甲传。

[433]《清太宗实录》卷 61,第 10 页。

[436]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七年五月丙申。

[437]《清太宗实录》卷 61,第 4 页。

[438]《明清史料》乙编,第 5 本,兵部题“御前发下辽东巡抚黎玉田题”残稿。

[439]《清太宗实录》卷 62,第 14~15 页。

[440]《清太宗实录》卷 63,第 14 页。

[441]《明清史料》丙编,第 1 本,致西据明清诸帅书稿。

第三章 清帝国的建立与全国的统一

第一节 多尔衮与山海关大战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清太宗皇太极病逝,其九子年方六岁的福临继位,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二人共同辅助幼帝,实则多尔衮摄政,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清的实际统治者和最高决策人。自松锦之战以后,皇太极本想乘胜入关灭明,但是发现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大地,规模之大,威力之猛,都是空前的。于是立即巧妙改变策略,企图利用农民军与明朝拼杀,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崇德七年(1642)十月十四日,皇太极特命贝勒阿巴泰、内大臣图尔格率军入关观察动向。第二天送行时又特别面谕:

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1]。

多尔衮摄政后,继承了其兄皇太极欲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建立全国统治政权的战略总方针。故于顺治元年(1644)一月二十七日,派遣迟起龙等人为使者,取道内蒙古地区,以福临的名义给农民军将领致书:

……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2]

此信送到大顺军镇守榆林的将领王良智手里时,李自成已率农民军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了。当李自成得到王良智的报告,眼看就要攻占北京,推翻明王朝,所以对清“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建议未予理睬。多尔袞伫待多日,不见回音。此时,清的重要谋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看到关内的形势发生急速变化,便对多尔袞企图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的战略方针提出异议,认为明王朝已病入膏肓,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清的主要敌人变了,不是明王朝,而是农民军。他请求火速入关,直取明都,并提出具体的进军方案 and 对待沿途官民的各项政策。四月四日,范文程向多尔袞启奏:“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蠹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悦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3]

这份奏书,适时而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策略,它对清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多尔袞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四月九日,多尔袞“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4],约十四万大军进关讨明。十一日^[5],清军到达辽河时,多尔袞得到探报,方知李自成的农民军于前一月已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王朝被推翻了。这时多尔袞感到进退两难,便征求熟知关内情况的对农民军颇为了解的明降将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坚决主张入关,攻打北京,寻农民军大战,必能获胜。他向多尔袞启称: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严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

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流寇)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府库,遁而西行。……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6〕

这是继范文程奏启后又一篇重要文献,洪承畴在变化了的形势下,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进军方略,是以农民军为主要敌人,以北京为主要攻击目标,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民军手中夺取胜利果实。多尔袞听了受到极大鼓舞,决定由内蒙入关,攻打北京。

此时,关内的局势发生了急剧而又重大的变化。这年春天,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挥戈东进,兵分三路直指京师。崇祯皇帝感到大明江山危在旦夕,于是“诏征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奏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7〕。三月四日,明廷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随命他火速领兵入卫北京。吴三桂十分狡诈,从个人的利害考虑,时刻观察政局的变化,故“三桂被命,迁延不即发,简阅步骑,携挈人民,徒五十万人众,日行数十里”〔8〕。由宁远(辽宁省兴城县)至山海关二百里路程,正常行军日行一百二十里,若兼程急驰能走二百里,一日便可到达。可是,吴三桂率领大军,六日从宁远起程,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整整走了十一天。他入关以后,根本无意勤王入卫京师,二十日军至丰润,便“犹豫不进”〔9〕,“分驻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处”〔10〕,袖手观望,待机而动。魏特在《汤若望传》中曾指出,吴三桂“对于君王的行动底动因,不是忠义,不是爱国心,这一点似乎很是实情,八成支配着他的性灵的主要成分,是贪求尊荣的心理,其次也就是不见得高尚的个人动机”〔11〕,这种分析是正确的,揭露了他观望不前的实质。二十

八日,当吴三桂得知“京师陷,帝后殉难”的消息,深感自己夹在清和农民军之间,要取得个人的权益,不是归降农民军,就是投靠清,他反复权衡,举棋不定。

其实清和农民军都在竭力争取吴三桂,这是有道理的,一则吴三桂占据山海关一带,是京师的东大门,通往关内外的咽喉要道,军家必争之地;二则吴三桂拥有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其中有三千子弟兵和部分“蒙古锐丁”^[12],战斗力颇强。因此,吴三桂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若降农民军,可以阻止清军入关,从而巩固大顺政权;倘归清,清军便可长驱直入,进攻北京。早在他驻守宁远时,清就曾多次派人致书招抚,因其家小皆在京师为质,不敢许诺,而是婉言拒绝。另外,当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直趋京师时,对吴三桂领兵入关勤王很重视。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在居庸关收降明定西伯唐通后,就命令唐通率所部,并带大量金银财物,利用旧日同僚关系,前去招抚吴三桂等人,唐通“遗书三桂,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但是“三桂不答”^[13]。十九日,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京畿“各镇将皆降”,惟有“三桂道未通”^[14],因此十分忧虑。他对军师宋献策说:“惟山海关吴三桂是一骁将,当致之麾下。而辽东劲敌又使我衽席不安。”^[15]然后在召集诸将领讨论“定久安之计”时,当部将顾君恩指出:“闻南方立藩王皆不足有为,惟山海关外不可无虑,宜储饷练兵以待之。”李自成同意他的看法说:“吾亦以此为虑耳。”^[16]可见招抚吴三桂是想遏制清军入关。所以,李自成加紧招抚工作,首先除“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17]外,还命其父吴襄“作书以招子”^[18],“使速降”^[19]。其次是派遣巡抚李甲和兵备道陈乙,“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20],并犒赏吴军官兵白银四万两。吴三桂看到投降农民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高官厚禄即日可得,则“大喜,忻然受命”^[21]。他立刻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在会上对众将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众将不知其意图,

“皆默然，三问不敢应”。他接着又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方知其意，便同声答道：“今日死生唯将军命。”于是“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22]，归降大顺军。

吴三桂决定向大顺军投降以后，自己率所部入京朝见李自成，由唐通等人领兵驻守山海关，并且“从关山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23]。这时北京城内比较混乱，农民军占领北京后，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而且政策失误，尤其是归降的明朝官吏，大肆“编拿百官，拘系追赃，酷刑拷打，呼号遍地”^[24]，同时强占他们的妻女为妾。吴三桂的家庭也没有幸免，刘宗敏拷掠吴襄，夺取他的爱妾陈圆圆。虽然李自成为了招抚吴三桂，曾加以制止，但是为时已晚。四月五日，吴三桂行至永平西沙河驿，见到从北京城里逃出的家人，问及家中情况，“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25]，可是又想到“吾与此兵结仇深，势难归北，李害父陷于不知。不必仇”^[26]，等到京后再辨明。接着又听说自己的爱妾陈圆圆已为刘宗敏抢占，深感奇耻大辱，“乃大怒”^[27]，“投袂起曰：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即刘宗敏），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28]，又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29]，真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30]。于是吴三桂“忿而中改”^[31]，八日回军进攻山海关，“袭杀其守关兵殆尽，贼师负伤遁归”^[32]，唐通败逃。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复叛，立即派白广恩率军救唐，结果亦大败，全军被歼。吴三桂占领山海关以后，立刻办了三件事：第一，“移檄远近讨贼”^[33]，“近京一路尽传”^[34]，就连“京城外亦遍张吴三桂檄，共约士民缟素复仇”^[35]；第二，联络士绅，扩充人马，余一元的《述旧事诗》载“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事势不容谄，捐输兼敛科”^[36]，可见山海关的绅衿给予积极支持。同时又“招集溃散及唐通降兵约二万”^[37]，还“新募兵数千，尤雄悍”^[38]，因此兵马增加到五六万人；第三，杀使祭旗，吴三桂下令斩李自成

派来招抚的使臣李甲头祭旗，割去陈乙两耳纵之^[39]，以示坚决与农民军为敌。

李自成看到吴三桂决心顽抗，不将其消灭必为大顺政权一患，因此决定亲自统领大军出征，为了先稳住吴三桂，十一日派遣使臣再次携带吴襄手书和大量金银前去劝降。十三日，李自成统率十成大军^[40]，宋献策、刘宗敏、李过等将领从之，并带吴襄同往，出齐化门直指山海关。吴三桂已经估计到李自成必领大军来战，所以早有准备。一方面向清企援，吴三桂“见自成势大，难与争锋”^[41]，许多部将也“以众寡不敌为虑，有进乞师策者”^[42]，如胡守亮，此人“素通满语，乃献借兵之策”^[43]。同时吴三桂又找谋士方献廷商量，他问献廷“敌众我寡，计将安出？”献廷曰：“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44]于是吴三桂命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等人为使臣，致书清军，请兵援助。另一方面行缓兵之计，当李自成亲征前遣使来劝降时，参将冯有威向吴三桂献计说：“吾军愿效死杀贼。今不如收其金币。散赐士卒，然后起兵，使彼不及备，何必杀此伪官。”吴三桂采纳他的意见，佯对来使说：“愿一见东宫而即降”，使臣便“报书复命。”^[45]吴三桂不放心，怕此计不成，接着又派生员李友松、谭遼寰、刘泰临，乡耆刘台山、黄镇庵和高选六人，“轻身给贼，行至三河，遇贼，遂羁而东”^[46]，用诈降手段欺骗李自成，以待清兵来援。李自成虽然没有完全中计，但是显然放慢了进军的速度，从北京到山海关约七百里，如果急行军三四天就可到达，可是大顺军却整整走了八天，贻误了战机。

四月十五日，多尔袞师抵翁后（辽宁省阜新境内）^[47]，遇见吴三桂派遣的使臣杨坤、郭云龙二人，并带来求援的书信，吴三桂在书中向多尔袞请求：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

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48]

多尔袞得书后，真是喜从天降，此乃清军入关的大好机会，立刻召见范文程等人商讨对策。范文程说：“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接着又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抚安百姓不可。”^[49]

多尔袞同意范文程的看法，虽然对吴三桂的乞援“大喜许诺”^[50]，答应出兵，但是对来书中有两点是不同意的：一是所谓“泣血求助”，向清借兵而不是归降；二是要清军“直入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关等处）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却不许从山海关合兵进京。多尔袞明知吴三桂对清存有戒心，但是他想利用吴三桂乞援的时机，能够迅速进关，所以他没有同吴三桂商量，便改变了原先想取道内蒙、由密云进攻北京的计划，而是由义州（辽宁省义县）南下，直趋山海关，迫使吴三桂投降，控制关镇战略要地。同时，他怕吴三桂乞援有诈，“欲探其言之虚实，遣其妻弟拜然与汉将（郭云龙）一人偕往山海关，汉将（杨坤）一人则方留在军中”^[51]。十六日，多尔袞给吴三桂复书，虽同意出兵，但要吴三桂降清，书曰：

……予闻汉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52]

吴三桂看到李自成大军压境，万分惊慌。他除了向多尔袞逼降让步，请求火速救援外，便加紧准备抗拒农民军的进攻。十九

日,吴三桂在演武堂,“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53],得到地主官僚的支持,如郭应龙、孟四吉等人,“辅助粮饷七千八百五十余两,稽察战马一百二十余匹”^[54]。二十日,吴三桂传令聚教场,“与诸将绅衿歃血同盟,戮力共事”^[55],杀所谓“奸细张有起、张五”^[56]二人祭旗。然后进行军事部署,在关城内日夜巡逻,“严缉奸宄”^[57],并于关城西石河一带设防布阵,待机而战。

这天,多尔袞率军到达连山,见到吴三桂使臣郭云龙、孙文焕,并收到来书,书称: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井,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巡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不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58]

还说:“贼兵已朝夕且急,愿如约,促兵以救。”^[59]

多尔袞对来书中“愿如约”三字的内容含意是心领神会的,实际上吴三桂表示愿意降清。此外,他从信中得知山海关军情紧急,一旦为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统领大军,日夜兼程奔赴山海关。据《沈馆录》记载:“九王(指多尔袞)即发驰行……一行皆未及打火矣,达夜疾驰,人马饥渴,黄埃涨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二十一日……至关十五里许,日已昏黑,屯兵不进,一昼夜之间行二百里矣。”^[60]

尽管多尔袞率领清军日夜兼程,但是李自成的农民军已于二十一日晨比清军抢先到达山海关,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军对阵。山海关形势非常险要,它是以关城为主体,四面各有辅城护卫,东西名为东罗、西罗,南北则是南翼、北翼,并同附近的长城、城堡、墩台、关隘等组成比较完整的防御系统。李自成为了迅速占领这座

京东门户的雄关，一方面命唐通率领一支人马，由离关城西北三十余里的九门口“北出而东守外城以困截之”^[61]，不仅要切断吴三桂与清军的联系，而且还要防止他逃往辽东降清。别一方面令随军前来的吴襄阵前致书劝降，吴三桂不从，在答父书中说：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繆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以殉国难，桂亦缟素号恸，寝千复怨。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媿美乎！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功，复愧平原骂贼之勇。……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乎？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俦以诱三桂，不顾也^[62]。

因此，李自成下令向吴军发动进攻，两军战于石河西岸，战斗十分激烈，结果吴军大败，“以致生员李友松、谭有养、刘以楨，战没贼营”^[63]，大批吴军被歼。农民军突破吴军的石河防线后，便派一支精锐骑兵，从西北的角山“飞奔透阵，至西罗城北，方欲登城，守城兵用炮击之，又遣偏将率兵还剿”，故未能得手。但是农民军虽被阻，乃“不复来战，相持竟日，遂收兵”^[64]。与此同时，农民军又攻打北翼城，据吴军守此城将领冷允登说：“当王师（即清军）之未至，正流寇之突关，亲王（即吴三桂）领兵当锋，派臣守北城。奈此城逼山受敌，贼欲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贼势蜂拥，竟扑边城直上，臣祇率亲丁尽力堵占，正在呼吸存亡之间，急请亲王拨兵协剿。”^[65]方守住此城。由于西罗、北翼二城遭到农民军的猛攻，险些丢失，而东罗城也很吃紧，把守该城的马维熙说：“东罗城孤当贼冲，危急劳瘁，倍于两城。”^[66]由上可见，山海关已陷入农民军的包围之中，吴三桂度势不支，亟待清军速援。

此日下午，多尔袞率领清军进抵山海关外十五里处停止不前，观察关城的局势，这时得到“吴三桂哨骑来报，贼已出边立营”^[67]。当天晚上，多尔袞派军在一片石打败唐通，唐通率残部由九门口退入长城内。二十二日早晨，多尔袞率军来到离关城二里的威远台

(堡)，“高张旗帜，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营觐之。三桂复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信。请之者三，九王始信，而兵犹未即行”^{〔68〕}。这显然是多尔袞对吴三桂施加压力，所以吴三桂只好带领绅衿吕鸿章、余一元等五人和二百名亲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突围出城，驰往清营。多尔袞在帐中接见吴三桂，并迫使他投降。吴三桂在阶级和个人的私利驱使下，向多尔袞剃发称臣，投降了清军。多尔袞迫使吴三桂就范后，便对他说：“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69〕}此时突然得到探报，北翼城部分吴军哗变，投奔农民军。多尔袞得知命吴三桂先行，并对他说：“尔回可令尔兵各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70〕}吴三桂立即率随员返回关城，加强各城堡墩隘的防守，下令全体官兵剃发，一时来不及的就用白布斜束项背，便于清军分别吴军或农民军。然后在关门上竖白旗，“吴三桂率诸将十数员，甲数百骑出城迎降，九王受拜礼于阵中，进兵城中”^{〔71〕}。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左翼入北水门，豫郡王多铎等率右翼入南水门，时值大风扬尘，咫尺不见，入关的清军隐蔽在关城之下。多尔袞告诫众将说：“吾尝三围彼(明)都，不能遂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者。”因此“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即农民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可成”^{〔72〕}。所以他“不肯先与自成轻战”，故命吴三桂为前锋，“一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觐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渔人之利”^{〔73〕}。

这时李自成知道山海关易守难攻，想诱吴军出关城野战，一举歼灭。因此停止攻城，把十万大军自北山横亘至海，沿石河西岸一字摆开列阵，作战时可以首尾相顾。身经百战，足智多谋的多尔袞，观看李自成的布阵后，决定避免同农民军对阵作战，则采取集中强大的优势兵力，发动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的闪击战。他说：“我

军可向海对贼阵尾，鳞次布列，三桂兵可分列右翼之末。”^[74] 多尔袞选择关城以南石河口一带为突破农民军的战场，一则这里离李自成中军大帐最远，是个薄弱之处；二则这里东南临海，又是平阳开阔地，便于发挥清军骑射的威力。他为了暂时不暴露清军参战，并保存八旗兵的实力，命令吴三桂率领部众打先锋，以吸引农民军主力来战，吴军在龙王庙和谭家颇罗地区同农民军接战，吴三桂心中明白，此战只能胜不能败，所以“与贼死战，自辰至酉，连杀数十余阵”，战斗非常激烈，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

自成、宗敏知关兵劲，成败翊一战，驱众死斗。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75]

可见吴三桂已陷入重围，曾多次企图突围未成，面临全军败灭的危险。此时，多尔袞认为时机已到，命阿济格、多铎等统领两白旗，“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腾跃摧陷”^[76]，战局立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军遭到清兵突然攻击，反而处于清军和吴兵的包围与夹击之中，清吴联军以全力冲杀，并把农民军压向海边，这场战斗十分残酷，所谓“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骑贼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成东海口，尽为斩杀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几矣”^[77]。吴三桂在此战中之所以转败为胜，死里逃生，是因清军的增援。正如刘健在《庭闻录》中说：“是日，战初合，满兵蓄锐不发，苦虞至日昧，三桂军几不支，满兵乃分左右翼鼓勇而前，以逸击劳，遂大克捷。”^[78]

当时李自成骑马按辔立于高岗之上，“见白旗一军，绕出三桂右，万马奔腾，不可止。自成麾后军益进”^[79]，准备火速驰援。但是，他身边有一僧人告知，“此非吴兵，必东兵（即清兵）也，宜急避之”^[80]。李自成虽经南征北战，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可是此次却

没有从整个战争全局考虑,自己策马先逃,动摇了军心。可贵的是这支农民军久经沙场,纪律严明,在没有主帅的情况下,许多官兵仍不后退,坚持战斗,最后因寡不敌众,在红花店为清军所败,勇冠三军的刘宗敏,“亦中流矢,负重伤而回”^[81]。二十三日,李自成退至永平,遣降官王则尧赴吴三桂营招降,吴三桂将王则尧送交多尔袞,被处斩。李自成得知后,便在永平范家店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斩首示众,然后率领残部西撤,二十六日回到北京。

山海关大战是以清军的胜利、大顺军的失败而告终。这次大战对清来说,是继萨尔浒、辽沈、广宁、松锦之战以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可谓“定鼎燕都,一统之基实始于石河一战”^[82],自此“期年之间南北浑一”^[83]。可是对大顺政权而言,则一蹶不振,由胜转衰,开始走上失败的道路。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一位杰出军事家,曾领导和指挥过许多著名的战役,取得了显赫战果,为什么在山海关大战中却遭惨败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 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有些昏昏然,牛金星等人忙于劝进,准备登基大典,刘宗敏等人热衷于拷掠追赃。而对当时的局势和大顺军所处的地位缺乏冷静的分析与正确的估计,表现出毫无战略远见,最突出的反映是对已迅速向关内进兵,将同自己争夺天下的清认识不足,根本没有采取必要的战略对策和实际措施。就这一点而论,多尔袞要比李自成高明得多,他对形势和任务了如指掌,把入主中原、从农民手中夺取胜利果实、建立清王朝代作为既定方针,一切皆有章有法。另外,李自成对占据山海关这个战略要地的吴三桂,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仅局限于“勤王”,威胁京师安全而已,却对他降清没有警惕,结果只是一味地招抚,没有派遣得力的将领率重兵去攻打或迫降,使其阴谋得逞,实现满、汉地主阶级联合进攻大顺军,这是大顺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2. 大顺军推翻明王朝以后,领导集团矛盾加深,削弱了李自成的军事指挥权,所谓“各自为雄,目无贼主”^[84],“凡事皆众主谋

也”^[85]。尤其是一些农民军官兵,长期在外南征北战,打下北京滋长了思乡情绪,产生了厌战、怕战的思想,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当吴三桂据关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即将出师征讨时,“营中诸贼大惧,私相卜问李闯有成否,闯王登极尚延几年否,出师不为关兵所杀否。得卜不吉,多涕泣”^[86],有些“马斯、炊丁亦人怀重宝,皆有归志”^[87],所以刘宗敏感到“此时但畏军变”^[88]。这种思想状态的官兵,在山海关大战中,发现清军突然参战,则大惊失色,惊呼“满兵来矣,拉然崩溃”^[89]。可见缺乏战斗意志、畏惧敌人的思想是战败的原因之一。

3. 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中指挥失误。首先是进军速度十分缓慢,三四天的路却走了七八天,使吴三桂有时间加强关城防御和遣使乞援;其次是不知敌情,不仅多次受吴三桂诈降缓兵之计所骗,而且十多万清军已入关都不知道,可见探报工作失灵到何等程度;再次是使用阵法不当,既摆开横列一字阵,则必须首尾相顾,互相游动,遭清吴联军分割围歼后,又未命预备队驰援,致使坚持战斗的农民军孤立无援,惨遭杀害;还次主帅弃众先逃,当清军铁骑绕过吴兵之右,向农民军猛扑过来时,李自成非但没有沉着应战,却“策马而走”^[90],顿时全军失去主帅,军心浮动,一片混乱,自相蹂践,死伤万人,使得大顺军全线溃败;最后是没有调兵遣将,有力地反击,当时北京还有四十万大军,如果指挥有方,集中兵力,寻清吴联军决战,有可能取得胜利。可是,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逃回北京后,急着筹办即位典礼,然后放弃北京,向西撤退导致最终失败。李自成犯了一系列战术上的错误则是战败的原因之三。

多尔袞率领清军入关,取得山海关大战的胜利后,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清朝、大顺和大西及南明三种政治势力鼎足的局面,在原有的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多尔袞为了击败对手,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立刻高高举起“除暴救民”、“复君父仇”的旗号,来巧妙地掩盖民族

矛盾,以此争取、笼络汉族官僚地主,扩大清统治的阶级基础,实行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坚决镇压农民起义军。他早在山海关大战胜利的当天,就对诸将旨谕:

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91]

翌日,多尔袞有意避开敏锐的满汉关系问题,特命汉人内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署名,向故明官民曰:

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92]

二十六日,多尔袞又令吴三桂以他的名义出示榜文:

平西亲王吴,为安抚残黎以救民生事:照得逆闯李自成戕主贼民,窥窃神器,滔天罪恶,罄竹难书。荷蒙大清朝垂念历世旧好,特命摄政王殿下大兴问罪之师,怀绥万邦,用跻和平之诚。仁声所播,义无拂命。第虑遐远之区讹传舛错,不特有辜大清敢暴安民之意,致安黎庶反受执迷殒身之祸。今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拥戴西洋大炮数百位,络绎南下,相应榜谕,以醒愚蒙。为此示仰一带地方官生军民人等,务期仰体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诚皈命,各安职业,共保身家,毋得执拗迷谬,自罹玉石俱焚之惨。^[93]

由于多尔袞利用汉人范文程、吴三桂宣传清的功绩及其政策,因此消除了许多汉族官僚地主的疑虑,把清军视为仁义之师,所以多尔袞率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反抗,“自山海以西各城堡文武将吏,皆争先奉表迎降”^[94]。二十五日,清军进抵抚宁,知县侯益光等献城投降。二十六日,师次昌黎县,知县徐可大等率官民迎降。二十七日,清军到达滦州,学正孙维宁等率众出迎归降。二十八日,师至开平卫,指挥陈任重等率部来降。二十九日,清军抵达玉田县,经历张彦、主簿王家春等率众投降。三十日,师抵公罗店,蓟州监军道李永昌、丰润县副将赵国祚等率众投诚。

五月二日,多尔衮领兵到达北京,“京内官民开门迎降”^[95],“都民处处屯聚以迎军兵,或持名帖来呈者有之,或门外瓶花焚香以迎者亦有之矣”^[96],“朝野一时欢然服从”^[97]。

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五月三日,宣布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剃发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有加恩养”^[98]。四日,下令军民为崇祯皇帝服丧三天,发丧安葬,并遣官祭明诸帝,以此安抚明官吏。这些措施,收到很好效果,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官僚士绅纷纷归降清朝。

此外,多尔衮仍以农民军为主要敌人。六月十八日,顺天巡按柳寅东献计说:“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99]这个建议,正符合清军总的战略意图,所以被多尔衮采纳,于是积极整编和扩充军队,准备向农民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就在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不到半个月,五月十五日麋集在江南的明朝官僚地主,扶植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这个弘光政权是以“讨贼复仇”^[100]为宗旨,叫嚣要地主阶级“戮力勦勦,助予敌忾”^[101],与农民军为敌。所以,多尔衮在海关打败李自成的农民军,进京后为崇祯帝发丧,照样录用故明大小官吏等行动,颇受他们的赞同和欢迎。因此,朱由崧认为,引导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是有功之臣,封他为蓟国公,赐银五万两,米十万石,以示嘉奖。以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一批大臣,企图联合清军共同镇压农民军,于是六月中旬,他给弘光帝上《请遣北使疏》,提出了“联清讨贼”的主张^[102]。

朱由崧接受了史可法的意见,派遣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等人,携带“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一万匹为酬夷之仪”。另赏吴三桂“银一万两、缎二千匹”^[103],北上与清议和。七月十八日出发,十月十二日到达北京,以割地、岁纳白银十万两等为条件,请求

清军不要南下,建议联合进攻农民军。此时清廷正集中兵力先消灭农民军,所以对弘光政权暂时采取不战不和的态度,因此把弘光使臣赶走,和谈破裂。

其实多尔袞对弘光政权的态度有个变化过程,大约在五六月份,对其竭力安抚,表示对他们在江南逢立“不汝禁”^[104],无意南进。但是到了七月份,因为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为清军占领,所以对弘光政权的看法和态度开始转变,这在七月二十七日多尔袞致史可法书说得十分清楚,就是要弘光归降。书称:

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界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梟獍。……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连连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事,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憚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羈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祿。……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105]。

史可法收到多尔袞来书后,于九月十五日给多尔袞回信,虽然表示坚决不投降,但是仍然希望双方联合灭“贼”。他说: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梟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

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106〕}

此时，多尔衮利用弘光朝君臣灭“贼”心切，集中力量进攻李自成的农民军，然后再转旆东征。所以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寄谕已率军南下的豫亲王多铎，改变进军方向，即“便道往征”^{〔107〕}，先解怀庆之危，再入陕西同农民军决战。顺治二年（1645）正月，多铎破潼关进攻西安，与此同时，英亲王阿济格和平西王吴三桂率军自陕北南进，将至西安。李自成畏惧清兵，退出西安，进入商洛地区。二月，多尔衮得知胜利捷报，命多铎把追歼李自成农民军的任务交给阿济格，自己仍遵前令趋往南京，征讨弘光政权。

这时弘光小朝廷腐朽透顶，朱由崧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军政大权控制在阉党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手中，他们打击异己，以权谋私。江南广大人民对弘光政权恨之入骨，许多人却对清政府“致望改革”^{〔108〕}。另外，原先一些北方明朝官吏投奔弘光政权，来此后大失所望，纷纷北上降清，例如王崇简、王熙父子等人。所以，清军南进比较顺利，四月二十五日，多铎率领清兵破扬州，史可法被擒遇害。五月十五日，清军占领南京，朱由崧逃至芜湖就擒，弘光政权灭亡。随之清军连下常州、苏州、太仓、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

由上可见，自清军入关到攻占南京，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摄政王多尔衮打着“除暴救民”、“复君父仇”的旗号，实行笼络汉族官僚地主，坚决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政策，以此来冲淡和掩盖满汉民族间的差异与矛盾。所以，这个时期满汉民族矛盾并不突出，社会矛盾仍是明末阶级矛盾的继续，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五月底，多尔衮收到多铎占领南京的捷报，又得知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被杀害的消息，因此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说：“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常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制度，是诚何心……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109〕}六月

十五日,他不顾许多汉官的反对,悍然颁布严行剃发令,宣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并且还规定,“复有为此事湊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110〕},真可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111〕},这种强迫剃发,是对汉族习俗的侵犯,无疑是野蛮的民族压迫。

列宁指出:“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112〕},“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113〕}。由于摄政王多尔袞强行剃发令,使原先大好形势发生了突变,剃发令激化了民族矛盾,爆发了遍及清统治区的反剃发斗争。多尔袞颁行“剃发令”,是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对清初社会影响非常深刻,产生了不好的社会效果,自此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客观上直接促使大顺军、大西军联明抗清,从而形成了全国抗清斗争高潮,这就推迟了清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正如徐鼐的《小腆纪年附考》所言:“剃发令下,而故臣遗老之遂命抗拒,劳王师者十有余岁。”^{〔114〕}直到康熙亲政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缓和了民族矛盾,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第二节 孝庄文皇后在清帝国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在各族妇女中,先后涌现出许多颇有作为的女杰,她们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明末清初生在蒙古、嫁到满洲的孝庄文皇后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她一生辅佐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三帝主政,对清王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起了重要作用,是一位胆识过人的女政治家。

一、孝庄文皇后——一位胆识过人的女政治家

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出生在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天命十年（1625）二月，这位才貌双全的少女，在其兄吴克善台吉的伴送下，从美丽辽阔的科尔沁草原，来到欣欣向荣的辽沈地区，嫁给后金汗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为妻。翌年八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病逝，皇太极继承汗位，崇德元年（1636）改号称帝时，封布木布泰为永福宫庄妃。她生三女一子，即皇四女固伦雍穆长公主、皇五女固伦淑慧长公主、皇七女固伦淑哲长公主、皇九子福临。由于她在后妃中聪明能干，深受皇太极宠爱。

庄妃自幼“无他玩好，而独嗜图史”^{〔115〕}，颇通治国之道。皇太极时期，她“赞助内政，越既有年”^{〔116〕}，“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117〕}。崇德七年（1642），清取得松锦大战的胜利，明在关外精锐丧尽，因此皇太极积极准备率领大军入关争夺天下，但是深感对关内的情况不了解，如同“瞽目”，急需“引路者”^{〔118〕}，认为松山被俘、关在沈阳三官庙的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是最好的人选，他既深知明廷，又熟悉农民军的情况。可是，皇太极得知洪承畴自被俘以后，“则延颈承刃，终始不屈”^{〔119〕}，绝食拒降，要求速死，以“感明帝之遇”^{〔120〕}。他认为明朝诸臣读书明理，其实这种报君恩是假，求好名声是真，所以并没有放弃对洪承畴的争取，先派汉官重臣范文程前去说降，继而又遣庄妃到三官庙去劝降，这就是野史记载和民间流传的“庄妃劝畴”，此举并非是施“美人计”的丑事，实则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恰恰说明皇太极对自己爱妃政治才能的充分信赖。庄妃当然深知皇太极收降洪承畴的意图，于是十分从容地来到三官庙。洪承畴见庄妃到来心中大惊，这意味着皇太极亲临说降。庄妃见到洪承畴并不卑视，却很尊重，称他为“先生”、“大人”^{〔121〕}，她很坦诚地分析了当时明清双方形势，指明走向，“反复喻以利

害”^{〔122〕}。同时，她对洪承畴绝食损身表示关心，用很亲切的语调说：“先生之志不可夺，我并不劝先生弃旧图新，可这样折磨自己，真叫人见了实在心疼”^{〔123〕}，随之命身边的女婢献上“人参汤”，以表同情。此时，“洪终闭目面壁泣不已，妃强劝之，亦不顾”^{〔124〕}，这位明朝身经百战的著名统帅，却在一名妇人面前哭泣不止，显然表明复杂的心态。庄妃一番刚柔相济的言词，洪承畴既有所思，又有所悟，深感皇太极是位有为之君，清朝必将大展宏图，当然也思念关内的亲人，等等。这些皆促使洪承畴“弃旧图新”，于是停止绝食，剃发归降，成为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的“引路人”。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清太宗皇太极患脑溢血突然身亡，因为他生前未立嗣子，所以“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125〕}。当时争夺皇位最激烈的在睿亲王多尔衮(太宗之弟)和肃亲王豪格(太宗长子)叔侄之间，两白旗贝勒大臣支持多尔衮，两黄旗贝勒大臣拥戴豪格，双方张弓挟矢，大有火并之势。这时善于谋略的庄妃，虽然沉浸在年轻丧夫的悲痛之中，仍不忘国事，看到了满族贵族内部出现的继续统危机，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清的前途，因此她为了清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挺身而出干预此事，设法使自己的儿子福临继承皇位，以此来平衡协调多尔衮与豪格双方的争夺，从而制止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于是她施展巧妙的政治手腕，笼络各方力量，特别是将多尔衮叫进宫来，施加压力，胁迫其子福临^{〔126〕}。在崇政殿诸王商讨立嗣会议上，有人提出要立豪格，可是他却虚假地表示谦让，“固辞退去”^{〔127〕}，而立于殿外的两黄旗大臣举行武荐，要求“立帝之子”^{〔128〕}，大贝勒代善表示赞同。除了豪格以外，显然包括福临。多尔衮见此情景，虽然有人“劝睿亲王即帝位”^{〔129〕}，但是他感到面对的形势不利，而庄妃会前要求立福临，正是摆脱眼前困境的惟一办法，于是对自己“即帝位”“犹豫未允”^{〔130〕}，采纳了庄妃的意见，表示同意“立帝之子”，既然豪格“固辞退去”，便提出要立年方六岁的福临为帝，所谓“八高

山(即固山)军后,吾与右真王(即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131]。这个折中方案,既尊重“立帝之子”的要求,又便于日后控制幼帝,因此,为双方贝勒大臣所接受,庄妃在这场继续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不仅阻止了满族贵族的内讧,而且使其子福临继承了皇位,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自己被尊为皇太后。

二、制衡摄政王多尔衮的策略

顺治元年(1644)清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的权势不断扩大,企图做皇帝的欲望也日益增加,为此他植党营私、打击异己、独专朝政,竟为自己建碑记绩,私自取大内信符贮入王府,停止御前跪拜礼,私制御用服饰等等,根本不把年幼的顺治帝放在眼里,以皇帝自居,因此,“大权在握,关内关外咸知睿王一人”。皇太后见多尔衮所作所为,认为“彼者肆然自帝,谁能禁之”^[132],深知他随时都可能发动政变,夺取皇位,这必然导致满族贵族内部的混乱和斗争,不利于清初的统一,于是她为了对付这种危急的形势,粉碎多尔衮夺位阴谋,保住儿子福临的皇位,采取以下策略:

一是韬晦之计。皇太后表面上对多尔衮准备夺位称帝的种种行径,皆无动于衷,置之不理,任其肆无忌惮。而幼帝福临在母后的授意下,“遨嬉狡狴,渔猎鄙事,无不为之”,因此多尔衮“安意无猜,得以善全”^[133]。这就起到了麻痹和延缓的作用。

二是屈尊下嫁。皇太后依照蒙族和满族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的习俗,下嫁多尔衮,正如明臣张煌言在《建夷宫词》一诗中所云:“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134]这是一桩政治婚姻,起到了控制和阻止的作用。

三是宣称皇父。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顺治帝“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135],而且

宣示中外,在给朝鲜“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136]。这就把多尔衮与福临从原有的“叔侄”变成“父子”关系,起到了约束和限制作用。

以上策略收到了好效果,多尔衮的皇帝梦始终未能实现,他犯病时,曾无可奈何地感叹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137]反映出—个失败者的心态。

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十三日,时值寒冬,多尔衮不顾身体负病,带领王公大臣往边外围猎,不慎从马上摔下受伤,经过简单治疗,又上马继续追猎,此时“度不自支”^[138],回到喀喇城。他见病情日益加重,感到不久于人世,但对夺位称帝未成,死不瞑目,就在这弥留之际,秘召其兄“英王(阿济格)语后事,外莫得闻”^[139]。但是从阿济格事后种种诡秘行动分析,是对摄政王权力的交接有所安排,因此他积极“计图摄政”^[140]。十二月九日,多尔衮病死,阿济格“即遣三百骑入京”,企图逼宫夺权,制造动乱。但被随猎的大学士刚林发现,“知其意,立策马行日夜驰七百里,先入京”,将此情急报皇太后和顺治帝。皇太后得知多尔衮已死,阿济格派兵入京逼宫,她沉着应战,“闭九门,遍告宗王、固山等为备,俄三百骑至,皆哀甲,尽收诛之,英王未知也”^[141]。然后“派兵役监英王至京”^[142],逮捕问罪,于是粉碎了阿济格的逼宫夺权的政变阴谋。

摄政王多尔衮死讯传到京城,满朝震惊,各有所思,人心浮动,谣言四起。皇太后为了稳住政局,特别要防止多尔衮的死党反上做乱,授意顺治帝下诏“臣民易服举丧”,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出东直门迎接灵柩,以“帝礼”厚葬^[143],追尊“义皇帝,庙号成宗”^[144]。至此,多尔衮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和地位,生前未能称君,死后却尊为帝,这显然是个高明的策略,使多尔衮的死党放心,不会因为他专权欺君,而罪及己身,所以没有闹事。顺治八年(1651)二月,议政大臣苏克萨哈上疏告发多尔衮生前“阴谋篡逆”^[145]等罪行。于是皇太后认为时机已到,彻底清算多尔衮的罪行,藉此清

除敌对势力。因此,顺治帝诏示中外,公布多尔衮的罪状,指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146]。并把多尔衮扶植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有的处死,有的监禁,有的贬革,从而巩固了福临的帝位。

多尔衮死后,解除了夺位的威胁,皇太后精心辅助其子福临主政。首先要求顺治帝努力学习汉族文化,精通治国安邦之术,同时下令把许多汉籍译成满文,供满族贵族阅读,从中吸取汉族统治经验;其次为了加速清初统一全国的进程,积极团结汉族的文官武将,使他们为清王朝效力。顺治十年(1653),她把在桂林战死的平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育之宫中,赐白金万两,岁俸视郡主”^[147]。同年,又把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和硕恪纯长公主嫁给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为妻;再次明末清初长期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她提倡节俭,曾多次把宫中节省银两赈济灾民,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她的深远谋略和政治才能,确实难能可贵。

顺治十六年(1659),南明永历朝廷平王郑成功率领十多万大军北伐,势如破竹,由舟山进入长江,攻占镇江,包围南京,收复江苏、安徽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江西、浙江等省州县也有举旗响应的,一时震动清廷。顺治帝对江南地区突然骤变的形势惊惶失措,束手无策,一会儿要逃往关外,一会儿又率军亲征,皆遭到母后的反对和斥责,据《汤若望传》记载:“当这个噩耗传到北京,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样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他一听皇太后的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照这样他要对待一切人们的,只要他们对于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词来平复皇帝底暴躁。”^[148]最终顺治帝还是放弃亲征,遵照母后

的旨意,派兵南下,传旨驻守南京的江南总督郎廷佐坚守南京,最后清军取得南京之战的胜利,收复江南失地,进逼金、厦。所以顺治帝曾说:“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兹育是依。”^[149]皇太后的精心辅佐,帮助其子顺治帝在清初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但是,皇太后和顺治帝母子之间在“立后”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前者出于国家社稷,后者重于个人感情。自太祖、太宗开国创业以来,把与蒙古“姻盟”视为团结蒙古各部、增强国力的重要政治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来自蒙古科尔沁部的皇太后深有体会,因此她为顺治帝两次“立后”皆出于此种政治目的。第一次立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为后,不久顺治帝认为志意不协,传旨废后,虽然皇太后不同意,但是看到儿子执意要废,也就不强求了,于是将皇后废为静妃,改居侧宫。第二次立蒙古科尔沁部贝勒绰尔济之女为后,顺治帝仍不满意,又要废后,却遭到母后的反对,未能废成。后来皇太后得知,顺治帝已有意中人,则是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她理解儿子的个人感情,便把董鄂氏召入宫内立为贤妃。但顺治帝要立董鄂氏为后,所以再次提出废后,这次不仅母亲反对,而且通情达理的董鄂妃也不同意,于是只好做罢。

年轻的顺治帝,崇尚佛事,喜好参禅,取法名“行痴”,面对繁忙的国事,却经常与僧人交往。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妃病逝,顺治帝似乎失去了一切,“寻死觅活”^[150],不能自拔,把国家社稷置于脑后,企图净发为僧,步入空门。皇太后对此坚决反对,出面阻止,虽然顺治帝削发为僧的荒唐行径未能得逞,但是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四,顺治帝身患“病痘”(即天花),卧床不起,高烧不止,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此时皇太后不能不考虑其子身后之事,便授意翰林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151],反映了

她的思想和意向,遗诏内容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1. 明谕立嗣。皇太后接受太宗未立嗣子的教训,避免继续斗争重演,另外又考虑到顺治帝患“痘症”早逝,福临的长子纽组已死,次子福全未出痘,三子玄烨已出痘,于是遗诏曰:“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

2. 异姓辅政。皇太后想到新帝年幼,须有重臣辅政,可是又忆起顺治初年,宗室多尔袞辅政期间的种种弊病,故决定选择非宗室大臣辅政,以便控制,更为效忠。故遗诏“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荃,保翊冲主,佐理政务”。

3. 安抚满贵。皇太后深知,清初开国之时,以策略用人,重用大批汉官,满族贵族不满,为了安抚他们,在遗诏十四条罪己状中,有三条是向满族贵族罪己的,诏曰:“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之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152],以此来增强和巩固满族贵族内部的团结。

七日,顺治帝病逝,将遗诏“布告天下,咸使闻知”^[153],使得顺康政权交接平稳过渡,对当时政局的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辅佐幼孙康熙

玄烨即帝位,年号康熙,尊祖母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对年仅八岁的康熙帝十分喜爱,她为了大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培养孙子成为一代英主,一面加强教育,使他读书明理,提高以国事为重的个人素质,一面通过具体政务,增强他治国安邦的能力。康熙帝曾充满感激之情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154]可见,太皇太后对康熙的影响是很深刻

的。

顺治帝死后,太皇太后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人物。所以安徽桐城的秀才周南,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请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这种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请求,遭到她的严词拒绝。但是她全力辅助康熙主政,教导康熙说:“祖宗骑射,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155]虽然“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156],因此许多重大政务的处理与她的意旨是分不开的。

康熙初年,太皇太后所信赖的四辅政大臣之一鳌拜,是个权力欲者,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广植死党,排除异己,“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文武各官,尽出伊门”^[157],对年幼的康熙帝很不尊重,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有时竟在康熙帝面前大发雷霆,甚至还想杀害康熙帝,篡位夺权。太皇太后对鳌拜的罪恶行径十分痛恨,决心除掉鳌拜集团,以保清政权的稳固,但是不能打草惊蛇,使其有所防备。祖孙二人秘商后,据《竹叶亭杂记》记载:“帝在内日选小内监强有力者,令之习布库(摔跤)以为戏。鳌拜或入奏事不之避也,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内,帝令布库擒之,十数小儿立执鳌拜,遂伏诛,以权势薰灼之鳌拜,乃执于十数小儿之手,始知帝用心,特使权奸不觉耳”^[158],随之逮捕惩处了鳌拜的死党。这种“声色不动而除巨慝,信难能也”^[159],由此可见太皇太后的胆识和谋略,不用一兵一卒,就把鳌拜清除了,为康熙帝亲自主政铺平了道路。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叛乱爆发,南北震荡,四方响应,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年已花甲的太皇太后非常关心,她根据战局的变化,不断向康熙面授机宜,于是康熙帝“料理军务日昃不遑,恃心坚定”^[160]。太皇太后为了取得平叛的胜利,鼓励清军英勇作战,多次散发宫中金帛加犒。十四年(1675),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三藩叛乱,清军劲旅大批南下,无力北顾之机,兴兵作乱,使得清

王朝南北受敌,严重威胁着京师的安全,“圣祖忧之”^[161]。早在布尔尼叛乱之前,康熙帝就获悉他们撙治兵器,企图谋反,便和祖母商讨对策,太皇太后认为“事尚未露,不便遽加之兵”,避免激而生变,逆焰早燃,“当先遣人往召,以征其虚实”,想在京师的殿堂上将布尔尼捉拿问罪。但是又怕布尔尼“生疑”,故派侍卫色冷等人前往,除了召见布尔尼兄弟外,还召见巴林王鄂齐耳兄弟、翁牛忒王杜冷兄弟来京议事。可是布尔尼预感到叛乱阴谋可能已为清廷发觉,因此“诸王俱至,布尔尼兄弟不来”。三月十七日,布尔尼“执奉使侍卫色冷”^[162],公开打起反清旗号,发动武装叛乱。

康熙帝得知布尔尼已发动叛乱,遂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前往镇压叛乱。太皇太后平日对廷臣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比较了解,她向康熙帝建议派遣都统大学士图海统兵前往平叛,认为“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康熙帝采纳祖母的建议,“立召公(即图海),授以将印”。因为“时诸禁旅皆南征,宿卫尽空”,虽然有将,而无兵可派,图海“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者,得数十万人”,把他们编成部队,开赴辽西镇压布尔尼叛乱。图海“率众夜围其穹庐,察哈尔部长布鲁克(即布尔尼)不及备,仓促御敌”^[163],大败而逃,清军追歼,不久布尔尼战败被杀,叛乱平息,由此可见太皇太后的知人善任。平定布尔尼叛乱,解除了京师危机,摆脱了南北夹击的困境,从而集中全力镇压三藩之乱,最后取得了胜利。清廷平定三藩之乱经历了八年,其间太皇太后做出了重要贡献,康熙帝说:“臣只遵懿训,绥靖寰区,叛逆削平。”^[164]因此,他要为祖母上尊号,太皇太后再三谦逊地推辞,相反要为康熙帝上尊号,提高他的威望,故谕曰:“自叛逆削平,海宇宁谧,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165]可见祖母对孙儿的深爱和厚望。

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二十八日,太皇太后“突然中风”,“据大夫等曰:虽右侧痛,言不清,但脉好,断无妨”^[166],没有生命

危险。二十六年九月，她旧病复发，十一月病情加重。康熙帝见祖母病危，除了命御医诊脉治疗外，自己昼夜不离左右，精心侍奉，可是祖母“病体依然，五内焦灼，莫知所措”^[167]。太皇太后虽在弥留之际，仍关心国家政务，遗诏曰：“中外文武群臣，恪恭奉职，勿负委任”，“其丧制，悉遵典礼，成服后三日，皇帝即行听政。”^[168]十二月二十五日，太皇太后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康熙帝见祖母离别人世，“擗踊哀号，呼天抢地，哭无停声”^[169]，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

康熙帝对祖母的感情是很深的，他赞颂祖母的功绩说：“昔奉我皇祖太宗文皇帝赞宣内政，诞育我皇考世祖章皇帝顾劬劳，受无疆休，大一统业。暨朕践祚方在冲龄，仰荷我圣祖母训诲恩勤，以至成立。”^[170]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孝庄文皇后把一生献给了清朝开国和统一大业，培养出康熙这位我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著名帝王，她无愧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

第三节 清初杰出的汉族政治家范文程

范文程是清初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清朝著名的开国功臣之一。他一生经历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供职四十余年，对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有很大贡献。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沈阳抚顺所人，隶汉军镶黄旗。他出生在一个汉族仕宦家庭，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裔。六世祖范岳于明洪武年间曾任湖北云梦县丞，因坐罪全家由江西乐平谪往辽东沈阳卫。曾祖范镡，明正德十二年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他为人亢直，因与权臣严嵩相忤去职。祖父范沈，为明沈阳卫指挥同知。父亲范楠，是个穷困未仕的知识分子。范文程生长在几度受挫而已破落的封建官僚世家中，这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范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171〕}，从小就受到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热衷科名，十八岁便成为沈阳县学生员。范文程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明末社会剧烈大动荡的年代，他的家乡抚顺所，就在明朝和后金的接壤处。范文程亲眼目睹明王朝统治下的广大地区，被蹂躏得饿殍遍地，满目荒凉，社会矛盾极为尖锐，正孕育着一场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与此同时，范文程也密切注视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日益兴起的满族，他们在其领袖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反抗明王朝的民族压迫，发展社会经济，统一女真诸部，建立后金政权，从而成为与明中央政权相对抗的强大的地方势力。富于真知灼见的范文程，面对这种局势，已经敏锐地预感到明朝行将溃灭，自己想要由科举而做官的路子断绝了，于是开始探索新的出路。

天命三年(1618)四月，当后金汗努尔哈赤攻占抚顺时，范文程毅然亲赴汗宫，自投效力。努尔哈赤“见而器之，召与语”^{〔172〕}，“询知其家身世，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173〕}，“诸王世子竞加优礼”^{〔174〕}。努尔哈赤“知其熟于当世之务，使随行”^{〔175〕}，“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所在行营，必参帷幄”^{〔176〕}，开始显露出他的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病逝，诸王贝勒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由于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许多政策失误，因而加剧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满族贵族内部矛盾，致使经济停滞，人民厌战，社会动乱不宁。皇太极当政后，深感要加强和巩固后金政权，必须根据社会实际状况，大胆实行改革。皇太极认为有必要从明朝那里学习适合自己需要的统治手段与治国方法。但是这种学习对于满族贵族来说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办到的，所以皇太极在不损害后金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发挥归降的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使之成为身边出谋献策的智囊团。

范文程正是这个智囊团中的重要成员，在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等一系列的改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皇太极非常赏识和无比信赖的近臣。天聪三年(1629)四月,皇太极“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躬之得失”^[177],故分置文馆,命范文程参予文馆事务。崇德元年(1636)五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负责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并录各衙门奏疏及词状,“所典皆机密事”^[178],“每议大政,太宗必曰:‘范某知否?’公或未与议,则曰:‘何不与范某议之?’公尝以病出直,诸务填委,待公病已决之”^[179]。范文程果然不负厚望,他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破旅顺、收平岛、讨朝鲜、抚定蒙古,文程皆与谋”^[180]。尤其是“先后以计诛明总兵毛文龙、经略袁崇焕”^[181],这不仅为皇太极除去了两名宿敌,也瓦解了明军在辽东布置的钳形包围圈,为清军入关扫清了道路。范文程的功绩主要不是军事活动,而是他主张改革,促进后金封建化,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君权

随着努尔哈赤的兴起,后金政权内部形成一个包括同姓亲贵和异姓勋臣的权贵集团,他们的权势直接影响到国君的利益,于是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与斗争。范文程认为权贵的私欲关系到后金的存亡。为了限制和约束骄纵不法的权贵,他上疏“请置言官”^[182]。皇太极接受了他的建议,于崇德元年(1636)设立了都察院,该院官员代表国家行使监察之权,“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侵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183]。可见,这是鼓励言官参劾违法的权贵,以加强君权。

另外,努尔哈赤晚年没有立嗣子,为了协调诸王之间争夺权利的斗争,实行八和硕贝勒共同主政。皇太极嗣位之初,“凡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184],而且还“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185],所得人口和财物也由八旗平分,所谓“有人必八家分养,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

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因此“贝勒事事掣肘”,皇太极“虽有一汗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186]。范文程反对这种有碍于君主集权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制,他积极帮助和支持皇太极采取各种办法来削弱诸王的权势。天聪九年(1635)十二月,当皇太极和他商量是否上尊号时,范文程回答说:“人从天象而行,哪有天特意告诉汗受尊号的道理呢?获得玉玺的事,各处的国归附的事,人心归顺的事,那本来就是天意。今汗顺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适当。”^[187]皇太极听从了他的意见,于第二年四月,接受群臣上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定国号为清。从此结束了八和硕贝勒共同主政的涣散分权的局面,而把国家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

2. 招揽人才

范文程认为“天下治安,惟在得贤”^[188]。他采取各种办法为后金收罗人才。首先是开科取士。崇德六年(1641)六月,范文程“奏请于满汉蒙内考取生员举人”,皇太极命他负责“考校”^[189]。所有录取之士,皆充实到后金各级机构中去。福格的《听雨丛谈》记载:“取士之初,人数虽少,而名臣多出其中”^[190]。

其次是严格荐举。由于后金随着对明战争的胜利,有大批的汉官汉将归降,他们往往通过荐擢之途,得到新的官职。范文程深知其中的弊病,他向皇太极疏言:“然汗意以为知汉人者仍须汉人,故欲汉人各举所知,为国家效用。谁意世倍之辈,竟藉此为党援之门!或以狙佞推其狙佞,或以游民推其游民,贪杯者即举朋饮,好赌者即举赌友;又有意在朋比,故参一二优者于其中以饰人耳目;甚或昵于亲故,迫于嘱托,明知其人非贤,不得不以过情之词谬为夸许。独不思皇上拊髀而思者谓何?今乃妄举若此也。……遂将皇上一番收罗豪杰之美政,翻为宵小倖进之阶梯,目前皇上考选之时,须斟酌收用,若不如此,恐于国计民生,关系不小。”范文程提出,“今我国举人之法,虽不肯照古昔连坐,亦当少仪惩罚”^[191],以

防止官场里结党营私。

再次是积极招降。范文程一贯反对屠城掠物,焚烧滥杀,这除了使黎民百姓少受损失外,就是要从敌方营垒中吸收有用人才。他知道争取明朝有影响的将领归降,对瓦解敌人,加速自己胜利的重要作用。例如他谕降祖大寿、孔有德等人。尤其是崇德七年(1642)二月,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在松山被俘后,开始不愿投降,可是范文程“以善言抚之,因与谈论今古事”,解除洪的思想顾虑。他们在交谈中,“时有梁间积尘落洪襟袖间,洪屡拂拭之,文肃遽辞归,奏文皇曰:‘承畴不死矣!其敝衣犹爱惜若比,况其身邪?’后文襄果降,如公所料”^[192]。洪承畴、祖大寿、孔有德等人,以后都是入关建立清王朝的重要引路人。

3. 整顿部院

天聪五年(1631)七月,后金按照明朝官制始设六部;崇德元年(1636)五月增设都察院;崇德三年(1638)六月,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称之六部二院,或谓部院八衙门。六部设置之初,每部以贝勒一人领其事,并设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参政八员。两院初设时,也有承政三四员,其余皆为参政,官止二等。这种设官办法,致使职掌混乱,矛盾重重。以六部而论,各部承政既要接受贝勒的领导,又要向汗负责,有时无所适从;再加上每部同有几名承政,他们之间有利互相争夺,遇事相互推诿,“只知为身为家,而不尽心为国;只知图名图利,而不替汗办事”^[193]。为改变这种机能失灵的状况,崇德三年(1638)七月,范文程“奏请每衙门止宜设满洲承政一员,以下酌量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共为五等”。皇太极“可其奏”,并派范文程协助睿亲王多尔衮主持“更定八衙门”^[194]。部院经过整顿改革,“各设承政一员,参政二员,停王贝勒领部院事”^[195]。

以上范文程的各项建议,皆符合后金发展的需要,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对后金封建化起了重要作用。所谓“佐清成帝业,皆文

程策也”^[196]，此话虽有些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

自后金兴起以后，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祖孙三代都把进取中原、建立全国政权作为总的战略方针。范文程就是这个方针的主要制定者。天聪六年(1632)六月，皇太极“询廷臣代明之策”，范文程说：“我军如欲深入，当乘其无备，一抵北京，讯其和否，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壮军威。计所从入惟雁门关为便，并谕沿路军民，俟版图归我，酌免赋税，示爱养意。”^[197]皇太极接受了他的意见，不断派兵入关，直趋北京城下，打着议和的旗号，观察明的虚实，破坏京畿一带的生产，以削弱明的力量。

到了崇德七年(1642)，关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自从清军取得松锦大决战的胜利，夺取明朝政权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所以，皇太极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198]可是就在此时，关内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即将推翻明王朝，这便打乱了清军入关灭明的计划，迫使皇太极不得不暂时改变策略，企图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夺取明朝政权。他命贝勒阿巴泰领兵入关，寻找农民起义军，谕曰：“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199]清军在关内逗留数月，未能和农民军建立起联系。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死后，福临即位，仍然推行以上战略方针。顺治元年(1644)正月，福临致书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将领说：“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200]结果企盼多日，杳无音信。

范文程见此情况，并分析了来自关内的探报，认为联合已经无

望,清的主要敌人变了,不是明王朝,而是农民军。顺治元年(1644)四月四日,范文程启摄政王多尔衮曰:“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貽悔将来者亦此时”。他还具体提出进取中原的两点方略,其一对明朝官吏,“拔其德誉素著者得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其二“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201]。

四月九日,摄政王多尔衮即统率大军,出师中原。十一日,师次于辽河时,多尔衮得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王朝被推翻了。十五日,清军进抵翁后(辽宁阜新境内)时,收到明退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来书,他以“财帛”和“裂土”为代价乞求清“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202]。多尔衮立刻召见范文程等人商讨对策,范文程说:“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乎”,“好生者天下之德也……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并提出要“申明纪律,妄杀者罪”^[203]。十六日,多尔衮复吴三桂书说:“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204]二十二日,清军在山海关战败农民军,范文程奉命草檄宣谕:“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205]在这入关的关键时刻,范文程高高举起“复君父仇”的旗号,巧妙地掩盖了民族矛盾,起到了化敌为友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清军入关后一路上所到迎降,几乎无一反抗。四月三十日李自成农民军主动退出,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未发一矢进入北京。

清军占领北京,标志着清王朝全国政权的确立。如何巩固这个政权,是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新问题。此时摄政王多尔衮忙于军事,而政务则由范文程负责,他“每日坐午门右决事”^[206],大

小事情“咸公综理之”^[207]。范文程积极推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其办法有的是从辽东移植过来的,有的是根据关内情况制定的。自“师入燕京,首为故明庄烈愍皇帝发丧,易梓宫,备仪卫,公亲经纪其事。……安抚悯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征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收其册籍”^[208],取消明朝三饷加派,田赋以万历旧额为准,“岁减数百万两,民赖以苏”^[209]。

是年六月,为避免清军南北两线作战,范文程为摄政王多尔衮代书致南明史可法的信中说,大清江山“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并提出“同以讨贼为心”,不然“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旌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攻打南明。要求史可法“取舍从速,应早审决”,“南国安危,在此一举”^[210]。

九月十五日,史可法给多尔衮复信曰:“今逆贼自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之头,以泄天敷之愤。”^[211]表示南明愿与清联合镇压农民军,自然也就无意北上抗清了。十月二十五日,清廷乘此机会,命原来已率师南下伐明的豫亲王多铎,先“便道往征”陕西,同英亲王阿济格统领的由陕北南进的清军,合击李自成的农民军,结果农民军败退湖北,李自成在九宫山不幸牺牲。

顺治二年(1645)十月,当范文程看到中原广大地区基本上已为清军占领,早先追求仕途的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无望,因此他效法关外“首请开课取士,以收人才”^[212]。清廷命他主持了丙戌、丁亥、己丑三次会试,“得人最盛”^[213],南北中试者共计一千一百人^[214]。除了推行科举制外,他还要求扩大荐举制,以便更多地收罗人才。顺治十年(1653),范文程“请敕部院三品以上大臣,

各举所知,毋问满汉新旧,毋泥官秩高下,毋避亲疏恩怨,举惟其才”^[215]。这两项收罗人才的政策,不但扩大了清王朝的阶级基础,而且也削弱了抗清力量。

范文程还针对顺治初年钱粮匮乏、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提出兴屯田法。清廷采纳他的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垦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综观上述,范文程是首计入关的功臣、举创百度的元勋,所谓“有清一代开国规制多其所手订者”^[216]。康熙五年(1666)他病逝以后,清廷给他极高的荣誉,康熙称他为“国家之懋典”^[217],并亲笔书写“元辅高风”^[218]四字额其祠。当然,范文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清朝统治阶级服务的,其镇压农民军更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里,看其主流,范文程在清初由乱到治的过程中,始终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进行多方面的调整 and 改革,有利于促成国家走向统一。从这一点说,范文程的历史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第四节 清王朝与大顺政权的战争

明朝末年,政治极端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明王朝的统治已经走过了兴旺发达的时期,而步入了日薄西山的黄昏。关外满族崛起,创建大清,关内爆发农民起义,建立大顺,如同两柄利剑刺向明朝心脏,当明王朝被推翻后,大清、大顺以武力对阵,中原逐鹿,谁能取胜呢?古人云:“兵欲胜敌,谋贵素定,而战胜可必”^[219]。这里通过清顺战争,考察两军统帅多尔衮和李自成各自的谋略,集中表现在战略的制定及策略的应用两方面,从而分析出清胜顺败的战争哲理。

一、闯王灭明和关城之战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以破竹之势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当时大顺占有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甘肃广大地区,拥有五十余万大军,形势大好,正处在一个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性变化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退居次要的地位,相反各支政治势力争夺天下的欲望和斗争更加激烈,因此军事战略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李自成在北京对关外正积极要求进取中原的大清情况不明,对江南未曾遭农民军沉重打击,积怨又深的故明势力误认为传檄可定,所以没有能审时度势,制定一个知彼知己,力求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虽然采取某些措施,却犯了严重错误,最突出的是“追赃助饷”。这种办法,一是面广,打击的对象包括故明“勋戚”^[220]、“在京各官”^[221]、“缙绅”^[222]、“富商居民”^[223],甚至“满街遍捉士大夫拘系,行路之人如汤鸡在锅”^[224],人人自危;二是饷巨,“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225];三是刑酷,“刑有炮烙,有脑箝者,有夹棍,有火尺,大抵夹者居多”^[226]。当时用夹棍五千副,“有夹于(刘)宗敏处者,有夹于各营后处官者,有夹于监押健儿处者,有夹于勋戚各官之家者,有夹于路次者,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施刑”^[227]。仅刘宗敏一处,“极刑追逼,死者千余人”^[228]。“追赃助饷”之策,首先给大顺战略上带来不利影响,从过去积极进取,转而消极退缩。四月十一日,李自成命将“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一饼……凡数万饼”,运回陕西,并说:“陕吾父母国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岂易一西安乎?”^[229]此言毫无战略远见,企图回陕西家乡过安乐的生活,于是导致官兵聚积金银,思乡厌战,有些“马厮、炊丁亦人怀重宝,皆有归志”^[230]。其次就策略而

言,李自成作为大顺开国之主,应以策略用人为先,何况自己身边谋臣无几,然而他入北京后的第五天,认为故明翰林富有,“凡翰林官无论新旧,皆派饷万金以上,诸人之多被刑拷,实由此也”^[231]。随之在北京大肆“追赃助饷”,“拷掠”的腥风刮遍全城,一些读书明理、治国有方的谋士,有的惨死,有的自杀,有的复反,有的隐匿,有的外逃,有的降清,有的投明。大顺在京未能扩大社会基础,增强武装力量,确实有策略上的重大失误。

李自成进京前,三月十五日在居庸关派遣新降的明定西伯唐通往山海关,招降明平西伯吴三桂,唐通“遗书三桂,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但是“三桂不答”^[232]。李自成入京后,又命巡抚李甲、兵备道陈乙,“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233]。吴三桂权衡得失,“忻然受命”^[234],决定归降大顺。他率领部众进京朝见李自成,山海关交给唐通等人驻守。四月五日,吴三桂行至永平西沙河驿,见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问及家中情况,“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235],“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236]又得知爱妾陈圆圆已为刘宗敏抢占,深感奇耻大辱,“乃大怒”^[237],“投袂起曰: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刘宗敏),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238],并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239],真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240]。于是吴三桂“忿而中改”^[241],八日回军进攻山海关大顺军,“袭杀其守关兵殆尽,贼师负伤遁归”^[242],唐通败逃。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后,下令斩“李甲头祭旗,割去陈乙两耳纵之”^[243],以示坚决与大顺为敌。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出齐化门直指山海关。吴三桂“见自成势大,难与争锋”^[244],许多部将也“以众寡不敌为虑,有进乞师策者”^[245]。因此,他与谋士方献廷商量,问献廷:“敌众我寡,计将安出?”献廷曰:“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246]于是吴三桂命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为使臣,致书清摄政王多尔衮,请兵援助。

清崇德七年(1642)春,清太宗皇太极取得了松锦大战的胜利,

明朝在关外精锐丧失已尽,再无力抵抗清军,他本想乘胜入关灭明,可是闻知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大地,规模之大,威力之强,都是空前的,于是企图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十月十四日,皇太极特命贝勒阿巴泰、内大臣图格等人率军入关,观察动向,联络农民军,行前面谕:“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247]然而阿巴泰此行未能如愿。第二年八月九日,皇太极病逝,其子年方六岁的福临继位,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袞二人共同辅助幼帝,实则多尔袞摄政,掌握军政大权。多尔袞足智多谋,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战略策略,他继承了其兄皇太极欲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建立金国政权的战略方针。顺治元年(1644)一月二十七日,派遣迟起龙、繆尚义等人为使者,以顺治帝的名义给大顺农民军将领致书,书曰:“朕与公军,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勿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名,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248]此书送到大顺军镇守榆林的将领王良智手里时,李自成已率军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了,李自成得到王良智的报告,未能从战略的角度,派人携书前往关外,探明大清虚实,采取对策,可是他对清“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建议不予理睬,此乃策略上的一大失误,从而促使清由联合转为敌对,战略策略的变化。

多尔袞待多日,未见农民军一字回音,心中已有所思。四月四日,清的重要谋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袞启奏,建议改变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的战略方针,认为当时清的主要敌人不是明王朝,而是农民军,奏曰:“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蠹兹流孽,亦将进而

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愧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249] 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战略上由联合农民军灭明，转而以农民军为敌，于是九日，他率领八旗大军向关内进发，行至辽河，得知李自成的大顺军已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王朝被推翻，此时多尔衮征求熟知关内和农民军情况的洪承畴意见，洪承畴向多尔衮奏称：“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司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流寇）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輜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愧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250] 多尔衮见后受到很大鼓舞，决定由内蒙入关，攻打北京。

四月十五日，多尔衮师抵翁后（辽宁阜新境内），遇见吴三桂派遣的使臣杨坤、郭云龙。他们献上吴三桂向多尔衮求援书，书曰：“……三桂受国厚恩，悯其民之罹难，拒守之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关等处）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251] 多尔衮认为吴三桂请兵求援，入关攻打农民军，夺取北京城，这是符合清战略方针的，并和此次出征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大喜许诺”^[252]。但是，明朝已经灭亡，吴三桂来书未降清称臣，却以明朝官员的身份称清为北国，“泣血求助”是向清借兵，极为不满。所以十六日，多尔衮给吴三桂复书，虽同意出兵援助，但要他降清，书曰：“……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

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得，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253]

二十一日晨，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到达山海关，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军对阵，并命唐通率领一支人马，从九门口“北出而东守外城，以困截之”^[254]，采取关内外夹击战术。初战吴军大败，退入关城，陷入大顺军的包围之中。多尔袞对吴三桂胸怀戒心，未从中协西协进关，而从义州（辽宁义县）南下，日夜兼程，此日下午抵达关门外十五里处的欢喜岭停兵不前，“高张旗帜，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营见之”^[255]。这时得到“吴三桂哨骑来报，贼已出边立营”^[256]。多尔袞派兵进击，唐通战败，退入长城内。大顺军攻打关城，吴三桂度势不支，急待清军速援，“三桂复遣使往请，九王（多尔袞）犹未信，请之者三，九王始信，而兵犹未即行”^[257]，显然是多尔袞对吴三桂施加压力，迫使他投降。吴三桂心急如焚，“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258]。十二日早晨，多尔袞移师至关城镇东门外二里的威远集，“三桂知清兵已在关外，遂突围出外城，驰入清壁中见九王，称臣，遂剃其首，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259]。此时得到探报，北翼城部分吴兵哗变，投奔大顺军，多尔袞命吴三桂先行，并说：“尔回可令尔兵各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260]吴三桂回城后，在关门上竖白旗，他“率诸将十数员，甲数百骑出城迎降，九王受拜礼于阵中，进兵城中。”^[261]英都王阿济格等率左翼入北水门，豫郡王多铎等率右翼入南水门，清军皆秘密入城，隐蔽在关城之下。多尔袞对大顺军高度警惕，告诫众将“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大顺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可成”^[262]。他胸有成竹，乘敌无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命吴三桂为先锋，以吸引大顺军主力。

这时李自成不知道清军已到达山海关,准备参战。他认为关城易守难攻,便把攻城的大顺军撤到石河西岸,自北山横亘至海一字摆开,作战时可以首尾相顾,诱吴三桂出城来战,可一举歼灭。哪知多尔袞暗中观阵,知其意图,采取相应的破阵对策,他说:“我兵可向海对贼阵尾,鳞次布列,吴三桂兵,分列右翼之末。”^[263]随后吴三桂率军首先出战,他心中明白,此战只能胜不能败,故以死求生,与大顺军战于龙王庙和谭家颇罗地区,战斗非常激烈,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自成、宗敏知边兵劲,成败决一战,驱众死斗。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奋南击,杀贼数千。贼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兵寡,三面围之。……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紫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264]可见,吴三桂已陷入重围,面临溃败的危险。多尔袞在顺吴两军“战初合,满兵蓄锐不发,苦战至日昃,三桂军几不支”^[265],此刻他看到突击大顺军的时机已到,立即命阿济格、多铎等统领两白旗,“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腾跃摧陷”^[266]。战局立刻发生了变化,大顺军却在清军和吴兵的包围与夹击中,战斗非常残酷,“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骑贼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城东海口,尽为斩杀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几矣”^[267]。

当时李自成骑马按辔于高岗点将台指挥战斗,突然“见白旗一军,绕出三桂右,万马奔腾,不可止”,不知从天而降的白旗军为兵,“自成麾后军益进”^[268],准备火速驰援。他身边有一僧人曰:“此非吴兵,必东兵也,宜急避之。”^[269]李自成听说白旗军是清军,十分畏惧,便弃军策马而走。大顺军“见白标(旗)军,如风发潮涌,所到之处无不披靡,于是贼遁”^[270]。仍有一部分大顺军坚持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在红瓦店为清军所败,勇冠三军的刘宗敏“亦中流矢,负重伤而回”^[271]。

大顺军战败后,向北京溃退,清军尾随追击。李自成没有调兵

增援,组织反攻,二十五日,却“先遣人入京,令礼政府榜示各官,速备登极仪物”^[272]，“毋致临期失误”^[273]。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对丞相牛金星说:“北兵势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岂可久屯在此?即十北京,不致一秦中险固,为今之策,不若退处关西,以图坚守。”^[274]因此,二十九日,他在武英殿仓促登极称帝,三十日凌晨,便率部离京西去。

山海关之战,以清胜顺败而告终。这战对清来说,可谓“定鼎燕都,一统之基实始于石河一战”^[275],自此“期年之间南北浑浑”^[276]。对大顺而言,则一蹶不振,由胜转变,开始走上失败的道路。

二、清方的战略和攻克西安

顺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多尔袞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清朝、大顺和大西以及南明三种政治势力鼎足的局面,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多尔袞面对新形势,为了战胜对手,统一全国,首要任务是巩固京畿,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 吊民伐罪。多尔袞多次向关内官民谕示,过去明清虽为敌国,如今明朝已被大顺推翻,崇祯帝饮恨自杀,“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277]，“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反轍”^[278]。他化敌为友,以大顺为敌,争取故明的官民拥护。

2. 追击闯王。四月三十日,多尔袞师次公罗店,得知大顺军弃京西撤,即命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和吴三桂等人,率军“兼程追贼,勿入京”^[279]。大顺军一败保定,二败庆都,三败定州清水铺,沿途几员大将被杀,数万士卒逃亡。五月四日,李自成至真定,他“耻于累败,贼党渐携,忿之,自勒精骑还击三桂,关兵、清翼张以进,杀大将三人,斩万余级,自成大败走”。次日,李自成合兵复战,

“贼殊死斗，三桂益奋，贼渐却，关兵射自成中之，坠马走还营，创甚”^[280]。于是拔营西走，经井陉，度故关，入山西。十二日，清军进抵故关，停止追击，返回北京，大顺军遭到沉重打击，使其无力北上反攻。

3. 严明军纪。多尔衮在入关当天，就告诫清军官兵曰：“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281]因此，“满兵入关，法令甚严，俱驻城上，附近居民有馈酒食者，皆不敢受”^[282]，却“于道旁埋锅而爨，无辄入民家者，民或往观，弗之禁”^[283]。“所食物，黑碎而干，以少水吞之，便度一日。”^[284]这种良好的军纪，颇得民心。

4. 安抚明臣。五月三日，多尔衮宣布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285]。四日，多尔衮令臣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他说：“予与明朝虽为敌，殊切痛惋，特令举国挂孝三日，以尽君父之情。以令太常、礼部等衙门，尊以天子之礼，葬于原拟之坟。”“于是各官奉令，自初六日始，设先帝后位于帝王庙，合享臣民哭临三日。”^[286]这就消除许多故明官员的疑虑，纷纷归降，甚至已经南奔的又返回北京降清。

5. 镇压反抗。当时三河县、昌平州、红西口及天津等地农民发动反清斗争。五月五日，多尔衮令三河“县官加意防缉”，并晓谕抗清农民“各安生业”^[287]。六日，命固山额真巴颜、石廷柱等率军前往昌平州进行讨伐。十日，遣固山额真李国翰、刘之源统兵征剿红西口。十二日，派固山额真金砺、梅勒章京李率泰前去“安抚天津等处乱民”^[288]。这些地区的抗清斗争，很快被平息。

多尔衮推行的这些政策和措施，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稳定了京畿。他在此基础上，以图进取，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早日击败敌对势力，做出了迁都北京的重要决策。六月十一日，多尔衮向在沈

阳的顺治帝奏曰：“臣再三思维，燕京势踞中原，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界，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有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若皇上不蒙天界，则有失天下之民，伏祈皇上熟虑。”^[289]顺治帝同意迁都北京，战略目的是“以定天下”。二十日，顺天府等处监察御史柳寅东，“为陈定国大计事，启曰：今贼西遁，已近两个月，征守如何定之，尚不得知。虽有深谋妙计，暂不晓谕民人，然李自成一日不除，国仇一日不得报，本朝亦不得安宁。今贼正秣马厉兵，而我却不睬之。窃思，如贼入秦，挟制民众，死守黄河，则恐我军不易破之。贼若与我对阵，即可守秦地，若不能对阵，势必退入西蜀地方，彼时则进讨更难。时已属秋，庙堂宜定大计。……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欲图西贼，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收晋豫，约定内应，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290]。这份启奏，适时而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应采取的战略。多尔衮很赞同，接受柳寅东建议，制定了先西北矛指三秦，征剿大顺，后东南饮马长江，讨伐南明，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于是他派兵进入山西、河南剿抚，以削弱大顺的外围力量，并且致书警告南明，勿忘清为明“雪耻”之恩，将“遣将西征……报乃君国之仇”^[291]，以阻止南明乘机北上进犯。

李自成在真定战斗中，被箭射中“胁下”，“深入二寸，箭杆拔出，镞头入骨，再三针出，血流不止”^[292]，人昏迷不醒。因此，大顺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权斗争，“大将刘宗敏、丞相牛金星私幸闯必矢亡，皆蓄争立之志。”^[293]三天后，李自成苏醒过来了，可是又得急报，“河南归德府同陈奇，商丘令贾士俊，定陵令许承荫，唐邑令孙淦，考城令范隼，拓城令郭经邦及尚国俊七人，俱被兵部尚书丁启睿命参将丁启光擒缚往南京”^[294]，“河南州县多反正”^[295]。他大惊失色，抱伤“召诸将议”^[296]，研讨对策，当时李岩将军“请分兵二万，收复河南各郡县。闯未及允……是晚闯密请（牛）金星议曰：李岩亦枭雄姿，向以势穷归我，今得兵而去，恐他日

得志，则难制服矣，太师以何如？”^[297]牛金星“忌李岩、李牟（李岩弟）得军民心”^[298]，早已怀恨在心，“见闯疑岩，遂乘机对曰：河南为三秦门户，晋楚屏藩，古来帝王建都之地，且属李岩故乡，若以大兵与之，定纵虎归山而添之翼矣。他日若举中州之豪杰，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则彼此事势又有不可知矣，断然不可。”^[299]于是李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300]。次日，牛金星“以自成命，邀岩饮，伏壮士于幕，三爵后，并其弟牟斩之”^[301]。军师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302]“自此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以不振”^[303]。可见这场内部残杀的悲剧，给大顺政权带来重大损失。途中太谷、榆次、定襄等地的故明官绅富商起兵反抗。六月初，李自成行至平阳（山西临汾），“分兵于山西诸隘”^[304]，以制将军张天琳守晋北大同地区，文水伯陈永福守晋中太原地区，平南伯刘忠守晋东南长治地区。然后他率部南下经闻善，向西渡黄河抵韩城，七月上旬回到西安。

李自成败回西安后，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定了以关中为抗清基地，东出潼关，北渡黄河，南征汉中，伺机北伐的战略方针，主攻目标是清，所谓“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305]。随之命高一功、李过等驻守陕北，并领兵进攻晋北州县，又“发兵出潼关，下河南”^[306]，收复失地，进逼河北。而且大顺军出固关，占领井陘，后被清军击退。

与此同时，多尔衮派遣归降的故明诸生吴惟华去山西大同，招降了明总兵姜让，随后又向他敕谕：“三晋地方，乃京城之右翼也，由此至西秦地方，皆被贼蹂躏，致使民不聊生，著尔速往传谕，乘机安定之。”^[307]于是接着晋北的代州、繁峙、崞县等地，也被招抚降清了。另外，多尔衮命令固山额真叶臣率军平定山西，“由饶阳至怀庆，郡邑悉下”^[308]，“土贼悉已平定”^[309]。然后多尔衮为了增强平定山西的兵力，遣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等，率军会叶臣，

共同行事。接着又派前锋统领席特库，率将士往助平定山西的叶臣军。他们将所占领的怀庆、潞安、泽州三府所属州县，“俱已委员管理”^{〔310〕}。

大顺军将领、原明定西伯唐通自山海关战败后，随李自成西撤，与大顺军亳侯李过驻守府谷。他“见贼势蹙不足恃，力纠集散卒，击走贼将李过，还驻保德州”^{〔311〕}。九月十五日，唐通降清，便引清军攻陷李自成故里米脂县。此时李自成因李过“府谷折兵太多，绑回长安”。随后李过被释，“又添复来，一路府谷，一路保德”^{〔312〕}，企图深入晋北地区，但被清军击败，退回陕北。

叶臣夺取怀、潞、泽三府后，于九月十三日率领清军出故关，直逼山西重镇太原府城。大顺军驻守太原的将领陈有福，采取凭坚城重炮、坚壁清野的战术。叶臣领兵进抵太原城下，“派员招降，然贼不从”^{〔313〕}。十月三日，清军攻打太原城，据从征的吴惟华塘报：“臣督率官兵，披甲城北，仗红夷神力，攻破北面间，随据臣标总兵张政雍、张凤鸣，中军副总兵贾廷谏，监军道游击张台等报称：奉本军门并诸固山号令，马步分进，攻击迭施。如攻城，则遣都司金梁等七员、步兵七百名，填壕二道，协助大兵过壕安梯，攻破太原北面矣；如截杀，则遣参游都守叶如兰等三十二员，马兵九百余名，在太原城东南一带埋伏，本日贼果奔溃出城，伏兵四起，当阵杀死逆贼一千有余。”^{〔314〕}陈有福弃城逃走，不久降清。叶臣攻占太原后，“府属五州二十县归降”^{〔315〕}。七日，他乘胜率军南下，进攻汾州、平阳二府，大顺军“弃城遁走，山西全省悉平”^{〔316〕}。

多尔袞进入北京后，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不仅巩固了京畿，而且占领了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许多府州县。十月一日，顺治帝在北京行定鼎登基，正式宣布清的战略是“早靖祸乱，载戢干戈，九州悉平”^{〔317〕}，完成全国统一的历史任务。多尔袞根据原已制定的先西北、后东南的战略方针，把征讨大顺放在首位。当时河南的形势急剧变化，大顺军乘叶臣率军攻打太原，河南兵弱之机，于十

二日,从山西垣曲东进攻济源。十三日,清卫辉总兵祖可法率军到怀庆,当天与怀庆总兵金玉和统兵前往济源救援,大顺军已攻占济源,两军激战中,金玉和在柏乡镇西中箭身亡,祖可法回军途中遭伏击,将兵退入怀庆。十五日,清河南巡抚罗绣锦向多尔袞启奏求援,启曰:“贼势猖獗,逼近怀城仅三十里,以及孟县城下。贼之狡谋,其意不止在怀属,而意欲占据河口。况大河以南,尚有贼氛,万一通联,势所难图。……伏乞亟敕兵部,速催大兵星夜兼程前来,以济救援。”^[318]接着孟县失守,怀庆被围。二十二日,李自成为了增强大顺军的兵力,“图河南诸郡”^[319],“遣兵出潼关,分八营,三营趋归德,三营趋裕州,二营据郟县”^[320]。多尔袞见以上情况,决定派兵入陕与大顺军会战。十九日,授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军征讨大顺,命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领所部从征,由晋北渡黄河入陕西,进攻西安。二十五日,授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南下,命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领所部从征,这支清军,实有两图,首先征讨大顺,然后进剿南明。早在三天前,清廷就遣学士詹霸驰赴阿济格军传谕曰:“顷闻流寇急攻怀庆,已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于是月二十五日率师南下,便道往征。豫亲王如已克流寇,即遵谕仍赴南京,如流寇闻风遁走,豫亲王即追蹙贼后,直趋西安。豫亲王先至西安,则率兵以待尔等。尔等先至,亦宜待豫亲王。两路大师务期合力攻剿,平定贼寇,勿以先至彼地,遂不相待。”^[321]由上可见,多尔袞采取东、北两路夹击会攻西安,企图一举击溃大顺政权。

李自成北伐征清的战略受挫,面临清大军压境。十二月初,他“闻英王将南下,惧弗支,则调关中兵,悉往应之”^[322],而且亲自率领大军,“北趋延安逆战”^[323],行至洛川,得报西安东大门潼关军情紧急,清军将攻关而入,于是回军救援。当多铎率军前往怀庆,大顺军自动撤围,退到河南。十二月一日,多铎命护军统领图赖先率精兵从孟津渡河,大顺军都司黄土欣、果毅将军张有声“各遁去,

沿河十五寨堡兵民，俱望风归附”。十四日，多铎至孟津渡河，“大军俱向潼关进发”^[324]。十五日，清军至陕州，又击败大顺军张有鲁部于灵宝。二十二日，清军距潼关二十里立营，固守不战，俟红衣炮军到来。

潼关是著名的关隘，易守难攻。此时李自成率援军来到潼关，二十九日，刘宗敏“据山为阵”，以拒清军，被击败。顺治二年（1645）正月初四，刘方亮率军进攻清营，又被击败。李自成闻讯，“亲率马步兵拒战”，再次被清军击败。五、六日，大顺军又连续发动进攻，皆为清军战败。九日，清军攻坚的红衣炮军运到。十一日，多铎命红衣炮军进逼潼关口，于是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加强防御，阻止清军入关。清军“举红衣炮攻之”，在大炮掩护下，大举进攻，所向披靡，李自成见大势已去，率领部分大顺军撤回西安。十二日，清军“渡潼关壕口”，大顺军“望风奔溃”^[325]，驻守潼关的巫山伯马世尧部众降清。十三日，清军入潼关，是日马世尧诈降泄露被杀。

李自成败回西安，未能立即调整各路人马组织会战，与清军决一死战，却“欲返据西安”^[326]。可是上年十一月，英亲王阿济格统军至宁武关，唐通前来迎谒，“王令往保德州河岸，造筏济大军”^[327]。阿济格因到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等地索取驼马，于是十二月中旬，直接从边外入陕西，而征调山西汾州、应州、朔州三处兵马，俱从保德渡河，至二十日俱已过尽^[328]。阿济格会合两军南下，直趋西安，大顺军将领高一功、李过等，虽顽强抵抗，但仍不敌清军，榆林、米脂、绥德等府州县相继失守。当多铎攻占潼关时，阿济格正围攻延安，李自成见清军两路夹攻，认为西安已不可守，便于顺治二年（1645）正月十三日撤离西安，至蓝田下陕南。此次大顺潼关战败，奔西安南走，实则重陷山海关战败，奔北京西走的覆辙，就战略而言，无疑走上了失败的道路。

三、转战豫鄂赣和大顺败亡

多铎得探报李自成已率部弃西安南走，一月十六日，他领大军自潼关起行，十八日，不费一兵一卒进占西安，此时由陕南北下的阿济格部，“未及入长安四百里余”^[329]。多铎见李自成率领十几万大军南进，主力依存，另外自己还身负进攻南京的战略任务，他怕李自成抢先攻占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据江南富庶地区反清，于是不待与阿济格部会集，便命部分汉军驻守西安，亲领大军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二月八日，清廷根据陕西的战况，分别谕多铎、阿济格两军统帅，谕多铎曰：“闻尔等破流寇于潼关，遂得西安，不胜嘉悦。初曾谕尔等往取南京，今既攻流寇，大业已成，可将彼处事宜交与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等，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大丈夫为国建功，正在此时，汝其勉之。”^[330]可见清廷表彰了多铎的功绩，并命他“往取南京”，“为国建功”，追击李自成“大顺军”任务交给阿济格。同日又谕阿济格曰：“尔等自京起行在先，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等起行在后，今豫亲王等已至潼关，攻破流寇，克取西安，尔等之兵，未知尚在何处，此皆由尔等枉道越境……以致逗留故也。今已命豫亲王恪遵前旨，往定南京。尔等可仍遵前旨，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勿以流寇已遁，西安既平，不行殄灭，遽尔班师。”^[331]清廷指责阿济格，进军缓慢，延误战机，未能与多铎合力消灭大顺，因此命他追歼李自成的“大顺军”，“以赎从前逗留之咎”。十四日，多铎领兵追击李自成抵河南，“旋得平定江南之谕，即于三月初五，率师南征”^[332]。二月，阿济格抵西安，看到上谕后，原先大顺军驻守陕北抵抗北路清军的李过、高一功部，因见李自成已撤离西安，便率部众入汉中，于是迅速集中兵力，率领清军急驰追击李自成部。

李自成未能凭借大顺军陕西家乡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击溃清军的两路进攻，反而成了战败者，率领部众撤弃根据地，匆匆

南奔。在这个重要时刻,他又没有提出如何转败为胜,鼓舞士气的新战略方针,致使大顺官兵作战目标不明,对前途丧失信心,甚至有些意志不坚强的人,离队出走,或叛变降清,尤其是原已归降,分散在各地的故明文官武将,见形势不妙,纷纷叛离。当时最为突出的是陕南大顺军护军将军贺珍率部降清,使形势变得更为险恶。李自成弃西安后,率领大顺军主力部队途经蓝田、商州、龙驹寨(丹凤),出武关入河南,经内乡、南阳、邓州,转入湖北,沿汉江而下,经襄阳,二月二十五日至承天(钟祥),三月初走汉阳、沔阳、德安,向武昌进发。当时南明驻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告急”^[333],三月二十五日他“请除君侧之恶,移檄远近,以讨马士英”^[334],统率全军沿江东下,四月四日在九江病逝,由其子左梦庚统其众,连陷湖口、彭泽、建德、东流、安庆等地,南京戒严。

三月底,李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已率众东下,城虚无人”。于是率领大顺军浩浩荡荡进入武昌城。他立即整编部队,将“数十万”大顺军,“分为四十八部”。同时他说:“西北虽不定,东南诟再失之”,提出“谋夺舟南下,取宣、歙”^[335]、“规取南京”^[336]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并非上策,一是清豫亲王多铎奉旨率军,经河南、安徽,已先进入东南,兵临扬州城下,南京的弘光小朝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很快就要灭亡;二是大顺军沿江东下,前有南明左梦庚阻截,后有清阿济格部尾随追击,陷入前后两面夹击,可是李自成对面临的问题并不重视,更未制定相应的对策,大顺军必将受挫。

李自成进入武昌不久,阿济格率军“蹶其后,至武昌”^[337],命“肅章京哈宁噶将兵围武昌城数匝”^[338]。李自成见武昌陷入重围,便遣“刘侯(刘宗敏)、田侯(田见秀)引兵五千人,出城迎敌”^[339],清将“路什同前鋒苏拜击败其众,并俘获自成妻妾。”^[340]四月二十四日,李自成因大顺军战败,决定放弃武昌,率全师顺江而下。阿济格率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四月底大顺军又被清军“蹶击

之富池口，获其船，贼党整众据河岸拒，兴鼎同护军统领哈宁阿、参将希尔根击溃其众”^[341]，“直逼自成庐帐，自成……潜越雷池而遁”，清军俘“总兵、知府、推官各一人，知县四人，守备、把总五人，获马匹船舰无算”^[342]。李自成率领大顺军继续东进，阿济格命谭泰率大师乘舟追之，大顺军到达距九江约四十里处，清军追踪而至，两军对阵，展开激烈的搏斗，大顺军大败，清军攻入老营，据河济格疏报：“俘自成两叔伪赵侯、伪襄南侯，并自成妻妾二口，获金印一颗。又获伪汝侯刘宗闵，并一妻二媳，自成养了伪义侯姜耐妻，伪齐侯顾英妻，伪总兵左光先，并一妻三子，及术士伪军师宋矮子（宋献策）。又获太原府故明晋王二妃。其自成两叔，及伪汝侯刘宗闵，俱斩于军。自成又有妻妾三口，因我兵追急，投扬子江死。”^[343]随后宋献策、左光先降清，丞相牛金星乘机叛逃^[344]。五月初，左梦庚“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兵十万，并家口，泊舟于九江之东流县界扬子江中投降，共带大小船只四万”^[345]，于是清军实力大增。

李自成从西安退却后，这对大顺军广大官兵而言，失去了尊严和荣誉，但退却不是说不反击，只有反击取胜，方能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何况大顺军有二十余万人马，在数量上大大多于尾随追击的清军，再则沿途的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又是大顺军原驻守设防地区，既有驻军，又熟悉地形，是反击的好地方。当大顺军退却到德安时，镇守该地的将领白旺，向李自成建议，加强防守，进行反击，可是闯王不采纳，却强令他率部随军退却^[346]。李自成一路上闻清军追击，便率部而走，或遭清军攻击，战败而撤，这种一退再退，不组织有效的反击，在战术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部队人心浮动，士气涣散，遇战必败的后果。

大顺军在富池口、九江之战中遭到惨败，损失严重，李自成认为东进“欲取南京”的战略方针已无力实现了，因此决定回军，由江西经湖北入河南，开辟新的反清基地。五月，他行至湖北通山县

境,被地方乡勇杀害,据费密的《荒书》记载:“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百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百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中,不可出。九百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347]李自成在退却转移途中,一时疏忽大意,不幸牺牲,大顺政权灭亡。

阿济格追击李自成取得很大成果,闰六月四日,他向清廷报告说:“蹶其后,追及于邓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七处,降者抚之,拒者诛之,穷追至贼老营,大败贼兵八次,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公山。……计我兵追蹶自成,及分翼出师败贼,凡有三战,获驼三十一,马羸六千四百五十,船三千一百八艘。……合计河南属城十二、湖广属城三十九、江西属城六、南京属城六,共六十三城,已尽设官抚定。”^[348]十日,清廷“以流寇荡平,遣侍卫坤巴图鲁赉书往谕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等曰:顷者览王奏捷,知王与诸将同心奋勇,扫灭逆寇,克奏肤勋,不胜喜悦。念王及行间将士,驱驰跋涉,悬崖峻岭,深江大河,万有余里,亦可谓劳苦而功高矣,今寇氛既靖,宜即班师。”^[349]清顺战争,清的最高决策者多尔袞“援闽外之略,一败于关门,而神器归;再破于西安,而巢穴扫;三灭于九江,而根株净”^[350],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最后以清胜顺败宣告结束,达到了战争的目的,对实现进取中原,完成清初的统一,建立清王朝的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节 洪承畴在清初统一过程中的作用

洪承畴(1593—1665),字彦演,又字亨九,福建南安人,隶汉军镶黄旗。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于乡,次年登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崇祯十五年(1642),洪承畴在松山战败为清军所俘,皇太极以

上宾款待，洪承畴深为感动，遂降清。此后，皇太极对洪承畴“宠幸在人臣之右”^[351]。诸贝勒大臣对此皆不理解：“上何待承畴之重也！”皇太极反问他们：“吾曾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回答：“欲得中原耳。”皇太极诙谐风趣地指出：“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352]日后洪承畴成为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最得力的助手和引路人。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疾身亡，其子福临即位，由睿亲王多尔袞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他们继承太祖、太宗事业，把夺取明朝政权作为总的战略方针。但是，此时关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顺治元年（1644）春，李自成农民军直逼明都北京。以范文程为首的一批汉官谋臣，认为当时清的主要敌人已非明朝，而是农民军，实与李自成争天下，指出“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貽悔将来者亦此时”^[353]，要求派兵火速进关。多尔袞综观时局，采纳此议，四月初九统率八旗大军，出师中原，命洪承畴随行参决帷幄。十一日清军进抵辽河^[354]，多尔袞得悉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自缢身死，一时不知所措。洪承畴立即向多尔袞陈进军方略：

首先，他认为“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避，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而“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355]。其次，洪承畴提出严肃军纪，明示政策，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叛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356]。

再次，在具体的战略战术方面，他要求“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出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抵京之日，我兵

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成功”^[357]。

最后，他再三告诫多尔衮切勿轻敌，“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358]。

多尔衮采纳洪承畴的建议，增强了进军关内、夺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辽宁阜新境内），多尔衮收到明平西伯吴三桂来书，乞求多尔衮“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359]。多尔衮喜出望外，欣然同意。由于吴三桂乞援，多尔衮改变了原先洪承畴提出取道密云进攻北京的计划，而从义州南下，由山海关进京。但是洪承畴的其他建议依然得到贯彻执行，例如改变过去进关掠夺财物、人口、任意屠城的恶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360]。清军一路所到迎降，几乎无一反抗，五月二日攻占北京，因为洪承畴引导清军人关有功，六月清廷便命他“入内院佐理机务，遂为秘书院大学士”^[361]，成为清初重臣之一。

清军占领北京，标志清朝全国政权的确立，但如何巩固这个政权，仍是摆在清统治者面前的新问题。洪承畴熟知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方法，提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一系列的建议，现概括为以下几点：

——学汉语、读汉书。洪承畴认为要统治中原广大汉族地区，就必须精通汉族的思想文化。他说：“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故金世宗、元世祖皆博综典籍，勤于文学，至今犹称颂不衰。”“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一日之间，万几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益光矣”^[362]。

——习明制，倡票拟。洪承畴认为保证清朝统治，必须采用明朝一些行之有效的典章制度。他说：“臣等备员内院，凡事皆当与闻。今各部题奏，俱未悉知，所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夫

内院不得与闻，况六科乎！倘有乖误，臣等凭何指陈，六科凭何摘参？接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各部院复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363]

——选人才，行连坐。洪承畴指出，命官不能贤愚不分随便任用，特别是对封疆大吏，要实行“保举连坐法”。他说：“如督抚、总兵员缺，令吏、兵二部满汉堂官详加评注，自书姓名保举，再以咨询左右大臣，议论相合，方行点用。俟后有功效，保举者受荐贤之赏；若旷职愆事，保举者受妄昧之罪。庶封疆，民生两有攸赖。”^[364]

以上洪承畴所提治国安邦建议，总的看来符合清统治的需要，皆被采纳，它对清初许多政策的调整和制定，以及巩固清王朝的统治，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顺治二年(1645)五月，豫亲王多铎率军占领南京，明福王朱由崧就擒，弘光政权灭亡，随之又连下常州、苏州、太仓、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清军所以能如此迅速取得胜利，这和江南人民痛恨南明的腐败统治，对清政府“致望改革”^[365]是分不开的。可是事与愿违，清廷的决策人摄政王多尔衮被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顾许多汉官反对，于六月十五日悍然颁布严行剃发令，“反对者，杀无赦”^[366]，这种对汉族传统习俗的侵犯，无疑是野蛮的民族压迫，因而激化了民族矛盾，爆发了遍及江南各地的反剃发斗争。以民族矛盾为主体的抗清斗争高涨起来，正像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所说：“自北骑南下，诸郡文武吏争献版籍，开门迎附，反之为守。……适下令剃发，乡民皆惊，而胥吏乘势鱼肉民，民汹汹思乱。……于是松江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举人徐孚远、章简阳与陈湖兵通，(吴)志葵乃与参将鲁文屿率舟师三千自吴淞江入淀泖，将窥苏州，(夏)允彝出入军中，飞书檄联络士大夫，四方闻之，争为响应。”^[367]

这种剃发令前后江南形势骤变的情况，是多尔衮未能预料的。

他为了缓和矛盾、平息江南地区抗清力量,特派出身江南、办事老练的洪承畴前去代替多铎,“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地方”^[368]。顺治帝在给洪承畴的上谕中说:“朕以江南初经归命,其余各省远迹未同,恐已归者尚多惊疑,未附者或怀观望,保厘南土,实赖股肱。”要他对“江南各省已经归顺者,即责成抚按问民疾苦,兴利除害,速图善后之策。未归顺者,先以文告再三晓谕,果不服从,方可加以师旅,即有攻讨,亦以平定安集为先”。尤其是对“其山村隐逸,及故明废绅,才德堪用者,从公咨访,征聘来京,或军前先委署事”^[369]。

是年八月初,洪承畴到达南京赴任,据记载:“是时明唐王聿键称号福建,其大学士黄道周率师道广信、衢州向徽州。左金都御史金声家休宁,募乡兵十余万屯绩溪。诸宗姓高安王常淇保徽州;薪水王术杞子常灾,自号樊山王,屯潜山、太湖间,由杻号金华王,据饶州;谊石号乐安王、谊渤号瑞安(昌)王,分屯溧阳、金坛、兴化诸县”^[370]。除了明王室乘机反清复明外,江南广大农民、市民、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以及一些地主士绅与知识分子,纷纷以“头可断,发决不可剃”^[371]的决心,在南京、吴江、苏州、金山、嘉定、松江、昆山、宜兴、常熟、江阴、嘉兴等地掀起抗清斗争,各地反清力量“声势相倚”^[372]。

洪承畴面对这种十分紧张的局面,根据清廷旨意,采取了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他在政治上大力拉拢江南地主阶级,以削弱反清力量,于是开科取士,顺治二、三年连续举乡试,网罗大批知识分子。同时对江南地区故明官员,除了以原官留用外,还允许现任官员“举荐”,他自己就向朝廷“举荐”故明降官降将、缙绅学士,一次多达一百四十九人^[373]。

此外,洪承畴请求蠲免钱粮,停止征运漕粮,他说:“江南地方,因明季赋税繁重,官兵坑害百姓极为困苦……伤残最苦之州县,人民逃亡,田地荒芜,又兼近来土贼抢掠,民无居。乃目前催征漕粮,

勒限直运,濒死残黎,供输不前,人情惊皇。”为防止逃散人民化为土寇,建议“最残苦州县,分别免征折价”^[374]。这种办法虽然是从清朝统治的根本利害考虑的,但对安定江南、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有好处的。

与此同时,洪承畴在江南积极进行招抚。他利用旧关系进行招抚,收到很好效果,如招抚了盘踞“在江南、湖广、河南、三省交界山中,联络堡寨,亦期防守以自固”^[375]的明兵部尚书张缙彦部就是突出一例。洪承畴预料“缙彦一投,则三省接界地方四十余寨,远近观感,自可渐次驯服”^[376]。此外,他还以原官留任,不念旧过等办法“招抚江南宁国、徽州、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抚州、饶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袁州诸府”^[377]。这样使地方和人民少遭或免受战火损失,对清初社会发展也是有利的。

当然,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仅用招抚不能完全奏效,必然还要诉诸武力,特别是朱明王室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到处搜罗反清力量,进行复明活动。如此时故明翰林金声,占据休宁,“起乡兵十余万,制造甲冑枪炮等项,分布山隘”^[378],反抗清军。福建唐王朱聿键遣使“授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徽宁池太,督师恢剿。寻又加兵部右侍郎,假以便宜行事”^[379],一时声势颇大。顺治二年(1645)九月,洪承畴派提督张天禄、总兵卜从善等人率兵讨伐金声,“清兵至徽,徽不即下”^[380]。洪承畴派已降清的黄澍,利用旧关系,潜往金声营中,“为内应,城陷”^[381],金声被擒杀。

金声死后,唐王朱聿键为了阻止清兵南下闽浙,十月初遣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黄道周“出兵徽州”^[382],黄道周集合乡勇万余人,从广信出金衢,深入婺源山中。洪承畴闻讯,“恐在徽兵力,不能四应,即严催芑采总兵卜从善统兵驰赴徽州援剿。又催调宁国总兵胡茂祜下马兵八百名,统以战口张鹏程、孙喜策等,星趋策应”^[383]。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军在婺源打败唐兵,黄道周就擒,解

往南京被杀。洪承畴乘胜率兵“分路再战……直追至浙江衢州府之开化县,该县士民,皆剃发投顺”^[384]。婺源大捷,对平定闽浙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洪承畴所言:“生擒逆首,东南事从此可定。”^[385]

顺治三年(1646)正月,活动在南京附近溧阳、兴化、金坛等地的故明乐王朱谊石,瑞昌王朱谊渤,带领二万兵马,“密图江宁,里应外合”^[386]。洪承畴发觉,“先事诛内应西沟池万德、郭世彦、龙琚等八十余人。”然后清军“出朝阳、太平二门,截谊石等后,乃启神策门出城兵奋击,破之,追及摄山,斩首无算”^[387]。同年八月,朱谊石、朱谊渤又和南京城郊反清力量“歃血同谋”^[388]。洪承畴探知,派江防同知范承祖率领满汉官兵渡江,“于六合、仪真地方,哨探扼剿”^[389]。洪承畴亲率大军进攻龙潭、镇江、丹阳交界的花山地区。结果朱谊石、朱谊渤不久皆为清军所获。接着清军在婺源严抗山捕获高安王朱常淇。顺治四年(1647)二月,清军在宿松生擒瑞安王朱谊贵,然后又在饶州擒获金华王朱由,至此“江南众郡县以次定”^[390]。

洪承畴自受命招抚江南,“驻南京三年,心计日数,口答手授,事至夜分不辍,心血为耗,目睛渐花”^[391],他对平息江南反清势力,安定江南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后因鲁王朱以海施反间计^[392]和函可一案^[393]的牵连,洪承畴认为不宜再在江南任职,故以江南业已平定及父丧为由,请解任守制。清廷批准,调离江南,回内院任事。

洪承畴抚定江南诸省,接着郑亲王济尔哈朗又平定中南各地,清王朝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而南明朱由榔的永历小朝廷颠沛流离,危在旦夕,“桂王除扈从外,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394]。此时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领导下,建立了以云贵两省为中心的包括四川、湖南、广西部分州县的抗清基地,力量颇为强大,他们向永历帝提出“联合恢剿之意”^[395]。顺治八年(1651)四月,双方达成“合师北拒”的协议。从此大西军余部奉

永历年号，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定国率领，一败清定南王孔有德，再败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取得空前未有的大捷。黄宗羲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396]另一路由刘文秀率领，挥戈北上，进攻四川，“蜀人闻大军至，尔响应，于是重庆、叙府诸府县次第皆复。吴三桂迎战辄败，领军以奔，退保保宁”^[397]。与此同时，东南沿海的郑成功，荆巴一带的李来亨等，都积极支持和配合西南地区的反清斗争，抗清斗争又重新推向新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清廷经过认真考虑认为惟有洪承畴“允当斯任”^[398]。顺治十年（1653）五月，命其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敕谕抚镇以下咸听节制，攻守便宜行事，授“经略大学士”印。洪承畴到达武昌，制定了严防重镇，互为犄角，先安湖广，后平云贵的作战方案。他在《恭陈湖南湖北情形并议分驻剿御事宜疏》中，详尽介绍分析了湖南、湖北的形势，提出了作战部署，认为：“计今日官兵……分驻武岗、衡州、宝庆、常德一带，可备防剿。然各郡穹远，联络不及，实有首尾难顾之虑。若荆州属县，贼孽正炽，倘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岳州以犯湘潭，不惟我兵腹背受敌，而大江以南，恐至骚动，此尤当筹画。”接着他又指出：“长沙系湖南北京会之区，衡永辰常宝庆必由之路，既可接云贵，又可以达广西，武昌藉以为屏藩，江右倚以为保障，臣必往来驻扎其间，始可四应调度，相机进攻。至于湖北荆郢之贼，若不急为剿除，必至滋蔓难图。……臣以督臣祖泽远商议，督臣必暂行移驻荆州，督同郢阳治臣料理荆州郢襄之贼，以扼全楚上游，绾南北要冲。……今长沙有臣驻扎，可分兵兼顾常德。则提督官兵亦应调赴荆州郢襄，听督臣调度剿贼，乃足消肘腋之患。安襄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所关更非渺小。但督臣既已移驻，则武昌省会，干系甚大，虽有湖广抚臣弹压，而兵力单薄，未足为恃。臣今有调到镇将官兵，陆续到武昌，暂驻歇马，可壮声势。而督臣仍应

往来于荆襄武汉之间，俟事定仍驻武昌，庶外可以清赋氛，内可以固根本。”^[399]

洪承畴在上述军事部署基础上，积极安定地方。他选拔人才，惩罢劣官，奖励开垦，蠲免赋税，训练军队，致使湖广地区“军威殊壮，招平抚辑，民情安悦”^[400]。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当孙可望派刘文秀领兵进攻常德，同时分兵遣庐明臣、冯双礼攻打武昌、岳州，均被清军击败，刘文秀回贵州，冯双礼受创伤，庐明臣坠水死，从此清军完全控制了湖广全境。可是洪承畴并没有因为军事胜利而贸然进攻云贵，却“休养兵马，欲待敌敝”^[401]，伺机收复西南诸省。

顺治十四年（1657），西南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永历小朝廷内讧，孙可望和李定国火并，可望大败。孙可望自贵州赴长沙洪承畴营中降清，“以滇黔地图为献，请为满汉兵先导”^[402]，“并陈进取状”^[403]，清廷封孙可望为义王，洪承畴认为进军云贵时机已到，便“上方略，言滇黔可取”^[404]。顺治帝表示赞同，命洪承畴“规取贵州”^[405]。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下旬，洪承畴攻占贵阳，随之“贵州全省底定”^[406]。

此时，清廷特派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自湖南来到贵州，主持南征军务。九月，多尼在贵州平越召开军事会议，制定进军方案，洪承畴建议三路入滇。信郡王多尼率军自平越经关岭铁索桥；平西王吴三桂率军自遵义经七星关；征南将军卓布泰率军自平浪经安隆所三路进攻云南昆明。洪承畴因年老多病留守贵阳。但是他十分关心此次军事行动，便在孙可望降官内，查有熟谙湖南、广西、四川、云贵地利者十九人，分拨各路作为攻滇向导^[407]。李定国、白文选等人率军“拒战皆败，明桂王奔永昌”^[408]。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初三日，清军攻占昆明，永历帝逃往缅甸。

洪承畴始终关心西南统一，当清军攻克昆明后，他不顾病体，上疏请求前往云南。经清廷同意于三月到达昆明，审度局势，认为

安定社会秩序是首要任务,为此提出两项建议:

第一,请求减轻人民负担,赈济灾民。他指出:“云南一隅,贼踞多年。……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动掠,如衣粮财物头畜俱被抢尽已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概行掳掠,致令军民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分离拆散,惨不堪言。”^[409]清廷得疏后,“命户部发帑三十万,以十五万赈两省贫民,十五万命洪承畴收贮,备军饷不给”^[410]。而洪承畴命地方官员,“确查两省真正穷民,必要及时赈济,均沾实惠”^[411]。

第二,建议暂缓向缅甸进军,以安定地方。清政府为了早日结束西南战争,命洪承畴“还进缅甸,以靖根株”,消灭永历小朝廷。洪承畴却上书建言缓进,他说:“臣审度时势,权量轻重,谓今年秋冬,宜暂进兵,俾云南迤西残黎、稍秋藉收以延残喘,尽力春耕,以图生聚。而数万大兵,又得养锐蓄威,居中制外,俾定国等不能窥动静以潜逃,土司不能伺衅隙以狂逞。绝残兵之勾连,断将兵之反侧,则饥饱劳逸胜算皆在于我。料定国等潜藏边界,无居无食,瘡痍受病,内变易生,机有可俟。是时兵饷刍粮兼备,土司苗蛮渐服,残兵降卒已安,并调拨将兵,次第齐集,责成防御,然后进剿,庶为一劳永逸,固内剿外长计。”^[412]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洪承畴的上述建议和措施,对平定西南、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是有作用的。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桂王朱由榔为清军所俘,南明政权宣告灭亡,西南诸省为清统一。

洪承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关于他在清初历史地位的评价,三百多年来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更易,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康熙时期,满族贵族为巩固清朝的统治,积极拉拢和团结故明降官降将为其服务,因而对他们比较敬重。如康熙四年(1665),洪承畴病逝,清廷为他立碑述功,称他是“贤良之臣”,充分肯定功绩,“特授世及之荣,以示酬康之典”^[413];乾隆中期,由于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清政府为加强统治,竭力宣

扬忠君思想,下令撰修《贰臣传》,大肆贬低清初降清的汉官。乾隆帝说:“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自不得不加以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朕思此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死后,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产贰臣传一门”^[414],因此把洪承畴列入《贰臣传》,大加指责;到了辛亥革命以后,由于革命反满的政治需要,大骂明末清初降清的汉官是民族败类,洪承畴是“汉奸”,在历史论著、小说、戏剧、说唱中成了被人唾弃的历史罪人。由上可见,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地位,从“贤良之臣”——“大节有亏之人”——“汉奸”,这种变化则给人们提出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像洪承畴这一类人物在清初的历史作用问题。

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坚持“严格的历史性”^[415],要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恩格斯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416]当然对洪承畴也不应例外。清军入关后,与南明、农民军形成了三股政治势力,争夺全国政权,这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的大动荡年代。此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沙皇扩张主义者开始东侵,国内又经过几十年内战,人民迫切需要社会安定,休养生息,所以国家的统一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也是清初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谁能担负此项历史重任呢?实践证明南明和农民军都不能完成,而只有新兴的清王朝可以承担。因此洪承畴归清后,积极投身到统一全国的历史洪流中去,并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应该充分肯定,正如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所说:洪承畴“顺治元年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出经略江南诸省,逋寇以削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黔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417]。这里我们肯定洪承畴在统一中的贡献,不等于说他一切

都是好的,如他镇压农民起义军,就应该批判。另外由于清初历史复杂性,我们肯定进行统一大业的历史人物,不等于就否定坚持抗清的明朝将领和农民军领袖。这并非矛盾,自清兵入关所发生的一切抗清斗争,都以其浩然的民族正气,促进了清廷政策的转变,而以洪承畴为代表的降清汉官则是统一政策的积极建议者和坚定的执行人。可见,他们各有千秋,给我们留下不同的历史遗产,因而都应予以肯定。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历史现象正是表现在明末清初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历史人物身上很重要的特点。

第六节 清廷对东南各地的统一

一、瞿式耜的抗清活动

瞿式耜,生于明万历十八年八月初八日(1590年9月6日),卒于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651年1月8日)^[418],字伯略,又字起田;号稼轩,信奉天主教,教名多默(Thomas)^[419],江苏常熟五渠里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四世祖瞿璠、曾祖父瞿国贤皆为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祖父瞿景淳,嘉靖甲辰会试会元、殿试榜眼,官至礼部侍郎,赠礼部尚书,谥文懿。父亲瞿汝说,万历辛丑进士,任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湖广学政,广东布政司参议等职,为官刚正^[420]。“四代甲科,鼎鼎名家”^[421]的身世,对瞿式耜一生的成长和政治生涯,无疑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瞿式耜是一位“恂恂不胜衣,泊然恬雅,临觞遣咏,不与世事相即。而风采骏发,每婴危难,神志益厉,未尝有疑惴之色”^[422]的人。他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封建文化教育,在其父瞿汝说的精心指导下,九岁便能熟颂四书五经,十四岁从学识渊博的王季和读书,十六岁又拜同乡著名学者东林党魁钱谦益为师,入拂水山房学习,从此两人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因此东林党人讽议朝政,评量人物和政治主张给他的思想影响较深。瞿式耜同我国封建时代许多知

识分子一样,沿着崎岖的科举之路向上攀登。万历三十三年(1605),补郡生员。万历三十六年(1608),参加岁试,名列第一。万历四十三年(1615),应乡试,他“直陈时事,于治法、臣品、边防、珥寺诸大端,抵掌言之,毫无顾忌”^[423],中举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入京应试,成进士。万历四十六年(1618)春,瞿式耜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令,开始步入了纷繁杂沓的政治舞台。

早在这之前,他就曾伴随父亲到京师和湖广为官,亲眼目睹明廷腐败,朋党丛生,兼并土地,民不聊生。与此同时,东北满族兴起,建立后金政权,成为威胁明王朝存亡的强大的地方势力。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致使明政府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刚刚踏上仕途的瞿式耜,从本阶级利益出发,心田里萌发出振兴朝政的意愿,自己虽是一名小知县,却决心实心任事,颇有善政,“一切与民更始”,“颂声鹊起”。

天启三年(1623)三月,瞿式耜离任回乡。九月,父亲病逝,他在家守制期间,精心整理其父撰写的《皇明臣略》和《兵略纂闻》两部遗著。这时瞿式耜的从弟瞿式穀邀意大利人天主教教士艾儒略(Aleni)到常熟一带布教,经瞿式穀的介绍,瞿式耜结识了艾儒略,他除了研究天主教义以外,对西方科学文化很感兴趣。天启六年(1626),瞿式耜领洗入教,取圣名多默,成为一名天主教徒^[424]。

天启七年(1627)八月,崇祯即位后,打击乱朝紊政的阉党,处死魏忠贤,任用东林党人。崇祯元年(1628)四月,明廷命瞿式耜为户科给事中,他到京上任后,不断向崇祯皇帝上疏,要求整治朝纲,振兴明廷,大胆直言,“搏击权豪,大臣多畏其口”,忤阉党余孽礼部尚书温体仁,罢归常熟。

崇祯六年(1633),温体仁入阁任首辅,他为了加害瞿式耜,怂恿瞿的同乡张汉儒,三次上疏,凭空地罗织五十六条罪状^[425],“诬式耜与谦益结为死友,侵国帑,谤朝廷,危社稷”^[426]。因此,崇祯帝认为瞿式耜“婪迹多端”^[427],下令“扭解来京”^[428]审讯。瞿式耜

于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到京,第二年闰四月被治罪下狱。后来经过刑部尚书郑三俊复查,弄清这是一桩冤案,结果张汉儒刑毙,温体仁被迫去职,直到次年十月瞿式耜方出狱回到常熟。虽然许多言官请求允许瞿式耜入朝任职,但是因温体仁的党羽周延儒在朝掌权,故拒而不纳。

顺治元年(1644)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五月,史可法等人拥立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九月,弘光帝授瞿式耜为应天府丞,不久擢为右金都御史,巡抚广西。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二月,瞿式耜启程赴任,临行前向弘光帝上疏,提出在广西的施政,首在“收拾人心,慎重门户,修饬武备,严伦序以肃土司,怀远人以清奸宄,封黎苗以定交南,补员缺以靖内地”^[429]等等。闰六月,当瞿式耜到达梧州时,腐败的弘光朝已经败灭。此时黄道周等人奉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瞿式耜原想立安仁王为帝,但得悉唐王已在闽监国,故而作罢,却仍认为唐王“伦序不当立,不奉表劝进”^[430]。八月,广西的靖江王朱亨嘉,“睥睨神器”^[431],不奉隆武帝,“自称监国,举兵将东”^[432]争立。他为了扩大势力,特派金堡到梧州联络瞿式耜,许以官爵,求得拥戴,却遭到瞿式耜的严词拒绝,并复书说:“两京相继陷,大统悬于一发,豪杰睥睨逐鹿,闽诏既颁,何可自兴内难为渔人利!”^[433]希望靖江王以抗清大局为重,不要使亲者痛,仇者快。可是“素狂悖喜乱”^[434]的朱亨嘉不听劝告,又遣桂林道进济来胁迫瞿式耜到桂林听命。瞿式耜不答应,则感到事态严重,便“移书总制丁魁楚为之备,而阴檄思恩参将陈邦傅防梧,止狼兵勿应亨嘉调”^[435]。朱亨嘉老羞成怒,亲自至梧州,对瞿式耜没有以君臣之礼相迎,只以王礼相待,十分不满。他向瞿式耜强索巡抚敕印,未能得手,即“劫之去,幽于邸第”^[436],百般虐待。瞿式耜身被监禁,他的夫人邵氏遣人赍疏唐王,请求救援,于是隆武帝令丁魁楚遣周帮傅,进讨靖江王朱亨嘉,结果靖江王战败,退守桂林。

由于朱的部将中军官焦琏归顺瞿式耜，充当内应，周邦傅很快攻克桂林，靖江王被擒，瞿式耜获释。隆武帝以功授瞿式耜为兵部右侍郎，召理戎政，但他一再推辞，不愿入闽为官。十一月，隆武帝派遣晏日曙来广西任巡抚，瞿式耜离职，仍留居桂林，不久迁往肇庆。

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八月,唐王朱聿键在汀州为清军所杀,隆武朝灭亡。十月十四日,瞿式耜等人奉桂王(即永明王)朱由榔监国肇庆,桂王授瞿式耜为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务。当时的形势很不利,清军从江西、湖南向广东推进,很快攻占入粤北的门户赣州。胆小无能的桂王在司礼监王坤的鼓动下,准备弃肇庆逃跑,瞿式耜坚决反对,他说:“今日之立,为祖宗雪仇耻,宜奋勇以号召远近。外弃门户,内衅萧墙,国何以立?”^[437]可是桂王不从,逃往梧州。后因瞿式耜多次恳请,方返回肇庆。

十一月五日,苏观生等人立隆武之弟朱聿键于广州称帝,改元绍武。瞿式耜闻知,便于十八日拥桂王即位称帝,年号永历。因此,绍武和永历之间为争立而发生内讧,瞿式耜奉命率兵御敌,由于总督林佳鼎轻进,兵败三水。此讯传到肇庆,“百官皆逃窜,上亦奔梧州”^[438]。瞿式耜屯兵峡口,阻敌兵西进。十二月十五日,当李成栋率清军攻占广州,杀绍武帝,挥兵西进时,瞿式耜认为“我兵水陆龟至三水,可上下扼也”^[439],永历帝不同意。瞿式耜又请求留守肇庆,抵御清军,朱由榔也不允许。瞿式耜只好跟随永历帝由梧州逃到桂林,此时永历朝廷的许多大臣,不是弃职而逃,就是投降清军,“左右惟式耜一人”^[440]。

瞿式耜到桂林以后,反对永历帝不战而逃,涣散民心军纪,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清基地。他分析形势说:“粤西居山川上游,敌不能仰面攻明矣。兵士云屯湖南、北,南宁、太平出滇,柳州、庆远通黔,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标勇,誓国家威惠,三百年悉受衔轂,足资内备”^[441],由此可见桂林是很理想的地方。同时,他还提出“修纪纲,布威武,抑权阉,招俊杰”^[442],整顿朝政的主张。可是

胸无大志、苟且偷安的永历帝，并未采纳推行。

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一月，清军占领肇庆。二月，继陷梧州、平乐。永历帝大震，他要逃往湖南，瞿式耜竭力阻止，疏称：“从来守成则易，开创则难，今当残破之极，而为中兴之举，事更难于开创。……诟有身承大历，薄海皆以恢疆雪耻仰望新皇，而可但思退着，但思避寇，而不为自强之计者乎？”^[443]并告诫永历帝，“今日之势，我进一步，人亦进一步，我退速一日，人来亦速一日。故楚不可遽往，粤不可轻弃”^[444]。瞿式耜见贪生怕死的永历帝不从，他考虑自己一离去，“便会将城拱手而送矣。故不得已且挣扎”^[445]，要求留守桂林。永历帝同意他留下抵御清军，授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赐剑便宜从事，一切兵马钱粮听其调遣。

三月十一日，平南大将军孔有德率清军由平乐直趋桂林，十四日，破文昌门而入。瞿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无叛志”，他“身立矢石中，与士卒同甘苦”^[446]，率领军民进行英勇巷战，击退了清军的进攻，取得了桂林保卫战的首次胜利。五月二十五日，孔有德得知桂林城中总兵刘承胤兵变，乘机再次发动进攻，瞿式耜与总兵焦琏“分门婴守，用西洋銃击中骑兵”^[447]数百人。然后开城出战，“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括署中米蒸饭分哺之，士卒腾饱，奋击”^[448]，“直入冲阵，王师（清军）弃甲仗而奔”^[449]，斩敌数千人，获得大量甲冑马匹器械等。此时广州清军告急，孔有德只好弃桂林之围，回兵救援，瞿式耜乘胜派兵收复阳朔、平乐、梧州等地。这次桂林大捷，狠狠地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湖广一带抗清军民的士气。

十二月初三日，颠沛流离的永历帝回到桂林。瞿式耜为了实施恢复大计，他认为“所重者，在外犹在内也”^[450]，请求永历帝“揽大权，明赏罚，亲正人，闻正言”^[451]。然而永历帝置若罔闻，不理朝政。顺治五年（1648）二月，因南安侯郝永忠在灵川为清军战败，率残兵退回桂林，永历帝惊恐万状，准备再次出逃。瞿式耜表示反

对,他说:“敌骑在二百里外,何事张皇。今播迁无宁日,国势愈弱,兵气愈难振,民心皇皇,复何所依?……若以走为策,我能走,敌独不能蹶其后耶?”^[452]分析了外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永历帝不听,率众逃往南宁。接着郝永忠在桂林发动士兵哗变,大肆掠夺,瞿式耜家也被洗劫一空,被迫暂避樟木港。三月一日,他返回桂林公署,总督何腾蛟、新兴侯焦璉等人应召率军来到桂林,从而稳定了局势。二十二日,清军闻知桂林兵变,乘虚进逼桂林,结果被瞿、何击败。此时,因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相继倒戈反清,归顺永历,故清军收缩到湖南境内,于是瞿式耜遣何腾蛟率军收复全州,军复大振。他见桂林已经安定,上疏请永历帝回桂林主政,指出“前日粤东未复,宜驻桂以扼楚;今日江、广反正,则宜驻桂以图出楚。事机所在,毫厘千里”^[453]。但是,永历帝在王化澄、吴贞毓等人的怂恿下,八月由南宁迁往肇庆,依附李成栋,为李成栋挟持弄权。

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一月,金声桓兵败身死。三月,何腾蛟在长沙遇害。这时李成栋也兵败落水,湖南、江西大部分地区又落入清军之手,因此形势突然大变,对永历政权的威胁日紧。瞿式耜沉着应战,他疏请兵科给事中吴其雷为监军,荐张同敞知兵得士,总督军务。命赵印选驻桂林,遣焦璉守阳朔,派张明刚攻永州。同时,还命令御史毛寿登到湖南、江西联合何腾蛟的旧部,派遣使者到湘西联络大顺军余部,共同抗清。这样各地抗清力量互为犄角,相互支援,所以很快收得了靖州、沅州、黎平、奉天、武冈、宝庆、永兴、来阳、常宁等地。

顺治七年(永历四年,1650)一月,清廷调集大军,进攻两粤地区。三日,清军攻占南雄,永历朝廷“百官争窜”^[454],永历帝也要西奔,瞿式耜奏称:“粤东水多于山,良骑不能野合,自成栋反正,始有宁宇,赋财繁盛,十倍粤西,材官兵士,南北相杂,内可自强,外可备敌,且肇去韶千里,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

今乃朝闻惊而夕登舟，将退至何地邪！”^[455]可是，永历帝不从，逃奔梧州。

此时，平南王孔有德，遣使致书瞿式耜，要他认清形势，归降清朝。瞿式耜复书说臣节所在，死而后已，拒绝投降。三月十九日，清军入龙虎关。九月八日，占领灌阳，接着攻陷全州。但是，桂林的赵印选、榕江的胡一青等人，畏敌皆不出兵迎战。因此，十一月五日，清军出全州，占领兴安，攻破严关，直逼桂林，王永祚率部投降，其他官员纷纷逃走，城中竟为一空。这时瞿式耜独坐署中，他的部下戚良勋牵两匹马，请他上马速走，却遭到拒绝，他说：“四年忍死留守，其义谓何？我为大臣，不能御敌，以至于此，更何面目见皇上提调诸勋乎！人谁不死，但愿死得明白耳。”^[456]紧接着通山王蕴钊来见，并劝说：“为恢复大计，社稷存亡，系公去留，不可缓也。”瞿式耜答曰：“吾此心安者死耳，逃死而以卷土为之辞，他人能之，我固不能也。”^[457]到了傍晚，总督张同敞（张居正孙子）从灵川回来，会见瞿式耜，为其报国精神所感动，愿同死以表忠怀，二人举杯同饮。六日清晨，瞿、张为清军所执，孔有德亲自召见瞿式耜，以礼相待，劝其投降，“说以百端，不应”^[458]，要求速死。孔有德又派瞿式耜同乡王三元、彭旷，先要他剃发，不从。再劝其为僧，也不允。他说：“为僧者，剃发之别名也，剃发则降矣，岂有降（虏）之留守乎？”^[459]孔有德把瞿、张二人关押起来，以待投降，他们每日赋诗唱和，得诗百首，即《浩气吟》，其中有“但将一死酬今古，剩有丹心傍主臣”^[460]，表现了舍死取义的浩然正气。瞿式耜被囚禁期间，不仅用诗进行战斗，而且还设法与外面联系，致书焦琏说：“城中满兵无几，若劲旅直入，孔有德之头可立致也。”^[461]孔有德得知此事，再加上劝降无望，便于闰十一月十七日，将瞿、张二人押赴刑场，行至独秀岩，瞿式耜说：“吾生平爱山水，愿死于此”^[462]，口呼《绝命词》：“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463]，英勇就义。死后由杨艺、姚端收葬，把柩厝

于凤洞山麓。永历帝闻知,赠为粤国公,谥文忠。到了乾隆四十一年,清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宣传忠义,所以乾隆帝赐谥忠宣。此时,瞿式耜的孙子瞿昌文,从桂林负骸归里,葬于常熟虞山。

二、郑成功与“南京之役”

郑成功(1624—1662)是我国著名的抗清将领和杰出的民族英雄。他南征北战,戎马生涯十六年,身经大小战役五十余次,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南京之役”和“台湾之役”,前者以失败告终,后者以胜利结束。现今有关“台湾之役”的论著较多,而研究“南京之役”的文章甚少,这里仅探讨郑成功发动“南京之役”的始末,战略战术的得失。

郑成功,原名森,字明严,号大木,福建南安人。他生活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时期,自从清军入关占领北京以后,在中原大地上存在着三种政治军事力量,即清、南明和农民军相互角逐。当时郑森在明南都南京国子监读书,热中功名,正沿着科举的阶梯向上攀登,企图走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是,南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军大举南下,南京陷落,他那金榜题名的美梦破灭了,便随其父郑芝龙逃回福建。不久,南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郑森前去觐见隆武帝,颇受器重,赐明朝国姓朱,改名成功,委以御营中军都督,封为忠孝伯,军中称之“国姓爷”,从此他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

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二月,清廷命多罗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师往征浙江、福建。八月,清军进攻福建,朱聿键被擒杀,隆武政权复灭。平国公郑芝龙在清廷的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剃发降清,并写信给已逃往金门的儿子郑成功,劝其归顺清朝。但是,郑成功严词拒降,他在复书中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464]而且公开宣称,“不受诏,不剃发,其意如山”^[465]。

此时,郑成功占领安平,仍奉隆武年号,他深知自己势单力薄,不足以和强大的清兵作战,于是他为了避开清军锋芒,便入海到南澳一带招兵训练,充实装备,筹积粮饷,举旗抗清。这样原先隆武朝廷的一些文臣武将和闽浙沿海的反清志士,都纷纷归附郑成功的麾下,所以力量大增。到了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五月,郑成功方知上年十月,永明王朱由榔已在广东肇庆即帝位,称为永历。他立即把永历帝视为其主,非常高兴地说:“吾有君矣!”^[466]所以就尊奉永历为正朔,派遣江于灿、黄志高二人,携带亲修表章,“从海道入广称贺,并条陈时势”^[467]。十月,江、黄二人,偕太监刘玉奉永历帝的诏书到来,晋封郑成功为威远侯。自此以后,郑成功成为永历朝的一支重要力量。

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郑成功建立了以厦门为中心的根据地,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建设。因此力量日益壮大,拥有军士十余万,战船千余艘,雄踞东南,为人瞩目。郑成功虽然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但是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只有反清复明的口号,没有具体的进军方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动性,无疑影响了全军的战斗力。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正月,同安浯州人周全斌前来谒见郑成功,此人文武全才,熟谙兵略。郑成功问他“恢复进兵策”。周全斌答曰:“若以大势论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当先通广西,达行在,会孙可望、李定国师,连踪粤东,出江西,从洞庭直取江南,是为上策。”但是“金声桓、李成栋已没,广州新破,是粤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劳也”。所以“今且固守各岛,上距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举兵取漳、泉,以为基业。陆由汀郡而进,水从福、兴而入,则八闽可得矣”^[468]。然后再待机北上,占据江南。他的这段策论,提出以福建为据点,联合李定国等,“直取江南”,作为恢复明室的战略方针。郑成功听后,很受启发,称之“妙论”^[469],于是采纳了周全斌的意见,积极准备北伐。

自此,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早日实现“南取江南”的战略目标,便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是年三月,郑军占领长泰。四月,围攻漳州。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三月,郑成功又命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和张煌言等人,率兵二万,战舰百艘,由海路北上“恢复浙直州县”^[470]。郑军过舟山、逼金塘、破崇明,使长江一带的清军日夜不宁。这次军事行动,起到了威胁南京、阻截清军粮道的作用。五月,固山额真金蜥率领清军戟海澄,郑成功亲自临阵督战,粉碎清军多次进攻,致使“金固山精锐尽丧”^[471]，“弗敢停鞭,领师回漳郡”^[472],从而郑军取得了海澄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六月,郑成功派监督池士绅前往广西安隆向永历帝报捷,永历帝大喜,随后就遣兵部主事万年英到厦门,晋封郑成功为漳国公。

这时郑成功和李定国两军犄角海陆,成为永历朝廷最有力的两大支柱,而且在军事上接连取得胜利,给清军沉重的打击。因此迫使清廷改变策略,实行东抚西剿的政策,企图通过降将郑芝龙,利用父子之情和高官厚禄招抚郑成功。顺治帝给浙闽总督刘清泰的谕令说:“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联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着管理,稽察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473]八月,郑芝龙遵照清廷的意图,派亲信李德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厦门招抚郑成功,“劝其归降”,并“封海澄公”^[474]。郑成功在给其父郑芝龙的复书上说:“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475],拒绝受抚。

九月,浙闽总督刘清泰也致书招抚郑成功,书曰:“从来大丈夫举事,必使功业有所归,身名无所累,而后奋臂一往,以求白于天下

可也。……足下英雄之姿、忠孝之性，岂甘一时之倔强、而青表史之讥，咫尺之飘摇，而酿赤族之祸也哉？如惧投戈为孤注，何妨联其子弟以归？倘疑赴阙为畏途，何妨请命于桑土而守？不佞以平生忠朴，久见谅于圣明，皆能为足下一剖心以呼吁者。倘都言之不应，不但非男子，且无以质鬼神。”^[476]郑成功不为所动，连信也没有答复。

十一月，顺治帝就郑成功在复其父郑芝龙的一封书信中所言及的问题做了解释，以劝他归降清朝。他敕谕郑成功曰：“尔父持尔书入告，朕览书内有君择臣，臣亦择君之语。尔来投诚，正是择君，朕破格委任，正是择臣，君臣一心，至诚相待，何有不信之处。又云：尔父为贝勒所诟屈抑数年。尔父在睿王时，果有猜疑看守之事，朕亲政以来，优厚大臣，加升尔父官爵。……又云：一攻一议，二三其令。因固山额真奉命在先，刘清泰招抚在后，及尔差人一到，即令撤兵，何尝失信。……又云：三府屯兵并辖三省沿海地方，原敕止有泉州等处，并未有三府之说，此传言之误。……复念尔兵卒众多，一府难以安插，钱粮委难支给，仍益以漳州、潮州、惠州三府并泉州四府驻扎，即将四府水陆寨游营兵饷拨给尔部下弁兵。……尔原辖武官，听尔遴选委用。……开洋船支，尔得稽察，收纳课税。……朕待尔推心置腹，毫无猜疑。”^[477]郑成功拒之不理。

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郑芝龙再遣李德，随清廷的郑、贾二使，带着“海澄公印”^[478]到福建进行招抚。郑成功得知以后，命常寿宁等前去谈判，并对他说：“议和之事，主宰已定，不须尔等言及。应对，只是礼节要做好看，不可失我朝体统。应抗应顺，同时酌行，不辱命可耳。”^[479]当常寿宁等到达福州，清廷来使派按察司道黄澍接待，双方“议相见礼”^[480]时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无法谈判。二月六日，郑成功在安平与清使相见。次日，他“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将为辞，复二使，然不受敕印”^[481]，郑、贾二人只好扫兴而归。

五月,郑成功认为议和中辍对己不利,一旦清廷加强对福建用兵,势必影响北伐。因此,他给浙闽总督刘清泰去信,提出“必有三省方就和”^[482],此书收到预想的效果,又引起清廷对议和的兴趣。所以,六月清廷就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同郑成功的胞弟郑渡舍、郑荫舍等,“赍四府安插兵将敕命入闽”^[483]。七月二日,顺治又敕谕郑成功说:“自古识时俊杰,遇推诚待人之主,披肝效顺,矢忠勿二,方能建立事功,身名俱泰,未有猜疑观望,可称识时知命者。……封尔公爵,给与敕印,俾尔驻扎泉、漳、惠、潮四府,拨给游营兵饷,养尔部下弁兵,朕之推诚心待尔,可谓至矣。尔自当剃发倾心,义不再计。……今如遵照所领敕印,剃发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貽后悔。”^[484]

八月初,叶、阿二使到达福州。十九日,他们派李德等先到厦门谒见郑成功,告知清廷遣使前来招抚。九月七日,再命郑渡舍去厦门,“渡舍见藩跪下,涕泣泪涟,称父在京许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难保,乞勉强受诏”^[485]。十七日,郑成功在安平宴会清廷使臣,叶、阿二使为了胁迫郑成功归降,“其随从精骑数千,步旅万余,漫山遍野扎营,了哨四出,各相提防”^[486]。郑成功早有防备,所以对此根本不放在眼里。清使要郑成功剃发接诏,而郑成功却坚持“先开诏书酌议,方肯剃发”^[487],双方“互争数日未定”^[488],结果谈判破裂。

郑成功“和议非本心”^[489],只是把议和作为策略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麻痹清廷,争取时间进行备战。所以,他在议和谈判中,有时态度暧昧,有时争执不让,有时一再拖延,因而使清廷琢磨不定。郑成功乘机为北伐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准备工作:

——相约会师。郑成功为了联合李定国在北伐中采取一致行动,于永历八年二月,致书李定国曰:“今震居既云巩固,而帝业未可偏安;况中原有可乘之机,胡运值将尽之时,宜速乘势,并力齐举。兹不佞现提水陆精锐,收得闽浙,熏风盛发,指日北上。愿老

亲翁卷甲长驱，鼓行迅击。首尾交攻，共焚济河之舟；表里合应，立洗腥膻之穴。然后扫清宫阙，会盟畿辅，岂不大符夙愿哉。”^[490]九月，李定国复书赞同“会师”，提出先南后北，即先调兵南下勤王，会师广东，然后再挥师北上，直取江南。

——整军练兵。郑成功“以和议不就，必东争西讨，事务繁多”^[491]，无暇兼顾政务，便于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设六官分理庶事。又特设储贤馆、育胄馆^[492]，招收阵亡将领和明朝遗臣的子弟，以充实各级军政机构。与此同时，他大力整顿军事组织，把全军分为七十二镇，每镇分五协，并建演武亭加强练兵，每日“亲临督操，步伐正齐，逐队指示”^[493]。而且制定“各镇合操法”和“水师水操法”，皆“刻板通行”^[494]。另外，严明军纪，赏罚分明，规定出征战剿时，“军前不用命者斩，临阵退缩者斩，副将以下先斩后报”^[495]。

——筹集粮饷。郑成功利用议和，乘机筹饷，他说：“清朝亦欲给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496]，因此“征派四出”^[497]。根据史料统计，仅永历七年八至十一月，郑军就在晋南、云霄、龙岩、惠安、仙游等地方，共征饷七十五万石。又如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郑成功命甘辉等，率军攻占海澄，获粮二十五万余石。第二年，郑军又从温州金山卫、福安、黄石等地方，缴获大批粮食，运往金门贮藏，以济北伐军粮。

——探明虚实。永历八年正月，定西侯张名振等，首次率领郑军进入长江，没有受到任何阻挡，很快进抵镇江，登金山，望江宁，“致祭先帝而回，金陵闻风震动”^[498]，顺治帝立即传令：“苏松官兵疾趋夹剿”^[499]，可是郑军已撤驻崇明。四月，张名振等再次领兵溯江南上，趋瓜州，捣仪征，逼金陵。五月，郑军回师时，攻打“吴淞关，获级四百，战艘三百七十，告捷于金门”^[500]。永历九年七月，郑成功认为“宜分兵与定西侯并忠靖伯等会师进入长江，捣其心腹，使彼不得并力南顾”^[501]。遂命右军忠振伯洪旭为总督，率领

大军北上,攻打台州,该城守将马信投降,又进攻舟山,据守此城的巴臣功归降。于是洪旭与张名振很快会师,正准备再次进入长江,不料张名振去世,所以此议作罢。虽然此次郑军没有深入长江进行战略侦察,但是对浙江沿海的清军防御力量已经查明,并且把舟山作为北伐进军的基地。

由此可见,郑成功乘清廷把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西南李定国,江南防御空虚之机,以及利用双方议和谈判,争取时间进行作战准备,这样将北伐战争逐渐提到日程上来了。

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郑成功召开会议,征求诸将对北伐的意见。

吏官潘庚钟说:“边地虽得,亦不足以号召天下豪杰。昔太祖起义濠州,若不得俞通海、廖永忠等水军,安能夺采石而得金陵,以成一统之基?以钟管见:漳、泉沿边,数载争战,民亦苦极。不如将数百号战舰,直从瓜镇而入,逼取江南。南京一得,彼闽、粤、浙、楚以及黔、蜀之豪杰志士,悉响应矣。”

可是,中提督甘辉却持不同看法,他说:“江、浙地广,非数十万师不可。倘大队前进,而贝勒侦知,会合水师出攻两岛,岂不危乎?不如就退,窥其衅隙攻取,进可战,退可守。”

潘庚钟反驳甘辉说:“公所言,眼前常见,非长久计也。今若不取,是自老其师。倘一旦会天下之兵以窥我,两岛岂能独全乎?所未暇全师及此者,尚有滇、黔、粤西孙可望、李定国等牵制。刻不藩主统貔貅之众,入据长江,截其粮道,则江南半壁悉为我有。彼自顾不暇,奚暇攻我两岛哉?”

工官冯澄世支持潘庚钟的意见,他说:“潘参军之论,正是舍末而就本。若今日坐老其师,不取江南,清朝之志未必便忘两岛,所谓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亦理势使然也。”

参军陈永华亦赞同说:“倘徒在闽争野争城而望中兴,此亦甚难。今日潘、冯二参军持论师从江南,号召天下,其见甚高。盖取

江南而两岛自安。若偷安岁月，一旦合攻，虽使诸葛复生，亦难措手矣。”

最后，郑成功同意北伐的主张，他说：“吾亦有心久矣。正武侯所言势不两立。清朝其肯每饭忘我耶？当先遣人从间道抵粤西请旨，令孙可望、李定国集滇、黔、粤、楚之师出洞庭而会江南，以分其势，俾天下英雄跂足相从。”〔502〕

这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统一了诸将对北伐的认识；二是明确了把南京作为战略打击的目标；三是重申了要联合李定国等共同北伐。

九月，郑成功遣杨廷世等赴粤西，向永历帝上书报告北伐的计划，书曰：“欲躬督舟师从瓜州、镇江入，直取金陵。请命李定国、孙可望等领兵，由楚泛沿庭，会合恢复，以迎圣驾。”永历帝对此书非常重视，立即召见杨廷世等人，问郑成功的兵力状况，杨廷世答曰：“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余万。粮饷虽就地设取，尚有吕宋、日本、暹罗、咬留吧、东京、交趾等国洋船可以充继。”于是永历帝晋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又自书手诏，令其速进师江南，伸大义于天下，号召英雄，勤王迎驾”〔503〕。十一月，李定国亦给郑成功致书说：“以明年夏会南都，驰檄荆西，约王光兴、李来亨等会荆州，号召四出，期大举出楚。”〔504〕

郑成功收到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来书以后，积极准备出征，此间训练铁人以对付清军骑兵，公布北伐禁条以严军令，并命黄廷、洪旭等留守厦门。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十三日，郑成功命中提督甘辉为前部先锋，统率左虎卫陈魁铁人五千，护卫兵一万，另有宣毅前镇陈泽、宣毅后镇吴豪等兵一万，配坐大烦船二十只、乌船二十只、快哨船十只为首程；又以右提督马信，统率右先锋镇杨祖，援剿左镇林明等兵二万，配坐大战船三十只、赶缯船二十只、快哨十只为二程接应；又遣后提督万礼，统率援剿右镇贺世明、右冲镇蔡禄等兵二万，配坐大烦船三十只、艍船二十只、快哨十只

为第三程接应。他亲自统领军兵四万人,战船一百二十只,由厦门启航,“开驾北征”^[505]。

六月七日,郑军进抵平阳,清守将单任暹投降。十三日,攻打瑞安,守将艾诚祥献城归降。七月二日,郑成功率兵到舟山,在此休整了一个多月。八月九日,他领兵北上,航至羊山,遇到强台风的袭击,结果郑军“覆舟五十余号,溺死数千人”^[506],郑成功的坐船被打坏,六个嫔妃和三个儿子也惨死了。因为郑军遭到重大损失,北伐受挫,所以郑成功认为“今船只兵器损失,长江难进矣,须溜回舟山收拾,再作区处”^[507]。十四日,郑军回到舟山,整修船只,补充粮食,待机北上。

到了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春,西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清军分三路入滇,会师昆明,李定国兵败磨盘山,永历王朝危在旦夕。这时郑成功决定挥师北上,深入长江,进攻南京,“以图牵制”^[508]。于是,五月四日,他“传令听议进取长江事宜”^[509],分派众将任务,并宣布征战纪律。十八日,郑成功进抵崇明,“欲顺风入瓜州”^[510],因张煌言曾四次攻入长江,故命他为全军前驱向导,率兵六千,溯江南上。六月一日,郑军过江阴。十四日,抵达镇江,距离瓜州十余里。郑成功召集诸将议曰:“瓜镇为金陵门户,宜先破之。”^[511]

瓜州是南京的大门,扼制长江的重镇,清军在此已经加强设防,“于金(山)焦(山)间以铁锁横江,所谓滚江龙者”^[512],并在“圉山及谭家洲皆设大炮”,而且在上流又设有“木浮营”^[513],以阻止郑军前进。十五日,郑成功命程应璠等率领水师船攻打谭家洲“炮城”,派张亮等督泗水荡船斩断“滚江龙”,遣张煌言等辖兵焚夺“木浮营”。郑清两军经过一番激战,结果郑军粉碎了清军的瓜州防线,“炮城”、“滚江龙”、“木浮营”皆被摧毁。十六日,郑成功率军渡江来到瓜州,下令攻城。该城守将朱衣佐、左云龙领兵出城迎战,“两阵相对,隔一小港,铕矢交击”。郑军“下水,直渡小港。……突

上岸，守兵不意，惊骇”，“清兵退走入城，诸军乘胜竖梯攻城”^{〔514〕}，遂克瓜州，阵斩左云龙，生擒朱衣佐。

郑成功攻占瓜州后，议师新向，“延平即欲取石头（南京）”。可是熟知江情的张煌言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润州（镇江）实长江门户，若不先下，则虏舟出没，主客之势殊矣”^{〔515〕}。周全斌也说：“今瓜州已得，可乘势连取镇江，反掌之易。倘若迟缓，彼得深沟固守，徒费士卒。”^{〔516〕}郑成功听后深感有道理，但是仍存有疑虑，他说：“吾顿兵镇江，金陵援骑，朝发夕至，为之奈何？”张煌言曰：“吾以偏师由水道薄观音门，金陵将自守不暇，岂能分援他郡。”^{〔517〕}同时，他又进言说：“瓜州陆兵虽败，尚有水师退入芜湖。彼若侦我师登岸扎营，顺流冲下，未免牵挂。当速整水师直捣芜湖，一则牵杀虏船，二则声取南都，以分其势，使不敢来援。然后陆师可无却顾，进取镇城必矣。”^{〔518〕}郑成功完全采纳了张、周二人的建议，“即请阁部（张煌言）往，并以直达芜湖为约”^{〔519〕}。然后，他传谕诸将曰：“兵贵神速，瓜州已下，水师遣进南部，虏不暇及镇江。我全师乘胜，直逼其城，虏若婴固自守，攻打迟我数日功夫，倘不揣来战，则一鼓而败之，城可立降也。”^{〔520〕}

正当郑成功率领浩浩荡荡大军，沿江而上，攻打瓜州时，清镇江守将戴可进、高谦等，立刻派人向南京的江南总督郎廷佐告急求援，郎廷佐命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率兵前来协守。于是戴可进等率领兵骑一万五千人，驻扎在银山准备迎战郑军。十九日，郑成功领兵进泊镇江南岸七里港，此时清军“骄躁，急欲与战”，可是郑军却采用疲劳战术，“海舟忽上忽下，见清军驻南，则泊于北，清军驻北，则泊于南，佯为畏避以诱之。清兵随走三日夜不息，露立江边，甚疲”^{〔521〕}。到了二十二日，郑成功突然率军登岸，向清军发动进攻，“郑兵前队长枪，次阵团牌，第三阵倭銃……然多步卒”。而清军骑兵居多，便“万骑突前，郑兵严阵当之，屹然不动，俱以团牌自蔽，望之如堵。清兵三却三进，郑阵如山，而清之长技尽

矣”^{〔522〕}。因此，清兵惊溃，败退银山。是日夜，郑成功命陈魁督率“铁人”攻打银山，这些“铁人”，“俱铁甲冑，钱面头子，止露两足”^{〔523〕}，清兵不知为何物，“骇然不敢出战，惟齐射之，箭不能入”^{〔524〕}，遂大败。戴可进、高谦带领残兵败将退守镇江城。管效忠逃回南京，蒋国柱逃奔常州，郑成功令马信前往镇江招降，马信驰城下大呼曰：“速速献城，迟则屠矣！今外兵已杀尽，汝等不信，请观扬蓬山（管、蒋二将驻兵处）。”^{〔525〕}二十三日，戴可进、高谦等，开城投降。

郑成功占领瓜州、镇江，为进军南京扫除了障碍。二十七日，他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参军潘庚钟说：“今既一鼓而克瓜镇，是则江南门户已破。虽军声大振，天下摇动，未可骤然进兵，当暂住瓜州，遣将分据淮、扬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窥其衅隙，然后大队齐进。况北都满、汉兵民人等不下百万，一旦粮道断绝，待哺不足，两月之间，其兵必溃，其民必乱，如此可不劳而定。”^{〔526〕}冯澄世支持潘庚钟的意见，他说：“江南城池广阔，进攻不易。不如且听庚钟之谋，驻扎瓜镇，据其险要，断其粮道。一面收拾人心，一面遣人从间道报捷请旨，命李定国等合师乃为上策。”^{〔527〕}郑成功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他对诸将说：“若不进兵恢复旧业，呼召天下豪杰，是自老其师。倘征各省兵马齐至，首尾合击，我势岂不自孤？况太祖昔日一得廖永忠、俞通海等水师，乘势夺采石而并金陵。破竹摧枯，正贵神速耳！”^{〔528〕}所以决定进军南京。

二十八日，郑成功又召集诸将研究如何进军南京，中提督甘辉建议由陆路进军，他说：“兵贵神速，乘此大胜，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繇陆长驱，昼夜倍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倘敢迎战，破竹之势，一鼓而收。不则围攻其城，以绝援后。先破其郡，则孤城不攻自下。若繇水而进，则此时风信不顺，时日稽迟，彼必号集援虏，婴城固守，相对□战，我亦多一番功夫矣。”^{〔529〕}此时奉命溯江而上已抵观音门的张煌言，得知郑军攻占镇江的消息，便致书郑成功，“谓

兵尚神速，若由水道，迟拙非策”^[530]，“请以步卒陆行赴白下（南京）”^[531]。郑成功赞同他们的意见，可是有些将领“以为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病。□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再加上“时因大雨，沟河难过”，所以郑成功“更议由水进发”^[532]。随后留刘猷守瓜州，周全斌、黄昭守镇江，并且命令张煌言率水师进攻芜湖，他说：“芜关居江楚下流，为江介锁钥重地。倘金陵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可虞也”^[533]，故“请煌言控扼芜湖，以制上游”^[534]。

七月四日，郑成功率领全军从镇江出发。七日，进抵观音门。八日，命黄安督领水师，“泊三叉河口，堵御虏船”^[535]。九日，传令各官兵船停泊在南京仪凤门外的江面上，而自己亲率众将登岸“踏看地势”^[536]。十日，命令郑军由仪凤门江边登陆，在狮子山一带下营。十二日，郑成功下令移营，开始围困南京城，命部将甘辉、余新扎狮子山；万礼、杨祖扎神策门南，翁天佑扎仪凤门；马信、郭义、黄昭、肖拱扎汉西门；陈鹏、蓝衍、陈魁、蔡禄、杨好扎城西南角，依水为营；刘巧、黄应、杨正、戴捷、刘国轩扎城西北角，傍山为垒；张英、陈尧策、林习山扎幕府山下；郑成功的中军大营就设在幕府山，“各设鹿角了望，深沟木栅防御，江南一时震动”^[537]。

与此同时，郑成功还命令张煌言招抚江南，袁起震招抚江北。张煌言率军到达芜湖以后，相度形势，遣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州，以截上流；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徽州。并“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附，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石埭、青阳、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538]。另外，袁起震到江北亦安抚了滁州、六合、和州、合山、来安等处，“时归附者接踵而至”^[539]。

此时，清朝驻守南京的江南总督郎廷佐、巡抚蒋国柱等，惊恐

万状。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一则江南的清军大部分调往西南攻打李定国，南京防守兵力十分虚弱；二则南京是明朝的留都，有比较深厚的反清社会基础。所以，当郑成功率军北上后，永历十三年二月，郎廷佐就上疏请求派兵增援，他说：“海贼郑成功，拥众屯聚海岛，将侵犯江南，而江省各汛兵数无多，且水师舟楫未备，请调发邻省劲兵防御。”^[540]六月十九日，郎廷佐得知瓜州失守，又给清廷上疏说：“速从京师调遣大兵前来，方可恢复瓜州，大江两岸城池亦不致失守。”^[541]

七月八日，顺治皇帝听到郑成功进入长江，瓜镇失守，江宁危急的消息，既惊又怒。据魏特的《汤若望传》记载：“这个噩耗传至北京，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么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他一听皇太后底这话，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这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照这样他要对待一切人们的，只要他们对于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语为平复皇帝底这暴躁，另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面前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各城门贴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顿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542]后来，虽然经汤若望的进谏劝阻，顺治帝没有御驾亲征，但是他一会儿想逃回关外，一会儿要督军亲征，这就充分说明了郑成功北伐，不仅给清廷以沉重的打击，而且社会影响也是很深刻的。

江南总督郎廷佐眼看郑军登陆，南京被围，便与诸将商讨对策。刚从郑军中逃回南京的操江军门朱衣佐说：“海贼虽是猖獗，其众不过数万，其船不过数百，瓜镇之失，皆由一时无备，故遭所破。今可速遣人卑辞宽限，以骄其志，然后设守御之策，征援兵破

之。”^[543]郎廷佐采纳了他的意见，一进七月十二日，“佯使人通款，以缓其攻”^[544]，纳款人见到郑成功叩禀曰：“大师到此，即当开门延入。奈我朝有例，守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宽三十日之限，即当开门迎降。”^[545]郑成功中计，他“允其请”，并且说：“本藩攻此孤城，不过一脚尖耳。既然来降，姑准其宽限者，盖欲取信于天下也。若至期不降，攻入之时，寸草不留。”^[546]

可是，有些将领识破了郎廷佐的计谋，向郑成功建议迅速下令攻城。潘庚钟指出：“此乃缓兵之计，不可凭信，可速攻之。”^[547]郑成功却认为：“自舟山兴师至此，战必胜，攻必取，彼焉敢缓吾之兵耶？彼朝实有定例，尔勿多疑。”^[548]潘庚钟又劝说：“孙子有云，辞卑者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欲降则降，岂恋内顾，决是城内空虚，速为进兵攻之，乃为上策。”^[549]郑成功却说：“古者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今既来降，又准其约，若骤然攻之，彼心不服。俟其不如前约，然后急攻，莫谓城内人心悦服，且使天下皆知我仁义之师。”^[550]十七日，郑成功会见众将时，甘辉说：“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功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551]郑成功不听，却要“诸将暂磨砺以待”^[552]。这时张煌言看到“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初不闻发一镞射城中”，所以他从芜湖“上书延平，略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553]，“劝成功急攻南京”^[554]。但是郑成功对一切忠告，置若罔闻，完全沉溺于已经取得的胜利之中，忙于祭祀明陵、庆祝寿辰，因此“士卒释兵而嬉，樵苏四出，营垒为空”^[555]。郑成功围困南京，前后共十二天，按兵不动，等待清军自动开城归降，他在用兵方略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导致以后“南京之役”的失败。

江南总督郎廷佐利用缓兵之计，“昼夜坚守，檄调各路步骑及水师”^[556]。水师总兵梁化凤由崇明带领步骑三千余人，游击徐登第由苏州带领步骑三百人，参将张国俊由金山带领步骑一千人，守

备王大成由浏河带领步骑一百五十人，协领牙他里等由杭州带领步骑五百人，“俱抵江宁”^{〔557〕}，南京清兵力量大增。同时，郎廷佐亲自率领官员贮备粮草，置办军械，修造战船等。另外，命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等负责城防，日夜巡视，缉查奸细。还有，在城内发布告示，安定民心，动员百姓协同守城，等等。可见，郎廷佐乘郑成功麻痹轻敌之机，做了充分的作战准备，待机进行反击。

二十二日，郑成功部下有个姓林的叛逃者，对郎廷佐说“逾三日城必破矣，明日二十三日为成功生日，诸将卸甲饮酒，乘其不备可破也”^{〔558〕}。果然，第二天清兵向郑军发动进攻，凌晨天色未明，梁化凤率领军兵五百人，掘开“向久砌塞”的神策门，突然偷袭驻扎在仪凤门外大道上的前锋镇余新部；余新率部仓猝应战，此时驻守仪凤、钟阜二门内的清军亦开城参战，两军展开激战，终因郑军寡不敌众，余新被擒，前锋营全军战没。然后梁化凤率领清军又向中冲镇肖拱宸的驻地进攻，经过一场恶战，郑军死伤很多，肖拱宸弃军投水逃走。这时驻扎在桥头的后提督万礼，欲来救援，可是清军已收兵回营。当左提督翁天佑奉主帅令前来支援时，前锋、中冲二镇已经被歼灭，并发现清军已出城扎营，列阵以待。所以翁天佑不敢冒进，只好与万礼合营同守，派人向郑成功报告军情。

当天晚上，郑成功召集诸将研究战况，虽然损失二镇人马，但是郑军主力却未受损。然而郑成功却轻率决定立刻移营，大营从幕府山迁往观音门，可是甘辉等人不同意，怕突然移营致使军心浮动，敌兵追击，故“劝成功暂抽兵将出观音门，相机以图再举”。郑成功对此不以为然，却说：“小挫锐气，便欲思退，明日正欲观诸君建功耳。”^{〔559〕}因此不听劝告，立即传令移营，各派地分扎，“令左先锋镇杨祖统援剿右镇姚国泰、后劲镇杨正、前冲镇蓝衍屯扎大山上，作犄角应援；中提督（甘辉）、五军伏（张英）在山内；左武卫（林胜）、左虎卫（陈魁）列在山下迎敌；本藩督右虎位（陈鹏）、右冲镇

(万禄)在观音门往来应援;后提督(万礼)、宣毅左(万义)等堵御大桥头大路;令右提督(马信)、宣毅后(吴豪)、正兵镇(韩英)由水抄摄其后;令左冲镇(黄安)专理水师,防其由水抄犯,分遣已定”^[560]。

同日晚间,清方郎廷佐亦召开军事会议,“会同满汉各官酌议进剿机宜”^[561],决定明日全军出击,与郑军决战。清军的部署是:总督郎廷佐负责守城,其余满汉官兵分为水陆两路,由昂邦章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马尔赛、总兵梁化凤等率领陆路人马;由提督管效忠、协领扎尔布巴图鲁、费雅珠巴图鲁、副将冯武卿等率领水路人马,从东西两面夹击郑军。

二十四日晨,清军齐出,进抵观音山郑营,这里北临大江,山势陡峭。陆路清军到此,又分为三支,一支由梅勒章京玛尔赛、吴孝力、汉军营总马如江等负责指挥、总兵梁化凤等协助,然后分成六队,从山的六面,分头进攻;一支由护军统领巴哈塔、蒙古营总阿杜赖、汉军营总赵锡章等分率八旗兵、协领牙塔里、副将姜腾蛟、参将张国俊等率领绿营官兵,攻打山的西面;一支由参领佟浩年等统率军兵,进攻山的北面^[562]。随之,管效忠带领水路清兵也到达,于是合攻郑军。

这时,郑军由于移营,立足未稳,便遭到清军猛烈攻击,杨祖、姚国泰、蓝衍、杨正的四营溃散,前来援救的陈鹏、万义二军被梁化凤率领的清军铁骑歼灭。然后,梁化凤和噶褚哈等率军,把驻守谷内的张英、甘辉二军包围,结果张英为乱箭射死,甘辉受伤被擒杀。守卫在山下的林胜,看到郑军损失惨重,可是山上主帅郑成功还不下令反击,正要率军前去请战,却遇到管效忠率步骑从水路来攻,两军进行激战。这时,在城上观战的郎廷佐,派遣一队人马,由小东门出城,袭击林胜的背后,林胜前后受敌被歼。另外,驻守山下的陈魁率领“铁人”上山,要去保护主帅,也被梁化凤的骑兵拦截,陈魁中箭身死,“铁人”全部被歼。驻守大桥头大路的万礼、万义二

营亦遭清军围攻，郑军奋勇抵抗，不幸败灭，万礼被擒杀，万义投水逃走。

就在这战斗紧张、关键时刻，郑成功作为全军主帅，擅离职守，轻率离开帅位，命潘庚钟守卫中军大帐，自己带领十几名亲兵到山下，令水师速援。此时全军失去指挥，群龙无首，陷入混乱，没有军令，各镇既不敢互相救援，又不敢自行进退，皆孤军作战，被清军各个击破。然后清军向驻扎在山上的帅营发动全面进攻，潘庚钟率领将士英勇奋战，最后壮烈牺牲。郑成功在江边，看到“大势已溃，遂抽下船”^{〔563〕}，逃往镇江。

郑成功退到镇江后，有些部将和地方士绅，建议以镇江为据点，整军再战。如张煌言来书说：“兵家胜负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诸郡邑，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图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万生灵何。”^{〔564〕}可是郑成功认为坚守镇江，就成了四面受敌的孤军，必败无疑，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二十八日他传令撤离镇江，八月十三日退出长江，北伐至此结束。

综观“南京之役”，郑成功由胜转败的原因何在？据徐鼐在《小腆纪年附考》一书中说：“成功江宁之败，论者惜其拒甘辉坐守瓜、镇之言，庚钟分扼淮、扬之策，恃锐轻进，以丧其师，此事后成败之论耳。……就使坐守瓜、镇，而山东之师冲其左，江、楚之援掣其右，金陵郎廷佐、梁化凤捣其中坚，岂能全师而返哉！孤军深入，自老其师，昭烈所以败于猇亭也。违众独断，孤注一掷，成功非无所见哉！兵骄者败，理固然也。”^{〔565〕}郑成功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应是“骄兵”所致，当他得知此役“死事者：甘辉、潘庚钟、万礼、张英、林胜、蓝衍、陈魁、李泌、杨标、魏其志、林世忠、张廷臣、洪复、吴赐等十四大将，其余标下将，不可胜计”，便“大恸，谓三军曰：是我欺敌，非尔等之罪也！”^{〔566〕}承认自己因骄傲轻敌，造成“南京之役”的重大损失。

郑成功发动的“南京之役”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没有因此而灰

心丧气,而是吸取经验教训,继续坚持抗清斗争。郑成功为了争取时间,重振旗鼓,派遣蔡政到北京议和,此时清廷对西南李定国用兵基本结束,所以把进攻的矛头由西南又转向东南。因此,清廷不仅不接受议和,反而命安南将军达素,率领满汉大军南下,进攻郑成功的金、厦根据地。郑成功在清军的压力下,就想另辟抗清基地,当然台湾最为理想,于是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他一举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三十八年的台湾。从这点而言,没有“南京之役”的失败,可能就没有“台湾之役”的胜利。

三、郑经与三藩之乱

郑经(1642—1681),字贤之,号式天,福建南安人。他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长子,康熙元年(1662)继承延平王位,奉亡明正朔二十余年。郑经统治台湾期间,虽然在开发和发展社会生产方面做出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坚持封建割据,阻挠祖国统一,骚扰东南沿海,破坏社会安定方面却犯了严重的历史性错误,故遭后人的谴责和唾弃。

(一)不识时势

从顺治定鼎北京到康熙继承皇位,这十多年神州大地发生了重大变化。早先清、南明和农民军政权三方对峙的局面已经过去,遍及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斗争业已结束。由于明末清初社会长期战乱,生产凋敝,经济残破,因此各族人民迫切要求国家统一,休养生息,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可是孤悬海外的台湾郑氏,却成了统一的主要障碍,尽管郑成功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了台湾,然而台湾同大陆还是处于分裂状态。郑经上台后,随着清王朝各项政策的调整 and 经济的恢复,国内社会矛盾已经缓和,过去抗清的正义性消失了,国家的统一成了大势所趋。况且,此时沙皇俄国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正分南北两路入侵,妄图掠夺我国领土、财富和人民,

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所以国家的统一就显得更为重要。郑经乃是平庸之人,“不务宏远,褊隘器小,不能和辑诸将,好博弈酒色”^[567],既无韬略,又无灼见,对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一无所知,却抱残守缺,逆历史潮流而动,大搞封建割据,破坏国家统一,他从容自得地说:“我远处海岛,可无忧。”^[568]

台湾和大陆的敌对状态,给海峡两岸的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清政府为了瓦解和消灭台湾郑氏反清力量,由于没有强大的水师与战舰,缺少进取台湾的必备条件,所以康熙皇帝说:“今人海征剿……战舰无多,遽以入海,恐变出万一,未能得志。”^[569]因此采取禁海、迁界措施,规定片板不许入海,“凡海岛中及近海居民,皆迁入内地”^[570]。并在沿海一带,开界沟、筑界墙、立界碑,又顺着界沟和界墙,每隔三十里设一营,屯兵守卫,藉以“坚壁清野,以待其困”^[571]。这种办法使得沿海人民“荡析流离,又失海上鱼盐之利”^[572],正像当时人陈迁鹤所说:“以予所见言之,方海患昌被时,当事议主坐困,迁濒海数千里内居民入内地,以绝其交通之路。朝命甫下,奉者过于严峻,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踉跄,富人尽弃其资,贫人夫荷斧,妻襁儿,携斗米,挟束藁,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573]于是造成沿海各省大片土地荒芜,百姓背井离乡,对外贸易停顿,当然清廷要负主要责任,可是郑经也不能推诿。福建总督姚启圣说:“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574]与此同时,郑经在台湾,对内加强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粮征浪费,割肉医疮,峻法严刑,壅川弭谤,生计者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矣”^[575]。“百姓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每人口纳银五分,名曰毛丁;船计丈尺纳饷,名曰梁头”^[576],“横征苛敛……几十年来,民番重困”^[577]。对外穷兵黩武,台湾凡文武官司田甲与百姓丁壮,每十人抽一人入伍服役,经常派兵“出没岛屿、窥伺内地”^[578],“往往乘风潮出掠”^[579],“沿海郡县,蹂躏几遍”^[580],“坏人

屋庐,荒人田土”^[581],给社会生产带来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造成无限的痛苦。因此郑克臧曾对郑经说:“偏僻海外,地窄民穷,频年征战,几不聊生。”^[582]所以祖国大陆和台湾人民,包括清朝与郑氏的一些臣工,对制造国家分裂、地方混乱的郑经,十分厌恶,希望早日结束这种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局面。

清政府对台湾的郑氏政权,一贯推行“循于招抚,不事轻剿”的政策,欲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元年六月,清政府得知郑成功病逝,郑经和郑袭为了争夺王位发生内讧,于是闽浙总督李率泰、靖南王耿继茂,遣中军王维明携书到思明(即厦门)议和。郑经命其伯父郑泰出面谈判,向清廷提出“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不易衣冠”^[583]。清廷反对这种分裂祖国的要求,并认为“锦(即经)灰烬垂灭,不许”^[584],因此议和中辍。康熙二年(1663)十月,清政府乘郑经战败、金厦皆失之机,李率泰、耿继茂又遣使到铜山议和,郑经“仍执高丽事例”,表示“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585],清方无法接受这种条件,议和再次告吹。六年(1667)五月,清政府再遣孔元章等人,前往台湾议和,向郑经提出“称臣、奉贡、并遣子入京为质等三事”。郑经回答:“和议之事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586],又说“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先王在日,亦只差剃发二字,若照朝鲜事例,则可。”^[587]由于清郑双方没有谈判的共同基础,所以孔元章只好由台返闽,十月至京复命,“以其无定局而中止”^[588]。八年(1669)六月,清政府特命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专程自京赴闽,与靖南王耿继茂、总督祖泽沛共同商讨对台湾郑经议和一事,经研究决定派兴化知府慕天颜和都督佥事季全赉诏书往台湾议和。七月初,慕、季二人抵台,郑经令协理刑官柯平、协理礼官叶亨同来使谈判,双方“各执意见,议未定”^[589]。于是柯平、叶亨随同慕天颜、季全返闽,在泉州继续谈判,郑方仍然坚持以“朝鲜事例,不肯剃发,世守台湾”^[590]为条件。清廷态度也很明确,康熙敕谕指出:“若郑经等留恋台湾,不忍抛

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若因居住台湾不行剃发,则归顺惻诚以何为据?”^[591]因此又命慕天颜、季全再往台湾宣谕:“果遵制剃发归顺,高爵厚禄,朕不惜封赏,即台湾之地,亦从彼意允其居住。”^[592]郑经执意不剃发,表示“若削发,至死不易”^[593],故议和又告破裂。由上可见,从康熙元年 to 八年,清郑双方经历了四次谈判,每次皆是清廷主动遣使赴郑营,在不损害祖国统一的原则基础上,做了一些让步,议和事终无成,显然责任不在清朝,而在郑方。郑经不识时势,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因此“未必归诚实意”^[594],而被私利迷住了心窍,企图通过谈判,以达到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卑鄙目的,所以始终再三要求,像朝鲜、琉球一样,台湾同中国仅保持藩属关系,这是一种背叛祖国的可耻行径。

(二) 参加叛乱

清初,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合称“三藩”。他们利用战乱之机,割据一方,权势得到恶性膨胀,“渐成尾大之形,包藏不轨,实为异日隐忧”^[595]。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后,把“三藩”视为心腹大患,列为必须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之所以迟迟没有下手,是考虑到台湾“郑人尚在耳”^[596]。到了十二年(1673)三月,正好尚可喜向清廷疏请归老辽东,不久吴三桂、耿精忠违心地也上疏请求撤藩,藉以观察清廷的态度。康熙认为时机已到,指出“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痍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597]。果然,吴三桂得知清廷决意撤藩的消息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动叛乱。福建的耿精忠早在吴三桂反叛之前,就蠢蠢欲动,八月曾派黄铺赴台,致书郑经,其书说:“孤忠海外,奉正朔而存继述,奋威中原,举大义以应天人。速整征帆,同正今日疆土,仰冀

会师，共成万世勋业。”^[598]郑经喜出望外，亲自率领舟师到澎湖待命。后因“吴三桂反，上诏平、靖二王留旧封，精忠谋益缓，乃辞锦，旋师”^[599]。此时耿精忠表面上没有举兵反，实际上他们“三王交通逆命，虽复停留，而反谋决矣”^[600]。

十三年(1674)三月十五日，耿精忠终于举起叛旗，传檄四方，鼓动反清。他立即命黄镛去台，要郑经起兵声援，并以漳、泉二府和全闽沿海战舰相许，且致书约郑经会师，“贵藩将水，吾将陆，江浙唾手可得也”^[601]。郑经兴兵响应，命陈永华留守台湾，遣侍卫冯锡范督诸镇船只先行厦门，自将统领左武卫薛进思、右武卫刘国轩殿后继抵。

根据夏琳《闽海纪要》记载，郑经同吴三桂早有交往勾结，康熙九年(1670)二月，当时“三桂在云南，渐蓄异志。经使监纪推官司吴宏济持聘，略曰：‘经儿发未燥，即闻大名；每读殿下家书檄草，忠孝激烈，未尝不抚膺慨叹，感极而继之以泣也！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特遣推官司吴宏济恭候福履！敝国虽小，楼船千艘，甲士十万，惟殿下所使之。’仰俟德音，无任主臣。”^[602]从郑经这番话里可以看出，郑、吴虽是敌对双方，但暗地已有来往，郑经百般恭维吴三桂，竭力鼓动吴三桂举兵反清，自己率领舟师听从调遣，可见郑经参加“三藩之乱”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早有预谋了。

吴三桂叛乱以后，为了迅速扩大势力，便于十三年(1674)三月中旬，派遣祝治国、刘定先带着书信，东渡台湾，向郑经呈上吴三桂的书信，信中说：“令祖举全闽投诚，大有勋劳，横遭俎醢，此百世必报之仇也。令先王心存大义，九死靡他，诚大丈夫特立独行，每言及此，未尝不叹为伟人也。己亥进围金陵，徒以声援不继而返。欲扬先人之名，雪家门之恨，惟此时为然。殿下少承先志，练兵养威，知为观衅而动。今天下大举，正千载一遇，时不可失。殿下速整貔貅，大引舟师，径取金陵，或抵天津，断其粮道，绝其咽喉。此奇兵

乘虚，仍捷奏万全。复累世大仇，神人共愤，快何如之。”^[603]郑经得书后，令监纪推官司陈克歧、副将陈文焕，随吴使返湖广，他在应吴三桂的信中说：“闻殿下忘家为国，不顾其子，欲伸大义于天下，不禁雀跃。既庆朝廷之光复，又喜所怀之不谬，故献一言：自古成天下之大业，必先建天下之大义。以殿下之忠贞，而择立先帝之苗裔，则足以号召人心，而感奋忠义。不佞所以区区道及，亦欲依日月之末光。早建匡复之业，枕戈待旦，以俟会师之举尔。”^[604]我们从吴、郑来往书信中看出，吴三桂一味要郑经兴兵帮他打天下，报家仇，根本不提复明一事。而郑经已经觉察吴三桂要另建新朝的阴谋，所以要吴三桂讲大义，光复明朝旧业，因此他们二人反清的目的不一样。

郑经积极响应吴、耿叛乱，四月初他率军离台湾，赴厦门，并传檄各地。他在檄文中说：“中国之视夷狄，犹峨冠之视残履，故资冠于履则莫不惋忿，沦夏于夷则孰不感愧。凡在血气之伦，宁无羞恶之心，但运数使然，莫可奈何，是以犬豕余孽，辄干闰位，遂使我明三百年之天下一旦沦胥为夷狄。洪惟二祖列宗，丰功伟业泽润民生，践土食毛，世承君德，即有亡国之祸，非有失道之主，而煤山龙驭，死守社稷。尤忠臣义士所推心而感泣者也……我先王忘家为国，抗夷于方张之际。……即予嗣位之初，亦尝败之于沙，斩其伪侯马德光（功），续以粮运不继，因退屯东宁，生聚教训者一十余年，庶几勾践之图，无坠先王之志。今者，虏乱日甚，行事乖方，积恶已稔，天夺其魄，以至吴王倡义于滇南，耿王反正于闽中，平南、定南各怀观望，秦、蜀、楚、越莫不骚动，人望恢复之心，家思执殳之遂。……予组练百万，楼船数千，积谷如山，不可纪极。征帆北指则燕齐可捣、辽海可跨，旋麾南向则吴越可掇、闽粤可联。陆战而咒虎辟易，水攻而蛟龙震惊。所愿与同志之士，敦念故主之恩，上雪国家之仇，下救生民之祸，建桓、文之伟业，垂青史之芳名。”^[605]郑经这篇檄文的特点是：第一，狂热鼓吹大汉族主义，把中国说成是汉

民族的国家；第二，竭力为亡明故主鸣冤叫屈，要光复明朝天下；第三，大肆为吴、耿叛乱唱赞歌，出谋献策；第四，积极参加叛乱，准备率军西进北上，一举灭亡清王朝。

郑经参加叛乱的行动，得到吴三桂的称赞和支持，吴三桂特遣礼曹钱黯赍书来聘，书中说：“获读华函，忠义之气凜然，故国之思弥切。不佞积愤三十年，困心衡虑，有不可尽白于人者。殿下能洞见本怀，万里精神，孰意其契合若此。先朝盛德，何日忘之，然藉拥戴以呼召人心，仍草创故智，不慎于始，后必终凶。项氏之于义帝、诸刘之于更始，可鉴也。使大势既定，亲贤自不乏人，与天下公议之，一德同心，宣化之例，何必逊古人耶。倡义除暴，首当削号，故改为‘周’。且列国即位改元，春秋正例，师古正名，窃附期义耳。”^[606]吴三桂给郑经这封信除了赞扬其参加叛乱外，主要目的是向郑经解释他不恢复故明，而建立新“周”的理由。郑经认为“吴藩萌念已差，不但不能取信天下，号召英雄，实为后世羞耳”^[607]。可见，吴、郑反清叛乱，不过是同床异梦。

(三) 郑 耿 争 斗

吴三桂、耿精忠和郑经起兵叛乱，他们互相利用，各怀鬼胎，所以内部争纷不可避免。当耿精忠反叛清廷时，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虑漳、泉下游文武不服”^[608]，“故藉锦声援”^[609]，因此几次命黄镛去台联络郑经，并有许归全闽弋船、割让漳泉二府、水陆分兵北进之盟。可是，耿精忠是个见利忘义之人，由于他扯起叛旗，“乃不一月，全闽降附，浙之温处，江右之广信，粤东之潮州，相继纳款，声势大振”^[610]。耿精忠被眼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更骄倨”^[611]，同时又听黄镛说：郑经“海上船不满百。兵不满万，耿王始轻之”^[612]，另外刘煜从厦门回榕城报告说：“海上兵不满二千，船不过百艘，安能济事。”^[613]耿精忠一则轻视郑经力量，二则怕郑经分享胜利果实，所以“乃欲负约”^[614]。首先，重申海禁，“即通行

各沿海边界,照前禁例,寸板不许下海,绝郑经来往”^[615],其次,郑经率军到达厦门,“遣人至耿王处,议拨船及地方安插兵丁,耿王不答,又禁买船料物,遂成仇隙”^[616]。郑经对耿精忠的行径十分不满,故派协理礼官司柯平到福州见耿精忠,指责他毁约背盟,耿精忠对来使柯平说:“归道尔主,各地自守,毋作妄想。”^[617]郑经得知大怒,自此郑、耿关系破裂,兵戎相见。

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郑经发兵反耿。首先是耿将赵得胜献海澄降郑,接着郑经命冯锡范率军进攻同安,守将张举尧投降。六月初,郑经围攻泉州,王藩锡城守赖玉,献泉州降。随后,黄芳度杀漳州守将刘豹降郑。七月初,刘进忠又以潮州归附。两个多月,“郑氏据有漳泉二州,及思明、金门”^[618],声势大振。于是耿精忠对郑经由轻视变为畏惧,便派遣冯国铨到厦门表示和好,要求索回同安、海澄,“欲以沿边海岛属经,不禁往来,通商贸易”^[619]。郑经对来使说:“天下乃我太祖之天下,与尔主何干?况漳、泉系本藩父母之邦,又是尔主请本藩渡海,戮力匡襄,共扶明室,故本藩不惜跋涉,提师前来。岂墨迹未干,遂尔背约?本藩蓄精锐,屡欲西向,恨未有便。以前日之全盛,尚欲与之争衡吴越,今尔区区一旅,何足道哉?”^[620]冯国铨自知理亏,无言可答,辍议而归。

这年十月,吴三桂得到派往闽地使臣钱黯报告,知道郑、耿火并,非常忧虑,立即命亲信周文骥带自己手书赴闽会见郑经和耿精忠,言明利害,调解纷争。他对郑经说:“耿殿下乃殿下唇齿之邦,辅车之势,分兵速进,则两相资也;持疑拒守,则两相毙也。释仇人而凌与国,忽远虑而争目前,利害相悬,奚啻什百。且大仇未灭,何以家为。……务期两地和好,速尔进兵,示义于天下后世非浅也。”^[621]

由于吴三桂出面排解,郑经和耿精忠双方停止了战争。十一月,耿精忠为了进一步消除来自郑经的威胁,遣蒲日兴去泉州见郑经求和,他给郑经的书中说:“日者诸藩建议之举,原从中原大事起

见，共图恢复，以协天人。……今事当创始，而每有争地争城之衅。夫闽地纵是殿下父母之邦，亦先王世守之地也。……方今西北连兵，望救甚切，非我辈游移观望之时。惟冀殿下俯念吴藩及弟前约，捐小忿而图进取，勿使海内豪杰谓我辈自相矛盾，怯公战而勇私斗也。”^[622]郑经对耿精忠这番文过饰非的话十分不满，便复信戏谑他说：“……且请弟渡海者谁？令弟毋作妄想者谁？绝不与弟往者谁？夫子有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勇私斗而怯公战’，弟亦不得已耳。如果欲修好，当践前约。”^[623]实际上双方皆无诚意，故谈判中辍。

此时，郑经在厦门整顿官制，扩大军队，积聚粮草，并且攻占了澄海、揭阳、潮阳等地。耿精忠看到郑经“现据漳、泉、潮三府，兵马强盛。而王进又屡败，故汲汲求好”^[624]。因此，十四年正月，耿精忠派遣吏曹张文韬前往泉州见郑经，表示贺年，赠送巨舰五艘，希望双方议和。郑经考虑到耿精忠低头认输，吴三桂从中调解，清军大兵压境，所以同意息兵议和，于是令礼官司郑斌、刑官柯平，随来使张文韬去福州谈判。郑、耿双方议定“以枫亭为界限，通商贸易，有事相援，毋得侵伐”^[625]，从此郑、耿争纷暂告结束。

(四) 西犯溃败

郑、耿议和罢兵以后，解除了郑经的后顾之忧。康熙十四年(1673)六月，郑经亲自率军南下，从泉州回到厦门，然后又进抵海澄。由于漳州守将黄芳度降清，故命刘国轩等人分兵去潮州，会刘进忠、何佑诸将，向西南进犯，欲攻广州。六月，郑经自将攻打漳州，克平和。刘国轩、刘进忠、何佑在蚩母山设伏，大败清军。十一月，郑经收买吴潜为内应，攻占漳州，郑军入城大掠。

此时，清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畏于郑军兵锋，企图拉拢郑经，遣使致书，向郑经劝降，他说：“今禁旅四出，捷音频闻，将军岂不知乎。苟英雄豪杰识时知命，于此为一猛省，建非常之勋，收不

次之赏，光及先祖，荣被子孙，诂不伟哉。乃将军计不出此，窃为将军惜之。伏思顺治年间，赏爵原封，令先君既纳降而顺受，后以要请不谐，遂栖身无地，是令先君负气寡谋也。倘一念转移，即与不穀会合，将军自泉州进发，不穀从汀州夹攻，则耿逆腹背受敌，必不能支，八闽之地可指破而定。果有此成议，朝廷必深嘉之，不穀当极力保奏，闽、粤封疆，分茅裂土，永为二姓之欢，计无善于此者矣。若执迷不悟，必欲争衡，主客之势，强弱之形昭昭在人耳目，岂有幸耶。”^{〔626〕}郑经回信说：“夫将军固明朝毛帅之役卒也，假令弃邪归正，并力王事，犹可尽洗前愆，生超丑类之名，死无负恩之恶，犹未失计也。……我家世笃忠贞，持正朔于不坠，事济之日，万代信史难逃董狐之笔。分茅裂土，我自有之，无烦将军过计也，若邀天之灵，我师水陆直捣羊城，主将不识避忌，取将军首级悬藁街，天下闻之，谁不欣然。”^{〔627〕}

郑经不仅拒绝了尚可喜劝降，而且乘机加强对粤东诸城的进攻，接连攻占兴宁、长乐、惠来、海丰、和平、连平、龙川、河源、东莞、新安、龙门等城，并围困惠州。与此同时，吴三桂也派马雄、郭义等领兵攻打广西，清广西将军孙延龄业已剪辮投降，“即分旅从梧州出击肇庆，由高（州）、雷（州）、廉（州）迫新会”^{〔628〕}，兵屯三水。因平南王尚可喜昏病日甚，军政事务皆委其子尚之信主管，尚之信自知已陷入吴三桂和郑经的夹击和包围之中，“而郡县兵将咸瓦解叛去，欲分兵出御，兵寡力单”^{〔629〕}，“之信穷蹙，遂乞降于周”^{〔630〕}，起兵反清，至此三藩皆叛。十五年三月，吴三桂为了解决郑经和尚之信的矛盾，特命马雄、郭义二人，“为两家排解分界，各守边疆，无事征伐，会师齐出江右”^{〔631〕}。由吴三桂提议，郑、尚同意，双方以惠州为界，于是尚之信撤惠州守兵，郑经派刘国轩驻守惠州。这样郑经就占据了福建的泉州、漳州、汀州、邵武、兴化，广东的潮州、惠州等府县，并约会吴三桂、尚之信出兵进攻江西，再挥军北上，自称“六军将帅”，于是气焰甚嚣尘上，势力发展到顶点了。

当“三藩之乱”爆发后,清廷的战略重点除了打击吴三桂以外,就是调兵遣将镇压耿精忠和郑经的反清叛乱势力。十三年(1674)六月,清政府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军前往闽浙消灭反叛。但对郑、耿二人采取不同的策略,康熙皇帝给福建总督郎廷佐的上谕中指出:“海寇(即郑经),宜用抚,耿精忠宜用剿或用间,相机便宜以行。”^[632]十五年(1676)八月,杰书领兵由浙入闽,攻占建宁。九月,耿精忠感到前有清兵,后有郑军,企图逃往海上,为部将所阻。因此,耿精忠下令剃发,派刘蕴祥到延平杰书营中表示服罪投降,又遣其子耿显祚前去迎接。十月初四日,耿精忠迎接清军入福州,投降清朝。此讯传到厦门,“郑经大怒,移书责之,举兵攻之”^[633]。因耿精忠降清,郑经便与清军直接对阵,于是令许耀进兵乌龙江阻止清兵南下,结果郑军大败,随之邵武、汀州皆陷。

正当郑经在福建接连失利之时,尚之信看到清军日盛,吴三桂不断遭败,耿精忠又归顺清廷,所以于十二月九日向清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投降。因此,郑经陷于清军南北夹击之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六年(1677)初,不到两个月时间,泉州、漳州、兴化、海澄、漳浦、云霄、诏安等地皆失守。

四月,杰书为了贯彻康熙皇帝对郑经“宜用抚”的旨意,同时又“以漳、泉既平,郑经尚在厦门,船艘一时未得应付,况惠、潮尚是刘进忠所据”^[634],于是遣僉事道朱麟、庄庆祚往厦门议和。郑经态度十分顽固,对清朝来使说:“先王在日,屡承招抚,只差剃发二字,若照高丽朝鲜例,则可从议。”^[635]并且给杰书复书言:“夫万古正纲常之论,而春秋严华夏之辨,此固忠臣义士所朝夕凜遵,不敢刻忘也。我家世受本朝厚恩,每思光复旧业,以报高深,故枕戈待旦以至今日,幸遇诸藩举义,诚欲向中原而共逐鹿。倘天意厌乱,人心思汉,则此一戎一旅并可转祸为福,何必裂冠毁冕,然后为识时务之俊杰哉。”^[636]由于郑经坚持封建割据的立场,所以双方谈判毫无结果。

七月,杰书乘郑潮州守将刘进忠降清,驻守惠州的刘国轩新败,因此又命泉州知府张仲举、兴化知府卞永誉、监生吴公鸿等为使人厦门见郑经,再申和议。可是郑经仍坚持原来条件,另外还要求“以沿海岛屿归我,资以粮饷,自可罢兵”^[637],因而谈判再次停顿。责任在郑方,正如杰书给清廷奏报说:“郑锦但云钱粮匮乏,假托支吾,语言无定。观此,海贼无降意矣。”^[638]

十七年(1678)十月,新任福建总督姚启圣,积极对郑经招抚。他利用吴三桂病死,清军攻陷平和、漳平、永春、德化、南安、惠安等城,派漳州进士张雄去厦门议和,希望郑经“念井里疮痍,翻然解甲解兵,纵数千万子弟尽还耕渔之乐”^[639]。但是,郑经在复书中却说:“顷承明教,拳拳以生民为念,不佞軫念民瘼甚于麾下,正以生灵塗炭,不忍坐视,故修矛整甲,相与周旋,诚欲拯民水火之中,不得不尔。”^[640]姚启圣得郑经来书后,又派泉州绅士黄志美入厦门见郑经,姚给郑的信中说:“知贵藩倦倦以桑梓为念,息兵安民,实出于惻隐,敢不委婉承命,是在仁人君子披肝露胆,毋事繁文,永缔于好。”可是郑经认为议和是“难行之事,非安民之实心也”^[641],所以不从。

十八年(1679)正月,姚启圣见郑经对议和冥顽不化,感到无望,因此他接受宋湜的建议,在漳州开设“修来馆”(又称“招来馆”),并委他“董其事”^[642]。“言自郑氏来者,尽延致之,使以华穀鲜衣,炫于漳、泉之郊,供帐恣其所求”^[643],这种积极招抚郑氏官司兵的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归诚者,日益众”^[644],有时一次来降者多达几万人。与此同时,清廷一方面令姚启圣加强陆上进攻厦门,另一方面命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率湖广、江、浙战舰由海上入闽,与姚启圣等军会攻。到了十九年(1680)二月,万正色率领清军攻占海坛,郑军总督水师的林升退至金门。此时厦门危急,郑经调刘国轩驻守,可是城中人心浮动,“时兵久已无粮,尽皆退溃,国轩禁不能止”^[645]。二十六日,郑经看到“诸军乘间掳掠”,

他感到大势已去，“惧为人所图，以焚演武亭行宫、辘重、宝玩悉毁于火”^{〔646〕}，狼狈逃往台湾，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病死。

综上所述，郑经参加“三藩之乱”，时经七年之久，“入踞漳、泉，以及惠、潮七府，人民受其痛毒”^{〔647〕}，“海滨黔黎，毁家破室”^{〔648〕}，使得“东南亿万户渔盐耕织咸失业”^{〔649〕}。可见，郑经的行径给社会生产带来极大破坏，人民生活造成无穷灾难，就连他的母亲董太妃也指责说：“若辈不才，莫如勿往，今观此举，徒累桑梓，苦生灵，是何益哉。”^{〔650〕}所以郑经反清，破坏国家统一，扰乱社会安定，这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的不义战争，尽管一时轰轰烈烈，但是最终是要失败的。

郑经顽固地坚持封建割据，分裂祖国的立场，人为地把台湾和祖国分开，致使台湾人民“违远乡里，损弃坟墓，亲戚睽绝，骨肉仳离”^{〔651〕}，他们日夜思念祖国和亲人。因此许多郑氏官司兵，接受清廷招抚，例如康熙三年主管福建投诚事务的户部郎中賁岱报告：“自康熙元年至三年，合计投诚文武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司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大小船九百余只。”^{〔652〕}又如十九年，总督朱天贵一次就带领“文武官司六百余人，兵两万余人，大小船三百余艘”^{〔653〕}，脱离郑氏，归顺清朝。郑经自己也承认：“我之叛将逃卒，为先王抚养者二十余年，今其归清者，非尽忘旧恩而慕新荣也，不过惮波涛，恋乡土，为偷安计耳。”^{〔654〕}

康熙初年，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团结是历史发展的主流。郑经不识时势，企图分裂自立，参加“三藩之乱”，虽然凭藉海峡天险，阻碍和延缓了台湾与祖国统一达二十年，但是就在他死后两年多，其子郑克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归顺清朝，从而实现了祖国统一。这个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谁要阻挡，必然身败名裂，成为历史罪人。

第七节 康熙统一台湾

康熙(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是清朝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六十一年,为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抵抗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主权;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康熙初年,遍及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已经结束,整个社会开始走向和平安定、休养生息的新时期。在这样人心思定、国家空前统一的形势下,惟有以郑经为首的郑氏割据政权,占据台湾,仍奉亡明正朔。它对内加强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粮征浪费,割肉医疮,峻法严刑,壅川弭谤,生计者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矣”^[655]。“百姓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每人口纳银五分,名曰毛丁;船计丈尺纳饷,名曰梁头”^[656]，“横征苛敛……几十年来,民番重困”^[657]。对外穷兵黩武,台湾凡文武官田甲与百姓丁壮,每十人抽一人入伍服役,经常派兵“出没岛屿,窥伺内地”^[658]，“往往乘风潮出掠”^[659]，“沿海郡县,蹂躏几遍”^[660]，“坏人屋庐,荒人田土”^[661]，使得“海滨之民,去乡离井,通流海屿,骨肉多残,生死茫然”^[662]。由上可见,郑氏政权给海峡两岸的社会生产带来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因此,祖国大陆和台湾的人民,包括清朝与郑氏的一些臣工,对制造国家分裂、地方混乱的郑氏政权,都非常厌恶和憎恨,期待早日结束这种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局面,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领土。早在康熙六年(1667)十一月,熟知台湾情况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就向康熙上疏,要求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并指出:“若恣其生聚教训,恐养痍为患”^[663]，“不如乘便进取,以绝后患”^[664]。康熙对施琅的建议十分重视,立即下诏要他赴京面询方略,诏称:“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

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665〕}

康熙七年(1668)三月，施琅奉旨来到北京，他给康熙的《尽陈所见疏》中，首先陈述了台湾郑氏政权对清政府的危害。一是原先“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渔盐，最为财赋之藪，可资中国之用”，现在却“折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以避其患”，结果造成“赋税缺减，民困日蹙”。二是郑氏占据台湾，大肆“收拾党类，结连外国”，一旦“羽翼复张，终为后患”。施琅还分析了台湾的形势，他说：“郑经承父余业，智勇无备，战争匪长，其各伪镇，亦碌碌之流。”况且郑氏官兵“不满二万之众，船支大小不上二百号”，这些军队平日分散各地，“耕凿自给，失于操练”，其中“多系闽地之人”，皆有“故土之思”^{〔666〕}。因此只要举师攻台，定能收复台湾。施琅还提出了进取台湾的具体方略，他认为“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分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667〕}。

康熙听了施琅的这番话，认为施琅很有见识。但他经过再三考虑，仍感到进取台湾还有许多困难，条件尚未成熟，不敢冒险从事，最后“以风涛莫测，难必制胜，寝其奏”^{〔668〕}。尽管这次康熙没有采纳施琅的建议，但是他发现了施琅这个人才，认为施琅是日后统一台湾的有用之人，于是授施琅为内大臣，留在身边待用。

历史的发展正像施琅在《边患宜靖疏》中所预料的那样，确实是“养痍为患”。康熙十二年(1673)，当三藩叛乱发生后，吴三桂“遣使通台湾”，耿精忠也派人“入台湾求济师”^{〔669〕}，吴、耿二藩皆勾结郑经作乱，郑经起兵响应，于是“三藩背叛，郑经复猖獗海上”^{〔670〕}。郑经很快派兵登陆，占据了泉州、漳州、潮州、惠州等地，“杀掠所至，十室九匮”^{〔671〕}，造成东南沿海一带“亿万户渔盐耕织咸失业”^{〔672〕}，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康熙即位后，长期对统一台湾下不了决心，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政治上，他面对着以辅政大臣鳌拜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挑战，陷入统治阶级内部夺权和反夺权

的激烈斗争;在经济上,他面临着一个破烂摊子,因长期战乱,生产停滞,到处呈现出一片荒凉凋蔽的景象;在军事上,由于清军防守地域很广,又要集中兵力镇压三藩叛乱,所以兵力不足。如要进取台湾,必须有强大的水师,坚固的巨舰,可是清军八旗兵多系善战骁骑,不习于海战。因此,康熙说:“今入海征剿……战舰无多,遽以入海,恐变出万一,未能得志。”^[673]鉴于上述原因,康熙对台湾郑氏政权采取以下几项防御措施。

一、遣使议和

康熙对郑氏及其官兵,一直抱着“循于招抚,不事轻剿”的态度,因此清政府曾多次遣使赴台同郑经谈判议和,希望通过和平途径统一台湾。可是谈判之事终无成,这个责任不在康熙,而在郑经。郑经说:“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674]企图通过谈判,以达到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卑鄙目的,所以,他在谈判中一再逼迫清廷接受三个条件:第一,要求台湾像朝鲜、琉球一样,同中国保持藩属关系;第二,要求允许台湾官民保留穿戴明朝衣冠,不削发;第三,要求承认郑氏以后世守台湾,不登岸。康熙对郑氏政权提出的如此荒唐的要求,逐条给以批驳。他针对第一条说,“郑经乃中国之人”^[675],台湾“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676]。又针对第二条说:“若因居住台湾不行剃发,则归顺悃诚以何为据?”^[677]还针对第三条说,既然称臣,就应受朝廷调遣,为何要世守台湾呢?康熙虽然不同意郑经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因而在不损害祖国统一的原则基础上,做了一些让步,如表示允许不削发、不登岸,但坚决反对所谓以朝鲜、琉球同例,这就粉碎了郑经等人妄图分裂祖国、割据自立的阴谋,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二、招抚归降

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在“江、浙、闽、广各设满汉兵户郎中

一员,专司招辑”^{〔678〕}。康熙十八年(1679),闽浙总督姚启圣接受宋湔的建议,在漳州开设“修来馆”(又称“招来馆”),并委他“董其事”^{〔679〕},“凡言自郑氏来者,皆延致之,使以华穀鲜衣,炫于漳、泉之郊,供帐恣其所求”^{〔680〕}。这些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郑氏官兵“归诚者,日益众”^{〔681〕}。如康熙元年至三年,福建沿海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大小船九百余只^{〔682〕}。又如康熙十九年(1680),郑经的总督朱天贵一次就带领“文武官六百余人,兵两万余人,大小船三百余艘”^{〔683〕},脱离台湾,归顺清廷。康熙对于从台湾归来的郑氏官兵,以礼相待,妥善安排,使他们成为以后进取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

三、实行海禁

早在顺治年间,清朝政府为了孤立瓦解海上的抗清力量,采取了严禁出海与内迁沿海居民的办法,称之海禁。康熙即位以后,沿袭了海禁措施,曾多次严申片板不许入海,“凡海岛中及近海居民,皆迁入内地”^{〔684〕}。并在沿海一带,开界沟、筑界墙、立界碑,顺着界沟和界墙,每隔三十里设一营,屯兵守卫,藉以“坚壁清野,以待其困”^{〔685〕}。这种迁海办法致使沿海人民“荡析流离,又失海上鱼盐之利”^{〔686〕},造成大片土地荒芜,百姓背井离乡,对外贸易停顿,当然清廷要负主要责任,可是郑经也不能推诿,正如福建总督姚启圣说:“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687〕}

以上三项政策中,前两项对郑氏及其官兵议和招抚措施无疑是正确的,它有利于用和平的手段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但是,后一项海禁措施,尽管在沿海地区得到了暂时的、局部的安定,然而实际上是不利于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错误政策,人为地把台湾海峡两边的同胞长期以来历史的、传统的骨肉关系割断了,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台湾郑氏政权继续统治和存在的。

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台湾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年正月,郑经死去,由其长子郑克臧监国。因诸弟争权夺位,发生内讧,郑经部将冯锡范杀郑克臧,扶持郑经次子郑克塽为延平郡王。郑克塽“幼不能政,权归锡范”^[688],事无大小,皆取决于侍卫冯锡范^[689]。郑氏内部“彼此稽疑,各不相下,众皆离心”^[690]。此外,由于郑氏集团“屡年征伐”,弄得老百姓“几不聊生”,再加上“年岁欠收,米贵如珠”,每担粮价高达五六两,“民饥死甚多”^[691]。因此,郑氏政权统治下的台湾,“人心解体,而无固志”^[692],有些不甘忍受压迫的农夫渔民铤而走险,举旗“倡反”^[693]。与此同时,三藩叛乱已被平定,有利于清政府集中全力进取台湾。所以康熙说:“滇黔底定,逆贼削平,惟海外一隅,尚梗王化”,要求吏、兵二部从速制定“进剿方略”^[694]。这样,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问题已经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了。

这年六月,闽浙总督姚启圣向康熙详细报告了台湾政局不稳的情况。康熙认为进取台湾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便派遣留在身边十三年的内大臣施琅,到福建担任水师提督,统一台湾。可是有些大臣反对,他们说:“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695]康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朕念海氛不靖,则沿海兵民弗获休息”^[696],“海寇固无能为,郑经在时就苟延抗拒,经死首渠既除,余党彼此猜疑,各不相下,众皆离心,乘此扑灭甚易”^[697]。在施琅离京师之前,康熙特在内廷召见施琅,对他说:“平海之议,惟汝予同,愿劳力无替朕命。”^[698]然后又在瀛台赐宴,向施琅叮嘱:“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付朕委任至意。”^[699]这些话表明了康熙统一台湾的决心和对施琅殷切的希望。

施琅到闽以后,相度形势,认为“贼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际,飓风时发,我舟骤难过洋”^[700]。所以没有立即出兵攻台,而是抓紧时间,“一面整船,一面练兵”,使得“船坚兵练,事事全

备”。广大官兵“摩拳擦掌，人人思奋”^[701]。此外，施琅又派人人台侦察敌情，联络旧部，许多郑氏官兵渡海来降，甚至还有些人组织起来，“以待内应”^[702]。

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初，正当施琅积极准备率军进取台湾时，他和总督姚启圣之间却在如何进取台湾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首先是在主攻目标上，姚启圣主张直取台湾，然后再分兵夹击澎湖，他说：“欲取台湾，势必先取澎湖，然止靠此一路进兵，风浪顺逆利钝，尚不可知。……如能直抵台湾，则澎湖进兵，易于取胜。”^[703]施琅不同意，认为“乘南风直捣澎湖，先扼其咽喉”^[704]，这样“胜势已居其半”^[705]，如果“澎湖不破，台湾无取理，澎湖失，则台湾不攻自溃”^[706]。其次是在利用风向上，姚启圣“欲候北风直取台湾”^[707]，施琅坚决反对，认为“北风刚硬，骤发骤急，靡常不准，难以逆料”^[708]，而“南风之信轻浪平，将士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上流，势如破竹，岂不一鼓而收全胜”。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影响对台湾进军，姚启圣便以“进剿海贼关系重大”为借口，突然“转意不前”。施琅眼看进取台湾的计划要夭折，便向姚启圣申明利害，“力争十余天”^[709]，他才勉强同意进兵。五月四日，施琅率军启行，台湾郑氏事前得知清军行动，派刘国轩带领郑军“扼守澎湖诸隘，俟我兵前进，即抄袭其后”。此外，清军又遇到“风大不得前”^[710]，被阻在海上。施琅认为在这样情况下冒险攻打澎湖，没有取胜的把握，只好回师，相机再举。

因为这次进军受挫，半途而返，反对进取台湾的势力又抬高了。如户部尚书梁清标上疏说：“今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当以清静为主。”左都御史徐元文也奏称：“请暂停台湾进剿。”^[711]他们的意思很明显，认为统一台湾就是轻启兵衅，破坏和平安宁的生活秩序，施琅没有屈服于这种压力，相反，就在这年的七月向康熙上疏说：“臣于水师营中，简精兵二万余，战船三百艘，已足破灭海寇，请令督抚趣办粮饷给臣军，而独任臣以讨贼，无拘时日，臣整理舟

师,时加操练,但遇风利,即可进兵。”^[712]他的这段话很清楚要摆脱姚启圣等人的牵制,自己单独指挥清军进取台湾。康熙很赞赏施琅勇于任职的精神,也看到“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因此认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713],于是同意了施琅“独力肩任,直入海岛”^[714]的请求,命姚启圣等人负责办理粮饷。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决定再次发兵进取台湾。此时正是酷夏,又是台风盛季,有些部将认为“不利征战”。施琅却说:“兵法不曰,出不意,攻无备乎?”他在出征之前,召集诸将研究进军方略,“先聚米作地势,示诸曰:如此入港,如此泊船,如此进战”,交待十分明确。另外,他要各船船帆上书写主将的姓名,以便作战时“望进退,以别赏罚”^[715]。

六月十四日,施琅统率清军水师两万多人,大小战船三百余只,从铜山起锚,向澎湖进发。施琅选择此时对台用兵,确实出乎澎湖守将刘国轩等人的意料,因为这里六月多台风,“常连日夜不止”,渡海“最忌”^[716],而“施琅是惯熟海务者,岂敢故犯”^[717]。十五日,当刘国轩等看到施琅不畏风险,率军直驶澎湖,心中惊恐,仓猝应战。清军很快攻占花屿、猫屿和草屿等岛,并进泊澎湖南大门八罩岛。十六日,施琅亲自领军进攻澎湖,他身先士卒,驾船突入敌阵,不幸为流矢伤目。清军见主帅负伤,便退回八罩岛。十七日,施琅向全军“严申军令,查定功罪,赏罚官兵”,相机再战。十八日,清军又攻取虎井、桶盘二屿。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施琅一方面派出小股舰队去佯攻,“以分贼势”;另一方面亲自驾船到澎湖周围“细观形势”^[718]。二十二日,施琅统率全军再次发动强攻,他派总兵陈蟒率领五十支战船从东面攻打鸡笼屿、四角山,配合“夹攻”。又派总兵董义率领五十支战船由西面进攻牛心湾,“以为疑兵,示若欲登岸者”。而施琅亲领五十八支战船居中指挥,另有八十支战船殿后,直驱娘妈宫。此时“南风大发,波涛汹涌,诸船扬帆而进,

风利舟快,瞬息飞腾,据其上流,乘势奋击,以一当十”。施琅“又令火器船乘风纵发,烟焰张天”,郑军“海船相沿烧殆尽”^[719]。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清军取胜,击沉郑军大小战船二百多只,歼灭一万二千余人,获得军械辎重无数,占领了澎湖列岛,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乘小船逃回台湾。

施琅攻占澎湖以后,除了严肃军纪,整装待发外,还公布了安民告示,把岛下逃散的老百姓都找回来,要他们“耕渔足事”,宣布“蠲三年徭税差役”^[720]。对于郑军的俘虏,“弗杀,带伤者济以医药,给以口粮”^[721],全部释放。这些人回到台湾后,“展转相告,欢声动地,诸伪将伪兵闻之争自投来归,禁之不能止”^[722]。

康熙收到清军占领澎湖的捷报,十分高兴,认为克取台湾即在旦夕。特遣侍郎苏拜赶赴福建,一是宣慰全体官兵,凡“官员俱加一级,兵丁尽加恩赏,以示鼓励”^[723]。二是全力支援,命令福建地方官员,施琅攻台所需一切,必须“速为料理,不拘何项钱粮,尽见在者,准其动用,毋致贻误”^[724]。三是加紧招抚工作,为了避免“将士劳瘁,人民伤残”^[725],防止郑氏集团“窜处外国,又生事端,不若抚之为善”^[726]。苏拜入闽后,积极贯彻康熙的意旨,从而起了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的作用。

台湾的郑氏政权,因澎湖失守,刘国轩惨败而归,“精锐全覆”,“皆震慑无措”^[727],“各怀戒心,市井风鹤”。可是眼看台湾危在旦夕,何去何从呢?于是郑克塽召集群臣,讨论对策,出现两种主张:一种以建威中镇黄良骥为首的一伙人,主张放弃台湾,逃奔吕宋,继续反清。他说:“今日澎湖失守,台湾势危,不如将大小战船配载眷口兵士,从此山边直下,取吕宋为基业。”接着,提督中镇洪邦柱说:“建威中镇所言吕宋者,诚当!柱与良骥愿领为先锋。”中书舍人郑得藩也说:“议取吕宋以避锋锐,此策甚妙。”他们的主张得到权臣冯锡范(郑克塽的岳父)的支持。所以决定派黄良骥、洪邦柱、姚玉等人领前队为先锋,其余船只分配眷口,陆续出发。这个消息

传出后,“讹言四起:‘当大抢而去’”,因此“百姓惊惶,昼夜不安”。另一种以中提督刘国轩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听从招抚,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他们坚决反对逃往吕宋,继续进行分裂祖国、破坏国家安定的活动。刘国轩对冯锡范说:“今澎湖已失,人心怀疑,苟轻重在船,一旦兵弁利其所有而反目,尊公之前车可鉴也。”冯锡范反问刘国轩说:“如此奈何、应分兵死守?”刘国轩回答说:“众志成城,守亦实难,不如举全地版图以降。”^[728]最后冯锡范勉强同意刘国轩的意见,准备劝说郑克塽降清。因此黄良骥等人“欲迁避吕宋,不果”^[729]。但是,究竟是“遣官求降,仍为远遁之计,群情汹汹,各怀向背”^[730]。

就在此时,施琅派遣曾蜚等人前来招抚,冯锡范有些犹豫不定,刘国轩说:“当时之际,尚且狐疑,倘一朝萧墙,将奈何?从来识时务者为豪杰,大势已去,当速顺天。”^[731]冯锡范无言以答,随后闰六月初八日,郑克塽遣顾平英等赴闽谈判,由于郑方坚持留居台湾不登岸,使谈判中辍,姚启圣提醒康熙说:“臣思贼若窘迫,必走外国,恐根除未尽,或遣后患。”^[732]所以不要放松对郑氏的招抚工作。因此,康熙便谕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等,“尔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733],这话实际上是消除他们回归祖国的思想疑虑。

与此同时,黄良骥一伙人乘郑克塽等人同清朝来使谈判之际,又暗地策动郑明(郑克塽叔父)“往攻吕宋,再造国家,以存郑祀”,他们偷偷把“辎重已移在船”,可是这个阴谋很快被刘国轩等发现,加以“止之,乃不果行”^[734]。刘国轩对郑克塽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当请降听天,勿盼后悔”^[735]。因此,郑克塽决定重开谈判,为了表示诚意,不仅派重臣冯锡珪、刘国昌等人赴澎湖议和;而且也不再要求留居台湾作为先决条件,表示愿回内地,听从安置。

七月十五日,郑克塽派遣的冯锡珪等人到施琅驻地请缴册印,奉表归降。施琅把此事疏报清廷,恰巧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康熙得知此讯,十分高兴,便欣然命笔,写了《中秋日闻海上捷音》一诗: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黜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736]

这首诗有力批驳了那些反对统一台湾的人,对台湾郑氏政权的“来庭”,“柔远”,不是以文德自饰,也不是嗜好武功,而是为了消除割据,实现祖国统一的“九壤同”。

就在康熙知道郑克塽归降的前四天(即八月十一日),施琅率领清军离开澎湖向台湾进发,十三日入鹿耳门抵达台湾。施琅登岸后,颁布《谕台湾安民生示》,规定“官兵不许占住民居,弁目不许包贖,乡社樵采逮捕,载运米谷蔬菜,出入港澳,均听民便。农商工贾,以营市肆,乡村骚扰强买,各严差巡”。而且还申明“今岁应纳租谷,十分酌减其四”^[737]。随后又公布《严禁犒师示》,指出:“王师原为拯民,非以扰民,故到处秋毫无犯,务使民不知兵,诚恐乡社保甲沿袭故套,各自派办劳军之费,致扰民生,合就严禁。”^[738]因此,清军入台后,受到台湾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壶浆迎师,接踵而至”^[739]。十八日,郑克塽带领文武官员,缴册印降清,至此在郑氏政权统治下二十多年的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康熙统一台湾以后,关于台湾的弃留问题,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一部分大臣不主张设官派兵驻守台湾,认为台湾是“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740],只须留守澎湖作为东南沿海的屏障就成了,并要求将住在台湾的汉族老百姓都迁回大陆,把台湾从祖国的版图上割掉抛弃,即所谓“迁其人,弃其地”^[741]。大学士李光地甚至说,台湾孤悬海外,不如“招徕红毛,界以其地”^[742],公然要把祖国神圣领土送给西方殖民主义者,真

是荒唐之极。

施琅听到这种企图抛弃台湾的主张后,立即向康熙慷慨陈词,详细分析了台湾弃留的利弊。他在《恭陈台湾去留疏》中,首先指出台湾地理形势的重要,说:“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当初荷兰殖民主义者窃据台湾,“成一海外之国,渐作国患”。后来郑经又占据台湾,“纠集亡命”,“荼毒海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一行徙弃”。结果必然造成“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到那时一些反清势力就要再度以台湾为据点重新活动起来。而且西方殖民主义者,早就“涎贪”台湾宝岛,“亦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他们“必纠合党伙,窃窥边场,逼迫门庭,此乃祸种。后来沿边诸省,断难晏然无虑。至时复动师远征……恐未易再建成效。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异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因此,“守台湾,即所以固澎湖,台湾澎湖一守兼之,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最后施琅告诫康熙说:“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一,台湾一地,虽为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彼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因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743〕}

施琅这番话是从清王朝长远的根本利益考虑的,因此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康熙特别召集廷臣,要他们仔细看看施琅的上疏,然后问“尔等之意若何?”大学士李霁等人奏称:“弃其地,恐为外吏所据。迁其人,恐奸宄生心,应如琅议。”^{〔744〕}康熙也深感“台湾弃取,所关甚大”,“若徙其人民,又恐失所,弃而不守,尤为不可”^{〔745〕}。因此,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清政府正式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管辖。并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又于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两千。从此台湾完全处于统一的全国政权统辖之下,这对于

维护领土完整和祖国统一都有积极的作用。不仅西方殖民主义将“无敢窥伺”^[746],使台湾免受外敌侵扰,确保了东南沿海各省的安宁。而且促进和加强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及与大陆的密切联系,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从上面康熙统一台湾的全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康熙统一台湾,再一次说明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与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期分裂,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康熙初年以来,以郑经为首的分裂割据势力占据台湾,人为地把台湾同祖国分开,这对民族、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利的。康熙顺应着历史发展的趋势,顺应着各族人民要求统一台湾的强烈愿望,经过长期不懈的争取和斗争,终于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的统一。历史证明,只有消除分裂割据,加强大陆和台湾的联系,才能更好地发展台湾的社会经济,抗击外来侵略,也只有这样,台湾才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二,康熙统一台湾所以能够取得胜利,这同他唯才是举,能用人,会用人是分不开的。康熙认为“国家有戡乱宁民之路,必有协理宣力之臣,用能延布天威,廓清海宇”^[747]。因此,康熙非常重视选择人才,并十分明确地指出,选拔人才时“好疑惑人非好事”^[748]。例如,康熙对施琅的任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施琅“少有识度,膂力绝人,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晓海中风候”^[749],而且“熟悉彼处(即台湾)地利、海寇情形”^[750]。由于他文武全才,特别是精通海战,熟知台湾情况,是进取台湾不可多得的有用人才。但是,施琅原是台湾郑氏的部将,后来归降清朝,因此有些大臣对施琅存有戒心,尤其是任用他进取台湾更是百般疑虑,当施琅几次“出兵不克”,“颇疑有贰”^[751]。于是在他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时,有人却在背后中伤他“去必叛”^[752]。然而康熙并不这样看待施琅,他说:“今值进剿台湾,正在用人之际。”^[753]认为要统一台湾必用施琅,施琅不去,“台湾断不能定”^[754]。康熙力排众议,对施琅十分信赖,这种善于用人的作风,是胜利进取台湾的有力保证。

第三,康熙解决台湾问题,从总的来看政策是对的。他为了统一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对台湾的郑氏及其官兵始终采用积极的招抚政策,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清朝和台湾郑氏政权对峙二十多年,虽然有澎湖一战,正像施琅说的,这是“不得已而用兵”^[755]。清廷曾多次遣使同郑氏谈判,虽然和议未成,但是招抚不弃,即使已经决定出师攻打台湾时,康熙还“特下诏旨招降,倘其来归,即令登岸,善为安插,多俾得所”^[756]。康熙对郑氏及其官兵说话是算数的,当他们归降清朝回到大陆以后,都给予优厚待遇,妥善安置。康熙把郑克塽迎到北京,授其正黄旗汉军公,赐第宅居。其叔郑明、郑智、郑裕、郑温、郑柔受四品职。其弟郑克塽、郑克均亦受四品职,郑克塽、郑克裔受骁骑校,郑克圻、郑克镐都受职有差、隶汉军旗。不久康熙下诏,认为郑成功、郑经并非“乱臣贼子”,将他们父子两枢归葬南安。另外,清廷封冯锡范为正白旗汉军伯。康熙特别表彰刘国轩“能仰识天时,劝令郑克塽纳土来归”之功,授他正白旗汉军伯,命为天津总兵,听说刘国轩“家口众多……特赐尔第宅,俾有宁居,以示优眷”^[757]。对广大郑氏兵丁,“有愿入伍及归农者,听其自便”^[758]。至于明朝归来的宗室,也给予屯田、种牛,安置在河南、山东等地定居。这些措施,无疑对和平统一台湾,维护国家统一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八节 施琅、吴英与澎湖海战

施琅(1621—1696),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他通阵法,善水战,晓海风候,是清朝水师名将。康熙二十二年(1683),率军

攻克澎湖,统一台湾,以功封靖海侯。施琅做出如此卓越的历史贡献,与其部将吴英的出谋划策襄助是分不开的,他在给清《密陈专征疏》云:“至于师中参酌,见有同安总兵官臣吴英,智勇兼优,竭忠自许,可以为臣之副,尤望恩嘉奖励。”^[759]吴英逝世后,李绂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亦云:“施公琅来提督海疆事,议进攻澎、台,引公(吴英)自助。……自海逆(郑氏政权)负险造乱,四世历六十年所,公与施侯(施琅)合谋七日而举之。”^[760]但是,吴英在攻澎平台中如何“智勇兼优”,如何同“施侯合谋”的详情,一直为人鲜知,施琅的《靖海纪事》和许多清代的官书私籍,及档案资料皆无记载,此事成了历史的疑团。最近我有幸看到吴英著的《行间纪遇》(手抄本)一书,其中有篇《施琅进攻台湾事》,全文约六千余字。此文对吴英辅助施琅平台经过,尤其是澎湖海战,记载颇为详细,从而使人们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无疑极有意义。

1. 两督不和,三邀吴英

康熙二十年初,台湾形势突然发生重大变化。正月,明延平郡王郑经病逝,由其长子郑克臧监国。因诸弟争权夺位,发生内讧,郑经部将冯锡范杀郑克臧,扶持其婿郑经次子郑克塽为延平郡王,于是郑氏内部,“彼此稽疑,各不相下,众皆离心”^[761]。七月,康熙帝认为进取台湾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便任命内大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共谋平台事宜。施琅离京师之前,康熙帝特在内廷召见,对其言:“平海之议,惟汝予同,愿劳力,无替朕命。”^[762]又在瀛台赐宴,向其叮嘱:“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付朕委任至意。”^[763]这些话表明对施琅的依赖和希望。

十月,施琅到闽以后,他与姚启圣之间,在如何平台的战略上发生严重的分歧。首先是在主攻目标上,姚启圣主张直取台湾,再收澎湖,施琅则主张,先取澎湖,再攻台湾;其次是利用风向上,姚

启圣欲乘北风，施琅则要乘南风。双方互不相让，出现了两督不和的局面。施琅为了防止姚启圣掣肘，于是当月就上疏称：“督抚均有封疆重寄……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764〕}当然，他自知独自往征，责任重大，不可轻视，虽然自己对闽台情况十分熟悉，但是那些毕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而当时的状况却很生疏，为了弥补和克服这一不足之处，必须从福建清军将领中，选择一位熟知闽台实情、善于谋略、精通海战的人，充当副手，鼎力相助，方能成事。经过各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同安总兵吴英是适合的人选。

吴英(1637—1712)，字为高，号媿能，福建泉州人，后入籍莆田。初为台湾郑氏部将，康熙二年降清，一直领兵在闽浙作战，以功由守备擢为同安总兵。据吴英在《行间纪遇》的《施琅进攻台湾事》中记载，施琅入闽后，曾三次邀请他人衙相助，合谋同征。

第一次，康熙二十一年二月以前，吴英说：

……时水师万提督奉旨改调陆路提督，命施琅为水师提督，至闽与姚总督意见不全，疏请只用英为副，可破台湾，不必总督出师。部议以进取台湾是总督先发其议，必须亲行。^{〔765〕}

由上可见，清廷不同意施琅举荐吴英为副，独自往征，却认为“进取台湾是总督先发其议，必须亲行”。

第二次，康熙二十一年七月间，吴英说：

五月间，总督率领提镇官兵战船，至铜山会齐，总督晕船不能进兵。……七月间……施提督与姚总督议终不合，题请专征，亲至同安浔尾，与英商议同征。英见督提未甚和睦，不敢许。^{〔766〕}

此次施琅亲自前往同安，邀请吴英“同征”。可是，吴英考虑到“督提未甚和睦”，怕卷入两者矛盾中去，所以没有同意。

第三次，康熙二十二年三月间，吴英说：

三月间……施提督曰，弟出京之时，曾蒙皇上旨意，在三

藩反叛，朕遣发官兵亦不过数年而定，只有福建海寇，我官兵到则贼船退，我官兵回则贼船来，实为国家大患。今命汝为水师提督，可传说各官，若有能同心竭力破台平海者，朕断不负汝等。^[767]

由于施琅向吴英传达了康熙的旨意，况且此时清廷已同意施琅独自专征，因此吴英接受了施琅的邀请，合谋平台。

2. 分析形势，出谋献策

施琅招吴英从同安调到身边，经常问及闽台形势，以助制定对台进军的决策。吴英分析，台湾郑氏集团得知清军要进攻的消息后，可能采取三种对策。他说：

贼有上中下三策。若行上策，尽撤澎湖之众，退守台湾，中留赶缁快船数十只在澎湖。俟我师到彼，贼船不来交战，竟出我之后，来扰我沿海，阻我粮运。台湾处处皆险，可登岸者只有二三处，贼以兵民土番堵守百日易，我船泊在大海之中十天难，必须先踞澎湖，然后发回战船，追逐沿海贼踪。澎湖多积粮草，以待时日，相机而进，恐功难速成矣。

其中策者，贼船合踪在澎湖，以待我师，败则遁退台湾，不败则仍旧踞守。我虽尽力攻杀，岂能全灭，必须重兵守澎湖，乘南风，别分大兵进台湾之北山，上淡水，鼓励土番，且进且止，贼势始分，然后乘虚而破之。

若行下策，尽台湾之众，以作孤注，分为水陆踞守澎湖。我主兵者，须身先士卒，用破釜沉舟之法，官兵不得不用命，澎湖若破，台湾可不攻而定。^[768]

以上吴英对清郑双方的形势和任务，做了精辟透彻的分析，但是有一点不厌其烦地告诫施琅，无论郑氏采用上、中、下三策的哪一策，而清军都必须先攻占澎湖，这样攻取台湾仅仅是时间早迟而已。

台湾郑氏集团对此次清军攻台估计不足，却采取了吴英所言

的下策,企图在澎湖与清军决战,一举消灭清军水师,以保台湾。而施琅采纳了吴英的建议,抓住战机,利用风向,“用破釜沉舟之法”,率师进攻澎湖。清郑两军皆投入几百艘战船,展开激烈的大战,这就是我国古代海战史上著名的澎湖大海战。

3. 澎湖海战,清胜郑败

澎湖位于台湾海峡东南,是闽台交通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郑克塽命权臣武平侯刘国轩负责澎湖的调度防御,他率领水军两万人,战船二百余艘,泊牛心湾,与鸡笼屿互为犄角,各战船置大炮一门,还配有发烦、鹿铳等火器多门,并在澎湖口岸,筑造短墙,安置腰铳,分兵把守,可见攻防力量都很强。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清军水师两万人、舰船三百艘,由福建铜山进发澎湖。据吴英《施琅进攻台湾事》记载:

六月初一日,在铜山会各镇,传集大小将弁,告戒三章,当天立誓,申明赏罚功条,欲先取花屿。英曰:“以海图观之,花屿在澎湖之西南,八罩在澎湖之正南,船多屿少,难以湾船,又离澎湖遥远,不如先取八罩,以占上风。”施提督曰:“此天启其衷也。”

六月十四日,乘风开船。十五日到八罩。十六日,会议,英曰:“必须先拔快哨二十只,进入澎港,探有贼船多寡,抛泊何处,陆地有无贼守,并看港路宽狭浅深,俟其回报,方可分兵而进。”时众将言曰:“今既到此,即可齐进,踹探何如。”施提督曰:“或迟或速,总在诸将之力。”

随即开船进兵,乘南风便利,顷刻即到澎湖港口,见贼船二百余号,俱在港内扬帆排列,而边山上大小烦炮不计其数,炮子犹如星多雨落。我船见其防守严密,齐挤港口,不能前进。只有将官蓝理、曾成、张胜、赵邦试……等数船,首先进港,冲锋鏖战,贼之船多,我船无援。英见事势危急,即单船驾双橹,冲入贼踪。伪水师总督林升,见英一船冲入重围,率领

数船前来夹击英船。英严督官兵冲敌，齐发炮弹。林升一船当先，贼众死伤甚多，林升左腿打断，各船贼兵不敢抬头，随即败遁，退入内港。英以单船前后无援，故退出港。

英即坐小船到施提督座驾船上，见施提督面上有伤。英问曰：“公面上伤何？”施提督曰：“我见前鋒数船冲入重围，又见公单船破入贼踪，复摇双橹深入贼阵。时急呼众船应援，俱不向前，我见时势急迫，即督令将官朱明、陈兰二船欲来应援，因攻击贼船，被炮火所作伤，我船上官兵带伤十余人，将官蓝理、张胜、赵邦试俱带重伤，今幸公船杀出，攻败贼众，此乃国家之福也。但今日见众心不齐，不肯向前，此贼何能得破？”

英曰：我国家数十年，为此海寇，屡抚屡剿，所费兵马钱粮无虑千万，沿海数省被害百姓亦不啻千万，今数十年逋已扼其吭，若不破此贼，日后再有何人敢言破台之事。此行非容易到此，今日我杀入重围，所见贼船虽多，而出头者只有大烦船二三十只，果是凶猛，余者亦不过碌碌逐阵而已。今日我师皆因船多，彼此观望，依我愚见，明早收船八罩，申明赏罚之令，将不向前将领尽行捆绑，欲以军法从事，待我会各镇保领，令各立军令状，将功赎罪。我战船四百余号，只挑选大船四五十号，余船尽令在后架梁。将各船精锐官兵尽行挑出，每大船上若站得二百人者，舱底再藏伏二百人，如对敌死伤一人，即换一人，其枪炮弓箭俱不许开用，令各兵尽抱火桶火罐，伏在两傍艤边。各镇自领前鋒，我船进港，贼大船必来迎，故我船派配已定，或二船、或三船，攻烧一船，贼船火起，我官兵不许过船，听其自烧，另攻别船，贼之前鋒大船一经烧尽，余船无不就擒矣。

施提督曰：“公此策甚妙，但众人之心，恐不似汝我之心。”英曰：“今日只因船多，彼此观望所误，若挑定官兵，船只无多，各船篷上，俱书姓名，各镇领头当先，众将不敢不进，不患此贼

不破也。”施提督曰：“如此则破贼之任，全在于公。”商议既定，是夜随在大海中抛船，十七日收回八罩，既将不向前大小将领尽行捆绑，欲正军法。英会各镇保领，各立军令状，随即挑选船只官兵，分配已定。^[769]

由上观之，澎湖海战，施琅出师首战不利，在港口战斗中，打了败仗，主帅施琅及将官蓝理、张胜、赵邦试皆负伤。施琅由于初战受挫，于是对攻澎平台有些丧失信心。此时吴英针对施琅束手无策的思想情绪，明确指出：一是这次平台的重要性，数十年来，郑氏占据台湾，经常骚扰沿海诸省，国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专征夭折，以后就无人“敢言破台之事”。二是此次战败的原因，首先对澎湖敌情不明，当郑军“俱在港内扬帆排列”待战，而清军将领却言“踌躇如何”，盲目进军。其次乃军纪不严，清军在战斗中，“彼此观望”，“众心不齐，不肯向前”，致使主帅被围负伤。三是要攻占澎湖，打败郑军，必须“申明赏罚”，“立军令状”，“各船篷上，俱书姓名，众将不敢不进，不患此贼不破”。施琅听了吴英对初战失利的分析和再战取胜的措施，受到很大鼓舞，认为“此策甚妙”，于是退回八罩，整军待发。

二十一日，施提督会集各镇言曰：“明日进兵，应分叠前进，今须商议妥当，设阄分拈，次序庶不紊乱，六镇座驾船排列当先而进，各将领船只随行。今贼船泊在澎湖东边山，就以东边为第一阄。”时海坛镇林贤拈第一阄、平阳镇朱天贵拈第二阄、英拈第三阄、铜山镇陈昌拈第四阄、金门镇陈龙拈第五阄、厦门镇杨嘉瑞拈第六阄，分别已定。英对施提督言曰：“如此进兵，明日必定破贼。”

二十二日，巳时，我船五十余号，排列前进，余船俱随后架梁。贼见我船进港，贼船鱼贯冲出，火陆炮声震天动地，大小炮子如雷轰雨洒，烟焰蔽空，山摇海沸。我船乘风直进，海坛镇林贤先遇贼船交锋，我船火器齐发，贼人势急，跳杀过船二

三次,林镇身被箭伤,官兵十去七八,几乎不脱,幸众船齐进夹攻,林镇方得退出。二阁平阳镇朱天贵才欲交锋,朱镇即中炮身亡,其船亦退出。英见时势危急,即督领各营船只,英船当先杀入,焚烧贼大船数只,时英右耳被銃伤裂,忍痛率领众船奋力攻烧,贼兵亦殊死战。时施提督、金门镇陈龙,督领众船齐到夹击,随将贼船尽行烧毁擒获……其烧余贼船兵丁,并守澎湖陆地数千余众,尽已投降。是役也,澎湖贼众全军覆没矣,计烧毁及获贼船一百九十余只,烧死投降伪官将三百余员,贼兵斩杀投降共一万余众,刘国轩坐小船逃回台湾。^[70]

4. 禁开杀戒,争取郑氏

吴英知道施琅的父亲、弟弟、子侄为郑氏杀害,有“三世”仇,故怕他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则以公报私仇,大开杀戒,这样必然要遭到郑氏官兵的顽强抵抗,平台势必失败。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吴英告诉施琅曰:

今既同事,生死共之,但有一言当以奉告。……公与海上(郑氏)有父子侄之仇,但郑家负隅已久,为仇者多,望报者不少。今日进攻台湾,全恃天意扶助。……一则不可挟私报仇;二则不许杀降;三则严禁擒揉奸淫。^[71]

施琅表示,“今幸同事,全仗智略,有以教我,无不唯命”^[72]。六月二十二日,清军在澎湖海战中打败郑军后,“是晚收入澎湖天妃宫泊船,英次日领陆师各营官兵登岸,分扎营盘,所有各营擒获烧伤落水之贼数百余人。英与施提议曰:所擒之贼役之无益,可与医药调治,给粮拨船送回台湾,使彼处兵民咸仰仁恩,贼心自乱。施提督依言而行”^[73]。

此时,刘国轩派人来澎湖议和,据吴英的《施琅进攻台湾事》记载:

刘国轩见事瓦解,遣员赴澎湖讲议纳款投降,正在酌议之间,施提督请英密言:“台湾有伪镇将二百余员,列名遣人前

来,请给令牌旗号,不用我师到彼,伊等会众举事,擒献巨魁,此举若行,我无亡矢遗镞之费。”英曰:“贼之强梁善战者,前已覆没殆尽,台湾余寇不过釜底游魂,旦晚可定。……今若轻听妄动,残害生灵,是汝我有欺天之罪也,此事断断不可。如轻听小人之言,内中岂无受海上之恩者,恐一允许,人多易泄,设有一二走漏风声,郑家兄弟子侄登舟飘遁别国而去,我等欲从何处追寻,纵得台湾,亦难班师矣。”^[774]

吴英坚决反对这种所谓“会众举事,擒献巨魁”的做法,此举必然导致台湾内部互相残杀,人民遭殃,有可能郑氏家族率部逃往“别国”,虽取台湾,后患仍存。

施琅完全接受和采纳了吴英提出的不可挟私报仇,不可会众举事的意见。他在《晓諭澎湖安民示》中宣布:“尔等既脱邪氛,咸登乐土,各宜安意生业,耕渔是事。本提督悯念疲瘵之余,当为蠲三年徭税差役,遂其培养也。”^[775]在《祭澎湖后土文》指出,“地土人民,今已非昨……以佃以渔,以耕以获。”^[776]同时,他又积极招抚台湾郑氏军民,在《安抚输诚示》中称:“示到,各官兵立即削发,本提督克日亲临安插,军纪素严,秋毫无犯。今既革心归顺,官则不失爵秩之界,民则皆获绥辑之安,兵丁入伍归农悉听其便,各自安意乐业,无事彷徨惊心。”^[777]并且在《台湾就抚疏》中,要求清廷,如果郑氏接受招抚,应宽大处理,他说:“矧郑逆自来远阻声教,未被圣化,非如吴、耿诸逆受恩背叛者比。谅荷皇上广开面网,赦其前愆,俾沾德意。”^[778]

八月十三日,施琅、吴英等,率师入鹿耳门抵达台湾,登陆后颁布《諭台湾安民生示》,规定“官兵不许占住民居,弁目不许包贖乡社。樵苏采捕,载运米谷蔬菜,出入港澳,均听民便。农商工贾,经营市肆、乡村,骚扰强买,各严差巡”。而且还申明“今岁应纳租谷,十分酌减其四”^[779]。随后又公布《严禁犒师示》曰:“王师原为拯民,非以扰民,故到处秋毫无犯,务使民不知兵。诚恐乡社保甲沿

袭故套,各自派办劳军之费,致扰民生,合就严禁。”^[780]因此,清军入台后,受到台湾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壶浆迎师,接踵而至”^[781]。同时也受到以刘国轩为首的大部分郑氏官兵的拥护,他们粉碎了黄良骥等一伙人企图怂恿郑克塽和挟持郑明(郑克塽叔父)逃往吕宋的阴谋。十八日,郑克塽带领文武官员,缴册印降清,至此在郑氏政权统治下二十余年的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注:

[1]《清太宗实录》卷 63。

[2]《明清史料》丙编,第 1 本,第 89 页,《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3][4][6][48][52][58][67][70][72][74][91][94]《清世祖实录》卷 4。

[5]此处《清世祖实录》卷 4 记为四月十三日,实为十一日,作者另有专文考证。

[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 79,《甲申之变》。

[8][32]《吴耿尚孔四王全传》平西王吴三桂传。

[9]《明史》卷 309,《流贼传》。

[10]康熙《永平府志》卷 3,《纪事》。

[11]魏特:《汤若望传》第 214~215 页。

[12][24]张岱:《石匱书后集》卷 63,《盗贼列传》。

[13][22][62]彭孙贻:《流寇志》卷 11。

[14][19][25]钱𦏧:《甲申传信录》卷 8,《借兵复仇》。

[15][20][27][39][44]抱阳生:《甲申朝小纪》卷 5,《吴三桂始末》。

[16]抱阳生:《甲申朝小纪》卷 3,《李自成始末》。

[17][18][21][43]钱𦏧:《甲申传信录》卷 8,《吴三桂入关之由》。

[23][26][28]《吴三桂纪略》。

[29][37][42][50][78][89]刘健:《庭闻录》卷 1。

[30]吴梅村:《圆圆曲》。

[31]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

[33][38][86]管葛山人:《平寇志》卷 10。

[34][75][79]彭孙贻:《流寇志》卷 12。

- [3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8,《李自成之乱》。
- [36][53][55][64]光绪《临榆县志》卷19,舆地编,《纪事》。
- [40]关于李自成率领大军参加山海关大战的人数,史学界说法不一,本文从王兴亚:《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一书的考订。
- [41][68][7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 [45][80][81]冯梦龙:《燕都日记》。
- [46]光绪《永平府志》卷58,《高选传》。
- [47]关于翁后在何地,史学界有说是广宁(即北镇),又有说是宁远(即兴城),作者认为在阜新境内,另有专文考证。
- [49]《八旗通志》卷189,《范文程传》。
- [51][59][60][71][77][96]《沈馆录》卷7。
- [54][63]《郭应龙奏本》,见李光涛:《多尔衮山海关战役真相》。
- [56][57]《藏国诏奏折》,见李光涛:《多尔衮山海关战役真相》。
- [61]叶梦珠:《阅世编》卷10,纪闻。
- [65]《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14页,《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启本》。
- [66]《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第449页,《平西王下马维熙等揭帖》。
- [69]余一元:《山海关志》卷5,兵警。
- [76]《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
- [82]乾隆《临榆县志》原序。
- [83]陈天植:《山海关志》序。
- [84]陈济生:《再生记略》。
- [85]钱邦艺:《甲申纪变录》。
- [87]赵士锦:《甲申纪事》。
- [88]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 [90]谈迁:《国榷》卷101。
- [92]《清史稿》卷232,范文程传。
- [9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附记野史》。
- [95]《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65页,《摄政郑王吉尔哈朗贺表》。
- [97]聿道人:《遇变纪略》。
- [98][99]《清世祖实录》卷5。
- [100]徐鼐:《小腆纪传》卷12,刘宗周传。

- [101]计六奇:《明季南略》卷6,弘光诏书。
- [102]《史可法集》卷1,请遣北使论。
- [103]陈洪范:《北使纪略》。
- [104]顾炎武:《明季实录》。
- [105]蒋良骐:《东华录》卷4。
- [106]《史可法集》卷3,书牒,复摄政王。
- [107]《清世祖实录》卷10。
- [108]吴郡人:《启祯记闻录》。
- [109]《多尔袞摄政王日记》五月二十九日。
- [110]《清世祖实录》卷17。
- [111]韩葵:《江阴城守记》上。
- [112]《列宁全集》第23卷,第35页。
- [113]《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页。
- [114]徐藩:《小腆纪年附考》卷10。
- [115]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内政辑要序。
- [116]《清圣祖实录》卷132,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己巳。
- [117]《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118][120]昭槁:《嘯亭杂录》卷1,用洪文襄。
- [119][朝鲜]《沈阳日记》壬午三月二十三日。
- [121][123]《沈阳故宫轶闻》,见王佩环:《清宫后妃》第199页。
- [122][124]《清秘史》卷1,洪承畴降虏始末记。
- [125]《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丁卯。
- [126]《清朝野史大观》1,清宫遗闻,萧墙祸。
- [127][128][131][朝鲜]《沈阳状启》癸未八月二十六日。
- [129][130]《清史稿》卷249,索尼传。
- [132]《清世祖实录》卷88,顺治十二年正月癸丑。
- [133]《清朝野史大观》1,清宫遗闻,世祖冲年用晦。
- [134]《张苍水集》第2编,建州宫词。见拙文《太后下嫁小议》,《历史知识》1983年第1期。
- [135]蒋良骐:《东华录》卷6。
- [136][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50。

- [139]《清世祖实录》卷 63, 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 [138][139][141]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摄政王。
- [140]《八旗通志》卷 140, 阿济格传。
- [142]《清世祖实录》卷 52, 顺治八年正月甲寅。
- [143]北京图书馆藏:《摄政王多尔袞薨世诏书》。
- [144]北京图书馆藏:《追尊多尔袞成宗义皇帝诏书》。
- [145]《清世祖实录》卷 53, 顺治八年二月癸巳。
- [146]《清世祖实录》卷 53, 顺治八年二月己亥。
- [147]《清史稿》卷 474, 孙延龄传。
- [148][150]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九章, “尚父”和他的皇帝学子。
- [149]《清史稿》卷 5, 世祖本纪二。
- [151]参见王戎笙:《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 1994 年《清史论丛》。
- [152][153]《清世祖实录》卷 144, 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 [154][168][169]《清圣祖实录》卷 132,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乙巳。
- [155][156]《清史稿》卷 214, 孝庄文皇后传。
- [157]章梈:《康熙政要》。
- [158]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 1。
- [159]昭桂:《啸亭杂录》卷 1, 圣祖孥觐拜。
- [160]《庭训格言》第 16 页。
- [161][163]昭桂:《啸亭杂录》卷 2, 图文襄公用兵。
- [162]勒德洪:《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上。
- [164]《清圣祖实录》卷 99,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壬寅。
- [165]《清圣祖实录》卷 99,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戊戌。
- [16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6, 内务府总管图巴等奏报太皇太后中风诊治折。
- [167]《清圣祖实录》卷 132,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甲寅。
- [170]《清圣祖实录》卷 133,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辛巳。
- [171][172][175][197][203]《八旗通志》第 189, 范文程传。
- [173][179][218]《八旗通志初集》卷 172, 范文程传。
- [174][176][188][207][208]《碑传集》卷 4。
- [177][185]《清太宗实录》卷 5。

- [178][180][205][215]《清史稿》卷 232,范文程传。
- [181][196][216]《沈阳县志》卷 9,人物,乡型。
- [182]《清史稿》卷 239,马国柱传。
- [183]《光绪会典事例》卷 998。
- [184]《清太宗实录》卷 11。
- [18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
- [187]辽宁大学历史系:汉译《满文旧档》天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189]《清太宗实录》卷 56。
- [190]《听雨丛谈》卷 7,八旗科目。
- [191]《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范文程请严核保举奏。
- [192]《啸亭杂录》卷 8,洪文襄之降。
- [193]《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扈应元陈官弊奏。
- [194]《清太宗实录》卷 42。
- [195]《茶舍客话》卷 1,八旗六部二院。
- [198]《清太宗实录》卷 62。
- [199]《清太宗实录》卷 63。
- [200]《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 455 页。
- [201][202][204]《清世祖实录》卷 4。
- [206]《明季北略》卷 20,吴三桂请清兵始末。
- [209]《啸亭杂录》卷 2,范文肃公厚德。
- [210][211]蒋良骥:《东华录》卷 4。
- [212][213]《在亭丛稿》卷 6,范文肃公传。
- [214]《听雨丛谈》卷 9,乡会式掌故。
- [217]北京图书馆藏:《范文程谕祭碑》。
- [219]《删定武库益智录》卷 7,谋猷篇。
- [220][221][222][225][227][231][270][273]《甲申核真略》。
- [223][224][22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0,廿五癸丑拷夹百官。
- [226]懒道人:《李闯小史》第 3 卷。
- [229][230][264][268]彭孙贻:《流寇志》卷 12。
- [231]《甲申纪事》。
- [232]彭孙贻:《流寇志》卷 11。

- [233][237][243][246]抱阳生:《甲申朝事八纪》卷5,吴三桂始末。
- [234]钱𦉰:《甲申传信录》卷8,吴三桂入关之由。
- [235]钱𦉰:《甲申传信录》卷8,借兵复仇。
- [236]张怡:《谏闻续笔》卷1。
- [238]《吴三桂纪略》。
- [239][245][252][265]刘健:《庭闻录》卷1。
- [240]吴梅村:《圆圆曲》。
- [241]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
- [242]《吴耿尚孔四王全传》平西王吴三桂。
- [244][255][257][258][259]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 [247]《清太宗实录》卷63,崇德七年十月壬子。
- [248]《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致西据明地诸师书稿。
- [249]《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辛酉。
- [250]《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庚午。
- [251]《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壬申。
- [253]《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癸酉。
- [254]叶梦珠:《阅世编》卷10,纪闻。
- [256]《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戊寅。
- [260][262][263][281]《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己卯。
- [261][267]《沈馆录》卷7。
- [266]《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
- [269][271]冯梦龙:《燕都日记》。
- [272][278][280]谈迁:《国榷》卷101。
- [27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附记野史。
- [275]乾隆《临榆县志》原序。
- [276]沈天植:《山海关志》序。
- [277]《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戊戌。
- [279]魏源:《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四。
- [282][284][286]李天根:《燭火录》卷3。
- [283]刘尚友:《定思小纪》。
- [285]《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 [287][288]《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壬辰。
- [28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第27页。
- [29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第43页。
- [291]《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 [292][293][297][299]懒道人:《李闯小史》第10卷。
- [294][298][30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李自成死罗公山。
- [295][300][301][303][304]李天根:《燭火录》卷4。
- [296]《明史》卷309,流贼传李自成。
- [305]《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58页。
- [306][419]彭孙贻:《流寇志》卷13。
- [30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第34页。
- [308]《清史列传》卷4,叶臣传。
- [309]《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壬午。
- [310]《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年九月乙巳。
- [311][327]《清史列传》卷79,唐通传。
- [312]《明清史料》丙编,第5本,山西总兵高勋揭帖。
- [3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第54页。
- [314]《清代农民战争资料选编》第1册上,农民军失守太原。
- [3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第55页。
- [316]《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戊戌。
- [3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第50页。
- [318]《清代农民战争资料选编》第1册上,农民军在河南济源孟县驻扎情形。
- [320]谈迁:《国榷》卷103。
- [321]《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丙子。
- [322]郑廉:《豫变纪略》卷7。
- [323]《白水志》卷1。
- [324]《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戊辰。
- [325]《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乙酉。
- [326]李天根:《燭火录》卷8。
- [328]《清代农民战争资料选编》第1册上,清军招抚木瓜园等堡并筹济粮饷。
- [32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第3745页。

- [330][331]《清世祖实录》卷 14, 顺治二年二月辛酉。
- [332]《清世祖实录》卷 14, 顺治二年二月丙申。
- [333]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 9。
- [334]计六奇:《明季南略》卷 3, 又檄。
- [335]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 10。
- [336]《清史稿》卷 217, 阿济格传。
- [337][340]《国朝耆献类证初编》卷 344, 路什传。
- [338][339][342]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 7, 纪灭闯献二贼事。
- [341]《满洲名臣传》卷 15, 兴鼐列传。
- [343][348]《清世祖实录》卷 18, 顺治二年闰六月甲申。
- [344]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 206 页, 注(65)(66)。
- [345]《八旗通志初集》卷 140, 阿济格传。
- [346]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 289 页。
- [347]费密:《荒书》。
- [349]《清世祖实录》卷 18, 顺治二年闰六月庚寅。
- [350]《清代农民战争资料选编》第 1 册上, 李自成牺牲后降清汉族官仍称贺于清廷。
- [351]《研堂见闻杂录》。
- [352][370][377][389][390][405][408][410]《清史稿》卷 237, 洪承畴传。
- [353][355][356][357][358][359]《清世祖实录》卷 4。
- [354]据《清世祖实录》卷 4 记载, 清军是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 经考证有误, 应为四月十一日。
- [36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9, 3734 页。
- [361][398][406][412]《贰臣传》卷 3, 洪承畴传。
- [362]《清世祖实录》卷 15。
- [363]《清世祖实录》卷 5。
- [364]《清世祖实录》卷 24。
- [365]《启祯记闻录》。
- [366]《清世祖实录》卷 17。
- [367]温睿临:《南疆逸史》卷 36。
- [368][369]《清世祖实录》卷 19。

- [371]许重熙:《江阴守城后纪》。
- [373][378]《清世祖实录》卷21。
- [374]《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第503页。
- [375][376]洪承畴:《为恭报旧枢投诚归顺事》,转引李光涛《论洪承畴之招抚江南》上。
- [379][380][381][382]张岱:《石匱书后集》卷37。
- [383][384][385]洪承畴:《恭报徽州合剿大捷事》,转引李光涛《论洪承畴之招抚江南》下。
- [386][388][389]《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第170页,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密揭发帖。
- [391]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8,洪承畴行状稿略。
- [392]顺治四年四月,清军驻防江宁总管巴山擒获谢光文,搜查到故明鲁王致洪承畴国公书,约为内应,杀巴山等人,这个反间计为清廷识破。
- [393]顺治四年十月,清军驻防江宁总管巴山抓获涵可等人,发现他们有反清活动,查出福王笄阮大铖书稿和变纪一书。此人是故明尚书韩日缵之子,出家多年,从广东来到江宁,久住未回,因其父是洪承畴的会试房师,所以从洪承畴处得到通行印牌,因此洪承畴受到牵连。
- [394]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 [395]戴笠:《行在秋阳》卷下。
- [396][397]黄宗羲:《永历纪年》。
- [399]《洪承畴章奏文汇辑》第68~69页。
- [402]《皇明四朝成仁录》卷12。
- [403]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 [407]《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第180页,经略洪承畴揭帖。
- [409]《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第595页,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 [413]《洪承畴墓志》。
- [414]《国史贰臣传表》乾隆上谕。
- [415]《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
- [4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344页。
- [417]赵翼:《檐曝杂记》卷2,洪经略行状。
- [418]许多史籍记载,瞿式耜遇害日期为闰十一月十七日(顺治七年,永历四

年),这是明历,并非清历,清历应为十二月十七日,本文从清历。。

[419][424]《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420][423]《常熟瞿氏四代忠贤遗像》。

[421]《瞿式耜集》卷3,书牋,《丙戌九月二十日书寄》。

[422][426][434][457]王夫之:《永历实录》卷2,瞿严列传。

[425]《张汉儒疏稿》。

[427][428]《常熟县民张汉儒控钱谦益瞿式耜呈词》,见《文艺杂志》1915年第8期。

[429]瞿元锡:《瞿式耜暨邵氏合葬行实》,江苏常熟县文管会收藏有手抄本,作者未能得见。本文所用材料,皆转引吴奈夫同志的《论瞿式耜》一文,《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430][443]《明史》卷280,瞿式耜传。

[431][435]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11。

[432][437][439][440][441][442][444][447][449][451][453][455][457]

[459]徐鼐:《小腆纪传》卷28,瞿式耜传。

[433]瞿共美:《粤游见闻》。

[436][452]温睿临:《南疆逸史》卷21,瞿式耜传。

[438][454]黄宗羲:《永历纪年》。

[443]《瞿式耜集》卷1,请驻全阳疏。

[445]《瞿式耜集》卷1,省会无虞再赴行在疏。

[448]张岱:《石匱书后集》卷52,瞿式耜列传。

[450]引自《苏省乡贤特辑》,瞿式耜传。

[459]徐元锡:《庚寅始安事略》。

[460]《瞿式耜集》卷2,赠别山。

[461][462]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17。

[463]《瞿式耜集》卷2,十七日临难赋绝命词。

[464]江日升:《台湾外记》卷2。

[465]《明清史料》丁编,第2本。

[466][467][468][469][472][474]江日升:《台湾外记》卷3。

[470][471][498][506][514]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

[473]《清世祖实录》卷69,第6~7页。

- [475]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七年八月。
- [476]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七年九月。
- [477]《清世祖》实录卷 19,第 4~6 页。
- [478][479]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八年正月。
- [480]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八年二月初一。
- [481][483][486][487][488][502][503][510][516][524][526][527][528]
[537][543][545][546][547][548][549][550][559][566]江日升:《台湾
外记》卷 4。
- [482]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八年五月。
- [484]《清世祖实录》卷 85,第 3~4 页。
- [485]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八年九月七日。
- [489]徐薰《小腆纪年附考》卷 18。
- [490]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八年二月。
- [491]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九年二月。
- [492]夏琳:《闽海纪要》卷 1,又称育材馆。
- [493][494]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九年三月。
- [495]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九年五月。
- [496]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七年八月。
- [497]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七年九月。
- [499]《明清史料》丁编,第 1 本,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
- [500]邵廷采:《东南纪事》卷 10,张名振传。
- [501]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九年七月。
- [504]王夫之:《永历实录》卷 14,李定国列传。
- [505]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 [507]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二年八月十日。
- [508][544]魏源:《圣武记》卷 8,《国初东南靖海记》。
- [509]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五月四日。
- [511]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 4,郑成功之乱。
- [512][517][534][538]《光绪鄞县志》,见《张苍水集》附录。
- [513]“木浮营”,此营是用大杉木板钉围,内容兵五百名,大炮四十门,火药火
罐不计。

- [515][553][555][564]张煌言:《北征录》,见《张苍水集》第4编。
- [518][520]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 [519]全祖望:《张苍水年谱》,见《张苍水集》附录。
- [521][522][523][525]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郑成功入镇江。
- [529][532]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 [530]邵廷采:《东南纪事》卷九,张煌言传。
- [531]温睿临:《南疆绎史》,张煌言列传。
- [533]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附录。
- [535]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八日。
- [536]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九日。
- [539]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 [540][556]《八旗通志》卷189,郎廷佐传。
- [541]《兵科史书》载顺治十六年六月十九日,总督郎廷佐等密题本,转引自安双成:《清初满文档案中郑氏家族史料概述》一文。
- [542]魏特:《汤若望传》,此书是根据汤若望回忆录写成的。
- [551][552]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十七日。
- [554]邵廷采:《东南纪事》卷11,郑成功(上)。
- [557]《清世祖实录》卷127,第12页。
- [558]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郎廷佐大败郑成功(郑成功的生日不是七月二十三日,而是十四日,此时郑军中确实为他祝寿)。
- [560]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应为二十三日)。
- [561]《为报明江宁崇明获捷有功人员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303页。
- [562]清军陆路进兵情况,笔者参考了安双成的《清初满文档案郑氏家族史料概述》一文,此文是根据《兵科史书》载郎廷佐、喀喀木、葛褚哈、蒋国柱、梁化凤等人题本,别的官书私籍均不见。。
- [563]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应为二十四日)。
- [565]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19。
- [567][568]郑达:《野史无文》卷12,郑成功海东事。
- [569][579]《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卷1。
- [570]《倘湖樵书初编》卷9,迁海。

- [571]《康熙御制文一集》卷 9。
- [572][583]魏源:《圣武记》卷 8,康熙戡定台湾记。
- [573][647]施琅:《靖海纪事》陈迁鹤叙。
- [574]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卷 6。
- [575]高拱乾:《台湾府志》卷 23。
- [576][646][650]夏琳:《闽海纪要》卷下。
- [577]《重修福建通志》卷 50,田赋。
- [578]《康熙御制文一集》卷 14,谕兵吏二部。
- [580][644]郁永河:《裨海纪游》卷下。
- [581][585]江东旭:《台湾外记》卷 13。
- [582]连横:《台湾通史》卷 2,建国纪。
- [584][599][609][611][614][618]邵廷采:《东南纪事》卷 12,郑成功下。
- [586][602]夏琳:《闽海纪要》卷上。
- [587][588][594]江东旭:《台湾外记》卷 14。
- [589][590][593][598]江东旭:《台湾外记》卷 15。
- [591][592]《明清史料》丁编,第 3 本,第 272 页。
- [595]《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跋。
- [596][601][603][604][608][613][615][619]江东旭:《台湾外记》卷 16。
- [597]昭桂:《啸亭杂录》卷 1,论三逆。
- [600][612][616][630][645]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 2。
- [605]《华夷变志》卷 2。
- [606][607][619][620][621][622][623]江东旭:《台湾外记》卷 17。
- [610]《闽海纪略》。
- [624][625][626][627][628]江东旭:《台湾外记》卷 18。
- [629][631]江东旭:《台湾外记》卷 19。
- [632]《清圣祖实录》卷 49。
- [633]吴含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0,第 4036 页。
- [634][635][636][637][638]江东旭:《台湾外记》卷 20。
- [639][640][641]江东旭:《台湾外记》卷 22。
- [642]李元春:《台湾志略》卷 2,姚启圣传。
- [643]全祖望:《鮑琦亭集》卷 15,姚启圣第二神道碑。

- [648]施琅:《靖海纪事》周澎百“平南赋”。
- [649]施琅:《靖海纪事》襄壮公传。
- [651]《明清史料》丁编,第252页。
- [652]《清圣祖实录》卷92。
- [653]施琅:《靖海纪事》叙。
- [654]黄宗羲:《赐姓始末》。
- [655]高拱乾:《台湾府志》卷23。
- [656]夏琳:《闽海纪要》卷下。
- [657]《重修福建通志》卷50,田赋。
- [658][695][696]《康熙御制文一集》卷14,谕兵吏二部。
- [659]《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之事》卷1。
- [660][740]郁永河:《裨海纪游》卷。
- [661][662][674][717][718]江东旭:《台湾外记》卷下。
- [663][665][705]施琅:《靖海纪事》卷上,边患宜靖疏。
- [664]《明清史料》戊编,第1本,第16页。
- [666]施琅:《靖海纪事》卷上,尽陈所见疏。
- [667][700]《清史稿》卷260,施琅传。
- [668][727][741]《清史列传》卷9,施琅传。
- [669][687]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卷7,闽海遗兵。
- [670][707]王之春:《清朝柔远记》。
- [671]《皇朝经世文编》卷84。
- [672][699][704][715]施琅:《靖海纪事》卷上,襄壮公传。
- [673]《平定海寇方略》卷1。
- [674][677]《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第272页。
- [676]《清圣祖实录》卷109。
- [677]邵廷采:《东海纪事》卷12,郑成功(下)。
- [679]李元春:《台湾志略》卷2,姚启圣传。
- [680][751]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5,姚启圣第二神道碑。
- [681][724]郁永河:《裨海纪游》卷上。
- [682]《清圣祖实录》卷10。
- [683][721]施琅:《靖海纪事》叙。

- [684]《倘湖樵书初编》卷9,迁海。
- [685]《康熙御制文一集》卷9,谕新王杰淑。
- [686][706]魏源:《圣武记》卷8,康熙戡定台湾记。
- [687]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卷6。
- [689][734]夏琳:《海纪辑要》卷3。
- [690]《清圣祖实录》卷105。
- [691]彭孙贻:《靖海志》卷4。
- [692]施琅:《靖海纪事》卷下,移动不如安静疏。
- [693][702][708]施琅:《靖海纪事》卷上,海逆日蹙疏。
- [694]《清圣祖实录》卷112。
- [697]《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 [699]《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 [701][709]施琅:《靖海纪事》卷上,决计进剿疏。
- [703]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卷4。
- [710]《清圣祖实录》卷102。
- [711]《清圣祖实录》卷103。
- [712]《清圣祖实录》卷105。
- [713]《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 [714]《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 [716]黄叔瓚:《台海使槎录》卷1。
- [718]施琅:《靖海纪事》卷上,飞报大捷疏。
- [719]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2。
- [720]施琅:《靖海纪事》晓谕澎湖安民示。
- [722][755]杜臻:《澎湖台湾纪略》。
- [723]《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
- [724][733][757][759]《清圣祖实录》卷111。
- [725]《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 [726]《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 [730]《闽海纪略》。
- [731][735]江东旭:《台湾外记》卷上。
- [732]《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之事》卷4。

- [736]《康熙御制文一集》卷 35。
- [737]施琅：《靖海纪事》卷下，谕台湾安民生示。
- [738]施琅《靖海纪事》卷下，严禁犒师示。
- [739]施琅：《靖海纪事》卷下，舟师抵台湾疏。
- [742]李光地：《榕村全书》李光地年谱。
- [743]施琅：《靖海纪事》卷下，恭陈台湾去留疏。
- [744]徐珂：《清稗类钞》台湾置郡县。
- [745]《清圣祖实录》卷 114。
- [746]姚莹：《东槎纪略》卷 4，台湾班兵议（上）。
- [747]韩蒺：《有怀堂文稿》卷 10，施琅碑文。
- [748][752][754]《清圣祖庭训格言》。
- [749]徐珂：《清稗类钞》施琅善水战。
- [750]《清圣祖实录》卷 96。
- [753]《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
- [757]《清圣祖实录》卷 119。
- [759]施琅：《靖海纪事》上卷，密陈专征疏。
- [760]钱仪吉：《碑传集》卷 15，吴英传。
- [761]《清圣祖实录》卷 105，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己卯。
- [762]施琅：《靖海纪事》，襄壮公传。
- [763]《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年八月十五日。
- [764]《清圣祖实录》卷 98，康熙二十年十月丙午。
- [765][766][767][768][769][770][771][772][773][774]吴英《行间纪遇·施琅进攻台湾事》。
- [775]施琅：《靖海纪事》上卷，晓谕澎湖安民示。
- [776]同上书，祭澎湖后土文。
- [777]同上书，下卷，安抚疏诚示。
- [778]同上书，台湾就抚疏。
- [779]同上书，谕台湾安民生示。
- [780]同上书，严禁犒师示。
- [781]同上书，舟师抵台湾疏。

第四章 康乾时期的安内和攘外

第一节 康熙平定布尔尼叛乱

康熙十四年(1765)三至五月,在我国东蒙和辽西爆发了以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为首的反清叛乱。这次叛乱,不仅破坏了关外广大地区的安宁,而且直接威胁着京师的安全,在客观上同“三藩之乱”遥相呼应,使清王朝南北受敌,因此“圣祖忧之”^[1]。由于此次叛乱的时间短、规模小、史料少,所以长期不为史家重视,在许多清史论著中,极少涉及。作者根据新近发现未刊刻的《平定察哈尔方略》稿本,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对布尔尼叛乱的历史背景,康熙平定叛乱的经过和意义,提出一些看法。

17世纪60年代初,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各地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整个社会开始走向和平安定、休养生息的新时期,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当这艘历史航船刚刚离港远航,就遇到了险礁恶浪。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为保其分裂割据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掀起了“三藩之乱”,战火燃遍长江以南半个中国。这股逆流也波及到北方,察哈尔部蒙古贵族布尔尼叛乱,正是在此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布尔尼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其祖父林丹汗,此人凶残狡诈,野心勃勃,企图乘明末社会动乱之机,兼并内蒙各部,称霸漠南蒙古。他对内“多行不道,钐戮亲族,虐害其下,又时侵扰诸部,人

不堪命，皆怨畔”^[2]；对外投靠腐朽的明王朝，获得明政府给东蒙的全部岁币，藉以反对后金，公开宣称“汝数苦明国”，“吾将牵制汝”^[3]。新兴的后金政权，则采取团结漠南各部、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林丹汗的政策，因此科尔沁、扎鲁特等部相继来归。天聪六年（1632）四月，皇太极亲率大军攻打林丹汗，林丹汗闻讯大惊，率部仓皇西奔，可是部众“素苦其残酷，莫肯从行，留居者十之七八”^[4]。天聪八年（1634），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染病身亡，次年二月皇太极命多尔袞等率军西征，消灭了林丹汗的残部，林丹汗的正妃苏泰和儿子额哲“遂献传国玺，悉众内附”^[5]。皇太极为了进一步笼络和稳定漠南蒙古，要郑亲王济尔哈朗收苏泰为妻，又把自己次女公主马喀塔嫁给额哲，并“特择善地，俾居义州”^[6]，封额哲为察哈尔蒙古亲王，仍冠内蒙诸部之上。

崇德六年（1641），额哲病死，由其弟阿布奈主管部内事务。顺治二年（1645），阿布奈娶其嫂马喀塔为妻，不久公主生布尔尼、罗布藏二子^[7]。顺治五年（1648），阿布奈袭封亲王，自此“渐骄蹇纵恣，与所亲信噶尔马色冷等，妄残杀部人，所为多不法”^[8]。尤其是他无视朝廷，竟然“不修朝贡者八年，所为益乖畔”^[9]。因此，康熙八年（1669），清朝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上奏，指出“阿布奈无藩臣礼，大不敬，应论死，没其妻孥，褫王爵弗袭”^[10]。康熙皇帝为了安抚漠南蒙古，又念阿布奈是清皇室的额驸，便从宽处置，“命羁之盛京”^[11]。

尽管如此轻罚，但是康熙仍怕不当，所以又封阿布奈长子布尔尼为亲王，并将安亲王岳乐之女嫁给布尔尼为妻。可是布尔尼“性尤凶顽”^[12]，是个野心家。他时刻寻机要报祖、父之仇，妄图“推翻满洲人的统治，恢复他们祖先曾经统治过的帝国”^[13]，因此当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后，清政府多次要布尔尼派兵南下增援平乱，然而“其兵不至”^[14]。他此时正想利用吴三桂变乱，“国家有事之际，王师四出，潜构逆谋”^[15]。于是派人潜入京师窥探虚实，侦知“北

京几乎没有满洲人的军队,连守卫城门的也只是些小孩”^[16],防卫非常薄弱。同时又遣人秘密奔赴漠南各地,联络蒙古诸部,鼓动反叛清朝,重振蒙古帝国。此外还加紧筹备马匹粮草,“缮治兵器”^[17],积极准备发动叛乱。布尔尼企图谋反的行径,为从嫁公主长史辛柱所察觉,她感到此事严重,立即派其弟阿济根火速回京,奏告清廷。

康熙闻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十分震惊,因为当时国内形势很危急,由于清军镇压“三藩之乱”未能得手,却失去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南、福建和陕西等八省,致使朝臣惊恐,人心浮动。又因清军八旗精锐“俱已出征,余者尽系老弱”^[18],京畿异常空虚,再加上北京城内又发生了汉族奴仆的暴动^[19],所以人人自危。可见,如果布尔尼叛乱一旦得逞,那清王朝将腹背受敌,社稷存亡不堪设想。康熙深感此事重大,便和阅世丰富、颇有谋略的祖母孝庄文皇后一同商讨对策。他们分析了面临的局势,估计了敌我力量,认为“事尚未露,不便遽加之兵”^[20],避免激而生变,逆焰早燃。而是采取“先遣人往召,以征其虚实”^[21]的办法,想在京师的殿堂上迫使布尔尼等人低头服罪,从而不动一兵一卒,用和平的手段粉碎这起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危的反叛阴谋。但是又惧怕布尔尼“生疑”^[22],所以特派侍卫色冷等人前往,除了召布尔尼兄弟外,还召巴林王鄂齐耳兄弟、翁牛忒王杜冷兄弟来京议事。诡计多端的布尔尼预感到事情不妙,叛乱阴谋可能已为朝廷发觉,因此“诸王俱至,布尔尼兄弟不来”^[23]。康熙十四年(1576)三月十七日,布尔尼“执奉使侍卫色冷”^[24],公开举起反清旗号,发动武装叛乱。随之奈曼部王扎木山向布尔尼移营附叛,顿时关外一片混乱,人心汹汹,据《李朝实录》记载,朝鲜人安端从京师回朝鲜义州时报告说:“自北京发行,到关外锦州卫、广宁等处,人民皆思避乱,言蒙古(指布尔尼叛军)将犯沈阳。及到沈阳,城门昼闭,不得留住。到连山关,逢凤凰城甲军一百二十名调赴沈阳,问之,则言蒙王车屹汗

(即阿布奈)被囚于沈十年,其子(即布尔尼)代立,以一枝兵遮截北京路,攻取沈阳,脱出其父,然后将为西犯云。”^[25]

当布尔尼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师后,北京的气氛十分紧张,许多廷臣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年仅二十二岁的康熙皇帝,“每日出游景山骑射”^[26],以安定人心,正如康熙自言:“朕若稍有疑惧之意,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27],并决定用战争的方式来平定布尔尼叛乱,因此采取了以下两点措施:

1. 调兵遣将、坚决镇压

首先,康熙于三月二十九日命多罗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都统大学士图海为副将军,护军统领哈克山,副都统吴丹、洪世禄为参赞。虽然统军主帅已命,但是京师“诸禁旅皆南征,宿卫尽空”^[28],无兵可调。此时“才略出众”的副将军图海提出建议,“请藉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29],清廷允准,故“得数万人”^[30],迅速组成一支平叛大军。

其次,康熙又于同日命盛京将军邬内巴图鲁,严防布尔尼叛军攻打沈阳,抢夺其父阿布奈,所以要坚决“固守盛京”^[31]。康熙为了加强沈阳的防卫力量,特命宁古塔将军巴海“速诣盛京,同将军邬内巴图鲁等固守,若宁古塔地方无虞,可多简精兵率往”^[32]。随之又抽调“永陵、凤凰城、盖州、牛庄、东京兵守盛京”^[33]。

再次,康熙又于四月三日派遣理藩院郎中马喇、员外郎塞梭前往漠南,敕谕诸部,要求派兵协助平叛,“悦马瘦不堪驰骋,亦宜各守地方”^[34]。康熙为了马喇等人出使顺利,收到好的效果,故命理藩院作书,颁发科尔沁部的俄齐尔、沙津,翁牛忒部的杜冷、毕礼滚达赖、叟色,巴林部的鄂齐耳、吴尔占,敖汉部的扎木素,喀喇沁部的扎世、吴特巴喇,土默特部的赵图,扎鲁特部的巴达礼、扎木等各一函,要“诸部使人,悉令与马喇等偕行”^[35],以壮声势。

2. 积极招抚、分化瓦解

四月五日,康熙派人赴察哈尔部招抚布尔尼等人,他敕谕布尔

尼说：“尔受累朝恩养，又为公主所生，以至戚不忍遽灭，故屡行晓谕，若仍执迷，恐貽后悔。”^[36]

康熙接着又给布尔尼弟罗布藏敕曰：“尔当开谕尔兄布尔尼，令其悔罪归诚，尔等以及子孙，庶不失荣贵。若布尔尼不悟，将以尔兄之故，并累及尔，尔果能率属来者，仍待以亲亲之道，即以王爵封之，必不食言。尔为公主子，于国为至戚，故行晓谕，其于大兵未至时，向尔兄开陈利害，速令请罪，以付朕不忍遽灭之意。”^[37]

最后，康熙又向察哈尔部众宣谕：“尔等当向布尔尼申明利害，彼若悔罪归诚，尔等亦获福多矣。”“若布尔尼拒谏不悛，或擒献逆渠，或自行投降，朕锡以官爵，俱加恩养，断不食言。”^[38]

由于康熙实行以上一系列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得布尔尼的部众军心动摇，被迫随叛者纷纷离去，叛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清政府改变了原先不利的形势，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彻底平定布尔尼叛乱创造了良好条件。

康熙对此次平叛非常重视，事事都要亲自过问，关于清军平叛进军路线问题，他不同意有人提出的取古北口近道直趋察哈尔，认为“大兵众多，若由古北口，则崎岖难行，且多带红衣炮具，耽延时日，自应出山海关”^[39]。四月五日，即清军出征前夕，康熙特召见抚远大将军鄂札等人，面授机宜，指出“大兵出山海关，当宣布累朝待布尔尼厚恩，及朕不忍加诛意，彼若悔罪来归则已，否则以敕书付纵蒙古持往谕之，即布尔尼等临阵来降，亦当受纳。今值蒙古马瘦，尔其速往无违”^[40]。六日，当鄂札等人从北京率军启行时，康熙又谕鄂札，要他“凡事与图海、哈克山、吴丹、洪世禄等酌定方略，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严加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大兵一至，即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分别升赏”。“须严禁将士，申明纪律，凡经过地方，毋得骚扰百姓，归顺良民，加意抚恤，务体朕定乱怀远之意”^[41]。

四月二十一日，鄂札率领大军到达歧尔哈泰，“侦知贼屯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间，而悉众阵以待”^{〔42〕}。于是鄂札便命令留下辎重，偕图海、吴丹、哈克山等人带领一支满、蒙精锐轻骑冲击敌营。布尔尼见清军来势凶猛，派三千骑兵拒战，但被击败。鄂札等人早就知道布尔尼在山谷间埋有伏兵，所以停止追击逃窜的败兵，立刻令清军搜山，果然伏发，误入埋伏区的土默特部蒙古兵受挫。副将军图海、护军统领哈克山见此情景，便分兵救援，“贼以四百骑继至，力战歼之”^{〔43〕}。布尔尼见势不好，企图与清军决一死战，遂倾巢出动，亲率全部叛军，摆列火器，进行猖狂反扑。鄂札等人严阵以待，当叛军进入阵前，命全军出击，经过一场激烈血战，“贼不能支，遂大败”^{〔44〕}，布尔尼部将晋津率众在阵前投降。但是，布尔尼不甘心败亡，曾两次收集溃兵再战，结果皆遭惨败。布尔尼看到全军覆灭，大势已去，便在乱军之中，带领三十余骑逃跑了。清军在“达禄之战”中取得大胜，“招抚人户一千三百余”^{〔45〕}，“获马匹器械无算”^{〔46〕}。

布尔尼在达禄战败后，带领残兵败将逃到札鲁特境内贵勒苏特地方，正好碰见奉命前来助剿的科尔沁部和硕额驸沙津，他是布尔尼弟罗布藏的妻兄。布尔尼要罗布藏将其妻送到沙津帐中，并告知战败欲逃之意，希望沙津念亲戚之情放走他们。可是沙津认为此事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所以立即派兵把布尔尼带领的逃叛残军包围，然而狡猾的布尔尼已逃遁。于是沙津要罗布藏去劝其兄布尔尼投降，罗布藏则乘机潜逃，并派布达里把情况告知布尔尼。沙津得知后，命孟格者率兵追击布达里，却为布达里杀死。于是沙津亲自领兵穷追，罗布藏和布达里皆被射杀，但布尔尼仍率十余骑顽抗，拒不投降，最后也被沙津所杀。

就在平叛的清军获得大胜的时候，突然“调驻宣府左翼四旗察哈尔，为布尔尼流言所煽，毁边墙私遁，肆行钞掠”^{〔47〕}。他们只知布尔尼有变，但不知已为清军打败，所以“欲往助彼”^{〔48〕}。四月二

十七日,这股叛军出独石口,进至鄂西奚,将“附近旗下蒙古妇女牲口,尽行掠去”^[49],然后继续向布尔尼驻地进发。可是这一路的巴林、翁牛特、敖汉、喀喇沁、土默特等部军队,皆为清廷调征布尔尼去了,因此无兵阻击叛军。而且更使康熙“深为可虞”^[50]的是以上各部官兵妻子在家,倘遭劫掠,影响极坏。

康熙对“察哈尔兵,狂悖如此”^[51],深恶痛绝。首先命内大臣佟国纲为安北将军,率兵速镇宣府,进剿叛军。其次令鄂札,要蒙古诸部随征的王贝勒台吉等,“率兵速回,各守境内,叛兵一到,即为剿除”^[52]。再次派一等待卫奇他特等人,前去招抚,他们抵达叛营后,告知布尔尼已兵败身亡,因此“众皆踊跃归服”^[53],这次察哈尔兵变便顺利地和平息了。

鄂札、图海等人,在关外处理了战后事务,奉命班师回朝。闰五月十二日,鄂札、图海回到京师,受到隆重的欢迎,康熙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南苑东红门迎劳,为了表彰鄂札“远行征讨,建立大功,赐黄金百两、白金千两”^[54],图海也“叙功晋一等男”^[55],其余官兵“俱论功授职赏资,优加恩赐”^[56]。自此役后,清政府收回察哈尔部先前义州故地,置为牧马厂,并适其部众到宣化、大同之北驻牧,把察哈尔八旗分为左右二翼,属理藩院管辖,其地位从原先蒙古四十八旗之上,骤然降到诸旗之下。

康熙平定布尔尼叛乱,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虽然战争胜负的因素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条件,但是首先是取决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康熙平定布尔尼叛乱,从阶级实质上来看,它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然而其内容则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布尔尼叛乱,表面上看气势汹汹,实际上毫无群众基础,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是坚决反对的。早在布尔尼发动叛乱之初,他就遣使到内蒙诸部进行串连,煽动叛乱,结果事与愿违,各部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抵制。如喀喇沁部多罗杜冷郡王扎世,他“归其使,以无能谢之,即具疏陈

明心迹，遣其下达喇世入告”^[57]；又如奈曼部台吉鄂京尔等，毅然“遂率九佐领与其妻子奔散汉，寻复至喀喇沁”^[58]；该部二等台吉吴勒木济，也“同其母率所属二佐领避居土默特”^[59]；再如土默特部贝子滚济斯扎布，派人向清政府报告叛军的活动，称“贼约我兵断锦州路，复约向山海关设堠侦探，又约移营就彼，凡三次，皆托故不应”^[60]，等等。所以漠南蒙古诸部支持叛乱的人很少，除察哈尔的布尔尼和奈曼部的扎木山“二旗外，别无叛者”^[61]，说明叛乱很不得人心。

此外，康熙对军事的布置和指挥的正确，也是夺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他虽然是采取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惯用的恩威并施的办法，但是他掌握整个战局，明确打击方向，并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决定速战，粉碎叛乱。所以，康熙对鄂札说：“兼程驰赴，乘贼马未肥，党与未合，即行扑灭。”^[62]而鄂札等人“仰承诏旨，卷甲疾趋，于贼约勒未之先，欻然至止，贼果不能抵拒，达禄之战，遂为我师所大败”^[63]，清军“出师未浹二旬，即剪灭凶丑，献恺而还”^[64]。关于此役用兵神速这一点，在法人白晋的《康熙帝传》一书中也有记载，他说：“康熙帝迅速地派出了一支小部队，命令他们出击，使这个蒙古王公措手不及，无法凑集他的全部兵力，更不能同与他结盟的几个蒙古的军队会合。这样就迫使蒙古王仓促地纠集他所能集中的兵力与那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他的心脏地带的清兵交战，蒙古王因此而遭到惨败。”^[65]

康熙平定布尔尼叛乱，尽管这次叛乱的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是它对清王朝的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我认为有两点可以提出。

第一，自明末清初以来，察哈尔部的蒙古贵族林丹汗、阿布奈和布尔尼祖孙三代，一直企图统治蒙古诸部，妄想复辟蒙古帝国的旧王朝，对蒙古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破坏蒙古地区的社会安宁，成为蒙古社会动乱的一大隐患。所以康熙镇压了布尔尼叛

乱,不仅摘除了这个分裂割据的毒瘤,“自是蒙古诸部,畏威怀惠之心愈深,而竭诚宣力之念愈切”^[66],而且加强和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可见这种反对分裂割据的战争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二,为镇压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扫清了道路,康熙平定布尔尼叛乱之后,清王朝解除了京师之危,摆脱了南北夹击的困境,从而可以集中力量解决“三藩之乱”的问题,然后经过五六年激烈斗争,终于平定了危害国家和人民,长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这为国家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乾隆时期的金川之役

所谓金川之役,包括乾隆十二至十四年和三十六至四十一年清政府发动的两次对金川地区的战争。金川位于四川西部,“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67],可是第一次金川战争,清廷“调派京东及各省满汉土官兵,共六万二千五百余员名”,“用帑银七百六十万四千八百余两”。第二次金川战争,“共调集十四省营八路土司满汉屯土官兵,一十二万九千五百余员名”,“动帑银六千一百六十万两”。^[68]此役是乾隆帝“十全武功”中历时最久、耗资尤巨的战争,原因何在?如何评价?确实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战争性质

金川因促侵(藏语大川)、赞纳(藏语小川)两河流经其境,“临河山有金矿得名”^[69]。金川历史悠久,据史籍记载,“禹贡梁州之域,本氏羌部落,汉为西南诸蛮”^[70],隋始设金川县,唐置金川州,属维州管辖,北宋归威州,明封金川喇嘛哈伊拉木为金川寺演化禅师,世袭土司,领有其地,隶杂谷安抚司。数传后,以河名分为大小金川。顺治七年(1650),小金川卜儿吉细“归诚授职”^[71]。康熙五

年(1666),其子“土司嘉勒巴内附,给演化禅师印,俾领其众”^[72]。乾隆十年(1745),由其曾孙泽旺袭土司职。此外,康熙六十一年(1722),大金川土舍色勒奔初“投诚,遵奉调遣,拨发土兵五百名”^[73],从四川提督岳钟琪平定“松潘、阶、文之接壤之羊峒”叛乱有功^[74],被“委以副长官司职衔,令管理驻牧事务”^[75]。雍正元年(1723)三月,清廷“给以安抚司职衔”^[76]。乾隆七年(1742),色勒奔初病故,“以其子莎罗奔承袭”^[77]。

这种土司制度是我国自秦汉统一以来,为了加强对西南“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78]的少数民族进行统治,逐渐形成“因俗而治”、“其道在于羁縻”^[79]的治理办法。“四川边境寥廓,历代多设土司以相控制……清初,戡定川境,各土司次第效顺”^[80]。此制的特点:一方面中央王朝对归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委以职衔,授给名号,世官其土,世有其民;另一方面土司土官必须遵守和服从中央王朝的政令,并尽贡、赋、兵等义务。清入关定鼎北京后,在西南虽然沿袭明朝的土司制度,但是到了雍正年间,看到此制的严重弊端,乃大力推行改土归流。不过为了分化瓦解,减少阻力,依然保留一部分土司,大小金川则为其例。

在金川周围,还分布众多的其他土司,共同构成所谓“嘉绒各部”。金川东部有杂谷、瓦寺,东南部有沃日,西部有革布什咱,西南部有巴底、巴旺、布拉克底、章谷,南部有木坪、明正,北部有绰斯甲布、从噶克、卓克彩、梭磨、党坝等土司。

自从大金川色勒奔初任安抚司,及其子莎罗奔袭职后,势力大增,于是有恃无恐侵犯邻近土司,并企图兼并其侄泽旺领有的小金川。乾隆二年(1737),色勒奔初领兵攻占革布什咱土司丹津罗尔布的盖古交地方^[81]。四年(1739)七月,他又三次出兵攻打革布什咱^[82]。九年(1744),大金川与革布什咱各自为了争夺巴底,“互相争杀”^[83]。此外,莎罗奔袭职后,谋图吞并小金川,“寻以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84],并且阴结泽旺之弟良尔吉为内应。

十一年(1746),莎罗奔“劫泽旺归,夺其印”^[85]。川陕总督庆复,见事态严重,进行“查究”,莎罗奔无奈,“始将泽旺放回,归还印信”^[86]。十二年(1747)正月,莎罗奔发兵攻打革布什咱的正地寨,随之又劫杀明正土司所属的鲁密、章谷,公然纵兵进攻坐汛此地的清军把总李进廷部,清军“不能抵敌,退保吕里”^[87]。大金川兵乘胜竟直渡河口,逼近入藏要冲打箭炉附近的毛牛地方。另一路大金川兵进入杂谷,在“党坝下营,迫胁蛮民投顺”^[88]。与此同时,莎罗奔又勾结绰斯甲布、结隆冲二土司,“攻围霍耳章谷”,进袭清军,“千总向朝选阵亡,并侵压毛牛,枪伤游击罗于朝”,“千总杨璠亦带矛伤”^[89]。正如乾隆帝所言:“逆酋敢于侵扰,伤及官兵,猖獗若此。”^[90]这就是第一次金川之战的起因。

经过第一次交战之后,金川土司的旧势力,没有受到沉重打击,于是很快恢复元气,依然如故,“自恃地广人众力强,与各土司构兵,迄无宁岁,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势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91]。乾隆二十年(1755),大金川莎罗奔联合绰斯甲布,发兵攻打孔撒土司嘉齐山,将百姓碉房烧毁,又围攻革布什咱丹东官寨及格斯喇嘛寺^[92]。二十三年(1758),莎罗奔因身体负病,一切事务由其侄郎卡管理,郎卡为了控制革布什咱,以一女妻革布什咱土司,遭到拒绝,于是出兵攻打革布什咱,将土司四郎多博登和前来救援的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围困在吉地官寨,同时又侵犯小金川孙克宗地方^[93]。二十五年(1760)五月,莎罗奔病死,郎卡袭土司职,垂涎党坝。二十七年(1762)九月,大金川兵进攻党坝,沿途抢掠,占据玛浪,围攻官寨^[94]。三十年(1765)十二月,郎卡又发兵攻打党坝,占领额碉,并炮击格藏官寨^[95]。同时又与布拉克底,聚众围攻巴旺卡卡角,烧毁寨房,杀掠人口,占领其地^[96]。这时小金川土司泽旺因年老体弱,由其子僧格桑主政,势力日增。三十二年(1767),郎卡为了拉拢小金川,将其女许配僧格桑为婚,“遂与小金川互相结连,不服抚谕”^[97]。三十五年(1770)四月,大金川

郎卡病故,其子索诺木袭职。九月,小金川发兵“攻掠沃克什(即鄂克什)土司色达克拉寨落牲畜”^[98],大金川则支持。三十六年(1771)四月,索诺木进攻革布什咱,杀害土司色楞敦布多,并向清廷提出“将革布什咱地方百姓赏给当差”^[99]。而僧格桑乘机攻打鄂克什、瓦寺、明正土司,并包围坐汛达围寨内的清军把总洪廷瑞所率绿营兵二十名、土练二百名、土千总阿吉等^[100]。而且小金川“各处添碉卡”^[101],以防官兵来攻。因此,乾隆帝说:“僧格桑乘索诺木侵害革布什咱土司之衅,盖复滋横,并且修筑碉卡,谋抗天朝,势不得不加以兵革。”^[102]这就是第二次金川之战的起因。

由上可见,虽然两次金川之战的起因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激起的实质性问题却是一致的,概括而言,有以下两点:一是恃强凌弱,不断侵犯邻近土司,占领土地,杀伤民众,掠夺财物等;二是抗命朝廷,不遵政令,对前来调解土司纠纷的地方官,“往谕罢兵退地,逆酋阳奉阴违”,或者“不从,辄敢干扰”^[103],甚至围攻清军汛地,射杀官兵。因此,金川之役既不同于民族压迫和歧视激起的少数民族起义,亦不同于阶级压迫、官逼民反而掀起的农民战争,而是反清的地方叛乱,它和平准、平回的性质是相同的。

现在再来考察清朝为什么发动金川之战,主观与客观、直接与间接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清朝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乾隆帝的主观而言,他无疑是要维护清朝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希望能够长治久安。乾隆帝虽然不是清王朝创业之君,却是一位有作为的守成之主,他对顺、康、雍三帝开疆拓土而奠定的疆域十分珍惜,特别强调不能使先帝“式廓之版图或有侵削”^[104]。“并指出“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105]。而金川地区,“东则四川成都,西则西藏,南则云南、贵州,北则西宁、青海,与各处疆界相连”^[106]。这些地方都是政治敏感地区,所以乾隆帝在谈及金川问题时说:“吾则以为既受职为土司,则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远

连卫藏,则是我土,我土我臣,而横生逆志,蚕食邻封,将欲大有所为,弗剿而灭之,则四川将不能安枕……故余不咎人之议为穷兵黩武,而转咎己之类于姑息养奸……若谓余穷兵黩武,则余赖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万余里,岂其尚不知足,而欲灭蕞尔金川,以为扬赫溜、纪勋烈之图哉!”^[107]这段话充分表明了乾隆帝发动金川之役的意向和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定、消除动乱隐患。

其次就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而言,从16世纪到17世纪前期,西方殖民势力由海陆两方面向东方进侵,他们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侵扰掠夺,葡萄牙占领澳门,荷兰占领澎湖、台湾,英国占领虎门,进入广州。而沙俄由北方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攻城占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清王朝建立后,对于这些外来的陌生者,采取防范态度。早在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对荷兰要求在“福建地方,不时互市”,便向身边廷臣说:“外国人不可深信。”^[108]他到了晚年,曾告诫后人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109]雍正、乾隆皆继承康熙夙志,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如禁止传教、限制贸易等。

从以上安内和攘外两者关系来看,清王朝把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社会安定、抵御外敌作为国家战略。“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10],金川之役亦不例外,它必须服从清朝的国家战略,这就是此役发生的真正原因。

二、战中的失误

金川战争的性质只为取得胜利提供了可能性,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乾隆帝还必须依据客观实际的形势和特点,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和具体战斗方法的战术。如何制定能够取胜的战略战术呢?孙子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111]就是要求熟悉敌情我情,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制定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作战方针,可

见信息对决策的重要性。那么金川地区有哪些实际情况对战争有影响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自然条件。金川地区全境皆山，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属于高寒地带。这里山高谷深，河流湍急，把地面切割分隔，“羊肠一线折于悬崖峭壁中，虽将军大臣亦多徒步”^{〔112〕}，而且“重关叠隘，山路险巖，马蹶不能驰，人喘不能骋”^{〔113〕}。据清军将领鄂实奏称：“人易发喘，须服人参。”^{〔114〕}更严重的是因空气稀薄，外来人、马经常昏倒，必须对鼻喷烟方能苏醒站立^{〔115〕}。金川高原，“重山叠嶂，雾重风高，山岚瘴气，多寒少暑，春夏雨雪，经旬累月，罕有晴时，每雨则霹雷大作，电光中皆有声。至八九月间，始得晴霁，隆冬积雪丈余，山谷弥漫，坚冰凝结，道路不通”^{〔116〕}。气温变化很大，“一日之间，寒暖顿殊，咫尺之地，阴晴各异，严冬天晴时，日中可穿春服，盛夏天阴时，朝晚亦可披裘，四时无大寒大热，然倏忽变幻如此，不必烟瘴为厉，稍不自谨，中之立病”^{〔117〕}。这种险峻而恶劣的自然条件，对部队的行军作战和后勤的运输供应，都造成很大的困难。

——社会民情。金川是藏族的聚居地，大金川土司管领百姓四千多户，有兵丁三千人；小金川土司管领百姓六千多户，有兵丁四千人^{〔118〕}。大、小金川土司在各自的辖区内享有绝对的权威，占有境内的土地、山林和人民，掌握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这里藏民信仰苯教，“惟喇嘛之言是听”^{〔119〕}。金川土司崇奉苯教，并将政教势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土司往往留一子承袭土司职衔，其他诸子都出家为喇嘛，他们仍保有土舍身份，同时又成为当地宗教势力的领袖，地位仅次于土司，并参与土司的政务。金川土司通过宗教势力进一步控制百姓，金川民众“俗尚武，咸工击刺之术，虽妇女亦解谈兵，闻者征调，殊踊跃向往，临阵奋不顾身”。而且“人多膂力，类能手挽强弓”，“箭镞利甚”，还“善用火枪”^{〔120〕}。因此，金川人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战斗力。

——碉楼群竖。土司署所为官寨，四周建造许多碉楼，为作战兵堡，民居称寨子，各户必有碉房，为守望之所，于是把平时的住房和战时的堡垒合为一体，各自独立，又互为犄角之势。另外，在境内的关隘、渡口、沿途的制高点皆筑有层层战碉，构成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这些兵垒，就地取材，用石砌成，十分坚固。每座兵垒“如小城，下大额细，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数十层，每层四面各有方孔，可施枪炮”^{〔121〕}。为了加强防御能力，“或于碉外增壕，或于碉内积水，或附碉加筑护墙，地势本居至险，防御又极周密”^{〔122〕}，而且“有埋瓮听远之法，掘地丈许，可听数十里，自此深一尺则远十余里，以次递增可及百里，静夜伏地，潜听百里中人马行声，虽衔枚卷甲，皆历历可闻”^{〔123〕}，从而可以了解敌军行动，提早防备。这种石碉有很高的防御性能，“故一碉不过数十人，万夫皆阻”^{〔124〕}，可见阻滞进攻的作用。

综观上述，金川易守难攻，清军在特殊的地区，与特殊的敌人，打一场特殊的战争。

乾隆帝作为金川之役的最高统帅，“用兵所关甚巨，宜周详筹画，期于必克”^{〔125〕}。可是，他一则盲目轻敌，认为金川“蕘尔穷番，何足当我王师？”^{〔126〕}二则敌情不明，所谓“朕初未知地既险远，碉复坚峭”^{〔127〕}。可见乾隆帝对金川之役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因此未能根据战争的形势与特点，制定出既科学又周全的战略方针，致使前线将领无所遵从，于是犯了严重的战略战术错误。

金川地区天时、地利、人和，及作战手段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兵垒碉卡上，如何解决好碉卡问题，是金川之役取胜的关键。第一次金川之役期间，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云贵总督张广泗奉调为川陕总督，“专倚征剿”，采取逐碉而战、逢碉必攻的战略，分兵七路、十路进攻，“其扼隘处，必有战碉，斲以石而穹于墙垣间，以枪石外击，旁则无路进兵，须从枪石中过”^{〔128〕}，可见伤亡很大。清军“营中向有子母劈山等炮，仅可御敌，不足攻碉”。当时四川巡抚纪

山在军前“制有九节劈山大炮二十余位，每位重三百余斤，马骡不能驮载，雇觅长夫抬运，以之攻碉，若击中碉墙腰腹，仍屹立不动，惟击中碉顶，则可去石数块，或竟有击穿者，贼虽颇怀震惧，然即罄补如故”^[129]。“结果“诸将反多失事，张兴为降番所诱被戕，噶固士兵与贼交，游击孟臣死焉”^[130]。各路受阻，“无一路得进”^[131]。此时，张广泗颇有感叹地说：“贼碉险峻，枪炮难施，攻一碉不啻攻一城”^[132]，于是由攻转为守，“何敢复轻言进兵”^[133]，便“疏请原调汉、土官兵三万外，增兵一万”^[134]，“乃克有济”^[135]。

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乾隆帝见张广泗督兵未能奏效，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讷亲到川后，求胜心切，认为张广泗分兵进击是错误的，“遂谕军中以三日取噶喇依，违者以军法从事”^[136]。诸将无奈，被迫率军进攻，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战死，伤亡士兵数千人。讷亲不敢言战，转而与张广泗合谋，传令筑碉，采取“以碉逼碉”的战术。七月，讷亲奏言：“臣与督臣（张广泗）又思贼番因险据碉，故能以少御众，今我兵既逼贼碉，自当亦令筑碉，与之共险，兼示以筑室反耕，不灭不休之意。贼番自必摇动，且守碉无须多人，更可余出汉、土官兵，分布攻击，似亦因险用险之策。已飭各官星速修砌，递照逼攻。”^[137]随之讷亲、张广泗又合疏要求增兵，疏曰：“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冬春间当减兵驻守，明岁加调精锐三万，于四月进剿，足以成功，至迟亦不逾秋令。”讷亲又说：“来岁增兵，计需费数百万，若俟二三年后有机可乘，亦未可定。”^[138]

乾隆帝对张广泗、讷亲统兵征金川失去信心，传旨召其回京问罪，命协办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傅恒赴川到军前后，调查清军情况，针对张广泗、讷亲的夺碉战术，提出严厉批评，他奏言：“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上击下。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

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客主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即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每得一碉，即拨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即使毁除，而贼又于其地立卡藏身，以伤我卒，是守碉毁碉均为无益……如此旷日持久，劳师糜饷之策。”^[139]

第二次金川之役时，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定边将军温福，奉命率军二万余人进攻大金川，因进军受阻，驻营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达，以防守小金川之地。可是“温福刚愎，不广咨方略，惟袭讷亲、张广泗以碉卡逼碉卡之故事，修筑千计，所将兵二万余大半散于各卡，每逾数日当奏事，即派兵扑碉，不计地势之难易，得不偿失，士心解体。”^[140]。大金川兵乘机偷袭木果木，温福兵败被杀，另有副都统巴朗、阿尔素纳，御前头等侍卫德尔森保，前锋参领观音保，提督马全、牛天昇，总兵张大经，副将多隆武等，上至都统、提督，下至千把总、外委大小文武官员 366 人阵亡，牺牲士兵 4044 名^[141]，致使小金川得而复失。

金川之役，除了清军前线将领犯了以卡逼卡、以碉逼碉的夺碉战术的错误，造成重大损失外，乾隆帝在决策、指挥上也有严重失误。

第一，半途罢兵。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第一次金川之役进行已两年，胜负未定，乾隆帝突然传谕罢兵，企图草率结束这场战争。所谓“上以金川非大敌，劳师两载，诛大臣，失良将，内不悛。及是闻其地险难下，益不欲竟其事”^[142]，并以皇太后懿旨三次下谕罢兵，认为“圣母此旨，确切理势，并非偏于姑息，朕本心亦实以为当然”^[143]。于是不断传旨“机政殷繁，部务綦重，倚毗方切，是以召令还朝”^[144]，命傅恒迅速返京。

战争不是儿戏，而是为了达到严肃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因此，打一场战争必须达到目的，否则干脆就不打，这里不可能有中

间道路。金川之役的目的,就是要平定地方叛乱,维护国家统一,乾隆帝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却半途罢兵,造成官兵战斗力减弱,这就把成功的机会让给敌人,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古人云:“一日纵敌,数世为患,岂可舍将灭之寇,更烦再举。”^[145]所以傅恒不同意罢兵,疏曰:“金川事一误,今复轻率藏事,贼焰愈张。众土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审度形势,贼碉非尽当道,其巢皆老弱,我兵且战且前,自昔岭中峰直抵噶拉依,破竹建瓴,功在垂成,弃之可惜。且臣受诏出师,若不扫穴擒渠,何颜返命?”^[146]可是乾隆帝不听,决计罢兵,并且说:“蕞尔土司,即扫穴犁庭不足示武;且果献俘,则必悬首藁街,非所以受降之信。”^[147]

第二,拒敌归降。自古以来治军者,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取得战争的胜利,多用剿抚二策,除了武力以外,通过政治手段瓦解敌人,使敌人归降,从而达到战争的目的。金川之役中,乾隆十二年(1747)九、十月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派人赴清营表示愿率部众投降,却遭到乾隆帝和前线将领的拒绝,据四川巡抚纪山奏称:“莎罗奔差头人赴军营及抚、提衙门投禀乞降,但未亲赴军营,真伪难测,不便准其投诚。”川陕总督张广泗亦奏称:“该酋与伊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断难允行。”乾隆帝认为“逆蛮反复狡狴,即使面缚归诚,尚难保其日后不复肆横,况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一劳永逸,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著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148]。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军在木果木大败后,乾隆帝对金川之敌切齿痛恨,于是传谕日后拒敌投降,他说:“木果木军营失事,关系大体,而诸将士之投于王事者,多至数千,岂可不为报仇泄忿,如何尚能提及降抚了局之说?……至将来进剿金川,受降一说,断无理,将军等不但不可存之于心,并不当宣之于口。”^[149]因此,三十九年八月,大金川土司索诺木,遣人将僧格桑尸匣刨出,差头人

绰窝斯甲携尸匣,并带领僧格桑妾侧累及大头人蒙固阿什咱阿拉至清营乞降。四十年正月,索诺木派头人斯丹增往清营,送回汉土官兵 26 人以表乞降诚意。七月,索诺木兄弟五人具禀乞降,愿交出勒乌围富寨。索诺木三次乞降,均被拒绝^[150]。

古人云:“夫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军之善政也。”^[151]可是乾隆帝没有从战争全局考虑,而自恃强大,意气用事,金川敌人乞降,本来是结束战争、取得胜利的好机会,却弃之不要,欲以武力消灭敌人。这种一味以武取胜的指挥战术,使金川人失去了求生之路,转而以死相抗,于是战斗空前激烈残酷,清军伤亡更加惨重。

金川之役,由于乾隆帝和前线将领对金川地区的特殊性认识不足,而在决策、指挥、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致使此役历时既久,耗资又巨。为了说明问题,仅就拒敌投降所造成的损失进行简要测算。第一次金川之役从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十一日到十四年(1749)一月二十七日,经历 695 日,用银 7 648 000 余两,平均每日耗银 11 004 余两。因十二年九月三十日清廷拒敌乞降,使战争延长 498 天,耗银 5 479 992 余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二十四日到四十一年(1776)二月四日,经历 1 694 日,用银 61 600 000 余两,平均每日耗银 36 363 余两,因三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清廷拒敌乞降,使战争延长 550 天,耗银 19 999 650 余两,前后两次共计延长时间 1 048 天,耗银 25 479 642 余两。当然评价金川之役的得失,不是依据耗银的多少,而是要看战争的目的是否达到,即平定叛乱、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社会安定,正如马克思所言:“谁要想战胜敌人,他就不会去同敌人讨论战争的代价。”^[152]

三、战后的变化

金川之役的胜利,达到了战争的目的,完全符合国家战略的需要。战后,清政府在金川地区推行一系列变革措施,使其社会发生

了很大变化。

政治方面：

1. 政区建置。清政府为了将原来对金川土司辖区的间接统治改变为与内地州县相同的行政区划进行直接管理，乾隆四十一年（1776）于大金川地设阿尔吉州，小金川地设美诺厅，下属有美诺屯、大板昭屯、底木达屯、章谷屯。四十四年（1779）十月，裁阿尔吉州，并入美诺厅，以其原领之阿尔古屯改名为绥靖屯，噶拉依屯改名为崇化屯，一并归属。改美诺厅属的底木达屯为抚边屯，裁大板昭屯，并入抚边屯。四十八年（1783），改美诺厅名为懋功屯务厅，原美诺屯易名为懋功屯。该厅领有懋功屯、抚边屯、章谷屯、崇化屯、绥靖屯。五十年（1785），从打箭炉厅分出鄂克什安抚司归懋功厅。五十一年（1786），将原来阜和协的绰斯甲布安抚司改属懋功厅。至此懋功厅“领屯务五、土司二”^[153]。可见，大小金川原有的区划格局已被打破了。

2. 新设营汛。清政府为了金川社会安定，以防叛乱再起，决定派兵驻防，“资其控驭弹压”^[154]。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清廷命明亮为成都将军，移驻雅州节制，而提督桂林令其移驻美诺^[155]。后来考虑“原议将军驻扎雅州，但将军、总督两地相悬，遇紧要番情，不获立时商榷，并勘明雅州城地势逼仄，满兵难于挈眷，宜令将军仍驻成都”，而命提督桂林移驻雅州^[156]。乾隆帝对成都将军的职权十分重视，指出“于其地安营设汛，移提镇大员统兵驻守，并添设将军驻边弹压，固足以震慑诸番，但所设之将军，若不委以事权，于地方文武不令其统属考核……尚属有名无实……自应令成都将军兼辖文武，除内地州县、营汛不涉番情者，将军无庸干预外，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员并听将军统辖”^[157]。这就明确规定明亮为金川地区（即懋功屯务厅）最高行政长官，而且“每年至两金川新设营分巡两次”^[158]，查看地方。清军营汛具体分布如下：大金川共驻兵 3000，于勒乌围设总兵 1、游击 1、都司 2、守备 2，驻兵

1000。噶喇依设副将1、都司2，驻兵700。噶尔丹寺设游击1、守备1，驻兵300。茹寨设参将1、守备1，驻兵400。马尔邦设游击1、守备1，驻兵300。曾达设守备1，驻兵300。小金川共驻兵3000。于美诺设总兵1、游击1、都司2、守备3，驻兵1000。底木达设都司1，驻兵500。大板昭设守备1，驻兵300。僧格宗设参将1，驻兵500。翁吉尔垒设守备1，驻兵300。约咱设都司1，驻兵300^[159]。四十五年(1780)，于绥靖营设游击驻防，崇化营设游击驻防，庆宁营设守备驻防，抚边营设守备驻防。另外塘汛有资理寨、泽尔脚寨、崇德汛、独松汛、八角碉六屯、额尔撒尔^[160]。由于金川社会日益安定，清政府不断减少驻军，开始改变某些军政建制，到了五十四年(1789)，这里“一切章程政教，先后厘定，与州县相同”^[161]。

3. 人口变动。清廷为了铲除金川地区盘根错节的土司势力，将金川人口大批外迁，而把外地人口不断内移，逐渐改变单一的民族成分。首先是严惩大小金川叛乱的罪犯，据刑部奏：“逆酋索诺木及其兄弟，大小头人等，暨各犯家属二百五十余人械送至京。”^[162]经审判，“首犯”索诺木、“助恶”莎罗奔冈达克、索诺木彭楚克、阿青等“罪大恶极”的12人，均凌迟处死。索诺木之母阿仓、头人尼玛噶喇克巴、阿布颇鲁等19人，均处斩。并将已死的小金川主犯僧格桑之首悬于市^[163]。此外，罪犯及家属等永远监禁者16人。其余发往伊犁给尼鲁特为奴者52名，索伦兵丁为奴者45名，三姓为奴者34名，赏给功臣之家为奴者58名。所谓“通计渠魁首恶以及逆党余孽，或置之重典，或贷其余生，悉准情罪之重轻，以彰威德”^[164]。其次是将金川百姓男妇189人，解到北京编为1佐领，入内务府正白旗，设佐领1员，骁骑校1员，领催4名，马军70名，“于香山附近，令其建碉居住”^[165]，学习攻碉之术。第三是把战争中金川投降的20 000多人，分别赏赐、安插在绰斯甲布、革布什咱、梭磨、卓克基、从噶克、党坝、明正、木坪、布拉克底、巴旺、鄂克什、瓦寺12土司，及杂谷屯练等地方为民^[166]。第四是清政府通

过军屯、民屯、招商等方式,从金川邻近的土司,以及内地州县,迁入大批人口,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战后金川地区“安插及分户加垦番屯兵民共七千二百八十二户”^[167],金川由原先“番民”独居,则改变为“汉番杂处”^[168]。

经济方面:

清政府为了医治金川地区的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大力推行屯田,屯垦之初,据《四川通志》记载,“案新疆五屯,安插屯田户口”有以下几种^[169]:

1. 屯练,“系杂谷五寨屯练随征至金川,原派差防拨留给地耕种”^[170]。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开始移驻金川屯垦到四十三年(1778),共移驻“一百五十户,计男妇大小三百六十五名”,分别安插在小金川大板昭 50 户、丹札寨 50 户、大金川卡卡角 20 户、卡尔金 10 户、沈角沟 20 户,每户给地 30 亩,还有口粮、籽种、牛具^[171]。

2. 屯“番”,“系平定两金川后向化番人,分拨给地耕种”^[172]。这些归降的金川民众,“悉视屯兵例,概以牛具籽粮”^[173]。每户给地 30 亩,免五年纳粮,乾隆三十八年(1773),有 292 户降民“受地安排”。四十二年(1777),安插降民 1413 户,授地屯垦^[174]。

3. 屯兵,“系额设五营,选募兵丁三千名,除分拨差防外,余俱给地耕种。揆着赴屯者为眷兵,单身赴屯者为单兵,由屯番选补者为屯兵”^[175]。可见屯兵包括三种人:一是眷兵,“为使兵丁安心尽力,增加常屯人丁,允许兵丁携眷居屯,并允许建昌、松潘、维州之兵丁携眷来居,来时官为资送。每名携眷兵丁,授地三十亩,以二十亩所获粮交官,十亩所获为已有”^[176]。二是单兵,即驻兵屯种者,规定驻军“三人给地亩一分,令两人当差,一人耕种”^[177]。每兵给地 20 亩,每二名合种地 30 亩^[178],官办牛具籽种以资耕作,岁需盐菜银两由国库支付^[179]。三是屯兵,这种由屯番中选补者,仅作为驻兵,并非直接屯垦人。

4. 屯民,“系内地人民愿赴屯开垦者,给地耕种”^[180]。凡应募

来者,每1户给地30亩,并为子孙恒产。从外地来时,由本籍咨送,大口每名给盘费银1钱,小口银3分,口粮各1升,由沿途牧令支发。到此准给屋庐,无屋折银2两。还资以农具、耕牛,两户合10两,每户给籽种2石。免5年纳粮,自6年起,每户仅纳1斗2升^[181]。

清政府对金川屯田十分重视,为了不误农时,乾隆四十一年(1776)秋,“番地籽种先经采买四十余石,不敷散给。饬茂州、保县于存仓内拨五百石,解运噶喇依、底木达等处。于内地采办麦一千石,解赴美诺、勒乌围等处。至牛只先经采买五百余头,随饬于松潘所属番地采买一千六百头,内地附近各属采买四百头,陆续解往”^[182]。并给每户农具1副共5种,有铧头、木方锄、小锄、尖齿镰、锯齿镰,一方面雇铁匠赴屯打造,一方面由内地制解金川,仅锯齿镰就运去18000把^[183]。另外,还引进试种新的农作物品种如胡豆^[184]、水稻^[185]、蔬菜等^[186]。金川地区实行屯田后,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屯播种稞麦豆养,俱滋长茂盛”^[187]。而且人口日增,乾嘉之交时统计:屯练170户、屯“番”1997户、单兵、眷兵、屯民共5115户,总共屯“番”兵民7282户、纳粮1295石^[188]。

战后金川地区改变了过去闭塞状况,内外交通逐渐畅通,以往只有两路入金川,后已有五路可通,一由灌县至懋功为东路,一由打箭炉至章谷为南路,一由杂谷至抚边为西路,一由绰斯甲至绥靖为北路,一由木坪至鄂克什为中路^[189]。并在境内造桥修船,改善交通,据统计,共修补八处渡船、七处索桥、九处木桥^[190]。随之商业也日渐繁荣,商贾云集,他们从内地运入大批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换取当地药材、皮毛等土特产品。

文化方面:

金川战役后,清政府认为金川苯教喇嘛助纣为虐,于是废除苯教,振兴黄教,并将都甲喇嘛雍中泽旺、堪布喇嘛色纳木甲木黎二人押解京师,以“助逆咒诅”,“罪大恶极”凌迟处死^[191]。乾隆四十

一年(1776)九月,乾隆帝传谕曰:“两金川喇嘛均系邪教,不便仍留其地,但番人习奉佛教,该处独无喇嘛,似非从俗从宜之道,应于噶喇依、美诺两处酌建庙宇,即于京城喇嘛内派往住持。”^[192]从此大力倡导黄教,并传旨:是年由政府拨款,将噶喇依已“芜废”的雍中喇嘛寺,进行重建,改名广法寺,赐御书“正教恒宣”匾额。五十年(1785),又将美诺(懋功屯)的美笃喇嘛寺,“捐俸重修”,金碧辉煌,敕名胜因寺^[193]。在此期间,清廷派遣西藏黄教喇嘛桑宰敖特尔,并加恩赏赐班第达堪布名号,带领徒众前往金川广法寺。他到达以后,积极传经说法,广收门徒^[194],不久黄教信徒日众,终于取代了苯教。

金川民众能歌善舞,长于奏乐。战争中清军将领阿桂将俘获的一批艺童,送回京师,供奉宫廷,每逢节日庆典,表演歌舞节目,“有习锅庄及甲斯鲁者,番中雉戏也,亦命陈之宴次”^[195]。据《清史稿》记载:“高宗平定金川,获其乐……金川之乐:曰阿尔萨兰,曰大郭庄,曰四角鲁。用得梨一,柏且尔一,得勒窝一。”^[196]另外住在香山的金川人,每到自己的节日,以歌舞庆贺,在京师广为流传。战后,内地大批汉人进入金川地区,本地人开始学习汉语^[197]。而且“新疆番众久经剃发,并半已穿戴内地民人衣帽”^[198]。可见金川和内地文化得以交流。

从以上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看到战后金川的变化:由动乱到安定,由土司到屯政,由落后到进步,由闭塞到开通等。列宁说:“战争所以往往是有利的,是因为它能揭破脓包和排除俗例。”^[199]金川之役正是如此,旧的死亡,新的成长,金川社会向前发展了。

第三节 清廷反击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

乾隆末年,清廷两次派兵进藏反击廓尔喀(即今尼泊尔)入侵,虽然战争的规模不大,投入的兵力亦不多,但是它对我国反抗外国

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加强对西藏更有效的管理,皆具有重要意义。

18世纪中叶,尼泊尔境内正值各部蜂起,称王争长的分裂割据时期,“大小部落总共三十处,户口二十二万七百有零”^[200],其中分布在加德满都谷地巴勒布人的阳布(即雅木布)、库科木(即库库穆)、易隆(即叶楞)三部势力较强,同清王朝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时位于阳布(即加德满都)西北,相距六日路程拉加普人的廓尔喀部兴起,大约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其首领博纳喇赤的领导下,“渐次将巴勒布三部侵夺,周围二十余处部落全行占据”^[201],建立廓尔喀王国,遂迁都阳布。不久博纳喇赤死去,由其子西噶布达尔巴克即位,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传位给年仅四岁的王子拉特纳巴都尔,因为新王年幼,由其叔巴都尔萨野辅政,总管全国一切军政要务,下属办事大头人苏尔巴达布为他的行政助手,此人“狡诈好事”^[202]。当时廓尔喀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各部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如巴勒布人对廓尔喀“心怀怨恨”,宗朗部落亦与其“时常争闹”^[203]。廓尔喀为了摆脱困难,积极对外推行扩张政策,先后占领了哲孟雄、沮木等国,而对我国西藏垂涎欲滴,寻觅时机,妄图侵占。

廓尔喀在西藏西南,两地相互毗连交错,人民长期友好往来。廓尔喀除了“住耕游牧之外,半以佣业谋生,并有贩运粮食货物来藏贸易者,历年买卖交易,以通有无,向来和好无嫌”^[204]。西藏官民亦知道“该处素无盐茶,并无银两、马匹,所产惟米、豆、牛、羊、布、帛、铜、铁、珊瑚、玛瑙、孔雀。……然西藏素产盐斛,及内地贩运银茶,实为科尔喀必需之物,故向来藏属夷民往来驼运,彼此通商,相安已久”^[205]。可见廓藏双方商业贸易非常密切,据史载廓尔喀在西藏经商者多达一千余人,甚至在战时还有四百余名^[206],这说明了廓尔喀的经济生活对西藏商业贸易的依赖性。

乾隆四十五年(1780),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应乾隆皇帝之请,奔

赴热河行宫为其诵经,祝贺七旬大寿,贺毕不幸于十一月二日因出痘在北京西黄寺圆寂。乾隆皇帝极为悼惜,为他百日诵经,第二年二月,命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护送灵柩回藏。仲巴呼图克图是个好利之人,他乘机将六世班禅死后,“凡朝廷所赐赉,在京各王公及内外各蒙边地诸番所供养,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鍍金之袈裟、珍庆,不可胜计”^[207]的财物,“既不布施各寺庙与唐古特之兵,又殡其弟舍(沙)玛尔巴为红教,不使分惠”^[208],而“悉踞为己有”^[209]。因此,“生性狡黠……自幼俱与不相睦的”^[210]同母异父的弟弟沙玛尔巴,非常不满,怀恨在心。乾隆四十九年(1784),沙玛尔巴逃往廓尔喀,他背叛了国家和民族,“与大头人巴都尔萨野交好,将藏中虚实告知,从中怂恿,外夷唯利是图,顿萌窥伺之意”^[211]。到了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廓尔喀致书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噶布伦,书称:“藏内所用钱文,皆我巴勒布(即廓尔喀)熔铸,此后但用新铸钱文,旧钱不可使用。再我境接壤之聂拉木、济咙二处,原系我巴勒布地方,仍应给还。”^[212]

清朝驻藏大臣庆林、稚满泰等,见书后立即复书,严厉斥责廓尔喀对西藏领土的索求,明确指出聂拉木、济咙“二处俱系达赖喇嘛地方”。同时宣布不许干涉西藏银钱流通,认为“现在尔等新铸钱文甚少,不能流通,仍将新旧搀杂使”^[213]。

与此同时,廓尔喀“寄字达赖喇嘛,商定兑换银钱价值”,“因科(廓)尔喀新铸银钱,较巴勒布旧钱银色略高,欲以一文当作两文行用,藉此为辞,与唐古特(即西藏)寻衅”^[214]。达赖喇嘛尚未答复,廓尔喀又“藉商税增额,食盐揉土为词,兴兵扰边”^[215]。

六月初,廓尔喀未经宣战,命大头人苏尔巴达布率领三千人马,侵入西藏境内。二十一日,廓尔喀军攻占济咙。二十四日,又占领聂拉木。然后廓尔喀军北上,进攻宗喀、噶鲁尔等地,后藏重镇札什伦布的安全亦受到威胁。因此西藏地方僧俗官员,纷纷向清驻藏大臣庆林,钦差稚满泰告急,实恐力不能支,请求火速发兵

援救。

庆林等人得报后,当时西藏境内共有驻军三千四百余名,立即抽调一千二百余名,前往各路堵击。同时又向四川总督李世杰通报西藏紧急军情,要求迅速增兵。李世杰命提督成德、总兵穆克登阿等人,率领清军三千名,进藏驰援。

七月二十七日,乾隆得到庆林的奏报,知道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消息,立刻传谕庆林等人,“派兵堵御”,“严加防范”。同时命至热河行宫觐见的成都将军鄂辉、总兵张芝元“即日起程回任,俱著驰驿兼程行走”^[216],准备率军进藏。

八月四日,乾隆为了反击廓尔喀入侵,下了两道重要上谕:

其一,敕谕西藏民众,积极支援清军打击侵略者。谕曰:“今因巴勒布等侵犯藏界,抢掠聂拉木、济咙二处。尔黄黑番众,理宜竭力支持,剿退贼匪。……今特调内地官兵,赴藏讨贼,无非保护尔等,奠安卫藏之意。……兹特晓谕尔等,若有收藏米面糶粃,及可作粮之牛羊等物,概行发出售卖,用济兵饷,不惟尔等可沾厚利,大兵不虞乏食,成功迅速,岂不甚善。”^[217]

其二,檄谕廓尔喀,指出聂拉木、济咙皆是我国西藏领土,决不容侵犯,要求立即撤兵,归还所侵占的土地。谕曰:“尔属下首领苏尔巴尔达布,整军前抵我境,将聂拉木、济咙两处抢掠。此两处虽边蕃尔之区,原系藏中旧属,非尔之地。……犹欲向宗喀前来,殊出情理之外。……尔接阅此书,须往复熟筹,速行退兵,将聂拉木、济咙等处,全行献出,否则大兵一发,尔等靡有孑遗,追悔莫及,尚其详审利害,毋自贻伊戚也。”^[218]

就在檄谕发出不久,八月十四日,廓尔喀攻打肋噶尔,未能到手,大肆掠夺而去。十七日,廓尔喀兵攻占宗喀,疯狂屠杀寨内百姓。因此,乾隆加紧调兵遣将,聚集成都,并且从四川、陕西、山西、湖北等地拨银约一百多万两,以资军费。但是,乾隆认为成都“距藏较远,于筹办一切,究恐鞭长莫及”,于是命令四川总督李世杰移

驻打箭炉，负责筹办军需，“该处距藏稍近，消息易通，可就近调度”^[219]。而且指出“西藏距打箭炉不下五千余里，粮草等项运送维艰”，如果“概由内地筹运……缓不济急”^[220]，所以“今于西藏地方，就近购办粮石，以供大兵口食，乃是上策”。

八月二十四日，鄂辉回到成都，奉命率军由打箭炉进藏，与先已抵藏的成德，查办廓尔喀侵藏事务。如何处理此事，乾隆有明确指示：“必须将前被贼抢占之济咙、聂拉木、宗喀等处地方，全行收复。并勒令该处头人，将该处与后藏贸易、明定地界、严立章程。令其出具甘结，不敢复行越界滋事，惟当趁此兵威，使之畏惧慑服，以期一劳永逸，方为妥善。”^[221]当鄂辉入藏后，乾隆深感驻藏大臣庆林办事不力，于九月九日，以理藩院侍郎巴忠通晓藏语，谙熟藏情为由，授予御前侍卫钦差大臣赴藏会办。十二月四日，乾隆以庆林“粮运迟延”为罪名，免去驻藏大臣之职，其驻藏大臣印信，由巴忠接管。并将庆林“著以兰翎侍卫，在章京上效力行走，交与鄂辉、巴忠等差遣委用”^[222]。

巴忠身为朝廷钦差，代行驻藏大臣之职，自恃位高权重，“率意专擅，欲图草率完事”^[223]。他入藏以后，在拉萨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把他视为朝廷重臣，就廓尔喀侵略西藏一事，向巴忠表明两点态度：一是“应行进剿”；二是反对“讲和”^[224]。可是，巴忠却不以为然，却说达赖喇嘛“与人谈论俱不能明晰，似系一木讷无能之人于卫藏事，并非明敏聪慧之辈”^[225]。他急于藏事，回京受奖，因此在和与战两者之间，却主张讲和。

早在廓尔喀入侵之初，西藏有些僧俗官员，视敌如虎，未经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应允，就私下与廓尔喀讲和。当廓尔喀军攻打肋噶尔遭败退却后，仲巴呼图克图和萨迦呼图克图利用这个机会，遣人与廓尔喀议和；另外，戴绷巴载寄字到藏，“意在讲和，希图目前完事”^[226]。巴忠对议和积极支持，而且“自遣番人与廓尔喀讲和”^[227]，此时公班第达之子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班禅额尔德尼

之父巴勒丹敦珠布、玉陀噶布伦札什敦珠布、济仲喇嘛罗布藏卓尼尔、喇嘛敦珠布彭楚克、萨迦庙岁奉喇嘛索伊锡等人前往济咙与廓尔喀议和，“廓尔喀以聂拉木、宗噶(喀)、济咙三处地方，系他自己抢得，不肯退回”^[228]。如果每年支給“三百个元宝，方肯退地”。他们“并未向达赖喇嘛及巴忠、成德、鄂辉等预行稟明，私与科尔喀头人巴穆萨野达萨尔等，商议许银赎地，沙玛尔巴从中主持，代写合同，两边定义之人一一列名钤用图记，合同内开每年许给元宝三百个，合银一万五千两，永远按年付给，有反悔神佛必降殃咎等语”。当时丹津班珠尔等人提出“以年年给与元宝三百，力量不能，向沙玛尔巴讲论，沙玛尔巴另写合同一纸，自(乾隆)五十四年为始，给付三年后再行商议”^[229]。随后，他们向札什从布、萨迦呼图克图庙内及后藏贸易铺户，凑借元宝三百个，将当年赎银如数交清，议和谈判宣告结束。

此协议传出以后，虽然未经“预行稟明”，但是木已成舟。达赖喇嘛得知此事，坚决反对，“阻止许银赎地”^[230]。巴忠却“以该噶布伦等，业已和息，贼匪又复乞降，遂任其私议完结”^[231]。而鄂辉、成德皆“因巴忠系钦差大臣，谙悉番情，既已主操其事，亦即随同附和，将就了事”^[232]。就这样巴忠“许银赎地”，买回了被占的领土。

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天，由于巴忠等人“许银赎地”，所以廓尔喀军都撤退了，因此鄂辉、成德等率领清军，几乎没有进行战斗，顺利地收复了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巴忠等人隐瞒实情，蒙骗朝廷，却公然奏称：廓尔喀“震慑天威，现已畏惧输城，设暂定界，自此藏地安宁，边疆永靖”，于是“酌定善后事宜，分析条款”^[233]，总共开列十九条，其中包括驻兵、筑堡、训练、粮台、巡防、贸易、税收、争讼、奖赏、差役、盐务、军饷、抚驭、升擢等等。乾隆阅后，批示“依议速行”^[234]。到了六月，廓尔喀派遣使臣哈哩萨野、巴拉巴都尔哈瓦斯等，携带表文和贡品，赴京师进表纳贡。他们到京以后，有

关“许银赎地”一事，只字不提，乾隆误认为廓尔喀慑于清军威力，臣服退兵，故册封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王爵，其叔巴都尔萨野公爵。十一月，巴忠不等将善后事宜办完，就返回北京，因此遭到乾隆的斥责，未能升官晋爵。

此役由于乾隆用人不当，巴忠等人背着朝廷，私下议和，以银赎地，求得退兵，结果“未交一兵，而靡饷百万”^[235]，同时也给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留下了祸根。

自从巴忠等人“许银赎地”后，就遭到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爱国僧俗官民的反对，他们设法废除这项屈辱的协议。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天，廓尔喀派人来藏领取“赎地”银两，达赖喇嘛拒绝支付，随后遣使赴阳布，要求“撤回合同”，可是廓尔喀不同意，希望双方到边界一地进行谈判。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月，达赖喇嘛向驻藏大臣保泰请求，“假托”^[236]巡边练兵修庙，实则与廓尔喀商讨取消“合同”。此议获准后，达赖喇嘛派遣丹津班珠尔、噶勒桑丹结等人去聂拉木。六月二十四日，他们到达聂拉木，给信“约廓尔喀人来至边界面议地租一事”^[237]。二十八日，收到沙玛巴尔复信，“令其前往议事，在卓克沙木，即札木地方见面”^[238]。噶勒桑丹结等人，见谈判地点有变，心有疑虑，“因欲与噶布伦等商议，回至中途，即被玛木萨野派人劫回”^[239]，关押在札木。

七月六日，廓尔喀派头人达萨勒克德哩，带领七十余人至聂拉木。次日早晨，又有廓尔喀兵千余名，向聂拉木进发，该地的喇嘛噶布伦“见来人甚众，一时不能禁止，将彼处桥梁拆毁，廓尔喀疑断其归路，混放鸟枪，致相争斗，廓尔喀即占据聂拉木”^[240]。丹津班珠尔及教习兵丁王刚、冯大成等十余人被俘，拘禁在札木，然后又送往阳布。

八月初，廓尔喀侵略军向后藏大举进攻。二日，廓尔喀兵“四面攻围”宗喀，教习陈谟、潘占魁率领守军“协力堵御，打死贼匪甚多”^[241]。四日，廓尔喀兵千余人，围攻定日，守军弃寨逃走，占其

寨。十二日，廓尔喀复攻宗喀，“贼匪又用木梯上墙，跳进寨内者十八人，均被汉兵丁等杀死。墙外之贼，被番兵打死者亦多”^[242]。廓军战败，退往三十里外的俄玛驻营。十六日，廓尔喀兵三千余名，攻打萨迦，并分三路围困前来援救的藏军，藏军“对敌不住，往后退走”^[243]，廓军乘势攻占萨迦。同日，廓尔喀兵又占领了通往西藏要隘和重镇的济咙。

廓尔喀占领聂拉木、定日、萨迦、济咙等地以后，沙玛尔巴为了报私怨，就竭力拨弄唆使廓尔喀纵兵去抢掠札什伦布，于是廓尔喀兵由聂拉木、萨迦一路，向札什伦布推进。八月十六日，驻藏大臣保泰命都司严廷良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去前藏避乱，仲巴呼图克图留守札什伦布寺，并由都司徐南鹏率领绿营兵百余人驻守官寨。十八日，廓尔喀兵将进至札什伦布时，僧俗官民，人心浮动，纷纷出逃。十九日，仲巴呼图克图为了个人安危，把寺中细软物件搬至东噶尔地方居住。二十日，廓尔喀兵几乎未遇抵抗，就占领札什伦布寺，然后向徐南鹏驻守的官寨发动进攻，连攻数日不下，“贼见营官寨坚固难攻，众悉退回”^[244]。直到九月七日，廓尔喀兵将寺中财物洗劫一空，从札什伦布退走。十二日，又攻占定结、第哩浪吉等地，逗留观望，未见退回。

八月二十二日，乾隆收阅保泰的奏报，得知廓尔喀以旧未完债项为由，再次入侵西藏，攻城占地，掠人为质。乾隆将奏报交巴忠阅看，巴忠自知“许银赎地”一事已经败露，罪责难逃，便投河自杀了。而鄂辉、成德参与此事，“因尽以罪委之，谓巴忠解唐古特语，故私议皆其一人所为，己二人不知也”^[245]，所以朝廷没有追究。

乾隆为了粉碎廓尔喀入侵，收复被侵占的领土，决心再次调兵进藏，大张挞伐，以绝后患。他说：“朕临御五十六年，平定准部、回部、大小金川，拓地开疆，远徼悉入版图。况卫藏为我皇祖皇考戡定之地，久隶职方，僧俗人等胥露浓化，百有余年。况该处为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驻锡之地，蒙古番众素所崇奉，若任小丑

侵凌，置之不问，则朕数十年奏武功，岂转于此等微外么庸，不加挾伐，是此次用兵，实朕不得已之苦心，此天下臣民所共见者，并非好大喜功，空兵黷武也。”^[246]

于是九月初，乾隆命四川总督鄂辉率军由打箭炉进藏，与先已抵藏的成都将军成德所率人马会合，痛歼廓尔喀兵。随后，又命吏部尚书孙士毅“往摄其事”，“驻打箭炉筹办军糈”^[247]。可是，鄂辉、成德阳奉阴违，“按程缓进”，因此乾隆认为“二人不足恃”^[248]，使命嘉勇公福康安、超勇公海兰察率领索伦、满兵及屯练土兵，由西宁进藏，较四川打箭炉近三十日的路程。随之，又命陕甘总督勒保移驻西宁，筹办马匹粮草。可见，清军已分南北两路向西藏进军，以图早日驱敌安边。

福康安，满洲镶黄旗人，父亲傅恒，官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姑母是乾隆的孝贤皇后，既是朝廷重臣之后，又是皇帝的近亲。尤其是他参加了征金川、定台湾之役，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勇猛的作战精神，是位誉满全军的青年将领，所以他是进藏驱廓的适合人选。乾隆说：“朕再四维，竟须福康安前往督办，方足以资统率。福康安素娴军旅，识见较鄂辉为优。”^[249]

九月二十九日，福康安离开京师，前往西宁。不久，海兰察率领索伦兵丁，亦随之前往。十月，鄂辉奏称：“贼匪业已败回，不过在济咙、聂拉木一带观望拒守，俟与成德抵藏，设法攻取。”乾隆阅后，指责鄂辉说：“贼匪现在济咙、聂拉木一带，正可带兵星驰赴藏，痛歼贼众。……乃计不出此，坐失机会。且鄂辉等身在中途，贼匪于抢掠后，早经饱载回归，安得大言不惭，为此贼匪败回之语？”^[250]然后就将鄂辉革去总督之职，赏给副都统衔，驻藏办事，听候福康安调度差遣。

十一月初，清廷授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中旬，乾隆收到靳保等人的奏报，皆称：“青海口外时值隆冬，冰雪甚大，炊爨维艰，牧饲缺乏等。”他“为之辗转不寐，因思福康安受恩深重，素性

奋勇,顾爱颜面,不肯居好逸恶劳之名,必欲由青海一路行走,事属勉强,甚有关系,莫如即改道从巩固一路,上栈前进。该处均有驿站,以青海行程计,莫不过稍逾原定之期”。因此,乾隆传谕福康安,希望他改道而行,“断不可过于拘泥勉强,反致误事也”^[251]。福康安得旨后,认为军情紧急,不容改道,仍从西宁一路进藏。

十一月二十六日,福康安到达西宁。由于勒保为进藏的官兵建立了军台,准备了马驼,以及充足的粮草和衣鞋,因此福康安在西宁只停留四天,于十二月一日起程,直到第二年(1792)一月二十日抵达拉萨,行程四千余里,前后六十天。这段路程确实艰难行,据福康安说:“每日寅初起程,行至戌刻始行住牧。……一日所行道路,较之喇嘛番子人等,行走两日程途尚属有余。惟是数站以来,所过之亢阿拉山,扎苏拉山及和约尔达巴罕等处,旧存积雪,或七八寸至二三尺不等,石径崎岖,艰于登陟,有大河数道,冰坚雪厚,宽逾数里,亦属难行。”^[252]青藏高原地带,“虽不比云贵烟瘴伤人,然人行即喘,头目眩晕,肌肤浮肿”^[253]。就连福康安这样年轻力壮的汉子,在途中亦“冒寒患病”。

正当福康安率军向西藏行进时,鄂辉和成德带领的南路清军已经进入西藏。廓尔喀得知大批清军进藏,便在聂拉木、济咙等地,增兵筑寨,“以为负隅固守之计”^[254]。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成德率军攻占拍甲岭,乘胜进攻聂拉木,廓尔喀兵“据碉寨,所恃墙垣坚厚,死守不出”^[255],攻城受阻。五十七年正月初九,鄂辉率军到达聂拉木,与成德合兵,继续攻城。十一、十二两日,督兵先挖沟道,搬运柴草,堆于入口处,正拟放火之际,突然大雪,只好停止。十六日,清军“复运干柴,各执火弹,潜至东边门洞,刨去余雪,引燃柴火,抛置火弹,火势腾起……内藏贼匪猝不及出,烧死压毙者甚多”^[256]。二十日,鄂辉等派兵再挖地道,深入城内,装满火药。二十四日,清军向地道投火,“轰塌寨房,贼匪悉就歼擒”^[257],攻占聂拉木。

廓尔喀看到聂拉木失守，通往国内的交通要道被阻，认为战局不妙，但是没有退兵之意，却展开外交攻势。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给鄂辉、成德致书，大谈此役缘由，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西藏背约所致，希望清廷罢兵，进行谈判。乾隆得悉后，指出这是缓兵之计，拒绝接受，同时批评鄂辉、成德没有乘势进剿，致使廓军得到喘息的机会。

福康安入藏后，收到乾隆谕旨，命他迅速率军进剿，收复失地。这时西藏境内有军兵一万六千余人，所备之粮有七万四千五百余石，牛四千二百头，羊二万五千余只，此外尚可添办粮二万石，计算粮数已足供一万五六千人，一年有余口粮，牛羊尚不在内^[258]，可见兵多粮足，取胜廓尔喀是有充分准备的。因此，福康安为了贯彻乾隆的旨意，檄谕廓尔喀曰：

尔部落与唐古忒人等既因钱债细事，彼此争竞，即应将实在情形，禀明天朝驻藏大臣，听候查办，或驻藏大臣不为申理，亦该禀知总督、将军等，自必为尔秉公判断。……（尔）辄敢称兵滋扰卫藏，不但占据边界，且敢侵犯札什伦布，将庙宇塔座损坏，镶嵌金什物肆行抢掠，尔岂不思卫藏之地，即天朝之地，岂容尔等作践。……今本将军奉命亲统大兵问尔廓尔喀之罪，惟有将尔部落一举荡平，申明天讨，尔等从前所议钱债细事，概不值理论，现在调集各兵，源源而来。克期进发。……断不似从前与尔说和完事，谅宜知悉。^[259]

三月，福康安抵达西藏，等待各地人马到齐，即行进剿。闰四月二十五日，福康安率军前往绒辖、聂拉木，察看地势，决定以济咙为进兵正路。二十七日，福康安自第哩浪古进兵，经趋宗喀，五月六日，福康安行至擦木，该地两山夹峙，中亘山梁，廓尔喀兵在山梁极高之处，瞭望甚远，路径逼仄，难攻易守。福康安认为“必须乘夜潜兵进攻，方可立时夺据要隘”^[260]，当天入夜后，正值阴雨绵密，他将所部分为五队，派哲森保、翁果尔海等带领两队，由东西两山

进至擦木敌寨左右山梁堵截。另派墨尔根保、阿哈保等带领两队，亦由东西两山梁，绕至敌后，截其去路。海兰察、额尔登保等带领一队，由正路直攻敌寨。福康安亲自督率台斐英阿、德楞泰等，往来截杀，指挥攻剿。次日黎明，该处山甚高峻，树木茂密，山梁扼要之处，前后有石碉两座，大河环绕，山梁之间，周围砌筑石墙，高约二丈有余，向北留门，只有一径可上。福康安督兵潜登山，夺敌前碉，敌守后碉不出，官兵毁垣入，短兵相接，杀死咱玛达杜拉尔木等三名头目，兵丁九十余名，俘虏十八名，遂攻占擦木^[261]。

福康安收复擦木后，乘胜直趋济咙。五月八日，清军占领济咙的屏障玛噶尔、辖尔甲两地，为进军济咙扫清道路。九日，清军抵达济咙。这里敌寨高宽厚，在山冈上砌筑石墙甚坚，周围叠石为垒，高及二丈，密排鹿角椿木为守御之计。又在西北临河处，砌大碉一座，直通敌寨为取水之地。敌寨东北，在石上砌碉一座，倚石为固。敌寨东南，山梁甚陡，另砌石碉一座。廓尔喀兵分据险要，负隅固守^[262]。

十日，福康安针对以上廓军守卫情况，便采取分兵攻扑，剪其旁寨，遂攻中坚的办法，他命哲森保等率军抢上东南山梁，廓兵在碉内死守，清军奋勇围攻，迫使敌兵出战。海兰察奉令领兵往来冲击，杀敌甚多，占据山梁。此时，巴彦泰等率军进至临河碉下，廓兵因系取水要隘，抵御甚坚，双方战斗很激烈。因此，梁上的清军撤下增援，并用大炮轰击，碉座塌去一角，敌兵纷纷跳下大河淹毙、登岸逃生者，俱被清军截杀。接着，桑吉斯塔尔等带兵攻占敌寨东北的石碉，全歼敌守兵。至此，清军消灭了敌人的旁寨，然后发动攻打中坚主寨，福康安命阿满泰、珠尔杭阿等率军猛攻，可是久攻不下。于是，福康安调集所有官兵合攻，一方面用大炮不断轰击，一方面架梯登寨，经过一番苦战，清军收复济咙，杀敌六百四十余名，俘虏二百余名^[263]。乾隆得知济咙捷报，极为喜悦，特赐福康安御制志喜诗书扇，及御用佩囊，以示嘉奖。

与此同时，成德、岱森保等率领的清军，于五月十六日，由哈那滚木山行至窝朗卡。二十一日，清军往攻札木。二十二日，克敌卡两处，遂攻占札木。二十六日，成德得到探报，前方有铁索桥，此桥为聂拉木通往廓尔喀境内的要隘，有重兵屯聚。于是成德等“带兵于树林内潜行，骤将大河东贼卡夺据，随在山上施放枪炮，乘夜夺桥”^[264]。二十七日黎明，清军将西岸敌卡夺获，杀廓兵二十余名，余俱败逃。

福康安等率领清军攻占济咙后，成德率领清军攻占札木和通往廓尔喀的铁索桥，于是收复了被廓尔喀侵占的全部领土，把敌人赶出了国境。本应就此罢兵，两国议和，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廓藏之间存在的问题，可是乾隆为了“一劳永逸”，要深入廓境，占领阳布，迫使归降。因此，福康安在未入廓境之前，战略上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孤立廓尔喀，利用廓尔喀与邻国的矛盾，“曾檄近廓东南之哲孟雄，宗木布鲁克，西面之巴作木朗，南面之甲噶尔、披楞等部同时进攻”^[265]；二是调查研究敌情，知道沿途高山峻岭，大河相阻，各险隘皆有重兵守卫，所以“更必须出奇制胜，方能迅速藏事”^[266]。

十三日，福康安等率军由济咙起程前进，防备廓尔喀兵绕袭后路，遣成德、岱森保及诸神保各出左右一路，以分敌势，而大军出中路，海兰察将三队为前军，自将二队继之。十四日晨，清军进克距热索桥十余里的摆吗奈撒地方驻营，探得热索桥处有大河一道，过河就进入廓尔喀境内。当清军进抵热索桥时，守桥廓军撤去桥板，阻止清军过河。十五日黎明，福康安派兵仍至河边作欲进之势，而密遣阿满泰、哲森保等率军由东面峨绿大山绕至上流，以木筏渡河，清军遂克热索桥。

清军渡河以后，迅速向前推进。十七日，进至蜜哩顶。十八日，行抵旺噶尔。十九日，福康安收到探报，得知在旺噶尔西南的协布噜地方，形势极为险要，廓军拒守甚坚。于是，他亲往察看地

形，望见前有横河，河水湍急，桥已拆毁，旺堆在河北，协布噜在河南，迤东为克堆寨，守兵甚多。二十日，福康安等率军至旺堆，廓军扼河拒守，不得渡河。二十二日，命惠龄等留原地佯攻，牵制敌人，而福康安等率军，潜从上游缚木渡河，直薄克堆寨。二十三日，分三路进攻，一路由鄂尼保等率领，绕至寨后；一路由阿满泰等率领，顺山进攻；一路由海兰察等率领，潜至对面山梁。二十四日，出敌不意，各路并进，廓军不支，清军乘胜攻取协布噜。

福康安等率军攻占协布噜后，继续向前推进，欲攻东觉，此处“为贼境险要之地，贼匪据险设备，前后高下分布颇为联络”^[267]。六月三日，福康安率军进攻东觉，自将所部由正面攻打，命海兰察等分兵侧击，经过三天激战，于六日攻占东觉，此役清军伤亡一百余名，杀敌六百余名。这时成德等所率清军，于同月三日，由果达哩山起程，进抵多洛卡，攻占陇岗，接着向利底进军，沿途未遇抵抗，廓军纷纷逃亡。九日，福康安、海兰察等率领大军，抵达雍雅，距离阳布一百余里。

廓尔喀见局势危急，便遣使赴清营议和。六月二十五日，廓尔喀将头一年在聂拉木抓走的兵丁王刚、第巴塘迈，及丹津班珠尔跟役多尔济诺尔布、第巴跟役果畿等四人送回。并致书福康安等人，书称：“廓尔喀与唐古忒素相和好，所有诱执兵丁、噶布伦，及抢掠后藏，皆由沙玛尔巴来主持唆使。……是以王刚等送出，恳求大皇帝施恩散宥，如蒙允准，再遣大头人来营吁恳听候。”^[268]十八日，廓尔喀又派遣大头人普鲁尔邦哩、朗穆几特邦哩、乃尔兴、巴拉巴都尔哈瓦斯等人，前往清营“递禀乞降”^[269]。此时，福康安阅读廓尔喀来禀以后，檄谕廓尔喀，指出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其叔巴都尔萨野如不敢视身诣阙，亦应来营叩头请罪。要求把沙玛尔巴的遗骨送出呈验，将前次与西藏地方官员喇嘛所签两份合同交出，并把在札什伦布所掠各种物件全部归还，撤除沿途驻守的廓兵等。同时，福康安亦认为廓尔喀来禀不可信，“当奋勇进攻，断不肯

坐失事机,致堕贼人缓兵狡计”^[270],没有接受议和。

七月三日,福康安等率领清军向前挺进,进攻噶勒拉山,由堆朴木山至帕朗古横河,廓兵扼桥拒守,清军夺桥过河。海兰察欲扼河立营,福康安不同意,率军直攻甲尔、古拉集木集两要寨。这里距离阳布不远,“贼以十营踞山,守御甚固”,清军“冒雨上山二十余里,至斗绝处,贼乘高木石雨下,隔河隔山之贼三路来犯,我兵且战且却,死伤甚众”^[271]。

廓尔喀自退入境内作战,取得首次胜利,为了阻止清军攻占阳布,乘胜遣使再次请求议和。八日,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呈缴前立合同,送交札什伦布物件,及沙玛尔巴尸骨”^[272],以示议和诚意。福康安亦因清军伤亡惨重,进兵受阻,退回雍雅结营,并将廓尔喀求和一事禀报朝廷,等待谕旨到来,采取下步行动。

八月十日,乾隆谕福康安等,因藏内气候骤冷,“今年下雪自必更早……锐于进取,冒险深入,转瞬冬令,设至进退两难,关系尤为重大。……如实不能进取”,只要廓尔喀“畏惧乞降,情词尚属恭顺”,就可以“准尔遣加萨野等大头人进京,具表纳贡,悔罪投诚。如此则福康安遵旨受降,撤兵藏局”^[273]。二十二日,乾隆收到福康安的奏报,得知廓尔喀“稟恳归降”,立即传谕福康安等曰:廓尔喀“今既惧悔罪,叠次递稟乞降,情词尚为恭顺,朕仰体上天好生之德,廓尔喀犹吾民人也,不忍多诛夷……即传朕旨,赦其前罪,准令纳表进贡,悔罪投诚”^[274]。九月三日,乾隆再传谕福康安曰:“领兵进剿,屡次克捷,收复后藏边界济咙等处地方,深入贼境,痛歼贼众,贼酋畏惧震极,投稟乞降,情词恳近,因恐雨雪阻途,特颁谕旨准其纳款。”^[275]由上可见,乾隆希望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十月三日,乾隆敕谕廓尔喀,表示接受廓尔喀议和请求,但在边界国土问题上态度十分明确地指出:

今因尔畏威悔罪,缴出前抢札什伦布物件,送出沙玛尔巴骨殖,屡次吁恳归诚,并遣大头人第乌达塔持巴等恭赍表文,

呈进方物,又遣头目苏必达巴依喇巴忻喀瓦斯等赴营呈送牛羊酒米果品糖食等物,备犒官兵,俱经大将军福康安转奏,并将尔情愿永遵禁约,不敢再提出从前合同及停止行使廓尔喀钱文,即济咙给鹰马,亦永远不也索取,并将札木地各仍属西藏等事,一一奏闻。……再协布鲁、东觉、博尔东拉、噶勒拉、堆补木、帕朗古等处,俱系大兵攻克,本应即以此等处为边界,今念尔悔罪投诚,仍行赏还,其聂拉木边外札木地方,尔请仍归西藏之处,札木地方本系藏内管辖,自应仍归后藏,此后尔部不得再有侵越^[276]。

福康安遵奉乾隆旨意,受降撤兵,没有侵占廓尔喀一寸土地,班师回到西藏境内。不久,廓尔喀派遣使臣噶箕等到北京朝贡,对归还札木、取消向济咙索取鹰马等提出异议,清廷给予严厉批驳,认为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不利于解决问题。因此,廓尔喀使臣噶箕等亦感到此议不妥,表示以后不再提札木地方和济咙鹰马之事,返回廓尔喀。

乾隆两次出兵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投入兵力约两万余名,耗银约三百五十万两,阵亡官兵三百余名,可见清廷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两次战争都是廓尔喀首先挑起发动的,清王朝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被迫兴兵反抗,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因此,清军官兵在西藏僧俗官民的积极支援下,克服了气候寒冷、行程遥远、粮草不足等等困难,英勇杀敌,驱逐了廓尔喀侵略军,收复了被占领的土地。乾隆取得这次反侵略战争胜利,不仅对西藏社会安定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清廓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乾隆通过两次抗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发现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地方政教之间皆存在不少问题,他说:“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惟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遂尔从中舞弊,

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又滋生事端，始行禀白，吁求大臣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致屡次滋衅，成何事体。”^{〔277〕}

因此，乾隆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协调西藏政教之间的关系，于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命福康安会同达赖、班禅等共同筹议西藏善后章程，经会商共议定一百零二项条款。第二年正月，清政府修订为二十九条，正式颁布执行，称之《钦定西藏章程》。这是清廷为西藏地方政权所规定的最高法律，其内容包括政治、军事、财政、贸易、司法、宗教与外交等方面，尤为突出的是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章程》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其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噶布伦以下所有西藏政教官员皆是驻藏大臣的属员，事无大小，均禀驻藏大臣办理。西藏地方官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如有升黜赏罚，亦由驻藏大臣办理；达赖、班禅和各地黄教呼图克图的转世，必须由驻藏大臣监视，履行“金瓶掣签”的手续，新的“呼毕勒罕”（即转世灵童）长大举行“坐床”典礼，须由驻藏大臣主持，他们的家属不得干预政治事务。达赖、班禅所管庙宇及喇嘛人数，必须造册，送交驻藏大臣衙门，以备稽查。各寺院所管寨落人户也要造册，呈送驻藏大臣，以备随时查阅。喇嘛外出朝山礼塔，须向驻藏大臣领取照票，不准潜行私越；西藏地方财政，皆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收支情况要呈报驻藏大臣衙门，如发现官员贪污受贿，由驻藏大臣查办治罪。出入西藏的贸易商人，由驻藏大臣发给执照，商人名数，要登记造册，以备核查；西藏地方驻军的编制、粮饷、赏罚、出征、换防等，都由驻藏大臣管理，军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放，每年春秋二季，驻藏大臣巡边查视，检阅驻防官兵，处理各项事务；西藏的外事，皆由驻藏大臣负责处理，邻国与达赖、班禅通信，必须报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回信也要由驻藏大臣酌定，不能私自发给。到西藏布施瞻礼的外国商旅，入境时要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离境时，发给照票，再行遣回。综上，驻藏大臣权力的提高，标志着清廷对西藏

管理的加强,这对密切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对巩固边疆与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乾隆为了和亚洲各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在战败廓尔喀的善后处理的过程中充分反映出这一点。当清军深入廓尔喀境内,逼近首都阳布,两国议和后,清廷没有向廓尔喀索取一寸领土,赔偿一分银两,只要求保证永远不再侵犯。而且“于藏内边界,一一设立鄂博,毋许私行偷越。……嗣后以济咙、聂拉木以外为界,尔部落人等不得尺寸”^[278]。同时恢复藏廓两地商业贸易,便要遵照新定章程,听驻藏大臣酌拟次数,公平交易,因此廓尔喀把大批牛、羊和粮食运入西藏,从西藏运回大量盐、茶等生活用品。从此,清廓两国友好相处,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发生鸦片战争时,“廓尔喀亦遣人禀驻藏大臣,言小国与里底(英吉利)所属之地相邻,每受其侮。今闻里底与京属(指广东等地)构兵,京属屡胜。臣愿率所部往攻里底属地(即印度)以助天讨”^[279]。这表明廓尔喀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英国侵略,从而证明了乾隆对廓尔喀外交政策是正确的。乾隆对亚洲各国的和平友好政策,不仅稳定了亚洲的局势,而且对亚洲各国抗击西方殖民者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注:

[1][28][30]昭槠:《嘯亭杂录》卷2,图文襄公用兵。

[2][4][5][6][7][8][9][10][11][12][17][20][21][22][23][24][31][32][33][34][35][36][37][38][40][41][42][44][46][57][58][59][60][61][62]勒德洪:《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上。

[3]《清太祖实录》卷6。

[13][16][19][65][法]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见《清史资料》第一辑。

[14]魏源:《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一。

[15][47][48][49][50][51][52][53][56][63][64][66]勒德洪:《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下。

[18][26][27]《清圣祖庭训格言》。

- [2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0,第4013页。
- [29]《清史稿》卷二251,图海传。
- [39]《清圣祖实录》卷54。
- [43][45][55]《八旗通志》卷149,图海传。
- [54]《八旗通志》卷126,鄂札传。
- [61][91][107]《平定两金川方略》卷首1,《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
- [68][97]郑栖山编纂,张羽新校注:《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总略。
- [69][72][84][85][131][139][147]魏源:《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 [70][71][116][119][160][167]《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23,《懋功屯务厅》。
- [73][75][77]《平定金川方略》《金川图说》。
- [74]岳炯:《岳襄勤公行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
- [76]《清世宗实录》卷5,雍正元年三月甲申。
- [78][79]《明史》卷310,土司。
- [80]《清史稿》卷513,土司2。
- [81][83]《清高宗实录》卷219,乾隆九年六月乙亥。
- [82]《清高宗实录》卷101,乾隆四年九月癸酉。
- [86]《平定金川方略》卷1,乾隆十二年二月癸酉。
- [87][88]《平定金川方略》卷1,乾隆十二年三月戊戌。
- [89][90]《平定金川方略》卷1,乾隆十二年二月己酉。
- [92]《平定金川方略》卷1,乾隆二十年六月癸卯。
- [93]《清高宗实录》卷557,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丙戌。
- [94]《平定两金川方略》卷3,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
- [95]《清高宗实录》卷754,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庚戌。
- [96]《平定两金川方略》卷4,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庚申。
- [98]《清高宗实录》卷857,乾隆三十五年四月丙辰。
- [99]《清高宗实录》卷887,乾隆三十六年六月甲午。
- [100][141][150]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163页,第152~153页,第160~162页。
- [101]《清高宗实录》卷890,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乙亥。

- [102][103]《平定两金川方略》卷首1,《平定小金川勒铭美诺之碑》。
- [104]引自陆正明:《乾隆帝“十全武功”初探》,见《中国军事史论文集》。
- [105]《清高宗实录》卷1444,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戊辰,《御制十全记》。
- [106]《清高宗实录》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乙卯。
- [108]《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 [109]《熙朝纪政》卷6,纪市舶。
- [110][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24。
- [111]《孙子兵法·谋略篇》。
- [112][124][128]赵翼:《平定两金川述略》。
- [113][117][189][193]李心衡:《金川琐记》2。
- [114]《清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己未。
- [115]《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 [118][166][194]见李涛:《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中国藏学》1993年第1期。
- [120]李心衡:《金川琐记》12。
- [121]李心衡:《金川琐记》3。
- [122]《清高宗实录》卷298,乾隆十二年九月庚子。
- [123][197]李心衡:《金川琐记》15。
- [125]《清圣祖实录》卷119,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癸未。
- [126]《平定金川方略》卷22,乾隆十四年正月甲子。
- [127]《清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戊辰。
- [129]《平定金川方略》卷3,乾隆十二年八月辛巳。
- [130][136]昭桂:《啸亭杂录》卷4,《金川之战》。
- [132]《清高宗实录》卷300,乾隆十二年十月丙寅。
- [133][135]《平定金川方略》卷5,乾隆十三年正月丁未。
- [134]《清史列传》卷17,张广泗传。
- [137]《平定金川方略》卷8,乾隆十三年七月辛卯。
- [138]《清史稿》卷301,讷亲传。
- [140]魏源:《圣武记》卷7,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 [142][146]《清史稿》卷301,傅恒传。
- [143]《平定金川方略》卷22,乾隆十四年正月癸亥。

- [144]《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九日谕。
- [145]《历代名将言行录》卷13,《北国史宁语》。
- [148]《清高宗实录》卷301,乾隆十二年十月癸未。
- [149]《平定两金川方略》卷69,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丁巳。
- [151]《册府元龟》卷427,将帅部、受降。
- [1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58页。
- [153]参见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四川省懋功直隶厅。
- [154]《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丙辰。
- [155]《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庚辰。
- [156][158][159][177]《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丙戌。
- [157]《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辛巳。
- [161][179][187][190]见曾唯一:《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 [162][164][191]《清高宗实录》卷1008,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壬申。
- [163]《清高宗实录》卷1007,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己巳。
- [165]《清高宗实录》卷1009,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庚寅。
- [168]李心衡:《金川琐记》14。
- [169][170][172][174][175][176][178][180][183][188]《四川通志》卷87,武备、屯练。
- [171]《清高宗实录》卷1053,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庚寅。
- [173]《清史稿》卷120,食货志1。
- [181]李心衡:《金川琐记》4。
- [182]《清高宗实录》卷1016,乾隆四十一年九月辛未。
- [184]李心衡:《金川琐记》4。
- [185]李心衡:《金川琐记》9。
- [186]李心衡:《金川琐记》11。
- [192]《清高宗实录》卷1017,乾隆四十一年九月戊戌。
- [195]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5。
- [196]《清史稿》卷101,《乐》8,阿尔萨兰、大郭庄、四角鲁为舞蹈,得梨、柏且尔、得勒窝是乐器。
- [198]《清高宗实录》卷110,乾隆四十五年三月辛丑。

- [199]《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7页。
- [200][205]《明清史料》庚编，第9本，户部为巴忠奏移会。
- [201][202][212][213]《巴勒布纪略》卷1。
- [20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称一史馆):《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5号，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奏折。
- [204]《明清史料》庚编，第2本，内阁抄出鄂辉等奏折。
- [206]《廓尔喀纪略辑补》卷25。此书为油印本，是在《廓尔喀纪略》的基础上，由已故的吴燕绍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摘录故宫所存有关档案，予以补充。其后，又由吴丰培先生核校增订而成，1977年印行。
- [207][209][215]《清史稿》卷525，藩部8，西藏。
- [208][235][245][248][265][271][279]《圣武记》卷5，乾隆征廓尔喀记。
- [210][229]引自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426页。
- [211][214][224][226][229][231][232]一史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4号，福康安奏折。
- [216]《清高宗实录》卷1309，第48~49页。
- [217][218]《清高宗实录》卷1310，第13~14页。
- [219]《清高宗实录》卷1311，第20页。
- [220]《巴勒布纪略》卷2。
- [221]《清高宗实录》卷1312，第35页。
- [222]《清高宗实录》卷1318，第6页。
- [223]《清高宗实录》卷1394，第10页。
- [225][230]一史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8号，福康安奏折。
- [227]《啸亭杂录》卷6，廓尔喀之降。
- [228]《东华录》乾隆朝，卷116。
- [233]《巴勒布纪略》卷22。
- [234]一史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62号，和珅奏折。
- [236]《清高宗实录》卷1383，第12页。
- [237][238][239]一史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5号，成德奏折。
- [240]《清高宗实录》卷1385，第8页。
- [241][242]一史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5号，鄂辉、成德奏折。
- [243][244]《卫藏通志》卷13上。

- [246]《清高宗实录》卷 1389,第 11 页。
- [247]《清史列传》卷 26,孙士毅传。
- [249]《清高宗实录》卷 1387,第 26 页。
- [250]《清史列传》卷 27,鄂辉传。
- [251]一史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67 号,福康安、勒保奏折。
- [252]一史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0 号,福康安奏折。
- [253]《廓尔喀纪略辑补》卷 18。
- [254]一史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6 号,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奏折。
- [255]一史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3 号,鄂辉、成德奏折。
- [256][257][266]《廓尔喀纪略辑补》卷 28。
- [258]一史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5 号,福康安奏折。
- [259]引自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 458 页。
- [260][261][262][263]《廓尔喀纪略辑补》卷 33。
- [264]一史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7 号,福康安奏折。
- [267]《廓尔喀纪略辑补》卷 35。
- [268][270]《廓尔喀纪略辑补》卷 37。
- [269][272]《卫藏通志》卷 13 中。
- [273]《清高宗实录》卷 141,第 22 页。
- [274]《明清史料》庚编,第 9 本,刑部为内阁抄出上谕一道移会。
- [275]《明清史料》庚编,第 9 本,礼部为内阁抄出上谕一道移会。
- [276]引自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 470~471 页。
- [277]《清高宗实录》卷 1393,第 12 页。
- [278]《卫藏通志》卷 2。

第五章 清前期几位杰出的科技人才

第一节 杰出的治河专家陈潢

陈潢(?—16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杭州)人。他幼年聪颖,好读经世书,很注意研究农田水利方面的学问。因受当时社会风气和家庭影响,从小就热衷科名,可是“连试不遇”^[1],因而逐渐淡薄功名,不图仕宦,以布衣儒士洁身自好。他为人方正恬淡,慷慨好施,“喜与名士交,性慷慨,一言投契,挥手千金勿吝”^[2]。康熙十年(1671),陈潢为生活所迫,出外谋生,北上“遨游京师”,结果“困无所遇”,只好饱含满腔的忧愤离开北京,途经邯郸吕翁祠时,在墙壁上奋笔写了一首七言诗,诗曰:“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3]这首诗语句豪迈炽烈地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情怀。

就在这年六月,在朝的武英殿学士靳辅升授安徽巡抚,按照当时朝廷惯例,凡是州县以上的外官,而又兼有刑名钱谷之责者,都要聘请幕宾,协同料理事务。但是,靳辅离开京师之前“时留心访求,未得其人”^[4]。当他赴皖上任路过邯郸吕翁祠,读了陈潢刚刚挥笔疾书的壁上题诗,大为赞赏,又见诗文墨迹未干,估计作者一定出走不远,立即派人四出寻找,找到后,两人一见如故,谈了一个通宵,结成知己挚友,于是靳辅聘陈潢为幕宾。从此靳辅“一切受教,若鱼之得水也”^[5]。陈潢随靳辅治皖六载,“裨益实多”^[6]。康熙十六年(1677),靳辅调任河道总督,他深知陈潢的才能,便委以

河务。他们矢志同心，黽勉协力，专心治河。杨象济为《天一遗书》作跋说：“国朝治河之略首数靳文襄，文襄之绩得我浙陈氏天一之助，文襄前后疏稿皆其笔也。”^[7]靳辅也曾对康熙说过，陈潢“出则随臣荒度经营，入则偕臣料理文告”^[8]，“凡臣所经营，皆潢之计议”^[9]。陈潢辅助靳辅治河，“多资其经画”^[10]，先后达十年之久。他在治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当时不仅在我国是首屈一指，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水平了。

陈潢生活的时代，因自然和人为的原因，黄河经常发生水患。清初，汹涌澎湃的黄河，自青海省贵德县起，流经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夹带大量泥沙，“以斗计之，沙居其六”^[11]。这样浑浊的河水，蜿蜒辗转进入河南，从开封以下，地势平衍，土质松软，所以经常改道，而且“水缓沙停，河身淤垫”^[12]，使河床高于地面，“当伏秋异涨之际，使无堤以障之，势必至水行地上矣”^[13]。于是整个豫东、皖北、鲁南和苏北广大地区，成了它任意横行的地方。特别是自北宋熙宁年间，黄河南徙于淮，黄、淮河在清口交汇，合流经云梯关入海同时这里也是大运河出入的咽喉，南北交通的枢纽，因黄强淮弱，淮不敌黄，造成黄水倒灌，黄淮二水一起涌入运河，使之泥沙积垫，堤坝崩塌，败坏运道。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十五年，三十三年间无河决之患仅十年，尤其是康熙即位后，几乎无岁不决，因此“河患之深，日甚一日”^[14]。康熙十五年（1676），黄河和淮河皆发大水，“清水（即淮水）于原冲九处外，高良涧板工冲决口二十六处，高家堰石工冲决口七处，涓滴不出清口。黄水乘高四溃，冲决千家岗等处，灌入烂泥浅，将武家墩板工冲开五十丈，灌入废河，历杨家庙合淮水灌清水潭。又分一股入洪泽湖，由石工决口，亦灌清水潭”^[15]。同时“河道大坏，自肖县以下，黄水四溃，不复归海，决于北者，横流宿迁、沐阳、海州、安东等州县。决于南者汇洪泽湖，转决下河七州县，清口运道尽塞”^[16]。河患横行，不但“田禾淹尽，民多流徙”，而且运河的“粮艘北行，处处阻闸阻浅”^[17]。这就影响了当时的漕

运。漕运是清政府的生命线,每年有六七千只漕船,运载四百万石粮食经过运河运到北京,供给京师以作官俸、军饷和生活消费的需要,一旦“漕运无由北达”,京师便“危急异常”^[18]。因此,许多满汉大臣纷纷上疏指出,“国家之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19]。“如河道堤岸坚固高厚,虽值泛滥之时,水势顺流而下,上不误漕,下不劳民”^[20],可见治河已成为清廷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治河的重要意义,康熙早已有充分认识,他说:“河道关系漕运,甚为紧要”^[21],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22],以示国家的首要急务,时刻铭记不忘。并且认为,清初以来“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民生皆受其困”^[23],主要是河务不得其人。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康熙看到“河运皆困”^[24],就免去王光裕总河之职,任命实心任事的靳辅担任河道总督。

靳辅授职之时,“正值河患孔棘,黄水倒灌,高堰溃决,黄淮合并东下,淮扬大困,州县所在告灾”^[25]。由于“两河敝坏之后,前此覆辙频仍,闻者心惊,见者胆落,无不以畏途视之”。所以靳辅心中充满了“忧惶悚惧之念”^[26]。于是他就找陈潢谈了自己的想法,商讨治河事宜。陈潢针对靳辅的畏惧思想指出:“盘根错节以别利器,河久失治必有人起而任之,膺斯任者非公莫属”^[27],鼓励靳辅大胆任事。他又说:“遗大投艰,岂得无惧,但能实心力行,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潢草等下士,素有志于当世之务,而未获进身,无由建白,今亦正可相佐……以毕素志”^[28],表示自己将竭尽全力襄助靳辅治河。靳辅“一闻潢语,瞿然自惊,随应之曰:子能助我宣力王事,以报君恩,我亦何敢再荫身家之虑哉”^[29]。于是释忧惧而勇于任事,两人齐心奔赴治河前线。

陈潢参加治河以后,首先强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指出:“必以亲历度势为第一事也。”^[30]陈潢为了查明黄河的地形、水情和泛滥的原因,亲自沿河考察,“跋涉险阻,上下数百里,一一审度”^[31],甚至“疾风时潢独驾轻舟,深冒不测,测水之深浅,时之盈然若指

掌”^[32]，从而掌握了有关河患的第一手材料。他认为“中国之水惟河源为独远”，“经历既远，容纳无算，又遭西北沙松土散之区，流愈疾而水愈浊，浊则易淤，淤则易决”^[33]。其次是在治河实践中认真学习和总结别人的治河经验。长期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在治河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先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治河专家。因此，继承和综合他们治河成果对进一步治理河患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不可能有所创造和发明。所以陈潢博览中国古代治河图笈，并且“遍历河干，广谘情询”，“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34]。还劝告靳辅对“田夫老役有所陈说，皆宜采听，以备参详”^[35]。

陈潢在“周度形势，博采舆论”^[36]的基础上，经过周密思考，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治河方案。他为靳辅就治河问题草拟了八疏，伺日报清廷，内容包括大修工程计划，筹款和管理等项。可是，清政府“以西北军事未靖，经费不敷，河工大修暂停”^[37]。不久，陈潢再拟八疏，对原先大修计划进行了一些修正，压缩一些项目，于是廷议允行。

从此，陈潢把全部精力和智慧都倾注到治河中去，十年如一日地战斗在黄河大堤上。由于他善于学习，善于继承，善于在最新成就的基础上搞综合创造，因此他在治河上取得了很大成效，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潢认为根治黄河，既要治水，又要治沙，两者比较，治沙应居于首位。所以，他对明代著名的水利学家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理论十分推崇。他说这个治河理论“真乃自然之理，水合则流迅，流迅则势猛，势猛则新沙不停，旧沙尽刷，而河底愈深，于是水行堤内，而河遂其就下之性，方克安流耳”^[38]。但是，陈潢并没有墨守陈规，拘泥于前人的治河方法，而是在充分肯定、认真借鉴和努力继承“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基础上，敢想敢

干,革新创造,进一步发展了潘季驯的治河理论,从而“补印川(即潘季驯)之所未逮”^[39]。

陈潢为了更有效地“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达到既能刷沙,又能防水的目的,便在河道的近处修筑“缕堤”,在河道的远处修建“遥堤”,这种“缕堤之外又有遥堤”的办法,在河水小时能够“合水”,加快水的流速,可以更好地冲沙。河水大时又能够阻挡洪水,防止堤溃成灾。由于陈潢在河道内建起一道道“缕堤”和“遥堤”,“使水束于堤内,则一往奋迅,刷沙有力”^[40]。这样一来,“上可为洪湖受分泄之水,下可代下游受横决之水”^[41],有力地发挥了束水冲沙、御防溃决的作用。

陈潢利用“以水攻沙”的道理,发明了“开引堵决法”。这种“开引堵决法”,就是在河道“决口之下,故道淤处反筑一堰,截其微流”,使其“河底涸出”,并“开浚深沟数道”。与此同时,在河道“决口上游,相度形势,则开一引河,直通故道”。“遂开决口上流引河之口,黄流复际暴怒,有一道以泄之势,必直注引河,由引河而直趋故道,故道已开深沟,水有所容,必且沛然莫御,而停沙淤浅之处,便可随流而冲刷矣,河溜既归故道,而决口之事自灭”^[42]。由此可见,“开引堵决法”不仅能大大加快堵塞决口的速度,而且省工省料又安全。

陈潢在治河过程中,既看到“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对治河的重要性,也还看到“缓水停沙”对治河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能够科学地、辩证地对待“冲沙”和“停沙”的关系,使两者都服从于除害兴利的根本要求。因此,他将治河中的“沙害”,变为“沙利”,把对沙的消极防御变为积极利用。他所发明的“放淤固堤法”,就是在那些河堤不够牢固的地段,“建设涵洞,引黄灌注,复于月堤亦建涵洞,使清水流在月堤之外,堤里洼地不久淤成平陆,几与黄河水面相平,不但堤根牢固,而每年取土亦易”^[43]。同时还可以利用这种办法,把夹带大量泥沙的河水,引进到黄河两岸的低洼地区造田,变

弊为利。

陈潢不但积极治沙,而且也重视治水。他为了计算出河水的流量,控制河水的泄水量,创造了“测水法”。他“以推测土方之法,移而推测水方”^[44],此法即把河水的横切面积乘河水的流速,便可得出水的流量,流量的单位是“以水纵横一丈,高一丈为一方”^[45]。他利用这种“测水法”,“以上流之宽深,准下流之浅窄,量入为出以泄之”^[46],“此出彼入,使游波竞衍,不致薄堤,凡置闸通漕,率用此方”^[47]。这种“测水法”,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是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创造。

此外,陈潢为了防御和减轻洪水对堤坝的冲击,发明了“减水坝”。他根据分洪的道理,在河身狭窄的地方,也就是堤坝承受河水冲击力最大的地方,开渠引水,调节水的流量,然后再把水引入河面较宽的正河中去,“使暴涨随减,不致伤堤”^[48]。例如,他利用“减水坝”,把黄河的水引入洪泽湖,“助淮之弱以敌黄,使无内灌,庶几二渎均适,而可免遏蹶之患矣”^[49]。

陈潢的创造发明,加快了治河的进度,提高了工程质量。但是,他认为要根除河患,就必须综合治理,坚决反对当时十分流行的“重运轻黄”或“防河保运”的看法。陈潢指出:“运道阻塞由河道之变迁,而河道之变迁则以治河者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而其他决口则未之及焉”。“此但知论其形,未审其理耳。”^[50]“不知黄河之治否,关数省之安危,即无关运道亦无任其冲决之理,矧决口多则水势分,而河流缓,流缓则沙停,沙停则底垫,河道坏而运道日梗,原委相关,不容歧视。”^[51]所以,他主张要把黄、淮、运三河视为“表里”,相互关联的整体,必须“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而后无弊也”^[52]。

陈潢提出的综合治河方案,得到河道总督靳辅的赞同,根据这个方案的指导思想,对河患进行全面的综合治理。陈潢治河大体分为两个时期,从康熙十六年(1677)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称之

前期,重点是治河的大修工程,主要是解决严重的水患问题。所谓大修工程,包括下列几项:一是清江浦至云梯关到海口的疏浚工程;二是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的挑浚工程;三是修筑运河以西到高家堰一带的堤工;四是堵塞黄、淮、运沿岸的决口工程;五是深挑运河及清水潭工程,等等。除了大修工程以外,还要完成改运河口工程,挑皂河工程,修归仁堤工程等。这个时期治河工作是紧张的,任务是繁重的,陈潢在广大河夫辛勤劳动和积极支持下,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大修理及其附加工程,基本上战胜了河患。于是“海口大辟,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53]。由于“水归故道,漕运无阻”^[54],大批漕粮运往京师。而且原先被淹没的土地“逐渐润出”,使得“下河十余万顷皆沃产”^[55]。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以治河大修工程告竣,决定首次南巡,特意巡视了治河工程,亲眼看到治河取得了很大成绩,便问河道总督靳辅说:“尔必有通今博古之人为之佐?”靳辅“以潢对”。康熙召见了陈潢,为了奖励他治河功绩,授予陈潢“金事道”衔的地方官^[56]。

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这是陈潢治河的后期。他完成治河大修工程以后,就把治河的重点从解决水患转移到改善运河交通,进一步解决漕运问题。

此时,尽管水患减轻了,但是北上的船只出清口后,还要假黄河河道行驶二百余里,然后再进入运河。这段黄河航线,风大浪险,航道经常变化,不利于航行,因“黄流湍急,每船增牵二十余夫,日行二三十里,浅洲淤沙,劲须起驳,一遇暴风水涨,多致漂溺”^[57]。

因此,陈潢建议挑中河,以避黄河风险。于是从骆马湖,经宿迁、桃园至清河仲家庄,开辟一条一百八十多里的中河。自中河通航以后,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出清口,渡黄河,驶入中河,在黄河里航行不到二十里,大大减少了航运的危险。因为有了中河,“漕行无风浪之忧”,所以大批漕船可以顺利到达京师。又由于“中

河安流,舟楫甚便”^[58],从此“中河内商贾船行不绝”^[59],这就促进了南北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

由此可见,陈潢不仅在治河理论方面造诣很深,而且在治河技术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再加上他对治河工作认真负责,“不避寒暑,无分昼夜与大工为始终者,十年有如一日”^[60]。所以,在陈潢治河期间,“清水畅流敌黄,海口大通,河底日深,黄水不虞倒灌”^[61],基本上消除了河患,漕运也有了保障,甚至出现了为人们热烈讴歌的“黄河清”的现象^[62]。陈潢在长期的治河斗争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清代杰出的治河专家。当时人民群众为了表彰他对治河的贡献,把他称之为“河伯”^[63]。

陈潢对自己的治河工作是十分热爱的。但是,落后的封建制度不可能使科技人才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相反,它往往摧残人才,扼杀人才。陈潢也未能逃脱厄运。康熙二十七年(1688),陈潢竟被朝廷一些官僚,扣上“屯田扰民”的莫须有罪名逮捕入京。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夕,他还惦记着要把自己的治河经验传给后人,他说“宣防之法,可资后人遵守”^[64]。因此,他要自己的子孙把他治河文稿整理刊印,由于“陈氏子孙衰替,所著不存”^[65]。幸好在他逝世不久,他的同乡张藹生把他治河的部分文稿收集起来,编成《河防述言》一书,总共十二篇。后来到了咸丰年间,高中翰曾到陈潢后人家中“购求遗书,则治河诸文稿故在,因哀而录之,题曰《天一遗书》”^[66]。此书不见传世,可巧此时杨象济将此书抄录下来,杨氏抄本现收藏在北京图书馆。虽然陈潢治河大部分著作都已散失,可是《河防述言》和《天一遗书》,仍为我们保存下来一部分他的治河名言,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直到今天对我国水利科学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节 火器制造家戴梓

戴梓，字文开，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谪迁辽东，客籍沈阳，自曰耕烟老人，辽人称耕烟先生。他生长在明末清初，正值战乱不休的年代，其父戴苍，官至明监军道，一次“与海贼战，断肋破脑，不仆以勇”^[67]，充分表现了无畏的英雄气概，这些对戴梓一生的成长和政治生涯，无疑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他在十二岁时，做《阴钓台得寒字》一诗中写道：“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68]，小小的年纪，已在心田里迸发出报效国家的心愿。

戴梓负经世之才，“自喜于书，无所不读，尤好兵家言”^[69]，特别是“兵法战守诸器具，靡不究习”^[70]。他“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71]，十分精巧。由于不断钻研总结前人制造火器的经验，大胆地创造发明，终于成为清初著名的火器制造家，发明制造的主要火器有以下几种。

一、连珠火銃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驻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叛乱，接着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先后起兵响应，史称“三藩之乱”。康熙皇帝为了平定破坏国家统一、妄图分裂割据的“三藩之乱”，于康熙十三年（1674）六月，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领清军赴闽浙讨伐耿精忠叛军。八月，杰书到达杭州，“王闻先生（即戴梓）名礼聘之”，戴梓欣然以布衣应聘从征，“为王陈天下大势如指掌”^[72]，并“献连珠火銃法”。可是这种威力很强的新式火器，“当时未通用，器藏于家，乾隆中犹存”^[73]。

关于“连珠火銃”的形状和性能，由于“器藏于家”，没有制造使用，所以是时无记载。但是，到了乾隆年间，据纪昀所撰《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此时听戴梓的儿子戴亨说：

少时见先人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背，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74]

此言出自戴梓之子戴亨之口，应该是可信的。由上可知，“连珠火铳”是一种多装连发的管形火器，比起以往的鸟铳，简化了装弹药的手续，并提高了发射的速度，它类似近代的机关枪，却比西方人发明机关枪早了二百多年。

二、冲天炮

康熙十五年(1676)，戴梓因其父戴苍逝世，便离军回乡奔丧守孝。十月，虽然耿精忠献福州城率部降清，但是郑经却以台湾为据点，继续反对清朝，经常派兵骚扰福建沿海。因此，康亲王杰书以台湾未平为由，命戴梓回营，共商平台大事。戴梓以国事为重，守孝“未免”，迅速回到福州。为了早日平定郑经，统一台湾，“制冲天炮以献”^[75]。

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康亲王杰书班师回京，戴梓因“佐康王平三藩、征台湾”^[76]有功，随之来到北京，并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康熙见戴梓，“喜其能文，命直南书房，赏学士衔”^[77]。不久，又因戴梓“善天文算法”^[78]，被调到钦天监，监正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说：“冲天炮出其国，造之一年不成。”于是康熙命戴梓制造，结果仅用八天就造成了。因此，康熙“大悦，率群臣亲试之，即封炮为威远将军，镌治法名，以示不朽”^[79]。

关于戴梓所造“冲天炮”的详情，当时的记载现无史籍可查，但是《清朝文献通考》记载，“钦定名为威远大将军，即冲天炮”，这和戴梓造成“冲天炮”时，康熙“试放赐名”完全一致。虽然《清朝文献通考》是乾隆年间成书的，可是它是集录清初到乾隆时的各种文献编成，因此该书所载的“冲天炮”，就是戴梓制造的“冲天炮”。据

“通考”记载：

……冲天炮，各长二尺一寸，重二百八十五斤至三百三十斤，生铁弹重二三斤，大如瓜，中虚，仰穴，两耳铁环。其法先置火药于铁弹药内，次用螺蛳转木缠火药捻，裹以朝鲜贡纸插入竹筒，入于弹内，下留药捻一二寸，以达火药，上留药捻六七寸，以达火药，上留药捻六七寸于弹外，余空处亦塞满火药，以铁片盖穴口。外用蜡封固于小膛底上。火药间以木马加土寸许，乃安铁弹于大膛，又加潮土数寸以隔火。如放二百步至二百五十步，用药一斤三两，百步增二两。如放二三里，用药三斤。火门施烘药，次以炮尺高低变数定之远近，其最远在炮尺四十五度，本变上下若干即减远若干。监时施放，先点弹口火药捻，再速点火门烘药^[80]。

这种“冲天炮”以后有所改进，据《皇朝礼器图式》记载，此炮分为两种：

其一，“御制威远将军炮”，“铸铜为之，前哆后敛，形如仰钟，重七百五十斛，长二尺五寸，口楔花文，中双鱼形，间以苻藻隆起五道，底横连铁轴。受药八两至六斛，铁子自三十斛至三十五斛，入药炮内，间以木加土如许，乃入铁子，复置药子内，以螺旋木绕药线，外裹朝鲜贡纸，盛以竹筒入于子内，后出线寸许，以达炮药，前出六七寸，以待燃子外仍实火药，隔以湿土，铁镞掩炮口固以蜡，发时行燃铁子药线，再速燃火门药，炮发子出，迸裂四散，内用最烈。远近以受药若干及炮尺若干度为准，载以四轮车”^[81]。

其二，“冲天炮”。“铸铁为之，前哆后敛，形如仰钟，重自百斛至三百八十斛，长一尺九寸五分，隆起五道，旁为双耳。……受药自六两至一斛，铁子二十斛，用法如御制威远将军炮，载以四轮。”^[82]

综观上述记载，戴梓发明制造的“冲天炮”，是一种大口径短体白炮，十分坚固，不易炸裂；而且装有炮尺，可以上下调整炮位的角

度,测算射击目标的距离,增加了准确性;同时炮弹是爆炸型的,“子在母腹,母送子去,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83]。射出后“迸裂四散”,“敌人遇之无不糜烂”^[84]。这种“冲天炮”是当时比较先进,威力很大的新式火炮,所以康熙皇帝下令京师和地方皆可制造,将其装备八旗和绿营,以增强清军的攻坚和防御的战斗力。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率师亲征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叛军,在昭莫多大战中,充分发挥了“冲天炮”的作用,以“三炮附其营,遂捷”^[85]。此话虽然有些夸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冲天炮”的威力,从而取得了此役的胜利。

三、蟠肠鸟枪

康熙二十五年(1686)六月,荷兰国王遣使致书,进贡方物,其中献上“蟠肠鸟枪”。“蟠肠鸟枪”当时在西方是比较先进的火器,康熙皇帝见此枪,不以为然,认为“是中国所有也”,便命戴梓“仿造”。戴梓受命后,观其形状和构造,仅用五天就制造了十支“蟠肠鸟枪”^[86]。康熙甚喜,把所造“蟠肠鸟枪”都赏给荷兰来使,以此表明中国火器制造技术不比西方落后,宣扬国威。这种“蟠肠鸟枪”,枪管内有了膛线,是我国最早的线膛鸟枪,射程远,命中率大,它是一种轻型的管状射击火器。

戴梓作为一名博学多才的火器制造家,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自己的才华得不到发挥,报国之心不能实现,晚年生活却遭不幸,他生长在明末清初,此时西方传教士纷纷来中国,深入宫廷,以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博得皇帝的欢心和依赖。康熙就是这样的一位帝王,身边有许多西方传教士,向他施加影响,尽管他是一代英主,但是对我国的科技人才不重视,创造发明不采用,甚至无端地加以迫害,戴梓的遭遇即为一例。戴梓发明制造的“连珠火铳”和“蟠肠鸟枪”,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采用,致使“器藏于家”或“赏赐之物”,我国火器得不到发

展,落后于西方,处于挨打的境地。另外,戴梓奉命入南书房和钦天监供职,出于报国热情,凭着自己的“心思巧密,好与西洋人争胜”^[87]。他在南书房期间,与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论律吕不合”^[88];后来到钦天监,因制造“冲天炮”,南怀仁“为之屈,心甚伎刻”^[89],许多西方传教士“咸忌之”^[90],于是“诬其通日本”^[91]。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不进行调查,轻信谗言,竟将戴梓免职,遣戍辽东,这是很不公平的。戴梓被发配到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以鬻书画卖文自给,“常冬夜拥败絮卧冷炕,凌晨蹣冰入山拾榛子以疗饥”^[92]。直到雍正四年(1726年)他七十八岁时,获得朝廷赦免。返乡途中,因年老多病,忧忿而死。这样一位“抱经世大略”,“刚直不阿”^[93]的科学家,报国宏愿未能实现,却离开了人间,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值得后人反思。

第三节 农学家杨岫与《豳风广义》

杨岫(1688—1785),字双山,陕西省兴平县桑家镇人。他是清代著名的农桑学家,《豳风广义》是其代表作品,该书内容丰富,见解精辟,思想新颖,通俗易懂,不仅对当时在我国北方推广种桑养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对今天我们研究农桑技术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杨岫出生在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家庭,生活在清朝的“康乾盛世”,这时许多文人学士热中功名,沿着科举的阶梯向上攀登,走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可是,杨岫和他们不同,虽然他是一名监生,并拜陕西大儒李中孚为师,学习治国安邦之道,但“岫遂潜心圣学,不应科举”^[94],“自髫髻即抛时文,矢志经济,博学好问。凡天文、音律、医农、政治,靡不备览”^[95],“洞究精微”^[96],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

杨岫所处时代,正值清朝的鼎盛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

到恢复和发展。他在家乡开馆办学期间,提倡实践,鄙视空谈,主张革新,反对守旧,这种科学的务实思想突出反映在对待农桑事业上。他认为“天生庶民,畀之食以养之,畀之衣以被之。盖食出于耕,衣出于桑,二者生民之命,教化之原,缺一不可者也。夫人生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再衣则寒。饥之于食,寒之于衣,得之则生,失之则死,耕桑之所系大矣哉!”^[97]

因此,杨岫为了解决食的问题,设法提高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他带领学生和亲人在自家地里进行“区种法”的科学实验,把作物种在低畦或浅穴的土中,在区畦内深耕细作,集中施肥,适时浇灌,除芟杂草,保活全苗等等。这种耕种办法效果很好,每亩地的产量竟高达八石(约一千斤),于是“区种法”在兴平附近各县迅速推广,成为陕西有名的产粮区。另外,杨岫为了解决穿的问题,又提倡在陕西种桑养蚕。但是,他的主张遭到当时比较流行、影响很广的“风土论”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南方生长的作物不能移植到北方种植,陕西的气候和土壤不宜种桑养蚕。杨岫对这种陈旧保守、有碍生产的传统观念,进行坚决的斗争,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他以历史事实批驳“风土论”者,列举《诗经·豳风》一诗中有关陕西种桑养蚕的记载,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夫邠岐(今陕西省彬县、旬邑等地)俱属秦地,先世桑蚕,载在篇什可考,岂宜于古而不宜于今”^[98]。可见,种桑养蚕最早“起自秦中,渐及谿地”^[99],由于“秦人自误于风土不宜之说,知耕而不知桑,是有食而无衣。……故每岁之中,必卖食以买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又兼诸凡之费,莫不取给于一耕”,这样农民“焉得不穷”^[100]。因此,只有种桑养蚕,方能“广开财源,以佐积贮,裕国辅治,以厚民生”^[101]。

其次,他从认识论上驳斥“风土论”,大胆实验养蚕。雍正三年(1725),杨岫“游南山(兴平境内),见槲橡满坡,知其有用,特买沂水茧种,令布其间”^[102],开始饲养柞蚕。雍正七年(1729),他又由

江浙引进桑苗蚕种,亲自动手,栽培桑种,精心养蚕。同时博览蚕桑典籍,访问各地蚕农,从而总结出适于陕西种桑养蚕的有效方法。因此,他的科学实验很快成功了,当他养的蚕结出雪白的茧子,缫出晶莹的蚕丝的那天,周围几十里农民纷纷前来观看,皆赞叹不已。杨岫“亲经实验,已获其益”^[103]的现实,说明以往认为陕西水土不宜种桑养蚕的看法是错误的。

到了乾隆六年(1741)杨岫将自己几十年种桑养蚕的实践经验,加以系统整理和科学阐明,撰写了《邠风广义》一书,他把书稿敬献给陕西省府,建议在本省推广种桑养蚕,指出书中“纲举目张,事详法备,本非迂阔难行之事业,实为利民富裕之良图”^[104]。“凡我秦人能依此书,家户力行,岁取丝三五斤,便能完通省赋税有余。况水丝一斤,货银一两四五钱,能买棉花二十余斤,足中人阖家一岁之衣。若能取丝百余斤,即可为中人之富矣,焉有饥寒之苦,流亡之患”^[105]。因此“秦中蚕桑一兴,民得衣食两全,荒欠有备”^[106]。如何有效地推行此项工作呢?杨岫认为“必须设一永久之法”,把劝导农桑作为考核州县地方官政绩的条件,所以他说:“岫再三思维,莫若先檄行州县,以种桑之多寡为殿最,再行题请定规。嗣后州县升迁卓异,必列劝课桑蚕,岁岁增益,实有成效一条。或设专管之员,专董其事,更无推委疏忽。如此永为定例,则官无不劝,民无不从,则万世裕国富民无弊之政,永垂不朽。”^[107]

《邠风广义》,全书共分三卷,约八万多字,附五十四幅插图。这部农桑古籍,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注重实践。杨岫为了破除“风土论”对秦中农民群众的思想影响,他公开宣称,该书的内容大都是自己实践、或他人经验的总结,“见者勿视为空谈”,故曰:“是书,本之农书,弃其短,取其长,试有实效者,撷其精以纂成之,非臆说也”,书中“诸法或得之古书,或访之南人,或出之己见。酌古准今,乃秦地蚕桑之程式也,行之无疑”^[108]。他又根据秦中气候和土壤的情况,以及科学实验的结

果,指出“水深土厚高寒之处宜树桑”,“地卑水浅处甚宜树桑”,“河决水淹之地急宜树桑”,“家宅坟园宜树桑”。可见虽然“木各有所宜土,惟桑无不宜,桑无不宜,故蚕无不可事”^{〔109〕}。而且种桑养蚕之利,数倍于五谷,“焉有乏食之苦,意外之灾”^{〔110〕},并以桑家镇自家为例,他说:“岫因博访树桑养蚕之法,织工缫丝之具,无不按其规程,尽其法则。先自树桑百株,于己酉年,始为养蚕。乡人每有笑其迂阔难成者,岫亦弗之顾,惟日夜经营,无少懈怠。既而蚕成,及缫水丝之日,乡人乃其相环视,见其丝坚韧有色,光亮如雪,睹所未见,莫不惊异。由是乡邻之中,多有效之养蚕者,迄今十有三年,岁岁见收,近来邻邑亦有慕效者”^{〔111〕}。这样就打消了一些农民的思想顾虑,大胆地种桑养蚕,使生活富裕起来。

二是法则详尽。杨岫为了使蚕农尽快熟练地掌握种桑养蚕的方法,他认为“民生济用,莫先于桑。谋衣者,不艰于养蚕,而难于树桑。若桑务一举,则蚕事自兴”^{〔112〕}。所以在该书上册中,他详细地介绍了栽桑的技术,如有种桑法,盘桑条法,压条分桑法,栽地桑法,修科树法,接桑法,择桑法等。另外,他在该书中卷里,全面地传授了养蚕的方法。首先要求准备一套养蚕工具,他说:“欲事蚕者,须于秋冬农隙之时,预置蚕具什物,自不至临时忙迫失措。凡蚕食、簇料、火料、蓐草、火具、薰荐、曲筐、盘槌、蚕架、砧刀、抬纲、叶筛、椽杓、蚕室,必先精制习熟,而后可望其获利。”^{〔113〕}其次讲述养蚕技术,包括有择种下子、浴蚕种法、初蚕丝下蚁法、劈蚁法、头眠饲法、停眠饲法、大眠饲法、上簇法、摘茧法、蒸茧法、澡水丝法、缫火丝法等。他在该书的下卷,还介绍了织经,“将纺织经诸法,绘其图形,解以尺寸,详述作法”^{〔114〕}。如脚踏纺车、解丝络车、经丝、经床、织经、纬车等。由上可见,《邠风广义》把种桑养蚕的全过程,并结合秦中的具体条件,作了详细的叙述,从而促使种桑养蚕技术在陕西迅速推广。

三是图文并茂。杨岫为了使《邠风广义》通俗易懂,不仅“辞近

俚鄙,语多重复,未免见哂于大方”,而且“树桑养蚕之法,织工缫丝之具,俱列图形,使人一见了然”。这样“田夫野老,稚子僮仆,人人可晓”^[115]。全书有插图五十多幅,这些图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导种桑养蚕技术的,如《终岁蚕织图说》,将一年十二个月,每月种桑养蚕须知事项,以文解说,以图示意。另一类是介绍养蚕的各种生产工具,如抬炉、薰荐、蚕筐、蚕盘、蚕槌、蚕架、蚕纲、叶筛、蚕椽、蚕杓等,以便蚕农自制。更值得指出的是杨岫为了使蚕农熟练地掌握生产技术,在一些重要的生产工序插图上配有内容一致的歌谣,易于诵读熟记,如《终岁蚕织图说》、《称连下蚁图》、《分蚁图》、《头眠图》、《大眠图》、《上簇图》、《摘茧图》、《蒸茧图》、《缫水丝图》等,都有五言或七言的民谣,这是《幽风广义》不同于以往农书的一大特点。

四是全面发展。杨岫撰的《幽风广义》,虽然是本讲蚕桑的书,但作者并没有片面强调蚕桑的重要性,所以他在此书弁言中明确指出:“致富之本,皆出于农。农非一端,耕、桑、树、畜,四者备而农道全矣。若缺其一,终属不足。”^[116]因此杨岫在《幽风广义》一书中,除了蚕桑内容外,还写了畜牧说,包括饲养猪、羊、鸡、鸭的方法,以及兽医学知识。另外,他对农耕也非常重视,不仅如前所说积极推广“区种法”,而且系统地总结了移栽小麦增产的经验,要求在施肥的过程中注意“时宜”、“土宜”和“物宜”^[117]。

乾隆七年(1742),《幽风广义》刊刻印行后,不胫而走,迅速在全国各地流传开了,不久陕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开始种桑养蚕,使得蚕桑业在我国北方逐渐推广。乾隆五十年(1785),杨岫在故里病逝,享年九十八岁,兴平县的人民群众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建造了一座祠堂,到了光绪年间,将祠堂改为双山学堂。解放后,把他的《幽风广义》进行了校勘,编入《中国古农书丛刊蚕桑之部》,1962年由农业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些无疑是表明后人对这位著名的农桑学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注:

- [1]陆懋勋:《杭州府志》卷 135,《仁绩》四。
- [2][32]魏源:《钱塘县志》卷 24,《人物议行》。
- [3][5][15][27][30][37][51][57][64]陈文述:《颐道堂文钞》卷 9,《家天一先生传》。
- [4][6][8][26][28][29][60]靳辅:《靳文襄公奏疏》卷 8,《义友竭忠疏》。
- [7][13][33][50]陈潢:《天一遗书》。
- [9]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 3 编实业、水利、靳辅传。
- [10]钱林:《文献征存录》卷 3,陈潢传。
- [11]乾隆《山阳县志》卷 10,河防。
- [12][40][44][46]乾隆《淮安府志》卷 6,河防。
- [14][34][52]靳辅:《靳文襄公奏疏》卷 1,河道敝坏已极疏。
- [16][48]钱仪吉:《碑传集》卷 75,王士禛:靳文襄公辅墓志铭。
- [17][58]《清史稿》卷 127,运河。
- [18][45][47][63]陈潢:《河防述言》杂志第 11。
- [19]《皇清奏议》卷 17,徐越:敬陈淮黄疏浚之宜疏。
- [20]朱之锡:《河防疏略》卷 10,覆河水貽害靡常疏。
- [21]《清圣祖实录》卷 116。
- [22][36][53][55]《清史稿》卷 279,靳辅传。
- [23]《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 [24]咸丰《清河县志》卷 5,川渚。
- [25]靳辅:《靳文襄公奏疏》,序。
- [31]陈潢:《河防述言》审势第 2。
- [35]陈潢:《河防述言》任人第 4。
- [38]陈潢:《河防述言》堤防第 6。
- [39][42]陈潢:《河防述言》疏浚第 7。
- [41]陈文述:《颐道堂文钞》卷 9,高堰建二堆议。
- [43]靳辅:《靳文襄公奏疏》卷 8,河工守戍疏。
- [49]乾隆《清河县志》卷 5,河防。
- [54]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二十三年七月。

- [56]《清史列传》卷 71,陈潢传。
- [59]《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卷 32,治河一。
- [61]《清史稿》卷 126,黄河。
- [62]同治《徐州府志》卷 5 下,纪事表。
- [65][66]陈潢:《天一遗书》跋。
- [67][69][79][83][86][92]《耕烟草堂诗钞》附录,耕烟先生传。见《辽海丛书》2。
- [68]《耕烟草堂诗钞》卷 1,见《辽海丛书》。
- [70]《耕烟草堂诗钞》跋,见《辽海丛书》。
- [71][73][88][90]《清史稿》卷 505,戴梓传。
- [74][87]《阅微草堂笔记》卷 19,滦阳续录 1。
- [75][85][89]《国朝诗人征略》卷 13。
- [76]《清画家诗史》乙上,第 38 页。
- [77][78]《嘯亭杂录》卷 9,戴学士。
- [80]《清朝文献通考》卷 194,兵 16。
- [81][82]《皇朝文礼器图式》卷 16。
- [84][91]《清稗类钞》工艺类,戴文开制军用品。
- [93]《国朝著献类征初编》卷 120,词臣 6。
- [94][96]乾隆《兴平县志》卷 2,文学传。
- [95][99][102]杨岫:《幽风广义》官本昂叙。
- [97][98][100][103][116]杨岫:《幽风广义》弁言。
- [101][104][106][107][111]杨岫:《幽风广义》原书。
- [105][108][115]杨岫:《幽风广义》条例。
- [109]杨岫:《幽风广义》卷上,郭子章桑论。
- [110]杨岫:《幽风广义》卷上,河决水淹之地急宜树桑说。
- [112]杨岫:《幽风广义》卷上,栽桑说。
- [113]杨岫:《幽风广义》卷中,什物宜预说。
- [114]杨岫:《幽风广义》卷下,织维说。
- [117]杨岫:《知本提纲》卷 6,修业章。

后 记

鸿彬从1992年得病以来到2000年去世,与疾病斗争了八年。由于放疗的副作用,使他的生活质量极差,痛苦万分。作为夫人,我对于他的痛苦深有体会,有时真不知如何分担他的痛苦才好。然而,他顽强地活着,与疾病斗争着,这充分体现着他对事业、对家庭、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但是,最终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鸿彬对清史研究的执著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在病重期间,他仍然每天都用很多时间看书、写文章、整理书稿。如果有同事、同行、朋友来看他,他高兴极了,拉着人家侃侃而谈(虽然他的舌头又疼又硬,说话已很吃力),谈及的内容都是对清史研究的看法,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到后来,他实在没有能力再写的时候,面对写作计划及所收集的大量资料、卡片叹息道:“我要是晚病十年就好了。”就是在他弥留之际,还喃喃地说:“我不得不离开我所热爱的清史研究工作……”

这本《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就是他在病重期间整理的,他很想出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今天在他逝世两周年之际,我们全家想把这本书出版,以表对他的无限怀念。这一想法得到著名清史专家秦宝琦教授的支持,他在百忙之中帮助整理编辑并为本书作序。在此,对秦宝琦教授致以深深的谢意。

承蒙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本书得以出版,鸿彬的学生白杰同志在编排及校对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吕姝清

2002年10月20日